# 目 录

序 言 .................................................................................................................. 1

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中的冯・施韦泽先生的时代 ............................................. 3

让・巴蒂斯特・冯・施韦泽 .............................................................................. 3

《社会民主党人报》 ....................................................................................... 13

施韦泽和保守党 ............................................................................................... 39

施韦泽在北德意志国会中 ............................................................................. 42

施韦泽的独裁 ................................................................................................. 45

巴门一爱北斐特的代表大会 .......................................................................... 58

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反叛 ........................................................................... 64

爱森纳赫代表大会 ......................................................................................... 73

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和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解散 ........................... 73

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以后 ................................................................................ 84

施韦泽的结局 ................................................................................................. 100

我的国会活动的开始 .................................................................................... 114

在北德意志的制宪国会里 ........................................................................... 114

在北德意志国会和关税议会议中 ............................................................... 124

策略上的分歧 ................................................................................................. 134

德法战争 ......................................................................................................... 136

宣战前奏曲 ................................................................................................. 136

意见分歧 ......................................................................................................... 144

声明和布告 ..................................................................................................... 148

不伦瑞克常务委员会的被捕 .................................................................. 150

吞并和傀儡 ..................................................................................................... 156

我们的被捕 ................................................................................................... 167

我的以后的国会活动, 莱比锡叛国案及其他 .............................................. 176

德意志国会的第一次会议 ........................................................................ 176

第一次德意志国会会议 ............................................................................. 185

萨克森的其他事变 ......................................................................................... 187
<table>
<thead>
<tr>
<th>题目</th>
<th>页码</th>
</tr>
</thead>
<tbody>
<tr>
<td>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td>
<td>187</td>
</tr>
<tr>
<td>德意志国会的第二次会议</td>
<td>190</td>
</tr>
<tr>
<td>萊比锡叛国案</td>
<td>199</td>
</tr>
<tr>
<td>德意志国会的第一届第三次会議</td>
<td>205</td>
</tr>
<tr>
<td>我的演君案</td>
<td>208</td>
</tr>
<tr>
<td>我們的要塞監禁和在这期间所发生的事情</td>
<td>209</td>
</tr>
<tr>
<td>胡伯图斯堡</td>
<td>209</td>
</tr>
<tr>
<td>哥尼斯坦因</td>
<td>224</td>
</tr>
<tr>
<td>兹維考</td>
<td>225</td>
</tr>
<tr>
<td>自一八七一年到哥达的统一代表大会</td>
<td>229</td>
</tr>
<tr>
<td>各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td>
<td>229</td>
</tr>
<tr>
<td>两个派別的合并問題</td>
<td>232</td>
</tr>
<tr>
<td>一八七三年爱森納赫的党代表大会</td>
<td>239</td>
</tr>
<tr>
<td>一八七四年新国会的第一次会谈</td>
<td>242</td>
</tr>
<tr>
<td>合森多尔夫为联合开辟道路。联合的商谈</td>
<td>249</td>
</tr>
<tr>
<td>从哥达合併代表大会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前夕</td>
<td>263</td>
</tr>
<tr>
<td>合併工作</td>
<td>268</td>
</tr>
<tr>
<td>余痛</td>
<td>276</td>
</tr>
<tr>
<td>国会工作</td>
<td>278</td>
</tr>
<tr>
<td>我对巴黎公社的态度</td>
<td>283</td>
</tr>
<tr>
<td>新的迫害</td>
<td>303</td>
</tr>
<tr>
<td>一八七六年春天的哥达代表大会</td>
<td>306</td>
</tr>
<tr>
<td>一八七六年到一八七七年的竞选</td>
<td>311</td>
</tr>
<tr>
<td>一八七七年的国会</td>
<td>314</td>
</tr>
<tr>
<td>一八七七年的哥达代表大会</td>
<td>316</td>
</tr>
<tr>
<td>萊克森邦議會的选举——《未来》月刊</td>
<td>318</td>
</tr>
<tr>
<td>入狱的时机又成熟了</td>
<td>319</td>
</tr>
<tr>
<td>內部事件</td>
<td>324</td>
</tr>
<tr>
<td>一八七八年春季的国会</td>
<td>327</td>
</tr>
<tr>
<td>在萊比錫狱中和此时发生的事</td>
<td>329</td>
</tr>
<tr>
<td>霍德尔的行刺及其后果</td>
<td>330</td>
</tr>
<tr>
<td>第一个非常法</td>
<td>333</td>
</tr>
<tr>
<td>諾比林的行刺及其影响</td>
<td>336</td>
</tr>
<tr>
<td>一八七八年的国会选举</td>
<td>340</td>
</tr>
</tbody>
</table>
序 言

以前我自已曾希望能把《我的一生》第二卷写完，现在能如
愿以偿了。最近一年半以来，我的情况显著好转，因而工作能
力提高。可惜，这时我的亲爱的永远不能忘怀的妻子患长期的重
病，到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底她逝世才解脱了她的苦痛。

第二卷的篇幅比我原来预料的多得多，它在我的笔下发展成
一种党史，以我在我所达到的地位，这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些书
信和文件，我原以为已经遗失，却又找到了。在我所经历的一世代
以上的不安定的、过劳的生活中，为了小心起见，曾把许多东西丢
掉和忘记，而在彻底清查时又找到了。此外，因为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遗嘱，我共同继承他的著作遗产，数十年来我同弗里德里
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往来的信件多半又回到我的手里。这
些信件主要是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的，它们的主要内容我将在第
卷中加以利用。

假定一般说来我还保有生命和必要的力量，第三卷在较长时间
以后才能出版。准备工作还在开始。我也许必须把第三卷分为
两部分。它的内容包括反社会党人法的十二年，即人所乐道的党的
"英雄时代"的一段时间。我想以此来结束我这篇幅很大的著作。

最后一卷将附一人名表和内容索引。

苏黎世，一九一一年九月二日

奥·倍倍尔

* 原书第三卷并未附有内容索引。——译者
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中的
宫・施韦泽先生的时代

让・巴蒂斯特・宫・施韦泽

在拉腊尔逝世后几个相继领导他所创立的联合会的人物中，
让・巴・宫・施韦泽特别杰出。

联合会得到了施韦泽，就得到了一位很好地具备许多大有益
于他的职位的特色的领导人。他具有必要的理论修养，远大的政
治眼光和冷静的思考能力。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和鼓动者，他能够
把最困难的问题给最纯朴的工人讲清清楚，能像他那样懂得如何
激发群众热情，甚至使群众着迷的人是很少有的。在他当记者期
间，他在他的报刊《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批通俗科学论叒，
这些论叒都是最好的社会主义作品。例如他对马克思的《資本論》
的批评和后来印成小册子的论叒《死的舒尔茨反对活的拉腊尔》，
至今还不失其全部价值。作为国会议员，他也表现得十分干练和
精明。他迅速掌握现状并加以利用。最后，他也是一个深堪重视
的优秀演说家，使群众和敌人都受到感动。

但是除了这些良好的、有些还是出色的特点外，施韦泽也有一
系列的缺点，对于一个正在发展初期的工人党的领袖来说，这些缺
点对党是危险的。他走过了种种错误道路之后才参加运动，运动
对于他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一看出自己在资
产阶级中没有发展的前途，他这个在生活方式上早就堕落的人只
有到工人运动中去充当一个所谓他的野心同他的才能注定他充当
的角色，才有希望发迹，他就参加运动。他不仅想当运动的领袖，而且想当运动的统治者，并且竭力为他的自私目的加以利用。他曾在阿沙芬堡一个由耶稣会主办的学院里学习，后来又从事于研究法律，于是他从耶稣会的诡辩和法律上的强词夺理获得了精神武器。他就使这个本性诡诈狡猾的人成了一个政客，他肆无忌惮地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任何代价来满足他的野心，满足他的纵情享乐的需要，这些非有充分的财力是不可能满足的，可是他没有这种条件。况且在一切民运动中证实了一个历史性的老经验，即有纵欲习惯而无缺乏财力不能满足的领导人物，容易屈服于向前袭来引诱，尤其是当他们同时又相信，除了满足他们的野心以外还能够获得虚伪的成就的时候。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赋予它的领导人为独裁地位，这非常有利于施韦泽的企图的。但协会中比较有独立思想的会员也自然对独裁者的这种欲望不断进行斗争。有时反对派好像被他那蛮横无理的行为压制下去，并从联合会中排挤出去，但不久又有另一些人在另一些地方起来，重新开始对他作斗争。由于联合会的唯一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也非常有利于他的统治企图。他既握有工具，并毫不犹豫地使用它，对会员的精神统治变成专制的统治，他于是强暴地压制每一个异议和每一个使他不快的意见。同时，虽则施韦泽新心里瞧不起群众，他却懂得如何讨好他们，而且像他那种阿谀谄媚的样子，我从没有再遇到过。他把自己装扮成群众的工具，只听从“至尊的人民”的意志，而这至尊的人民只阅读他的报纸，并受他的意志的暗示。谁敢反抗他，谁就被指为动机卑鄙，被诬蔑为愚蠢低能，妄想爬在善良、诚恳的工人头上，以便滥用他们为他们的敌人谋利益。

像施韦泽逐渐扮演的角色当然只有在运动的幼年时期才有可能
能，因此我们原谅他那些狂热的追随者。今天不论是谁要想在
运动中扮演施韦泽那样的角色，即使在短时间内也是不可能的。

施韦泽是一个头等的煽动家，这种人如果当了国家的领导人，
就会成为马克思弗利（他本来醉心于马克思弗利的无原则的理论）
的高足。多年来他用上述方法在联合会中所保持的专制统治，只
有天主教堂的一些现象可以比拟。他不枉跟耶稣会士受业一堂。

我们（李卜克内西和我）所控诉施韦泽的是：他按照俾斯麦政
策的利益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自然是违反该会的大部分会员的
意志和心愿的）。我们认为这个政策不是德意志的政策，而是大普
鲁士的政策。这个为霍亨索伦王室利益而进行的政策，力求赢
得全德意志的统治权并用普鲁士的精神和普鲁士的统治原则来统
治德意志——这原则是一切民主政治的死敌。

在当时的一般情况和俾斯麦同自由资产阶级处于激烈斗争的情
况之下，他利用一切能有助于他的目的的手段，哪怕是最阴暗的
手段。我在本书第一卷里已经叙述过，在拉萨尔上台之前，俾斯
麦就有一个干练的代表——油漆匠艾希勒，在工人界中宣传他的
政策。拉萨尔不是以奴仆而是以平等的身份，作为一个掌权者对
另一掌权来同俾斯麦谈判的，但是他给与俾斯麦这种企图的支持比他自己大概想给予的还要多。他同俾斯麦的谈判固然表面上
在一八六四年二月间中断而且直到他（拉萨尔）逝世也没有恢复，
但是使工人运动为俾斯麦政策服务的努力则仍然如故，并且取得
一定的效果，而在俾斯麦的代表洛塔尔·布赫尔邀请卡尔·马克思
为普鲁士《国家通报》的撰稿人时遭到严词拒绝，也未改变这种
情况。

海伦·冯·拉科维奇（海伦·冯·达尼格斯）是拉萨尔的旧情人，
他就是为她而被卷入决斗丧命的，在她的《别人和我》一书中
（柏林，一九〇九年），叙述说，在一次夜间谈话中他问拉萨尔道：是
真的吗？你同俾斯麦有种种秘密勾当？他回答说：“关于俾斯麦，和他想要向我那里得到什么和我想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没有这种事，也不可能有这种事，你可以放心。我们俩都够老练的——我们清楚彼此的老练，结果不会是我们的（始终是政治上的语言）当面彼此嘲笑的。在这方面，我们受的教育太多了——所以只不过是拜会和富于机智的谈话。”

这段叙述可能是真实的。如果他不像他的旧情人在这里所叙述的那样想法，就是瞧不起拉萨尔的聪明和他的见识。一般说来，聪明有见识的人（也包括施韦泽在内），都不会误认社会民主党人能从俾斯麦那里得到什么和得不到什么，并且，也不会误认，如果俾斯麦与社会民主党人发生什么关系，也只是为他的利益想来利用他们而已，以后就会像丢掉挤干了的榨檬似地丢掉他们。或者是另一种情况，他们把自己出卖给他，为他服务，这在拉萨尔是不可能的。

事实首先说明了我的看法，即当副主席F.W.弗里茨舍代替伯恩哈特·贝克尔充当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时，前任副主席达麦尔博士向弗里茨舍建议，在萨克森王国进行鼓动时除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以外还要替普鲁士筹款游说，并且把报纸上所发表的有关这些集会的报道直接寄给俾斯麦，也把集会情形直接向他报告。这是在一八七八年秋季谈到反抗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时弗里茨舍亲自告诉我的。我当时在国会中发言反对俾斯麦时也利用过这个材料。

所以想使全德工人联合会有利于俾斯麦的大普鲁士政策的企图很早就有，而且长久存在。我的分析是为了要证明，施韦泽有意地为俾斯麦这种企图服务。

如果施韦泽内心里真诚喜欢他表面上所拥护的事业，如果党内每个同志都可以确信他只抱着热情和最纯洁的努力为工人阶级
服务，如果他能避免他的政治生活中所涌现出的十分可疑的暧昧态度，总而言之，如果他的全部行为能令人信赖，那么，他就会无可争辩地终身担任党的领导。每一个诽谤他的尝试，不论攻击来自何方，到他身上都会失去效用。他却不是这样，他必须维护他那不断下降的威信。最后，在他放下主席职位后，当每个人都敢于自由地说话，没有被开除的危险的时候，遇到了正是那些曾经对我们方面的攻击狂热地捍卫他的人们对他提出了侮辱最甚的控诉。所以那些听得他死的消息漠然置之无动于衷的人，若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会直到最后一刻还承认他为他们的领袖，对于他的纪念就会永远恭敬万分。

* * *

让·巴蒂斯特·冯·施韦泽在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二日生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根据他的祖先来判断，他的血统是意大利一法兰西同德意志的混血种。他的家庭在一八一四年由当时的巴伐利亚国王封为贵族，属于所谓老法兰克福的名门望族。

幼年的施韦泽在他的家庭中所耳濡目染的是不很高尚、并且发生很成问题的教育的影响。他的父亲曾一度充当不伦瑞克的声名狼藉的卡尔公爵（这位公爵在一八三〇年为了免于牺牲在民愤之下，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本国）的侍从，是一个浪荡子，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他的母亲是和丈夫分居的，独立门户，过着同样的生活。无怪乎年轻的让·巴蒂斯特由于这样的出身和在这种榜样下步着父母的后尘，只是他的双亲已把钱财挥霍净尽，他没有钱，于是负债累累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约在五十年代中叶，他也曾到柏林求学，在这里同克鲁马赫家族来往（克鲁马赫的妻子是他的祖母的亲戚），并认识了普鲁士反动派的领导人物，例如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施塔尔。后来他在著作中对普鲁士国家的本质作出尖锐和中肯的批判，就是从
在柏林居住期间同权威的社会阶层的交际得来的。当时的大德意志—奥地利立场不仅在他的家庭中而且在老法兰克福的市民阶层中是占优势的立场，这种立场使他的观察力特别敏锐。他现在意识到那个作为奥地利的死敌的国家最内在的本质。他的这种大德意志—奥地利的立场也表现在政治论丛中，其中一篇是八五九年施韦泽在法兰克福（他于一八五七年定居在那里当没有主顾的律师）发表的。这篇文章发表于奥地利—意大利—法兰西战争期间，以意在注目的《奥地利的事业就是德意志的事业》为题，并且要求全德意志支援奥地利。第二篇论文具有同样的倾向，题目是：《奥卡尔·伏格特对于欧洲现势的研究》。文章结尾说：奥地利的事业是欧洲公理和欧洲秩序的事业，是文明和人道的事业，而首先是德意志荣誉和德意志独立的民族事业。

第三篇论文在一八六〇年出版，题目是：《全国统一的唯一途径》，他显然左倾了。他自认是共和主义者，并且认为只有通过来自下面的革命导致德意志的民主统一，德意志才会有幸福。然而，13

后来他又沉溺于他的大德意志—奥地利的同情中，直到他同拉萨尔认识后，才终于转入小德意志阵营井认为唯有俾斯麦政策才能解决德意志问题。

一八五九年民众运动的开始和民族联盟的创立及其小德意志方面的努力，不能使施韦泽无动于中。与他当时的立场相合，他起而反对民族联盟。他认为《一八六一年一月》民族联盟只有声明拥护共和主义，也就是说拥护革命，才可望得到上帝的帮助。普鲁士并不比奥地利好些；必须在二者中作出选择以后，德意志才有可能统一。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由于他的协助，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创立了一个工人教育协会，施韦泽当选为该会主席。他在这里代表着同样的激进思想。一八六二年初，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德意志问题》，他在这里再次自认是霍亨索伦王室政策和普鲁士在德意
志的领导权的无情敌人，并且痛斥中立政党的拙劣。他现在显然是政治上非常忙碌的人。他还兼任法兰克福的体育协会主席，那些表面上不是政治性的协会，在当时却一起展开了热烈的政治活动。射击协会运动就是这种情形。施韦泽在这个运动中也显得很积极，并且在德意志射击同盟成立后，还担任该会的核心委员会委员。当一八六二年二月四日在法兰克福举行德意志第一届射击大会时，施韦泽是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和大会报纸的编辑。他当时同科堡公爵，即“射击公爵”，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在会场上他常常出现在他的身边，这当然同他以往的激进态度相矛盾，但同他一年之前在美因河工人会议上所作的彻底社会主义的激进演说相矛盾，这一点，我在本书第一卷已经叙述过了。

在这个时期施韦泽同时怀着几种企图。但是恶运突然降临。在法兰克福射击大会后不久，他被控告犯了两件罪行，这些罪行在他后来生活上投下一个阴影，并且作为他性格的标志是重要的。

首先他被控告侵吞了法兰克福射击大会账房的二千六百古尔盾。委员会方面对此并未提起控诉，这就使人认为，这件事大概还有争辩。相反地，我可以肯定，参加射击大会中央委员会的哥达司法顾问官斯特尔泰，曾署名在科堡《德意志工人总汇报》上发表一篇声明，证明侵吞公款是事实。几年以后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展开对施韦泽的反抗时，哥达支会派代表员一人到司法顾问官斯特尔泰那里问他，对施韦泽提出的贪污罪状是否属实。斯特尔泰证明属实。于是哥达支会又转与施韦泽接洽，把斯特尔泰的话告诉他，并请他控告斯特尔泰。施韦泽拒绝了。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些，因为他还忙得很。

另外一件更讨厌的事件是一八六二年八月在曼海姆的皇宫花园内发生的。一天上午施韦泽对一个儿童犯了有伤风化的罪行，
他被控诉，并被判监禁十四天。如果能肯定哪一个是谁事的儿童，处罚会重得多。这一点却没有人办到。但也许找到些别的，施韦泽也曾对之作同样非礼要求的儿童。他的判决就是以此为根据的。施韦泽当然主张自己无罪，人们在想为施韦泽洗刷的努力中，企图证明他无罪。为了历史的真实性，这种企图应该中止。不管人们对同性恋看得多么随便，无论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公园里，企图对一个学龄儿童满足同性爱，却是件卑廉鲜耻的行为。还应说明，如果施韦泽自己觉得无罪，他在就会留意对第一级法院的判决提起上诉。

这两件事迫使施韦泽离开法兰克福一个时期。在工人阶级它们自然也引起了对他的异常愤恨。次年，圣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后，当施韦泽认了拉萨尔并成了这个联合会的会员时，法兰克福的会员要求拉萨尔告诉施韦泽，让他不要再参加联合会的集会。拉萨尔拒绝了这个要求，认为这是胸襟狭窄的表现，这个加在施韦泽身上的罪行与他的政治无关。宠爱童话在希腊曾经是一种普遍流行的风气，政治家和诗人对此都有嗜好。此外，他对施韦泽的才能推崇备至。他给施韦泽写信说，受到的那种嗜好是不合乎他的兴趣的。他并没有表示怀疑，说施韦泽没有这种嗜好；他自然知道其中的原故。

一八六三年初，施韦泽在莱比锡的奥托·维忙特那里发表了一篇新的论文，题目是《奥地利的领导地位》。他为表示“尊敬和友谊”把这篇文章献给他的朋友巴伐利亚的一个旧军官冯·霍夫斯台登先生，序言是一篇沉闷的浮夸文章，有如亚尔西巴德①对他所喜爱的一个人的谈话。文章内容不只在一个方面有趣味。他在文章里完全正确地描述了普鲁士国家的性质，并且说明普鲁士完全

① 公元前四五○——四〇四年，雅典的政治家和将军。——译者
不适于统一德意志。此外，他不顾一切民主的约束，仍然支持奥地利的领导地位。他说，普鲁士国家根据它的历史发展同德意志全体对立，……这种发展迫使它在同一体土上并通过同一体富之道继续扩张，因而以吞并为出路。但是普鲁士的这个使命不是德意志的，而是普鲁士的。普鲁士按照它的内在气质，必然会注意到，不使程度不等地渗入一切细节的精神，国家的古代历史上的、特别是普鲁士的，主要是霍亨索伦的性质消失掉。

他强烈反抗这个同真正全体德意志不相容的普鲁士。他以下面的纲领方式说明了一个我们以后在别的场合还要遇到的观念。他说：“未来的德意志国家——不论它是个共和国还是个帝国——即使比现在德意志同盟的领土仅仅短少一个村庄，那也是民族的一个耻辱。说德语的最遥远的村庄的最小茅舍都有受全体保护的神圣权利。”

但是以后不久，这个庄严的声明并没有妨碍他去支持那导致、想导致、而且照他自己的理解必然导致民族耻辱的政策。并且这不仅关系着单个村庄或一座茅舍，而是关系着上千万德意志人的国土，这些国土较之霍亨索伦家族给他们王国命名的普鲁士省早几百年，就已经属于德意志国家了。最后，他要求奥地利占领导地位和整个奥地利加入同盟，如果别无他法，就以粉碎普鲁士来做到这点。因此，他要求，大德意志派毅然拥护奥地利的领导地位，并且不要把阵地让给小德意志派去鼓励普鲁士的领导地位。

所以施韦泽在一八六三年初还是黑与黄的①大德意志派。几个月他就变成另一派。在这期间他认识了拉萨尔。他马上体会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机会使他可以在前途上得到一个符合他的野心的，并且在上述事件之后他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永远被剥夺的地位。

(1) 奥地利国旗的颜色。——译者
在資產階級世界中，他成了一个大家必然向他關門的人。

当一八六三年春天地萨尔来到法兰克福时，他們二人显然不久就做到情投意合。一同上游莱茵河法尔茨，也给这点造成机会，在出游中萨尔尔还发生一件趣事。参加这次出游的除了萨尔尔和施韦泽之外，还有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汉斯·冯·毕洛夫和当时还年轻的我們的已故同志文特林·魏斯海莫同志。他們先到莱茵河畔的欧斯特霍芬，要从那里往以施金根的故都著名的埃柏恩堡去游览。由于魏斯海莫的恳求，他的住在欧斯特霍芬的父亲邀请这群人吃午饭。萨尔尔在筵席上和魏斯海莫夫人并肩而坐。在谈话中间，夫人像妇女们常有的那样好奇地问萨尔尔，他是否相信他那些计划可以实现。萨尔尔拥抱她，并且一面说“您是个可贵的夫人”，一面吻她的嘴唇。于是他确实地封住了她的唇。对于这个违反一切社交礼节的侮辱，老魏斯海莫激动得喘息了几秒钟，而其余的人們则哈哈大笑。

在萨尔尔影响之下施韦泽的思想变化，立即鲜明地表现。在八六三年十月十三日他在莱比锡所作的以《进步党是停滞不前的支持者》为题的演讲中。这个演讲表明他完全改变了他迄今对普鲁士的态度，同时为拉萨尔政策作辩护，并且鲜明表示反对自由主义的态度，这在当时就是袒护俾斯麦和封建制度。在那个演讲中他说道：

“不过，我的先生們，如果您們听我的話，您們就会認識到，現代专制政体继同它那些成帮的贵族和牧师确乎与我們相敌对，因为专制政体一点也不顧理解革新；不过，您們同时也会認識到，我們真正的、顽固而激烈的敌人却藏在另外地方——即藏在資产阶級政党及其代理人中间。必須彻底坦白和肯定地說明，停滞不前的真正原因在于所謂自由党是目前最大、最重要的問題，因此，我們的斗争，即社會民主党的斗争，首先是针对自由党的。如果您們
堅持這一點，那么，我的先生們，你們自己就會說：為什麼拉薩爾不應該求助于俾斯麥？

根據這個理論，工人的主要敵人不是痛恨每一政治进步和社會進步的封建主義者，時髦點說，即上帝意志的最熱烈的擁護者，工人的主要敵人乃可謂為自由主義者，他們中間即使是最右傾的分子究竟還是近代發展的代表，是一定程度的文明進步的擁護者，沒有他們，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成立，資本主義制度才為無產者創造了提升自己為自由人和消灭人壓迫人的可能性。施韦泽知道他所宣傳的觀點是極反動的，是叛賣工人利益的，但是他還是宣傳它，因為他相信，可以借此飛黃騰達。

不言而喻，俾斯麥和封建主義者對於这样一个來自最左翼的帮助覺得稱心滿意，并且對於代表這種理解的人也斟酌情況，予以支持。但是這種同社會主義和共产主義所作的遊戲——沒有一個有理性的人會認為這比遊戲更重要的——卻不失為一種巧妙手法，把不太有膽量和見識的自由資產階級吓得不知所措而墮入俾斯麥的專制政治的羅網中。這種社會主義對資產階級越激烈的裝腔作勢，他就會越圓滿地達到目的。也因此，布赫爾才要求馬克思——這件事還須永遠重提——為《國家通報》寫甚至共产主義性質的文章。

但是，這個政策是和民主主義以及社會主義恰好相反，這個我先不必加以證明。

《社會民主黨人報》

一八六四年七月，施韦泽迁居柏林，並在那里入了籍。他的目的就是从事于出版一个党机关报《社會民主黨人報》，由他的朋友馮·霍夫斯台登供給資金，这个人同斯特拉赫維茨伯爵夫人結了婚，頗有些財產。令人詫異的是，拉薩爾在他的遺囑上一分錢也沒有撥
給他所贊成的事业。

尽管下列这些人中间，有一部分对施韦泽怀疑，可是施韦泽除了李卜克内西以外，还是赢得了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罗斯托夫上校、乔治·海尔维格、费力浦·贝克尔、弗·韋谢、摩里茨·赫斯和烏特克教授为撰稿人。当然是根据一个由施韦泽起草的，以鲜明、确切和简练著称的激进纲领来撰稿。这个纲领发表在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试刊号的第一版上：

我们党的纲领

决定我们党的努力和活动的是三个大观点：

我们反对创造那种从封建的中世纪延续到十九世纪的、把各民族不自然地分离和结合起来的欧洲国家组织——我们必须促进全世界各民族利益和人民事业的团结一致。

我们不要一个软弱的、四分五裂的、对外无力而对内则十分蛮横的祖国——我们必须是完整而强大的德国，一个自由的人民国家。

我们拒绝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对于社会的统治——我们必须争取到劳动治理国家。

这三个重大的依据一个共同基础的观点，在可能发生的任何问题上，以强制的必然性指引我们走上我们所要走的道路。

我们的原则是简单而明了的——我们永不害怕从中得出结论。

毫无疑问，如果自此以后把这个绝对无可争辩的、党内一切领导人物所公认的纲领当作党报的准则，就决不可能发生分裂，而会进入一个健全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并且非常可能使党早在幼年时代就有意想不到的扩充。

但是施韦泽是别有用心的。我在这里不谈他的同伙和《社会
民主党人报》的撰写者霍夫斯台登先生。霍夫斯台登是个软弱的人，对于事物的本质没有深入的洞察力。他受施韦泽的摆布和利用，而几年以后，当霍夫斯台登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经年累月坐在他的餐桌上的施韦泽花光他的财产以后，他就像一个榨干了的柠檬似地被施韦泽抛弃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正确态度并没有保持多久。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六期那篇《俾斯麦内阁和中、小各邦的政府》的文章里已经含有转变，施韦泽在文中对俾斯麦政策表示同情，虽然表示得还很谨慎。他在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第十四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开始发表《俾斯麦内阁》一系列的论文，在论文中他揭下了民主主义的假面具，结果使刚刚拉拢到的撰稿人多半又公开谢绝了。

在这些文章的第一篇里说：

"议会议制度就是平庸的统治，就是无力的空谈，而专制主义至少是勇敢的制度，至少是有所克服的行为。人们喊道，‘可耻呵，那些现在为反动派服务的变节者’。但是奇怪的却是，这些彻底的变节者（我们看见他们很快的身败名裂。--奥·倍·），不在普鲁士和维也纳那里（当然不是。--奥·倍·），而这些彻底的变节者恰恰是在俾斯麦那里。"

他所指的变节者，正是自以为革命不是他们分内事的人们，那些日资本主义制度（假设他们一般来说曾是资本主义的敌人）妥协的人们，并且他们自己说，资本主义在勃兰登堡容克保护之下是不会吃亏的，在这事上他们没有搞错。

施韦泽的第二篇文章是对普鲁士发展的观察：

"由这个基础开始（由选侯国开始），这个比较年轻的国家，特别是通过一个伟大的国王兼雄的常胜将军、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值得崇拜的人的伟大天才，于是扩展成一个辽阔而强大的王国。"
在这种西塔尔或特莱赤基也不能更响亮地颂扬弗里德里希大帝之后，他也给一八一三年的人民起义一番赞扬，这是普鲁士历史规律上的一个辉煌的例外。“总之，主要的是，普鲁士之为普鲁士，就是通过领导它的那个王朝形成的。”

随后他描写普鲁士忠君主义的本质。

“这样的精神，在有些德意志国家里固然可能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终究缺乏高度的政治严肃性和深厚的威信，而另一些国家里却成为对人们所谓的忠君主义的讽刺，这种王者精神在普鲁士却是一种确有根据的政治见解和政治方针。因为这个王朝和它每世的君主，都有内在的权利被认为是传统因素增长率数表的顶点，是旋转在习惯道路上的力量的重心，是国家整体内有机体的心和脑，只有这样和在这样假设之下它才可能并且才能获得它特有的实质和它现实的地位。”

此外他还认为，普鲁士国家在当时情况下还带有明显的未完成性、一个还未结束的历史发展的特征。因此就有了叫嚣要吞并的情况。普鲁士在德意志所负的这个使命，尽管人们要使我们相信的德意志的使命，而是一个普鲁士的使命。

所以没有人能比施韦泽对普鲁士国家的本质认识得更清楚，他的结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是下列问题也就更加要紧了：他怎么能够支持这样一个政策，这个政策，照他自己所承认的，是

35
非德意志的，因为只是大普鲁士的，并且如果它胜利了，就意味着民主主义的失败？这样一个政策，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不应该是支持的，是必须对它作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因为推行这个政策的就是民主主义的死敌。

施韦泽这样结束了他的第二篇文章：“一个真正普鲁士的内阁，一个致力于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它的导源于普鲁士邦的历史的本质的内阁，既不能像保守派历届内阁
在普鲁士久已做过的那样，按照一味依样画葫芦的保守主义仅仅
打算呆呆地维持现状，也不能像自由主义派在否认权力重心从国
王转到议会的情况下所意图的那样，力求在取消国家内在性质的
情况下谋求实施由它的历史向国家指出的对外政策。”

这用明白的德语译出来就是：普鲁士国家的特性在于禁止普
鲁士政府实施议会制度，如果你自由主义者还要在这方面去努
力，那么你们所要求的东西就是与普鲁士国家的本性相对立的。
所以你们满足于在国家机构中做个点缀品吧。在议会与政府处于
对立的地位的形势下，这种表示就意味着干脆是攻代议制之背和
支持作斯麦的计划。

在他的第三篇论文中他首先说道，他的第二篇文章的推论和
对此所进行的研究，引起了许多误会（！）。所以现在他要说得更
明白些。他说：

“由于普鲁士遵行必定导致吞并两公国（什利斯维希—霍尔斯
坦）的政策，这就把普鲁士历史的光荣传统由长期睡眠中唤醒，而
致力于普鲁士国家精神最里面的中心。

现时在普鲁士所行的政策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政策！……谁开
始吞并，谁就必须把吞并贯彻到底。还有其他。

一个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吞并德意志土地的普鲁士政府，
一个面对着公开的、由皇帝、国王和公侯声明不能维持的德意志政
治状况，于是又拿起‘弗里德里希时代的政策’（如同一家大德意
志派报刊所说的）的普鲁士政府，就不能在小胜之后停止前进——
它必须在所走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如果必要的话，用‘铁与血’
前进。

既同一个历史上已经长成的国家最自豪的传统相结合，而又
在决定性的行动面前胆小退缩，就是扼杀这个国家最深处的生
活力。
人們可以使这样的传统停止活动——但是不能接受它，以便加以毁灭。

一个普鲁士的大臣如果为普鲁士制定这样的政策，他一定会遭到弗里德里希大王亡魂的愤怒和他同时代人的大笑。”

每个善良的普鲁士人读了这样的文章，他的心该何以跳动？可是照这种说法，普鲁士似乎注定要做德国的统治者了。而封建主义者的心该何以喜爱这个比他们全体能更好地阐明和颂扬普鲁士国家的“历史任务”的人。这难道不应该加以注意和奖励吗？

施韦泽在这里所说的东西，也是预示俾斯麦进一步的政策，是真正鼓励（如果还有鼓励的必要）俾斯麦在已踏上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施韦泽在第四篇文章里谈到同盟会议和奥地利。因为没有比德国问题的这两个因素更受人关注的了。他批评起来也毫不费力。此外，施韦泽在这篇文章里对奥地利所持的态度，有如他后来的整个策略：是跟他早在一八六三年（也就是十年半以前）在他的小册子《奥地利的领导地位》里为歌颂奥地利所说的话，以及跟《社会民主党人报》表面上代表的纲领都恰恰相反的。

第五篇文章谈到国家的地位和德意志问题。他的结论是：

“在德国有行动能力的还只有两个因素：普鲁士和民族。普鲁士的刺刀或者德意志无产阶级的拳头——我们看不到第三个。

……普鲁士主义是德意志主义的敌人，但也是德意志目前当

局的敌人。

民族稳固地立在永久的基础上——如果普鲁士想起弗里德里

希大王曾是它的国王，德意志公侯们的宝座就必定动摇。”

23

普鲁士王位的情况如何呢？

读者一定会承认，写的是再简炼，再富于煽动性没有了。他在表明态度方面像鲸鱼似地曲折蠕动。他只让人揣测，但不说出他要
干什么。显然他对读者大众有所要求，他们被他指控普鲁士的诡辩所俘虏，这就是他的目的。此外，第五篇文章里洋溢着的倾向，浸透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整个政治内容。在那个德意志报界中，俾斯麦没有比这更巧妙的手笔为他的政策作宣传。

毫无疑问，这些关于俾斯麦的文章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一期上所登载的纲领有最尖锐的矛盾。极精明的施韦泽决不会没有预见到，他这些文章对刚才拉拢到的绝大多数撰稿人是最粗暴的当头棒。这篇显然是无与伦比的侮辱。所以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威·李卜克内西、海尔维格、约·菲·贝克尔和弗里德里希·赖附当然同达刊物断绝关系。

关于辞去撰稿问题，施韦泽在他的报刊第三十一期上的一篇文章写道：有几个人狭的头脑因为他们社论《俾斯麦内阁》而发怒。他得意地叙述，奥地利自由派的两个主要机关报——《新青年报》和《东德意志邮报》都站在他那方面，并且把上述报刊中的文章转载了几大段。此外，他还引用库纳曼的《新法兰克福报》上的话，说施韦泽所奉行的政策无非是拉萨尔政策的延续而已。

这是正确的！若没有拉萨尔的关系，施韦泽就很难把他所喜爱的政策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发生作用。但是拉萨尔和他之间却有所不同。拉萨尔在经济上是完全独立的，对俾斯麦是可以分庭抗礼的，施韦泽却是俯首甘低，甚至根据他那方面的品质，都谈不上与俾斯麦分庭抗礼。他的登堂表现是俾斯麦政策的工具，表现为一个得到拉萨尔主义表面的益处并巧妙地加以利用的人。

此外，施韦泽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们一旦看到自己不能在党內充当头等角色，就退出《社会民主党人报》。拉萨尔同他们正相反，不是一个不生效果的抽象的人，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客，不是一个耍笔杆的空谈家，而是一个做实际行动的人。

在这里，又不应该忘记，后来施韦泽对这个“不生效果的抽象”
的人，“耍笔杆的空谈家”卡尔·马克思百般献媚，想把他争取过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作壁上观。在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的答复中，他们发表了下列声明：

“下列签名者曾经答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并允许在撰稿人名单上公布自己的名字。但是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那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必须按照向他们宣布的那个简短纲领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他们自始至终没有忽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困难处境，因此没有提出过任何不合柏林时宜的要求。但是他们一再要求至少要像反对进步党人那样勇敢地反对内阁和封建专制政党。《社会民主党人报》所奉行的策略使他们不可能再继续为它撰稿。

下列签名者对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的看法，以及对工人政党对这类欺骗所采取的正确态度的看法，已经在一八四七年九月十二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七十三号上，在他们回答当时科伦出版的《莱茵观察家》第二〇六号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同‘政府’结成反‘自由资产阶级’联盟的主张的时候详尽地发挥过了。今天，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当时的声明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提到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的声明是：

“相当多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经常叫嚷反对自由资产阶级，而结果，除了德国各邦政府这种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现在像《莱茵观察家》一类的政府报纸竟根据这些先生的词句声称，硬说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不是自由资产阶级，而是政府；共产主义者不论和前者还是和后者，都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

人民，或者至少是（如果用个更确切的概念来代替这个过于一般的含混的概念）无产阶级考虑问题的方法却是和宗教事务部的人士所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八八页。——译者
想像的完全不同。无产阶级不会问，人民的福利对资产者是重要的还是次要的，资产者是不是想把无产者当炮灰。他们根本不想知道资产者想怎么样，他们想知道的是资产者被迫追求的目的是什么。问题就在于什么能使无产阶级取得更多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目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即官僚统治，还是自由派想望的制度即资产阶级统治。他们只要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跟他们在德国的地位比较一下就会相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且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

接着说：“无产阶级当然不会对等级的权利发生任何兴趣。但假如议会能够提出实行陪审制，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徭役、实现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真正的人民代议制的要求，假如议会能同过去一刀两断，根据目前的需要而不是根据旧时的法律制定自己的要求，——这样的议会是可以指望得到无产阶级最热情的支持的。”

三月四日，乔治·海尔维格和威廉·罗斯托夫都明白表示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明。三月五日，弗·赖谢在《莱茵报》上声明辞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撰稿职务，同时提到，他曾一再要求编辑部，应当对容克们不顾一切地作斗争。罗斯托夫在二月初曾给编辑部送去一篇详细批判军事问题的文章，虽然罗斯托夫一再催问，可是这一篇文章，还有他送去的一篇反对普鲁士国王的政府社会主义的文章都未见发表。一会儿说为篇幅所限，一会儿又说在等候适当的时机。三月十一日日内瓦的让·菲力浦·贝克尔在汉堡的《北极星报》上声明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行动。李卜克内西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九五年版，第二七、一五、二一五页。——译者
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与施韦泽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断绝关系的。赫特克教授在莱比锡虽未发表公开声明，但是他停止了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关系。在全体撰稿人中间暂时还留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只有巴黎的摩里茨·赫斯。他到一八六六年年底才脱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二篇声明注有伦敦三月十五日字样，刊登在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九日的柏林《改革报》上。这篇声明针对着施韦泽从《法兰克福报》转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想证明“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对待《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行为多么前后不一和本质上多么没有根据”。马克思证实，施韦泽在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十一日通知他《社会民主党人报》出版时顺便写道：

“我们向大约六——八个经过考验的党员呼吁，或者至少是向靠近党的人呼吁，希望他们撰写……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您，德国工人政党的创始人和它的第一名先进战士能够帮助我们撰写，那将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我们希望联合会在严重的斗争中遭到巨大损失之后能够得到您的支持，虽然它的产生间接地归功于您个人的活动。”

在纲领中从没有拉萨尔的名字。纲领中只包括三点：“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整个强大的德国是统一的自由的人民国家”，“消灭资本的统治”。因此，他和恩格斯才答应合作……施韦泽在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写信给他，他和恩格斯的允诺，在党内传开之后引起了极大的欢欣……马克思继续叙述，他在一月间如何对施韦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策略提出抗议，施韦泽虽然写信安慰他，但是刊物上的策略依然如故，他就重新提出抗议，于是施韦泽在二月十五日写给他下面一封信：

“如果您愿意像在最近的一封信中那样，向我说明一些理论问题，那我会感激地接受您的这种训诫。至于当前的策略中的实际
問題，那末请您注意，为了要判断这些情况，必须处在运动的中心。因此，您不论在任何地方和用任何方式表示您对我们的策略的不满，那对我们都是不公正的。您只有在确切了解情况的时候才能这样作。另外，请不要忘记，全德工人联合会是个团结一致的组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受自己的传统的约束（当时联合会成立还不到二十二个月，只有几千个会员。——奥·倍·）。要知道，事物 in concreto（实际上）总是带有某些复杂性。”

那么，不言而喻，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同志必然像他们所做的那样去做。施韦泽好像认为，他对他的撰稿人，可以像洛塔尔·布赫尔在俾斯麦同意之下要求马克思参加《国家通报》那样要求他们充当的角色。他们应该充当撰稿人，可是即使策略已经同他们作为同意撰稿的基础的纲领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他们也没有权利提出意见。要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写得尽可能激烈，越激烈越好，然后，你们就是供我掩盖我的私货的旗帜。施韦泽差不多就是这样论辩的。所以他听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报刊态度所提的指责，就宣称他们在中国不能判断德意志国内的事，这就是无耻。其实对于德意志国内的事，甚至绝不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比的人都能作出十分正确的判断。那时还不能指责俾斯麦说他掩饰他的政策和玩弄阴谋手段。

后来在一八七八年秋季，当适值反社会党人法即将降临，布赫尔邀请马克思为《国家通报》写稿的事成为公开讨论的对象的时候，布赫尔反驳马克思对这个邀请的说明。马克思为此在《每日新闻》上回答说：

布赫尔先生为《国家通报》拉拢我的那封信是一八六五年十月八日写的。信中有一段话，言：“至于内容，不言而喻，您将只依照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九五页。——译者
②同上书，第九八页。——译者

23
的学术信念，但是考虑到读者的圈子是 haute finance（金融贵族），而不是考虑编辑部，我建议来稿能写得只有行家才能明白了内在的含意。”相反地，布赫尔先生在《更正》中却说，他“问过马克思先生，他是否同意写一些所需要的文章，对情况作客观的叙述。关于马克思先生‘自己的学术观点’，我的信中根本没有谈过过”。

此外，布赫尔的信中还说，

“《国家通报》需要关于金融市场（不言而喻也有商品市场，因为两者是分不开的）动态的每月概述。他们问我能否推荐一个人，我回答说，没有人比您更适合做这件事了。后来他们就请我写信给您。”

布赫尔的邀请书的结尾是典型的，马克思的声明也把它抄录下来，

“进步（他指的是自由党或进步党资产阶级）在死亡以前，还会蜕换好几次壳；所以，谁还想在自己的一生中参加国家活动，就必须联合在政府的周围。”

那么，这就是使布赫尔投到俾斯麦怀抱中的原因，也就是使他向别人作同样尝试的原因。

按照李卜克内西在三月二十四日《莱茵报》上所发表的一篇声明中说，施韦泽在拉萨尔死后曾建议由马克思来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马克思拒绝使自己同一个他认为策略根本错误的运动相一致，而且他也无意于在那时政治状况中迁回德国。施韦泽曾约定，他新的刊物不奉行拉萨尔的策略，并避免任何向反动势力献媚，在这种条件下，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并且假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参加，他才表示愿意作撰稿人。最后，二人只是十分勉强地对此取得谅解，并且只是在反复保证之下，他才相信施韦泽（他曾听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九六三年版，第一六一——一六二页。——译者
到这个人最坏的事)的诚意。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政策很快得到了预期的效果。一八六五年二月初，全德工人联合会一个会员彼得·莱克斯，孙科伦的一次演讲中已经说：他觉得现今的政府较一个进步内阁更可爱。《社会民主党人报》未加一字的批判就把原话登载出来。三月十二日，巴门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人会义声明同意《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态度，并且完全赞成，在对普鲁士政府作判断之前，先等候看看它在各种时机所允诺的通过立法来改善工人阶级地位的建议结果如何。在这中间，它不是不可能取消三次选举法而代之以实行普遍、平等、直接和记名的选举法，这种选举法就是德意志工人的创始人拉萨尔所规定的现在德意志工人运动的首要目的。

这决议的形式和内容证明，这是施韦泽起的稿，并由《社会民主党人报》提倡到处都拿这个决议付表决，这等于为普鲁士政府来一次信任投票。

但是联合会中的反对派也已开始惹人注目。《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它的第三十八期上攻击公开的敌人和企图在党内散布分歧的假朋友。因为反对派也开始攻击联合会章程中独裁式的组织规定，于是必须把组织当作拉萨尔独有的事业用一种灵光围绕起来。从那时起，有系统地促进对拉萨尔的崇拜，每个敢怀其他意见的人，都被加上一种亵渎至上神灵的罪名。尤其是拉萨尔遗嘱上的这句话，‘我向全德工人联合会推荐法兰克福的全权代表伯恩哈特·贝克尔，选举他做我的继承者。他应当坚持组织，它将引导工人阶级走向胜利’，这些话竟成为区别真假拉萨尔分子的口号。施韦泽却支持这种渐渐接近愚蠢最后将变成宗教信条的见解。可是过了几年，竟然于把《基督和拉萨尔》这个题目列在许多次人民集会的议程上。一八六八年，弗里茨在柏林竟因为作了关于这个题目的演说而被控诉，检察官认为它有亵神之处。但因无从证明他是恶
意，弗里茨舍才被释放。

至于施韦泽对于他所促进的行动在内心中以为如何，那就无需加以分析了。

一八六五年四月五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四十三期上发表了一篇同论俾斯麦的文章非常相反的论奥地利国家关系的总结文章，其中说道：

“德意志人民党，同在一切问题上一样，在德意志统一问题上也是激进的。这就是说，它想把公认为又好又正确的思想完全没有例外地予以实现。

所以德意志人民党想把整个德意志统一为自由的人民国家。

我们是说整个德意志！不能缺少一个村庄、一个农场、那个在最远角落里的最小茅舍！

一个没有德意志的奥地利省的‘统一的德国’这种小德意志思想，对于民族和它的前途是一种重大的叛逆行为。（原文也有重点。）

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无条件，无例外！”

这是一种两面手法，施韦泽的目的是想借此使反对派缄默，因为反对派趁着论俾斯麦的文章的机会在联合会内外逞威风。他看出自己过于冒进。每逢他的举动受到公开的攻击，他就照例又要一次这样的手段。于是他又左倾了，并且以完全令人满意的激进行文章。他能这样，但也能那样。

他并不是孤独的，他还有一两个追随者。就在上述登载论奥地利的文章的那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特尔克发表了一篇关于国王寿诞庆祝会的辩护报道，庆祝会是由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在伊塞隆举办的，特尔克在会上还祝贺普鲁士国王万岁。特尔克在祝贺中表示，要想把全德工人联合会毁灭的心愿（如伊塞隆市长用无限残酷的镇压手段所企图的）是徒劳无功的。
“这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因为普鲁士内阁，与其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不如说由于国民经济上的原因，显然非常注意于联合会的努力——这是终久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人人景仰的国王陛下是工人的朋友。”

由于特尔克的衰谢，竟电报向国王拜寿，并接到下列的答复：
“伊塞隆工人联合会。陛下对于您的祝贺至为感谢。奉圣旨：斯特鲁堡，陆军中校兼侍从副官。”

在宣读这封公文的时候，如特尔克所继续说道的，大声高呼陛下万岁。在庆祝会大厅中挂起一张肖像画，画着普鲁士的鹰站在交叉的橄榄枝和桂树枝上，上面题词是：国王，穷困人的保护者万岁！……爱国的歌声响彻远方。一个退伍军人协会也不能比这做得更爱国了。

施韦泽把特尔克的长篇报道登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并没有加一个字的赘增或不满。特尔克正是照施韦泽的意见来办事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一八六五年九月二十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评论罗素爵士的一个通电时（通电中罗素对普鲁士和奥得利之间的加斯泰因协定作了最尖锐的批评）说道：加斯泰因协定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只是普鲁士政府的事情，普鲁士政府的政策是最明显和最彻底地违反普鲁士人民的意志的。并且他转过头来对着《十字报》（这报纸是用于警德国事件的外向来恫吓人民的）回答说：德意志民族的世仇不在法国，而在德国。他在这里指的是谁，他让读者自己去阐明。当时的工人在这种意义暧昧和两面手法中如何能够彻底明白？工人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写这些东西的才华智高在它之上，所以必须跟着他走。

《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的流传面很小，它只有几百个订户。所以这个报需要很多的津贴，并且谈不上给编辑人员一分钱的薪俸，虽然两者都是靠这来维持的。更令人诧异的是，在这样艰难的
经济状况下该报竟从一八六五年七月一日起改为每天出版，因此亏损几乎加倍，却没有任何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把债务增加到仅能弥补值得挂齿的一部分开支的程度。于是自然发生这样的问题：钱从哪里来呢？如果不是有希望从任何一方面取得巨额津贴，则刊物改为每天出版的计划就等于发痴。

联合会在不需要把刊物这样扩大，可是保守党的报刊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对进步党及其政策所不断进行的尖锐攻击，快意适情地大加传播，并迫使自由党报刊也大大重视《社会民主党人报》。这样，这家报纸就获得了一种与发行额不相称的意义。钱从哪里来呢？这问题对于自由党报刊也是现实的，于是施韦泽和霍夫斯台登认为有必要在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七十七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一篇对《莱茵报》的声明，该报在第一三九期上说：《社会民主党人报》同俾斯麦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在第一三九期上继续责难说，该报接受了最顽固集团的经费，把每周三天增加为每天出版。施韦泽和霍夫斯台登对《莱茵报》的声明说：

"《莱茵报》编辑虽然在这两段话语里有点谨慎（—奥·倍·），而且措词婉转（—奥·倍·），但总的看来颇无疑义地是指责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说我们抱有一般在政治上可能的最可耻、最卑鄙的态度，说正是有使命在报刊上代表社会民主党的我们，把自己卖出给一个敌对政党或者政治力量。

如果《莱茵报》的编辑部在获悉这个声明后立即撤回它的诽谤，我们就要就这种诽谤向主管法院提起诉讼，其余我们暂时保留。"

《莱茵报》编辑部在第二天（六月二十九日），对此作了答复：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冯·施韦泽先生亲收，柏林。"
《萊茵報》編輯部面對送交他們的聲稱，認為它不能使我們撤回任何東西，任凭《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提起用以恫吓的控訴。”

施韦泽对此的答复是：
“据此，则預約的訴訟即当举行。”
但是訴訟并未举行，施韦泽对这沉重的斥責同他对以往的斥責一样，置之不理。这就說明得够了。

在那时和其后几年，在柏林的工人界有一个人，因为有受政府雇用的嫌疑而非常惹人注目。这就是所謂工人普鲁士。事实上这个人是以每月五十塔勒的工资受人雇用的，直接为政府秘密参議瓦格纳服务的。同时普鲁士还为几家报刊供給警务消息，由此他可以得到一笔额外收入。普鲁士也就是那个在一八六六年秋季李卜内西回到柏林时，以违反禁令向警察告密的人，李卜内西因此被判了三个月监禁，这在本书第一卷内已叙述过。普鲁士特别喜欢参加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集会，并且时常在会上发言。李卜内西和其他当时在柏林的同志們确认他是施韦泽和瓦格納的居间人，但是施韦泽却大概同瓦格納有直接关系。

瓦格納，那个狡猾的擅长一切阴谋诡計的人，尽人皆知，他在一切社会政治事件中是俾斯麦的得力助手，同时他是管报道的参議，并且与俾斯麦和国王保持着最亲密的日常关系。所以施韦泽一瓦格納一俾斯麦这根链条沒有其他环节就连接起来，这对所有的部分都是很重要的。至于說施韦泽曾經同俾斯麦本人有来往，我认为是完全不会有的。施韦泽不是拉薩尔。我永不会忘记，俾斯麦有一天在国会里装做好奇的样子，拿着长柄眼镜放在眼前，把正走向讲坛的施韦泽从头到脚仔细地观察，他好像在說，“原来就是你依附于我的膝下。”

我們必須在摩爾肯馬克特认出施韦泽同瓦格納和更高级的关
系。所以当“博士”(这是施韦泽在那里的亲密称谓)日常诉诸领导时，官员和军官都对他非常客气，这是忘恩的特尔克若干年后同施韦泽决裂时所供认的。柏林警察总局显然是由于不可告人的原因热心为施韦泽恢复名誉，借此也可为瓦格纳和俾斯麦洗刷。由于这个原因，当古斯达夫·麦耶尔博士写他的作品《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和社会民主党》时(由古斯达夫·费雪尔在耶拿出版)，柏林警察总局非常乐意地让他引用秘密文件中关于施韦泽的材料。早在十五年前，克兰茨·梅林同志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时，警察总局也曾同样地提供材料，但是梅林拒绝了。

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认为通过施韦泽来支持俾斯麦的政策还不够，曾于一八六四年将信时致西格尔维格夫人，企图为这种政策作辩护，她在信里写道：

“下列两件事真正相差天壤：卖身给敌人，明地或暗地为他工作；或者像一个大政治家那样把握机会，从敌人的错误中得到利益，使一个敌人与另一个发生摩擦，把他逼上一条危险的道路上并且会利用不管是谁造成的。只要是对这个目的有利的局势。坦白地说，那些永远只站在未事事物的理想的人，在空中立的立场并不能凭着这种立场来确定眼前行动的人们，可能暗自以为是很杰出的人，其实他们什么用处也没有，完全不能做真正起作用的行动，总之，他们只能在广大群众中跟着才智较高的领袖走。”

伯爵夫人在这里安排了一个甚至使拉普尔也遭毁灭的领袖，因为首先，以她所描述的方式来讨论所需要的权力付诸阙如。我确信，拉普尔若是同俾斯麦共事，就必然失败，他的表演将以当众大出其丑而结束。认为一个俾斯麦能够或者愿意对社会民主党，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死敌，认真地让步，这证明是欺骗，这种欺骗完全不是现实的政策。因为俾斯麦必须专心致志的是同现
代资本主义势力取得谅解，并且为了这个目的，于必要时利用社会民主党作工具。但是社会民主党也不是一群羊，糊里糊涂地跟着领袖跑，由他随便率领和欺骗。哈茨费尔多伯爵夫人在她那时代和她所生活的环境中，可能相信这些，但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没有群众自觉的合作和走诚实正直的途径，是不可能持久的。群众不能容忍机诈的外交手段；一个领袖，如果他另有打算，他不久就会被识破，甚至会被活活地打下去了。

一八六五年夏季，施韦泽又乘机扮演进主义者，希望借此摆脱对他的控诉。这就是我在第一卷所述的施拉斯麦进入之施加暴力的科伦议员联欢会。施韦泽用那巧妙的惯技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反对政府的文章。当他在文章里因为进步党在科伦事件中的懦怯态度而加以嘲弄时，他也强调为普鲁士人要求完全自由的结社权和集会权。尽管他有出色的新闻记者技巧，现在竟写得非常尖刻，以至《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相当长的日子每天都被没收。当施拉斯麦于十月到比阿里兹会见到拿破仑，要求拿破仑同意他的“民族”政策的时候，施韦泽也把这种敌对态度转移到外交政策的批评。在这次谈判中，如一八六六年以后所证明，拿破仑是个受骗者。检察官对施韦泽的各种违反出版条例的罪行提出控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反对派也刺激检察官继续进行迫害。于是通过柏林和马格德堡的法院决定，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分支被封闭，因为这些分支是按普鲁士结社集会法第八条不准互相联合的独立政治团体。

但是这些迫害阻挡不住施韦泽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同强大的反对派作斗争。同时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在一旁极力挑拨，因为他不让联合会和他的政策受她所期望的影响。联合会中开始了真正的混乱，这是争权夺利的斗争。拉萨尔在他死前不久推荐施韦泽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理事会理事。但是杜塞尔多夫的代表大会却使
他失去了这个职位。伯恩哈特·贝克尔也同施韦泽不和睦，企图对他摊牌。所以他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联合会的代表大会，这是个使施韦泽由于他的过去最讨厌的地方。在这时，无能的贝克尔也遭到了很厉害的反对。使他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之前不久辞去了他的职位，于是特耳克当选为继任人。但在他的选举由基层组织认可之前，应由接替弗里茨为副主席的希尔曼（爱北斐特）担任联合会的领导。希尔曼原是施韦泽最坚决的敌人。现在利用他的地位，声明贝克尔和施韦泽之间所订立的使《社会民主党人报》成为联合会的正式机关刊物的合同完全无效，并取消它称做联合会机关报的权利。从那时起，施韦泽和霍夫斯台登把它改称为《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

在这期间，施韦泽进了监狱。他是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因为种种违反出版条例罪，其中还有亵渎君主罪和诽谤当局命令罪，被判处监禁一年。后来又增加了四个月，而且现在他的官权也被褫夺了。他在第一次判决后不久即被逮捕。但是施韦泽的新闻记者活动绝没有因此被禁止，像他在监狱中所享受的自由。是一个在柏林被判徒刑的政治犯过去和以后都享受不到的。他从监狱里以编辑的身份，后来又以联合会主席的身份负号施令。他的通信毫无限制，也时常接待访问。当一八六九他在鲁迈尔堡受几个月的监禁时，他竟能从事于在鲁迈尔堡湖中划船取乐。他也同样被许可自备伙食，这是柏林监狱里的政治犯在许多年后，即十九世纪末叶才得到的。

人们曾援用这些次徒刑，作为反对施韦泽是俾斯麦的代办这个指责的一种证明。这种理解完全错误。政府同它的政治代办所维持的关系是不必告诉检察官和法官的。再说，把一个有反对行为的政治代办暂时判刑，也是很适于破除对有关人员的猜疑，增加对他的信任。人人都知道，在拉萨尔把俾斯麦当作“融洽的旧舍邻
人”而同他进行数小时之久的政治谈话的时候，柏林法院并不怕把他判处一系列苛刻的徒刑，虽然当时俾斯麦和拉萨尔相互的关系是各界很多人都知道的。但以拉萨尔的健康状况如何经得起这长期的监禁，这倒使他很耽心。

在八六六年六月战争决定胜败的前数月中，《社会民主党人报》继续为俾斯麦政策服务，而且同以前一样狡猾巧妙。要想从一切的附带条件和矛盾中看出他是在推行诡诈的政策，就必须具有熟练的眼光和犀利的理解力。

一八六六年三月将终时，就是当他还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讲的话比较清楚一些，“同盟尸身在法兰克福的毁灭，就意味着民族的瓦解。如果这样，民族的诞生或许会从这三天开始。”他的一个汉堡信徒，沙尔迈尔，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声明说，给工人以普遍选举权，他们将是拥护战争的。同时《社会民主党人报》对进步党、民族联盟、三十六人委员会掀起连续不断的激烈攻击。此外还发表一些文章，其中对于鲁斯托夫的论民兵制度一书予以好评，并称赞民兵队伍为最廉价地提供最多战士的制度。

在三月间，《社会民主党人报》还藐视普鲁士的改组同盟草案，说它仍是“珍贵的材料”。到四月下旬，它却坚决拥护普鲁士的同盟改组。现在不再提起以往所提的保证，即新的德意志国家不能短少一村一庄。它也忘记了在八六五年九月下旬还写过；“我们最珍贵的宝物是，我们不知有奥地利和普鲁士，不知有巴伐利亚和黑森-洪堡，而只知有德意志、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语言。”

在四月底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哈布斯堡，霍亨索伦和德意志民主》里，终于说出了赞成取消奥地利；这样就把同盟中人口减少一千二百九十万。然后才算是组成了德意志，这就是说，然后普鲁士就得势了。
施韦泽以健康受了损害为理由一再请求给假，在一八六六年五月九日准假出狱。相反地，如果请假原因与真像相符，也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但是这个理由却显系说谎。施韦泽刚刚被给假出狱，就展开广泛的政治活动，这不仅证明了狱中的安静使他的健康又好起来，而且也可见主管机关对他的政治活动也未加限制。虽然在政治犯请假出狱时主管机关照例有个当然的要求，即请假者既因此项活动而犯罪入狱，他在请假期间就不准再去进行这类活动。

五月二十一日，施韦泽在汉堡出现，在那里“进行整顿”，六月十一日，在爱尔福特，六月十八日，在莱比锡，他在那里的一次演说为俾斯麦的改组同盟作辩护。但是这种辩护却不妨碍《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五月十八日的一篇社论中说：哥达派说要有一个自由的普鲁士居于德意志的领导地位，但是其实这就是说，所谈的普鲁士并不存在，也不能存在。

但是和这种有关普鲁士本质的的确的、十分正确的理解相对立，六月十六日施韦泽在莱比锡作《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的演讲时结尾说：

“但是如果能够推动普鲁士政府在对我们让步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原文如此！——奥·倍·）……满我们就尽全力来做我们这方面的事情，则胜利不是在奥地利旗帜之下，而是在普鲁士旗帜之下，不是在贝尼狄克①旗帜之下，而是在俾斯麦和加里波第的旗帜之下。”

还有比这更加自相矛盾的吗？

这些话作为施韦泽的政纲条文是很值得注意的，而且大概也得到了柏林高级人员的响应。但是，关于推动普鲁士政府对我们（就是对全德工人联合会）让步，我们要把乌托邦主义完全置而不顾。

①一八〇四——一八八一年，奥地利陆军司令。——译者
这就是希望俾斯麦让步（当然这是施韦泽自己也不相信的），这整个谈话都是瞎吹，因为施韦泽最后还亲自在六月三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写道，联合会中的混乱，正式使它在社会政治事情上什么都不能做。

他在六月三日以前也曾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过这种思想，而且事实上施韦泽应负全部责任的联合会中的混乱，一直到一八六七年就使联合会解体了。

如果我们在今日还认为，全德工人联合会那个时期对于革新事业有着显著的影响，例如，普遍选举权的获得，那也是与施韦泽的这些再三声明极为矛盾的。俾斯麦的改革方案遭到各界极其广泛的反对，所以俾斯麦当然必须欢迎任何对于他的方案的支持，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他之所以批准普遍选举权，那只是因为他非如此不可。这是自然的，用不着暗示和煽动。早在一八六三年夏季，即全德工人联合会才建立的时候，面对着奥地利的由各邦议会派代表组织德意志议会的改革草案，他要求在一八四九年在圣保罗教堂所决议的普遍选举权的基础上选举议会。俾斯麦把他所以如此和必须如此的理由，不仅后来在德意志国会中阐述过。他在一八六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即战前三个月，一个通知中也曾写道：

“我认为直接选举和普遍选举权对于保守态度，较之任何一种人为的、旨在制造多数票的选举法是更大的保证。根据我们的经验，群众比他们那些通过任何人口调查特许其有选民资格的群众的领袖们更真诚地关心于保持国家的秩序。”

俾斯麦又在一八六六年四月十九日写信给在伦敦的白思多夫伯爵说：

“根据我由长期经验所得的信念，我可以说我，那种人为的间接选举和多级选举制度是一种危险得多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阻碍了最高当局同构成人民核心和人民大多数的健全分子的接触……
革命的支柱就是选民团体，它们供给进行频繁活动的党一个布满全国和容易操纵的网，就像十七八九年以来选民所表现的那样。我毫不犹豫地声明，直接选举是革命的最基本的手段之一，并且我相信，我对于这类事情实际上已积累了一些经验。”

除了由于普鲁士三级选举制结果造成的烦恼所显然暴露的理由以外，特别有意义的是，在那一批后来凑成北德意志同盟的国家中，除了普遍选举权之外没有其他选举权可作共同的基础。此外，应当注意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在法兰克福的第一届德意志议会实施普遍选举权的传统，因为只有普遍选举权才能够稍稍排除甚至存在于北德意志广大民众中间的对于成立北德意志同盟的仇视。必须进一步附带说明和一再提醒，在那些年代实施普遍选举权的思想，鉴于三级选举的后果，即使在保守主义的各派里，也是受欢迎的，而且枢密参政瓦格纳早在一八六二年夏末，因而就在拉萨尔公开提出这个要求之前，就已提倡实施普遍选举权了。莱比锡的激进派工人也早在一八六二年初提出此项要求，并且从一八六五年以来成为不分党派的全德意志工人阶级的一个纲领要求。一八六五——一八六年冬季，俾斯麦的改革草案还没有发表，还没有任何人能想到这个草案之前，在无数的民众集会中已经传播了这个要求。所以根据这种情况看来，全德工人联合会本身对于批准普遍选举权不可能发挥显著的影响。

俾斯麦在五月九日把邦联会打发回家，因为他害怕会像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时一样，不通过他的作战经费。但是俾斯麦需要钱，他就用命令方法，毫无法律根据地发行了四千万塔勒的纸币，并指令设立公债处。全部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报刊都理直气壮地对这个违法行为开了火，但是施韦泽把它结束了，他对进步党党部不合理的攻击来卫护俾斯麦的措施。当战后俾斯麦要求拨款二千万塔勒建立国库时，直言不讳地说明战时首先不必
靠議院撥款，施韦泽又为之引证了一大批理由，但是不敢肆无忌惮地为那个计划作辩护。

《社会民主党人报》从一八六六年四月一日起由每星期出版六次又减为三次。因为战事临近，已经没有人再需要继续负担每周六期的重大牺牲。该报的订户已不满五百了。六月十七日，全德工人联合会莱比锡举行全体大会，仅有十二个代表参加，这表明了当时联合会的作用如何渺小。据说这十二个代表，包括施韦泽在内，是代表九千四百个会员的。在选举主席时，希尔曼（爱北斐特）败于波尔（汉堡）之手，这是施韦泽间接的胜利。《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又玩弄在他的莱比锡演说后必然在意料中的把戏。当奥地利在停战谈判时把威尼斯州转让给拿破仑，以便可以不必割给可恶的意大利，施韦泽同自由主义报刊一样发现这里奥地利背叛德意志，于是以此为口实，大张旗鼓地投入普鲁士的阵营，说它的“惊人的组织力量”证明了德意志站在它那边。从他这个立场出发，使他十分痛苦的是，当八月底奥古斯特·约翰·雅可比借着讨论国王的请愿书的机会，在普鲁士邦议会上发表一篇出色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坚决反对新组织，即北德意志同盟，因为这是以排斥德意志—奥地利和南德意志诸邦为先决条件的。雅可比进一步声明，反对政府现在向邦议会展出的对它战前和战时的违法行为负责任的要求。施韦泽固然充分赞扬了雅可比的勇敢和理想，但是他也用了婉转的词句为新事态作辩护。当后来九月二十日宣布大赦时，没有人能比自五月九日以来为政府作工作的他更应该遇赦了；他被赦免了十个月的徒刑。

一八六六年八月底，《社会民主党人报》突然以忧郁的语调承认：“德意志人民没有想像到德意志的统一是这样的。”当时所披露的有关北德意志同盟的未来宪法草案的东西确是令人忧郁的。俾斯麦，真正的现实政治家，现在达到权力的绝顶，趁热打铁，制订了...
一个在宪法权利方面还远远逊于普鲁士宪法的宪法草案。如果人们以为，施韦泽会因此大失所望，就是瞧不起他的聪明。谁要是像他那样认识现在统治着一切的普鲁士王国的本质，以及俾斯麦的本质和性格，谁就不会存其他的期望。但是他怎样的联合会为他的大普鲁士政策作辩护并使这种政策适合于他们的兴趣呢？他断言联合会是一种力量，所以“它能迫使他（俾斯麦）让步”这种主张究竟怎么样，现在表现出来了。

因为我们没有沉溺于幻想，所以我们就不是失望。可是施韦泽继续唱着老调。他首先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爱尔福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贯彻一个选举纲领，其中第一点必为柏林权威方面所欢迎。这一点是：“完全取消一切形式的邦、邦同盟。所有的德意志各族人民结合为一个由衷的、完全融合成一个有机体的国家，只有通过这种结合，德意志人民才能有一个光荣的民族前途。通过统一达到自由！”也就是说由俾斯麦政策的道路达到自由。这和德意志自由党所提出的口号相同，意味着继续吞并，不进行新战争，继续吞并是办不到的。纲领的第二点是关于国会和邦议会的普选、平等选举权以及给议员俸禄的要求。保证人民权利。在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所起草的纲领草案中关于全民武装的要求被施韦泽删去了，因为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报》，普鲁士已经证明，“只有它通过惊人的组织力量才适宜于领导德意志国防力量”，所以现在不应当向它提倡全民武装。第四点要求是按照斐迪南·拉萨尔的原则通过国家资助的自由组织来准备解决工人问题。所以也就是出自俾斯麦的恩典。爱尔福特的选举纲领终于促使摩里茨·赫斯，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一批撰稿人的最后一人也宣布脱离了。

施韦泽的这种态度可以同他在一八六五年春季在联合会中反对派逼迫时，于一八六五年四月五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声明的态度来比较一下，那声明说：
“所以德意志人民党把整个德意志统一为自由的人民国家。我们要说整个德意志。不能缺少一个村庄、一个农场、那个在最远角落里的最小茅舍。一个没有德意志的奥地利省的统一的德国这种小德意志思想，对于民族的前途是一种重大的叛逆行为。”

一八六五年的施韦泽就是这样把一八六六年的施韦泽判定了。但是他在一八六五年所写过的和所断言的东西，他的追随者却忘记了。只有根据他以前的另一种言论，即解决德意志问题要在德意志无产阶级拳头和普鲁士之间来选择，而当时德意志无产阶级的拳头还嫌过于软弱，不能按民主的意义来解决德意志问题，但这并不能作为一个工人党领袖让自己充当按专制意义来解决问题的工具的理由。姑且假定施韦泽的忠良，那么，他的策略仍然是对于民主主义的一种背叛，因为他支持了民主主义的最暴虐、最凶恶的敌人的政策。

施韦泽和保守党

在为一八六七年二月十二日选举北德意志制宪国会所展开的鼓动的时候，施韦泽开始了第二期的活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态度令人毫无疑问的看出，施韦泽不欲损伤与保守党的友谊。他公然倚赖同保守党交易来反对自由党，这也一定合乎俾斯麦的愿意。于是施韦泽又对进步党很激烈地开火，年老的摩里茨·赫斯把这个策略当作叛逆。赫斯认为最重要的是竭力加强议会议中的左派，借以完成一个还过得去的宪法，这是十分正确的立场，但不是施韦泽的立场。

施韦泽在他的追随者所供给给他的各候选资格中，决定充当巴门一爱北斐特的候选人，他认为这个选区胜利的希望最大。莱比锡的拉萨尔派想在莱比锡提出李卜克内西，我们则把提为萨克森的第十九选区的候选人，我们原希望他在这里可以获胜，可惜
竟未如愿。在莱比锡，当罗斯梅斯特教授谢绝后，我们宣布乌特克教授为候选人。施韦泽努力反对李普克内西的竞选。他说，李普克内西的竞选的出发点是始终以拉萨尔事业为眼中钉。那些暗中为李普克内西的竞选活动的人们是同奥地利的反动派有联系的。李普克内西在二年前还在公开的报刊上诽谤拉萨尔。谁若是选举李普克内西，谁就是公然自绝于拉萨尔和他的事业。他就这样以他的追随者对拉萨尔事业的盲目成见来投机。选举李普克内西，就是对拉萨尔的一种罪行。施韦泽一般对这事如何看法，表现在《致我的西里西亚和莱茵省的朋友和同志们》的号召中，其中激昂地说道：“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一个比较贤明的政府来到了!”一月底，施韦泽在巴门一爱北斐特又作了一次他那种巧妙的演讲，他并没有一字提到他在政治上和有时在国会中所站的立场。《社会民主党人报》对选举的结果抱着愚蠢的妄想。例如二月三日在第十五期上所披露的，说选举出来的代表们将在柏林过同居共炊的生活。人们谈着饮食共产主义等等。施韦泽甚至在还未有当选之前，《社会民主党人报》已把他当成胜利者来歌颂了。他在巴门一爱北斐特竞选的对手，除保守党的是俾斯麦，自由党方面是冯·傅尔肯贝克先生。选举那天带来了重大的失望。俾斯麦得六千五百二十三票，傅尔肯贝克六千一百二十三票，而施韦泽仅四千六百八十八票。他连复选也没有达到。在德意志其他地方的选举结果对于全德工人联合会也是件失意事。在这次巴门一爱北斐特的复选中，社会民主党人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二月二十六日一个选民大会上施韦泽首先讲话，但是他声明在听取大会意见之前，对于复选不发任何口号。最后他又讲话，他说：“在大会上曾多次喊出俾斯麦的名字，由此可知一般的情调是倾向哪方面了。他不便对各人规定他应该决定选举谁，每个人可依其内心的倾向来选举。”
因此，每人都知道他指的是谁。但为完成这出喜剧起见，他不惜与自己的讲话相矛盾而使大会通过一个声明不权的决议案。事实上俾斯麦在复选中几乎取得了施韦泽派全部的票。他以一万零一百九十六票对博尔肯首克的六千九百四十四票而当选。

施韦泽在一个声明中设法为这次的投票辩护，他说，

人民想使自由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竞选中所运用的卑鄙斗争方式而受到教训。“也许，工人们”，他继续说，“你们的投票并不是致敬于保守党候选人，而是致敬于首相，他主动地把自由党反对派很固执地忘记为你们要求的一种人民权利奉还给你们了。”

善良的、人民之友俾斯麦呵！

俾斯麦在爱北斐特选区当选几天以后，我在斯克森第十七选区（格劳乔，美拉内等）的复选中和一个民族自由党的候选人竞争。拉萨尔派的领袖在这里声明说（《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公开地报道），一个纯粹的拉萨尔派不能选举倍倍尔，按照拉萨尔派所采取的立场来说，倍倍尔是事业的叛徒。

俾斯麦是工人的恩人，而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则是工人的叛徒。这是施韦泽教育方法的果实。如前所述，尽管如此，我还是当选了，拉萨尔派的那几百张票不能有什么决定作用。

此后不久，俾斯麦因为在两个地方当选而辞去了巴门—爱北斐特的委任，所以必须在巴门—爱北斐特再举行一次选举。在重选时施韦泽得四千九百一十九票，自由党格奈斯特教授四千二百九十一票，保守党冯·德·海特两千五百九十四票，市长布莱特一千四百九十七票。于是又须进行复选，这次是施韦泽对格奈斯特。

《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公开地争取保守党的——工人的票。施韦泽在三月十七日的一个集会上更无人格，更不自重地献媚，在集会上他要求保守两相权取其轻者小者，那就是他。在社会基础上，工人党有许多事情能够同保守党携手。他为此引证了政府高级枢
密参议瓦格纳的讲话，凯尔勒主教的著作，俾斯麦的言论。

"保守党可以合作，以便工人通过他在议会中讲演。当保守党呼唤工人时（不管什么原因都是一样），他们都是全军出动。现在工人在呼唤，如果保守党不来响应呼唤，就是没有尽到道义上的责任。它若是不顾为自己惹起维持正当的愤慨，就应当前来。"

随后他对进步党发出恫吓。

但是这种无与伦比的无人格，不自重的行为仍旧没有得到报酬。施韦泽又失败了，是以七千九百二十三票对八千零一十九票败于格奈斯特。

施韦泽在北德意志国会中

北德意志制宪国会讨论了北德意志同盟的宪法并把它公布以后，第一届的立法机关选举定于一八六七年八月底举行。施韦泽仍是巴门—爱北斐特区的候选人，这次成功了。施韦泽在初选中得六千一百一十票，勒维博士（卡尔倍，进步党）三千五百八十八票，冯·西培尔教授（杜塞尔多夫）三千四百七十八票，所以再复选中是施韦泽对勒维，结果施韦泽以八千九百一十五票对勒维的六千六百九十一票获胜。这一次又有大部分的保守党员投了施韦泽的票。他在谢词中认为必须提出，保守党的工人正确地认识了情势，所以投了工人候选人的票。这个说法的正确程度如何，有后来人所共知的事实来表明，即保守党的领袖冯·古塞罗夫先生为了施韦泽的竞选亲手交给他的四百塔勒。当这个事实被传播出去以后，在柏林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无情的要求，要施韦泽把钱退回去。人们如何会那么天真。

但是施韦泽认为还必须做另一件事，应当对保守党提出他在国会中品行良好的保证，于是他就在九月十一日的声明中继续说道：
“我的社会立场是无人怀疑的；所以我在这方面无需说什么。在政治方面，我遵照我所遵守的和推举我为领袖的党的原则，在自由和人民福利的问题上，不可动摇地同极端左派（进步党）是一致的。如果有从外国来的严重危险威胁德意志祖国，我就尽个人所有的一切力量在议会内外支持现在是德意志民族威力地位的顶点的普鲁士国王及其政府。”

施韦泽的当选当然在他的追随者中间引起了极大兴奋，于是他就可以利用，他乘坐四匹白马驾着的车子在巴门一爱北斐特两城中作胜利游行。在今天，如果一个工人领袖要安排这样的胜利游行，就会把自己置于死地，可是他爱好这个。这种通常是驾着白马的胜利游行，后来也还屡次举行，例如在汉堡一阿尔托鲁，又一次在巴门一爱北斐特，又一次在卡塞尔。可是于此也要有必要的民众在路上，例如施韦泽自柏林往卡塞尔的旅行在明顿中断，从那里改乘火车于夜晚七时后才到达卡塞尔。在工人联合会开代表大会期间的许多天，他也是乘驾着白马的车，却要求他的党徒负担为此付出的高额费用。他们拒绝了。他们只支付由车站到市中的胜利游行费用，其余的必须由施韦泽自己负责。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

北德意志国会中现在除我之外，还有李卜克内西，由于施韦泽的参加，我们同他之间虽有争论。特别有趣的一次是在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的会議上，那次列在議程上的是关于义务兵役的法律草案。李卜克内西首先发言，发言非常尖锐，时时被多数派和议长猛烈打断。他特别对俾斯麦的政策作了无情的攻击，在结尾时说了这样的话：“世界历史将会踏步离开这个北德意志国会，因为它不过是专制政体的一块遮羞布而已。”后来由我发言。我异常镇静地阐述我们拥护民兵制的立场。在这中间施韦泽也登記发言，旨在发挥他那对立的立场。在提出休会建議时，议长按当时的章程宣读赞成和反对法律草案的登记发言人的名单，其中施韦泽被列为
反对者。因而他按议事规则解释说，他自己登记的并不是反对，而是赞成法律草案。

施韦泽随后在专题讨论时发言说，照李卜克内西先生所采取的立场，则普遍的义务兵役制也必须放弃了。附带说，我们二人还打算提出一个要求实施民兵制的决议案，也就是实现褒霍斯特和格奈塞瑙式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但是得不到必需的签署人。李卜克内西希望北德意志同盟完全不存在。他和他的朋友想按照自由主义来改造北德意志同盟，因此他们同进步党站在一个立场。这样，他就又请教于他从一八六三年以来当作反动派的支柱来斗争的，而且不断攻击的那个党。他（施韦泽）不顾同李卜克内西先生和他的朋友，以及失去土地的公侯们和外国，致力于破坏和毁灭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同盟；

“我们认识到，普鲁士的权力核心是使我们这长期被轻视的德意志祖国，终于在外国面前取得威望和光荣，并且将来还要如此，所以我们将不打算否认和挑剔普鲁士的那些去年使敌对世界不得不景仰赞佩的特征。”

他们站在新形成的祖国的里面，我们是站在外面，并且愿意站在外面。

李卜克内西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回答说，

“议员冯·施韦泽对我施了一个大恩，因为他给我一个我一直到现在没有找到的机会，使我得以声明，我同瓦格纳先生的替身根本没有关系。”

施韦泽沉默，瓦格纳也沉默。在表决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条之前，施韦泽离开了会场。他既不敢投票赞成，又不投票反对。

国会里的这些事件使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柏林分会不久举行了两次集会。施韦泽在会上建议下列决议案；

(1) 二人皆是普鲁士的爱国将军。——译者

44
“会议承认，在普鲁士所树立的威力中含有建立德意志统一的可能性；其次，会议于此与进步党彼此同意（再靠左施韦泽就不敢了。——奥·倍·），即必须用极大的力量并且不顾普鲁士政府的威胁，硬把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同盟按自由主义加以改变，因为只有用这种方法才可能把德意志事情作有效的确实的解决；第三，会议声明，与心怀嫉妒的外国抱同样观念来批判普鲁士去年的措施，并且据此力图和期望破坏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同盟，这是很不对的。”

拥护俾斯麦创造的事业不能比这再露骨了。与这个议案相对立的是施韦泽的两个反对者——提奥多尔·麦茨诺和赖曼的建议。

“会议决议，冯·施韦泽先生在国会中以及他在今天会议上对激进派的猜忌，使他在柏林工人中间所享有的一点点信用丧失净尽。”

第三个议案是进步党的安德里克机械工程师提出的，它要求，“会议决议，它在德意志问题上声明只能同意德意志进步党的立场。”

现在怎么样呢？当施韦泽觉得，他遭到了尖锐的反对，他的议案可能要失败，他就像以往每逢想到要失败时那样怯懦，把议案撤回，并且声明赞成进步党的议案，说该议案所述的和他的一样。任主席的霍夫斯台登要讨好施韦泽，把安德里克的议案先付表决并宣布予以通过，于是在反对派方面惹起暴风雨般的愤怒。

施韦泽的独裁

施韦泽急欲把全德工人联合会完全掌握在手里，也就是想当主席。他的这个欲望在波尔（汉堡）厌倦了主席职务，声明要辞职时得以实现。一八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在不伦瑞克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十八人，代表二千五百票。施韦泽代表阿波尔达的二十二票和里姆巴赫（在萨克森）的三十票。联合会是大为衰
落了。常的冲突；由于施韦泽的政策使他对他不信任；尽管施韦泽大言不惭而德国国会的选举结果仍然不利，危机等都是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波尔的开幕词就是现存沮丧情绪的表现。莱比锡的人们还抱着的把联合会整顿好的希望，没有实现；联合会的财务状况也异常不顺利，只有少数地方缴纳会费等等。在会议继续进行时，波尔请求不要再选他连任主席；他不能再忍受这个职位加在他身上的牺牲了。施韦泽批评了波尔的业务管理，但是他，如他所说，决不顾对波尔本人有所冒犯。他说明，代表大会对联合会有决定作用，并且据特尔克说，他竟要求主席职位，并且威胁说，若是他不能当选，他就马上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他答应提出正确处理业务的保证，因为他知道人们不信任他。会议不能决定如何办理，于是依白拉克的建议，暂时休会，以便疏通意见。经休会后，特耳克建议由施韦泽任主席。但是各方面表示，对施韦泽还有怀疑，并且认为联合会主席和联合机关报主编由一人兼任也是件不合理的事。特尔克设法来消除顾虑。施韦泽声明说，他知道人们对他不信任；但只有人们信任他时，他才接受这职务。他建议第二次休会，以期取得谅解。休会后许多代表声明放弃对施韦泽的不信任。然后，还把特尔克的保留条件：他可以选举自己，告诉他以后，他以二千三百八十五票对九十七票和四十一票弃权，当选为联合会主席。他为了获得信任，在大会上提出一个激进的纲领并使之获得通过。现在他对于他更进一步的良好品行也提供了所谓保证，他当着全体代表以握着来郑重约定，尽他的能力所及，促使联合会前进。代表们反过来也照样当着施韦泽握着表示效忠于组织和主席。其情形就同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国民议会网球场中所举行的宣誓一样，其区别只在于，不伦瑞克的宣誓活剧的导演施韦泽知道这不过是一出滑稽戏而已。

在柏林的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一八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到二
十五日）施韦泽又提起，在政治问题上联合会是可以同进步党一致行动。但是这决没有妨碍施韦泽在杜塞尔多夫举行国会补充选举的复选时（进步党候选人《莱茵报》主编柏尔格对一个保守党—民族自由党的候选人），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要求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投后者。然而柏尔格落选。他这样既可讨好俾斯麦，同时也不便《莱茵报》控诉他从极端保守派为《社会民主党人报》领取津贴的仇恨。

施韦泽另外一件不大光荣的，可以说明他的个性的事件是同他以往的朋友霍夫斯台登的争执。霍夫斯台登提供他的钱来创办《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一八六七年中叶，这笔钱用光了，霍夫斯台登成了一个穷人。一八六八年初，施韦泽企图把霍夫斯台登赶到维也纳去，要他在那里办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报纸。但是霍夫斯台登在维也纳遭到失败，又退回柏林。这时施韦泽拒绝他重回到报刊编辑部，并且也不承认霍夫斯台登还有任何其他权益；把他逐出门外，他这样做，是依据一个他向善良而不够机警的霍夫斯台登勉强的合同。霍夫斯台登在一八六九年春季巴门—爱北斐特的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当施韦泽的面对他的行为作了一个很长的控诉发言，所报道的事实激怒了亨利希·孚格尔代表（他现今还住在沙罗登堡）。他声明说，施韦泽对待霍夫斯台登，无异于一个卑鄙的资本家，这种描写在施韦泽的追随者中间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愤怒，结果是后来孚格尔被开除出了联合会。霍夫斯台登也控诉施韦泽的挥霍无度；他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这许多钱。在他指责施韦泽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时，施韦泽回答说，关于这一点他没有向他申辩的必要，施韦泽的帐务并不把他来归还。在这一点上，施韦泽确实对的，但是事实本身是值得注意的。一八六七年底，《社会民主党人报》才有一千二百个订户，因而还远远不敷它的开支，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可以被认为正当；“这报纸和施韦泽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的费用从
哪里来的呢？”不停的举债总也有它的止境。他的债权人有时也要
看看金钱。一八六八年底他的父亲死后给他留下的遗产也是杯水
车薪，微不足道的。而施韦泽当国会开会期间还是乘着华丽的车
马，后面跟着穿制服的僚从。

古斯达夫·麦耶尔（前面我提起过他论施韦泽的书）认为应问
间在施韦泽下车后常与他往来的保尔·林道，是否觉察到施韦泽
有放荡行为。林道予以否定。我以为保尔·林道的意见不能作为
定论。这位现今还活着的老先生也有很大的享乐习惯，所以他对
于“放荡”所定的标准也与别人不同。而且施韦泽同林道结交时，
他已经生病而且结了婚，这两种情况妨碍了他的放荡。在那时我
们从柏林得到的关于施韦泽生活方式的情报另有说法。据说他是个
第一等的享乐者，尤其是在克罗尔和柏林的夜酒馆里也常常同
那些暗娼之流往来，这大约就是他对他那多年的未婚妻所表示的
“忠实”，人们誉为美德的行为吧。他也有时同他最亲密的追随者
举行香槟酒会。施韦泽天生是收入一个钱总至少要花两个钱的一
类人，这些人的口号是：“需要不是按照收入而定，收入却是根据需
要而定”，因此，这些人看到钱就毫不犹豫地加以夺取。一八六二年
施韦泽从射击大会賭房里取去二千六百古尔盾，后来他在全德工
人联合会主席任内，以主席身份支配着賭房的金钱时，就照样侵吞
从工资低微的工人收集来的毛钱来满足他的嗜欲。这里所谈的数
目并不大，但是原因不在施韦泽身上，而在賭房太穷。在联合会的
各次大会上，谴责了并且证实了他这种舞弊行为，而且曾任联合会
司库多年并且遵照施韦泽的指示支付款项的自拉克，公开指责施
韦泽这种可耻行为，施韦泽却不敢分辩一句。但是谁能看出这样一
类事情，那就不应该认为他不会在政治上出卖自己，这对他是唯一
的还算有利可图的买卖。不过究竟到手了多少，没有人能提出证据，
因为这类生意不会在公开的市場上成交的。这里只能談談一些迹
象和許多不能作别种解释的事实。这里我要特别提出，俾斯麦在
一八六六年以后支配着汉諾威国王共四千八百万马克的私人财产
的利息，他可以把这笔利钱随心所欲地用于政治目的。这个基金
是以“机密费”的名称而臭名昭著，俾斯麦不必对任何人申述理由
即可动用。因此，奇特的是，当整个反对派报刊对这个贿赂基金作
斗争时，《社会民主党人报》从无一字提到这项基金。

此外，足以说明这个人的特性的还有，当一八六六年初我們出
版《民主周报》时，他有计划地对这个名字讳莫如深，如果他不得
同它争辩时，他总是说成李卜克内西先生的报刊。他想用这个策略
防止他的追随者听得报刊的名称而引起訂閱《民主周报》的念头，
以免读者由此知道許多使他（施韦泽）感到不舒服的事情。这种战
术是小气的、可笑的，但是他却使用它。

一八六八年春季，施韦泽又有了一个奇怪的转变。《社会民主
党人报》现在也照《民主周报》的样子，在說到北德意志国会时加
一个引号。一八六八年六月中旬，他还在国会中作与冯・奇尔希
曼辯論的发言，发挥了与迄今对普遍选举权的評价完全不同的理
解。他一向崇拜普遍选举权，并且大家知道，他企图作他的追随者
在巴門一愛北斐特选举俾斯麦作辯护，說他們选举他，是想借此对
普遍选举权的授与者表示他們的謝意。現在他声明：

“我为了选举我的人們的利益，为了民主事业的利益，必須确
认，这个議会只是好像而不是真正由普遍选举产生的。”

他所根据的理由是缺少出版自由和完全的結社与集会自由。
然而这些自由从一开始就没有，可是那时他的意見却不如此。現
在他对于现行选举法所表示的意见，却与《民主周报》早已屡次发
表过的意見完全一样。这种骤然的奇怪的改变意見显然是因为在
他的联合会中反抗日益增长的缘故。
在七月十九日第八十四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施韦泽通告说，他因为一个传单被爱北斐特高等法院判决在市监狱里监禁三星期。他派占杜塞尔多夫的W. 雷阿尔为副主席，哈赛尔曼为联合会机关报的领导人，因为他的参加，报刊的语调遂流于粗暴。通告在结尾时懊然地说道：

“在我要开始服刑的时候，谨向全体同志致最诚挚的告别敬礼。我希望联合会在我离开后照旧繁荣，或者在再会时更加繁荣（在整整三个星期后）。”

一八六八年夏季约翰·雅可比作了一个关于《社会问题》的演讲，演讲中他大大地左倾了，并且远远离开了进步党。在不伦瑞克的阿塞山岗上举行的一个民间节庆会上，白拉克对雅可比的这一举动表示支持并致贺。白拉克对于这个演讲提出以下论点：第一，约翰·雅可比的民主纲领获得了德意志人民最高度的注意；第二，根据这个纲领，坚决的民主党和原来的工人党在目标上没有原则性的区别；第三，两个政党必须在雅可比所提出的目标上意见一致，即，在一切人类平等的基础上，以自由的意义来改变现存的国家的和社会的情况。《社会民主党人报》以“混乱”为题对这答复说：

“雅可比所提出的工资应力求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公平分配这句话，是句极端错误的、无理和荒谬的词句。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中竟有人咀嚼这种卑劣词句，真是一件可悲的事……如果有人认为在雅可比的演说中竟还有值得注意的思想，就希望各方面都高呼：没有！那是一个自以为在不起的资本家的无理的、空洞的胡说罢了。”

这种激烈和粗暴的语言表明了，施韦泽一发觉联合会会员似乎想同相近党派的代表接触时，他就会多么愤怒。联合会必须在外面用中国的万里长城包围起来，这样他就能够绝对地统治它并且照他的意思操纵它。
联合会的下一次代表大会是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六日在汉堡召开的。不伦瑞克代表大会仅代表会员三千五百零八人，柏林代表大会代表会员三千一百零二人，现在是三十六个代表，代表八千一百九十二个会员。所以联合会基本上壮大起来了。人们把这个发展完全归功于施韦泽的活动和领导，这是不正确的。一八六六年战争结果所引起的危机的压迫已不存在，而代之以一八六八年的繁荣时期。所以在工人界中重新兴起了乐观情绪和政治生活，这不仅对全德工人联合会有利，对工人协会联合会也有利，工人协会联合会当时由我领导，会员超过一万三千人，他们当然没有像全德工人联合会所具有的纲领所造成的紧密性。施韦泽现在设法争取卡尔·马克思。他要理事会表决为了马克思著作《资本论》而向他表示感谢，他也曾邀请他出席汉堡的代表大会，马克思却因工作繁忙而谢绝参加。他也同意盖布提出下列建议。

“大会声明，因为一切文明国家，资本和反动派由于基本上相同的原因，对工人阶级施加压力，只有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他们的努力才会成功，所以德意志的工人党和一切文明国家里受同一原则领导的工人政党的责任是共同行动。”

这个建议一致通过。但是不管施韦泽装作如何激进，对于他的独裁的不满却有增无已。于是爱尔福特的会员提议，施韦泽应把从一八六八年一月一日以来由账房支取的金钱开出详细的报销单。理事会应该审查结算。杜塞尔多夫的会员要求，主席和联合会机关报主编两职要分开，这种安排容易导致专制，其实这种安排已经导致专制。此外，在各届代表大会上激烈地控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扣压它所厌恶的信件，又任意修改、甚至捏造别的信件。一个建议主张联合会方面接受机关报，大会认为办不到，把主编与主席分开也被宣布为不适当。相反地，决议把联合会的分散
在许多地方的二十四人理事会集中起来，并将移往汉堡。这是施韦泽的独裁所遭到的第一个有力打击。在讨论这回的时候，他作了一个不得已而揭发自己的通知。他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大会了。普鲁士政府的敌视日益增长。联合会将被解散。”瞧啊，刚刚三个星期以后，莱比锡的警察厅（因为联合会的地址是莱比锡）就要由于地方财务管理处而把联合会解散，可是这一机构是从一开始就有座落在联合会里的。

毫无疑问，施韦泽事先就知道这次的解散，这甚至是和柏林警察厅商量好的，而莱比锡警察厅是按照柏林的意思把联合会解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施韦泽当然不会向地方政府和内阁控诉莱比锡警察厅的这个措施。施韦泽在他一篇有关解散联合会的文章结尾说道：

“我们之所以服从，只是因为按事势这样做最为合理。所以我也借此声明：

‘全德工人联合会解散了……’

全德意志的工人们！我们现在站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坟前。

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继续存在我们中间。

我们也这样站在拉萨尔的坟前，但他自己还存在在我们中间。

我们的联合会被解散，这使他，使我们获得荣誉。联合会对于工人事业尽了自己的职责——所以它被解散了。

旧的形式毁灭了——我们会为你们所努力的工作获得新的形式。”

接着他感谢所赐与他的信任。

“我们曾经同斗争、共患难——将来我们还要同斗争、共患难。”

他这样对多情善感投机，把会员们感动得落泪，于是继续信任他。

52
如果普鲁士政府像施韦泽故作违心之论所写的那样对联合会曾抱敌意，那么现在他的义务和职责就是尽可能使联合会不受普鲁士政府的影响，比如，把它改往结社集会法不禁止联合的汉堡。此外，联合会在汉堡一阿尔托那的会员最多，这对联合会以及报刊的财务都是真正的支柱。在汉堡也不缺乏精神力量。施韦泽却不这样做，而在柏林警察的监视之下建立新联合会，把柏林作为会址。但是，普鲁士同萨克森一样有对于联合的禁令，而且当时普鲁士的结社和集会法还规定，联合会必须把全德国的会员名单呈缴警察局。并且他又一次泄露了他同柏林警察厅的关系和他的对于解散联合会的意见，因为他在第一一九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说道，

“人們所以选择柏林作为党的地址，是借此使警察可以不断地有机会来证实，党的根据和遵守现行法令进行它的鼓动的。”

一个民主政党的领导对亲爱的密弟是多么令人感动地恭敬！

如果施韦泽同柏林警察厅之间的亲密联系有可以证明的一天，那么现在就证明了。但是不仅是联合会现在处于柏林警察厅监督之下，而且施韦泽也利用新建联合会的机会完全取消汉堡代表大会上使他感到不舒服的决议，并且通过新组织巩固他的比以往更无限制的独裁。他公布新计划时说，

“无论如何要设法保护党在全德意志的统一。因为这个统一是我们的最好的珍宝——它是拉萨尔组织的基本思想，这是我们永不放弃的。”

所以，这样经常引证拉萨尔，无非是为了保持他的权威和蒙蔽会员们。

联合会的新建事业是由少数选拔出来、曾和他同甘共苦的人们公开地进行的。新章程包括了一些简单令人吃惊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主席要在开正式代表大会以前六个星期由联合会会
員在基层单位中选举出来，也就是还在代表大会讨论和考核他的业务管理以前，于是代表大会上的不信任票就无效，而对于他的活动的讨厌的批评也同样无效。此外，章程的第五条说：

“如果主席认为迫切需要，他就可以采取一切措施，但限于三个月内由理事会批准。”

与汉堡代表大会的决议相反，理事会本身又可以分散在德意志各地。代表大会只能在这样的情况下着手改变章程（第七条），即如果这个建议是由六十个会员署名并且在代表大会前三个月内送达理事会的。关于联合会究竟在哪里和如何重新建立，人们从来没有得到确实消息。但是警察厅决定得到了通知，否则它不会承认这个联合会。我们这个时代有组织的工人在阅读这些宣言时会质疑，这种事情如何可能，并且联合会的大多数会员难道不会一致起来抗议这种罪大恶极的行为，把主犯立刻撤职吗？这一切都无踪迹可寻。施韦泽用他的报刊绝对地统治着联合会；任何人胆敢挑衅，他的申诉书就被丢到字纸篓里，谁敢在集会上出面，他就被斥为拉萨尔主义原则的叛徒，予以开除的处分。在联合会中这个人算是完了。如果有人被党核到，他同情李卜克内西和我，大多数会员就把这看作一种罪行，如果可能，把它看得比血族通奸或杀害人命还重大。这是他有系统地进行挑拨的结果。

但是一部分联合会会员的见解却转变迅速超出我我们当时所认为可能的程度以外。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施韦泽在从十天十日起扩大了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有三千四百个订户）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通告，在通告中表明了他对联合会财政状况的看法，由于联合会的发展，财政情况基本上已经好转。他在结尾时宣称，他因为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工资和资本红利》，将要“进入监狱过孤独生活”三个月。文章的结尾是，
“关于組織，拉薩爾曾說，必須把一切单个力量集中成为一把铁锤。党所以选拔我为它的领袖，是认为我的臂膀有足够的力量来执这把铁锤。我希望，我的这种力量永不衰竭。”

在自负上，这种说法可算是无以复加了。

十二月初，他进了监狱，但是十二月将终时，因为他的父亲病重，他又从狱中被放出来，他的父亲死于年终以前。施韦泽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去处理家务。可是当他请假出狱后，又要在一八六六年的那种把戏。一个星期的假变成了许多星期，现在施韦泽又开始了广泛的政治活动，好像给他的假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的。

《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一八六九年一月一日宣称，主席还有好些天不能执行党的业务领导。一月十四日，施韦泽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对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谈话，并定于三月二十七日到三十日在巴门一爱北斐特召开联合会的代表大会。

按正常手续，施韦泽决不能参加这次大会，因为这期间他的徒刑还未满期。但是他却早已知道，他在这件事上会有自由的。他还指示，主席的选举应当按照他所预定的新組織章程，在大会前六个星期，即在一月二十四日和二月七日之间举行。

此外，他宣布将在中德意志一个城市中召开理事会会议，会议上将对南德意志和薩克森的鼓动活动作出决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对我们采取了更加尖锐的态度，因为我们有意或无意之间受奥地利政策的指导。这里应加说明，在这期间，李卜克内西在《民主周报》上对奥地利所屡次采取的策略，我认为是彻底错误的，因而在我与之间一定引起意见分歧。李卜克内西正是个走极端的人。他常常过分地仇恨俾斯麦和北德意志同盟，他也过分地倾向奥地利，他过分地信赖奥地利自由资产阶级内阁有成就。施韦泽自然会利用李卜克内西的这些弱点。在这里我要附带说明，在一八
六七年施韦泽也有个时期，有意支持那个资产阶级内阁。他显然要想法在维也纳为霍夫斯台登铺平道路。

一八六九年一月，我们知道最猛烈最沉重的攻击继续进行，我们在《民主周报》和人民大会上对施韦泽所进行的斗争，暂时停止攻击是因为我们被邀请到爱北斐特一巴门参加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以便对施韦泽提出控诉。关于这件事的序幕，我在本书第一卷中已经详加叙述了。

*   *   *

这里要来夹叙一下，一八六九年初，哈森克利维尔在杜伊斯堡的复选中也被选入国会。因为我认为哈森克利维尔不同意施韦泽的活动，并且诚心诚意地要与他联合，所以我募集了十二塔勒给他寄去作为支持选举之用。当时我们双方在选举上，还不能像今天这样用成千上万的马克来计算。每一塔勒都当作一笔巨款。关于这，我在一八六九年二月十三日《民主周报》上宣布，哈森克利维尔对于给与他的同情和支持表示非常欣幸和满意。他对于工人党的各派中间发生的分裂表示遗憾，并且希望，我们同他自己的党的其他领袖之间存在的或者曾有的只是来源于个人的分歧不久即可消灭。他十分确信，德意志全体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牢固团结的队伍在一个旗帜之下进行斗争的时期已经不远了。

哈森克利维尔的这个声明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我们当作社会民主党人讲话的，这样的承认是施韦泽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直接受施韦泽失势之时所不给与我们的。至于统一的完成自然是在后来哈森克利维尔继任施韦泽的主席职务后，还又经过了几年，才实现的。好像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都比后来作在位君主时要开明些。

*   *   *

二月十四日施韦泽宣布选举结果，他又以约计五千票对五十
四票当选为主席。如果人们考虑一下，在几星期后巴门一爱北斐特的代表大会所代表的会员是一万二千人，那就有四十个地方根本没有投票，所以那次选举无异于一个道德上的投不信任票。在施韦泽的政治休假达到了目的以后，他在二月十八日又进入监狱，但在三月四日，即国会开会的前一天，又被释放出狱。

这次的开释再度证明了施韦泽同政府的密切关系。从国会成立，即从一八六七年到今天，在国会开会期间，从来没有一个国会议员，包括资产阶级的议员在内的，为了参会而被释放出狱。在一九零九年到一九一〇年开会期间，甚至有一个阿尔萨斯议员必须开始他的两个月监禁。政府，首先是普鲁士政府，同国会的多数派一样，始终认为宪法上有关议员免刑的第三十一条并不包括徒刑在内。与普鲁士也早就使用的几十年的惯例相反，现在施韦泽竟被准假出狱，这不得到主部长的同意是办不到的，而部长如果没有俾斯麦的许可也是不敢同意的。

此外，俾斯麦对于这类事情怎么想法，鲜明地表现在四月二十八日，即施韦泽请假出狱后几个星期的国会辩论中。门德曾在慕尼黑—格拉巴赫举行了一个集会，会后发生暴动，门德被捕，因为据说这场暴动是由他而起，而事实上并不如此。施韦泽提议释放门德。在讨论中俾斯麦也发言，并以他那专横的口吻反对开释。但国会根据当前的事实必须违反俾斯麦的意思来作决定。于是他就采取报复手段，他发给那些指示和执行拘捕门德的官员们奖章。而且门德的情形并不是像施韦泽那样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徒刑，而只是拘押待审。

在那件事情以前不久，我无意中亲眼看见施韦泽和阿尔伯莱希特亲王（国王之弟，国会议员）的会面。我顺着走廊走过来，看见阿尔伯莱希特亲王同几个保守党议员在走廊那头一起站着。施韦泽由侧面走廊走来。亲王一看到施韦泽，就招他过来，向他伸出手去
让他紧紧握住，并且很亲切地问：我亲爱的施韦泽，您好？施韦泽：谢谢，殿下！亲王：您昨天为什么没有出席会议？施韦泽：我出席的，殿下！亲王：那么您为什么没有发言？人们都希望您讲话……我赶快进入会场，以免像个偷听者。谈话表示出，施韦泽已经常常同亲王往来，而且还表示出，国会中右派的“人们”清清楚楚地知道，施韦泽激进的言论意味着什么。

巴门—爱北斐特的代表大会

当我们在三月二十七日晚到达巴门—爱北斐特时，一批全属于国际方面的同志在迎接我们。关于我们当天晚上的讨论，我在夜里还写信给马克思说：

“李卜克内西和我在爱北斐特和少数同志准备明天的战斗计划。我们在这里听到了这样多的施韦泽的无耻下流行为，真令人毛骨悚然。也明明白白证实了，施韦泽所以推荐国际纲领，只是为了给我们在一个主要打击并把一大部分的反对派分子打倒或者拉过去。所以我请您，同时也以李卜克内西和此地全体朋友的名义请您，对于通过施韦泽的代表大会决议暂勿理睬，或者至少只是极其慎重地予以答复。

详细报告不久就寄上。

关于明天辩论的结果还没有什么可说，只有一点可以奉告，施韦泽用尽一切阴谋诡计来煽动反对我们，我们决不能希望有彻底的成功。为了消灭他自己联合会中一切反对派的组织工作，已于数星期以前在这里非常干练地完成了。举个例说，昨晚施韦泽来到时作了个真正的胜利游行穿过爱北斐特—巴门。（坐着用白马驾车的华车）就此搁笔。”

施韦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称，敌人已逼到主席（即高于一切的人物）跟前来了，代表大会必须比以往更加严厉和坚决地把
对組織的，就是說把對他所欽定的組織的一切攻擊打回去。

在預備會上違背了施韦泽的意旨（他本來想把同我們的會面，
如果不能避免，就向後推延），以三十票对二十七票決議准許我們
立即出席。次日下午，我們在施韦泽的狂热追随者的怒視之下进入
了擁挤不堪的會場。李卜克內西首先作了約一小時半的發言，
我接着发言，說得基本上簡短些。我們的控訴总结了我迄今对施
韦泽所提出的控訴。发言遭到多次猛烈的打断，尤其是当我把施
韦泽叫做政府的代办的时候。據說我应把話收回。但是我拒绝了。
我认为，我有权利自由說出我的意見，而听众們可以不相信。

《社会民主党人报》把我們的发言作了极不完全而且一部分捏
造的报道，借以欺骗讀者。李卜克内西过份地守信义。他不作任
何报道，而仅限于在《民主周报》上宣布說，我們出席了全德工人联
合会大会并提出了我们对施韦泽的控告。施韦泽以六千五百票对
四千五百票（这些代表在投票时弃权）得到了信任决定。因为我们
把希望即使不建立在社会民主党各派的联合上，也建立在各派的
妥协上，所以《民主周报》不再发表攻击施韦泽的文章，假如对方也
保持这种策略。但这并未实现，《社会民主党人报》反而继续攻击
我們。

當我們发言時，施韦泽在讲坛上坐在我們的后面，一言不发。
我們离开会場時，几个代表走在我們前面和后面，以便保护我們免
受施韦泽的狂热追随者的暴行。不过，當我們走过夹道的人群时，
还是听到了許多歌詞話，如“流氓，叛徒，三，應該打得你們粉身
碎骨”等等。会場中有一个企图趁我步下讲坛时照我的膝弯里
一下把我打倒。我們的朋友在門前迎接我們，校正卫士把我們送
回旅馆去。

施韦泽向代表們要求信任投票。在热烈辯論後他取得了上述
的票數。代表中弃权的有白拉克、布勞埃尔、魯道尔夫（汉諾威）、
馮·達克、蓋布、希尔施、波爾、拉斯貝(埃森)、索拉德、路易·叔
曼(柏林)、斯皮爾、亨利希·孚格尔、維爾克和約爾克。

这些人因为拒绝投信任票必须受严重的惩戒，《社会民主党人
报》对他们的攻击密如冰雹。信任投票的决议说：

“鉴于伯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先生的讲话中并无任何新的和重
大的东西，代表大会声明，联合会主席今后和以往一样仍拥有德意
志工人党的完全信任。”

对于韦泽，爱北斐特代表大会意味着一连串的黑暗日子。在
莱比锡警察解散联合会在后的秋季，他给新组织所拟订的独裁条款，
现在被代表大会决议牺牲了。首先决议联合会领导由一个十五人
理事会来代替以往二十五人(1)所组成的理事会。除了主席、司
库和秘书以外，其余的十二人必须居住在一个地方，以便经常接
触;并且能够随时召开会议。理事会会议由该会主席召集，不像以
往由联合会主席召集。而且联合会主席不再是代表大会以前六个
星期选举，而是在大会以后才由联合会会员用直接选举的办法来
选举，会后应将结果公布，使得会员知道大会上完成了些什么。关
于主席的权力，他发出的指示本来可在三个月内由理事会追认批
准，现在限为八天，于是权力就变成空洞的东西。此外，理事会只
要多数通过，就可以决定联合会的内部组织，业务程序，奖励办法，
文牍和会计事宜。更有甚者，遇有政治的骗局或重大的侵吞公款
情事发生时，理事会也有权停止他的职务，并立即召开代表大会或
举行基层投票来作最后决定。由于这些以及一系列的其他规定，
施韦泽的权力受了大大的限制。这些决议证明了对他还充满了很
强烈的不信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最重要的规定，虽然遭到
他的反对，仍被通过。此外，还设置了一个由三个柏林会员组成的

(1) 理事会的人数前面说是二十四人，此处作二十五人，恐系笔误。——译者
监察和申诉委员会，接受一切对编辑部的申诉并对此作出决定。这些决议为联合会奠定了彻底民主的基础。施韦泽的全能受到限制，他非常沮丧，回到柏林后竟想向我们靠拢。四月八日，我给
我妻的一封信里说道：

“施韦泽，虽然我起初没有理他，在我同另外一个同事谈话时，却悄悄地来到我跟前。会议结束时，他请我同他、弗里茨舍和哈森克莱维维尔一道吃饭。不显得粗暴，就无法推脱这个邀请。于是施韦泽派他的漂亮马车和穿制服的仆从来把我们送到吃饭的饭馆（我们在欧尔布里希饭馆吃饭，这就是一家巴伐利亚的啤酒馆，在菩提树街附近的莱比锡街）。饭后他坚持派马车送我送到我要去接李卜克内西的安哈尔特车站。”我附带说明，他这餐饭费是各自付账的。

在吃饭中间还商谈了有关停战的条件。我同他们事先声明，李卜克内西不在座的时候，我不能作丝毫的决定。他们三个对我一个人来谈判，使我不无疑虑。随后的几天，我们在国会继续开会。施韦泽要求，双方不仅在报刊上和会议上停止互相攻击，而且两党成员也不得互相作政治性的往来或从事共同的活动。我拒绝了后者，虽则一般说来我们屡次激烈地互相争吵，对施韦泽没有丝毫退让。双方互相敌视。对于我是一种侮辱，对于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也是一种侮辱。所以既不准个人互相攻击，也不准组织互相攻击，乃是理所当然。我们也约定了，将来在国会里由这一党或那一党提出的建议要互相支持。《社会民主党人报》为此在四月十六
日第四十五期上发布通告说，今后它既不对李卜克内西和我，也不对我们的党进行攻击，并且要求联合会会员依此行事。另一方面，我们在《民主周报》上发表了相似的声明。

这样，一切好像是在最美好的和谐之中。但是施韦泽不能适应这种新秩序；一个像巴门—爱北斐特代表大会所造成的民主组
織，等於斷絕他的政治生命。這個組織像是給他戴上枷鎖，以往用慣了的政治兩面性將失行不通了。特別足以說明他當時的態度的
還有，他命人照他去年夏季对汉堡代表大会記录那种办法把关于
爱北斐特的詳細会议记录加以扣留和消灭。凡是揭穿他的真象的
东西，他一点也不让联合会会员和大众知道。

六月十八日第七十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像晴天霹靂似地發
表了一篇公告，标题是：恢复拉萨尔党的统一，由施韦泽和門德署
名。这里要重述一下，自一八六七年初以来，有一部分全德工人联
合会會員在哈茨費尔德伯爵夫人的影响下脱离了联合会，而以“拉
萨尔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名义另行組織，由門德任主席。这个联合
会的机关报是《自由报》。从此两个联合会互相争吵不休。现在这
些敌对的伙伴，只就他們的主席和哈茨費尔德伯爵夫人而言，突然
言归于好，在他們的党徒之前携起手来。

发表的通告是一篇非常富于感情的文章，以歌颂拉萨尔为开
端。又引证拉萨尔的話：“你們要保持组织，它将引导你們走向胜
利”。继而夸大其辞地说。

“两个联合会所选出的领袖彻底地认識到这一点，今天他們兴
高采烈地出现于两联合会会员之前，并且要求他們协助建立伟大
的事业……一个威震整个德意志的真正全德工人联合会……我們
把我們的建議提交给两联合会全体会員，就是說給至尊的人民，由
他們自己直接地即时作出决定。（原文也有着重点。）

这是拉萨尔的旧章程，我們昔日曾团结在这章程之下，我們必
须再回到这章程之下，以便這次在統一发展这个基础上共同迈步
前进……”

然后要求应在本月二十二日之前（通告的日期是十六日，六月
十八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發表，十九日或二十日才能到大多
数会员的手里）把他們的建議付表决，而且必須在二十三日把表决
結果送达柏林。

通告还声明，如果表决結果同意門德—施韦泽的建議（施韦泽故作謙虛，退居庸碌的門德后面），应在六月二十四日把两联合会解散，就在当天由几个同志集合在一起，遵照拉萨尔的旧章程議决恢复原先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应在六月三十日选举主席，七月三日宣布结果。在选出主席之前，門德应执行主席职务，特尔克执行秘书职务，白拉克执行司庫职务。通告的結尾說：

“同志們，請促這事的實現，在拉萨尔的逝世紀念日，我們大家要全体在他的坟墓上携手，并且要说：我們表现得无愧于这位巨匠。”

两主席的这种行为是个政变。这样一来，爱北斐特代表大会所给与施韦泽联合会的民主組織一下子被毁灭了。施韦泽也一举而粉碎了加在他身上的枷鎖，又成为絕對的统治者和独裁者。施韦泽担忧駐在汉堡的理事会的反抗，为了打破这种反抗，他派他的亲信特尔克前往，他对理事会的劝誘成功了。盖布打电报说：“理事会考虑了特尔克所陈述的理由以后，一致拥护恢复統一。会员大会同意。”

但是现在关于施韦泽、弗里茨舍、哈森克莱維尔和我們之間的协定也算取消了。为了这个目的，施韦泽在六月二十二日第七十二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声明說：我們撕毁了这个协定，因为我們重新故意地而且惡意地企图干涉我們所憎恨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个組織。因此，我們把有关的协定解除了，他們現在也不再受它的拘束了。

所犯的这个“罪名”首先落在我的头上。我在六月間在十二个屠林根的城市中举行了集会，其中也有阿波尔达、爱尔福特和哥达。这里由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召集开会，他們也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全权代表担任主席。一切集会都是人满，而且经过异常良好。
在那些集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是，只有社会民主党原则能够改善劳动阶级的处境，并且必须使社会民主党的各派工人团结。

我的鼓动旅行以爱森纳赫的代表会议为结束，除了我们的信徒以外，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和民主党人都参加了。此处应加以说明，当时在柏林只有相当数目的资产阶级民主党人，他们全都采取雅各比的立场，其中有阿伯教授和他的岳父斯乃尔教授，此外还有在耶拿后来加入了党的徐博士，爱森纳赫的克略茨纳赫律师等。此外在维玛、哥达和阿尔登堡也有这个党的信徒。在爱森纳赫的一个决议中声明说：

“为了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不仅要求停止民主的工人党各派之间的分裂，而且民主的工人协会也应同整个的民主党团结一致，尤其是在共同的政治事务中，特别是在选举的时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协会要一致行动。”

那么，这就是促使施韦泽进行反对我们的罪行。

再者，不论鼓动工作取得多少成绩和赞同，我对它仍不满意。六月十七日，我由隆乃堡写信给我妻说：“即使人们对这个人表示热爱和友谊，鼓动工作仍不是愉快的事情。”可是我后来还是干了那么长久。职贵所在，义不容辞。

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反叛

施韦泽和门德的政变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广大会员中惹起了愤慨。一部分较有知识的会员看透了，不能再同施韦泽和陆相处，他是团结的障碍。白拉克经布雷麦尔（马格德堡）的介绍通知李卜克内西和我，他们希望同我们会一次。我们欣然满足了这个愿望。六月二十二日夜间，我们——白拉克、布雷麦尔、斯皮尔（沃尔沃芬比台尔）、约尔克（哈尔堡）、李卜克内西和我——在马格德堡的
一个三等旅馆里见面。谈判了很久。白拉克和布雷麦尔主张立即向施韦泽进攻，并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斯皮尔和约尔克则有很大的顾虑。他们认为必须试一试“由里向外”来改革联合会；我们回答他们说，巴门一北斐特事件足以说明由里向外的改革是什么样子。在施韦泽充当主席并掌握着《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期间，那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一致了。杰出的白拉克伏在旅馆客厅里的弹子台上抄写一篇宣言，然后为了这个宣言征集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的签名，这时已经半夜。我们把宣言又彻底详细地讨论一翻，到将近三点钟才就寝。然而，真倒霉！我们躺在臭虫窝里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入睡。四点钟就起来，搭早晨第一班火车回家。决议要在一个中德意志城市——哥达或爱森纳赫——召开代表大会，并邀请德意志—奥地利的工人协会和瑞士的德意志工人协会派人参加，也请求国际的德意志支部派代表出席。

因为会议的历史意义，我把白拉克及其同志们的宣言原文抄录如下：

给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们

同志们！我们联合会的主席在一大堆虚伪的套语之下，采取了使每个有思想的会员必然满心愤慨的手段。署名人应这种事态的要求，匆匆忙忙地（所以对于冷待也没有人想抱怨）举行了一次集会并一致同意一个对于党将有深远影响的步骤。我们请求你们，同志们，慎重地，毫无成见地审查我们的意见。

不久以前，施韦泽和门德先生，这两个极其激烈地以反动派的走卒互相指责的人，还不愿与闻工人党各派的合并，忽然在今天（取得了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的同意）在他们的联合会会员之前，以动人的词句来要求会员们导致单单党的这两个派别的统一，而对于整个社会民主党的团结却一字不提，并且这一切都在蔑视所谓“至尊人民”的权利的情况下进行。不仅表决期限那么短促，使
員对于问题不可能真正作出判断，所以一切都完全好像是突击；不
仅表决的形式简直像用手枪抵住会员的胸口逼着他说是或否，这
样，荣末顺从那最可耻的条件，否则放弃所最渴望的统一，哪怕只
是零碎的统一；不仅是这种表决形式与一个怀有民主思想的人不
相称，而且就是主席也那么专权独断地办事，这几乎是没有先例
的。就是对待美洲奴隶也绝没有比这里对待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更横行霸道的。那么，在采取这种极为重要的步骤之前，为什么还
要征求会员或理事会的意见呢？！等到事情完了，就用几句花言巧
语逼出会员的“自由”同意。施韦泽先生一吩咐，会员们就只有听
从，然后称他们为“至尊的人民”。对于一个人，没有比这更大的侮
辱了。如果施韦泽先生认为是好的，就责成会员亲手把多年来
辛勤创造的改革事业一下子毁灭掉，并且立即接受以往造成最激
烈的分裂的章程，这章程使主席掌握最无限制的权力而理事会
毫无影响，除此种种之外这个章程还可以这样解释：在整整三年内
章程不可能有任何改变！主席在这种情下的行为——小型的政
变——使许多联合会会员多年来的怀疑得到证实，冯·施韦泽先
生只是利用联合会来满足他的野心，并且想把联合会贬成敌视工
人的反动政策的工具；否则，他现在就会设法使德意志社会民主党
的全德工人团结一致。谁只提倡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团结，
而不尽力从事唯一能使党获得权力和影响的全党团结，谁要是用
这种形式使一部分团结而使全部的团结成为不可能，谁要是这样
做的话嘴里还说着动听的、洋溢着兄弟友爱的词句，他就是个十
足的伪君子，而且谁要想把那些不服从提出的可耻条件而献出力
于某些较伟大的、某些较高尚的事业的人们而污蔑为团结的敌人，
他就是一个盖世无双的阴谋家。

每个诚实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为导致德国全体社会民主党工
人的团结而努力。面临运动的日益壮阔的浪潮，面临世界上一
文明国家里暗示着政治和社会情况很快就要有重大变化的预兆，拖延这个团结就是叛逆。

但是，这个团结却只能是真正至尊的人民自己的事业，而你们，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们，不能让几个领袖任意把你们当作一群羊出卖，你们要作掌握自己命运的好汉！

我们深知，一个组织中个别人物的意志竟能蔑视联合会的一切成就，甚至能随时使联合会本身成为问题，能使联合会随时被解散而后再按照与他相宜的形式恢复起来，在这个组织中，这位个别人物用工人的几几分去贿赂可耻的流氓，一个这样的组织里面没有丝毫民主的精神。在一个这样的组织中要想以后有所作为，那就是白白浪费我们最好的力量；我们不要它！

我们受一种思想的指导，即只有党自己能够决定它的组织，此外还受一种思想的指导，即要造成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团结，以及职员会的团结，我们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一个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全体工人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会上就能奠定与国际运动相结合的党的真正民主组织的基础。同志们，我们指望你们的支持！以往总是满怀着人为的互相仇恨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将会团结起来，并能给自己一个他们的原则精神同他们一切力量的集结统一起来的组织。

同志们，你们决不要被那些从不把党的团结放在心上的人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你们不要容忍那种只敢拿来对付无耻者的或是无思想的人们的手腕；你们要表现你们的本质，——不要作个劣性主人手下没有意志的奴隶——，而要作独立决定创造自己命运的实在和真正至尊的人民。为了我们的原则，为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冒险干一次英勇行动吧！让我们不要白白高举写着全党团结的旗帜！只有团结起来，工人才是一股力量！分散开来，我们就永远是我们敌人的笑柄，但是统一和真正民主地组织起来，我们

67
就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你们同意我们——我们非常盼望你们如此——，那就请把你们的同意通知署名人中的一个，以便我们共同进行召开代表大会。

我们要求（我们沉痛地下此决心）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全德工人联合会曾是我们所最关心的，但是为了事业，人们就必须不惜重大的牺牲；并且除此之外，没有办法！

那么，同志们，在争取我们伟大崇高事业的神圣斗争的新道路上前进吧！热诚和坚持保证了胜利。

J. 布雷麦尔（马格德堡）。霍夫曼（纽斯达－马格德堡）。W. 克莱斯（马格德堡附近的布考）。太·约尔克（哈尔堡）。C. 穆勒、S. 斯皮尔和 A. 费维希（沃尔芬比台尔）。W. 白拉克（小）、H. 艾勒斯、E. 吕台克和 A. 石拉德（不伦瑞克）。弗里德里希·埃尔乃尔（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在六月二十六日的《民主周报》上我们发表了上述的宣言，在同一期上也发表了我们给同志们的声明，其中驳斥了施韦泽说我们破坏与他成立的协定的指责。然后我们对门德－哈茨费尔德－施韦泽的联合喜剧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我们声明：“我们将进行决战，并且用一切力量和信心同明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携手进行这个决战。”我们结尾说：“究竟是那里的腐化、卑鄙、贪图贿赂，还是我们这里的忠实和目的纯洁得到胜利，将见分晓了。

我们的口号是：打倒宗派主义！打倒个人崇拜！打倒那些口头上承认我们的原则而行为上背叛我们的原则的阴谋家！社会民主党万岁！国际工人协会万岁！”

我们在这个声明和以后一再用我们的忠实意图对施韦泽的不
誠實意图作斗争，所以后来对方给新教的党起了一个绰号“誠實派”。

由于我的建议，中央理事会一致决议，赞同自拉克等同志主张
召开全德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宣言，并且要求工人协会
的理事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我在六月二十八日发出通告，要求最
迟在七月一日午时答复，必要时可打电报。我也写信告诉日内瓦
的约·菲·贝克尔，国际的德意志支部中央委员会同样可以寄来
一份赞成团结事业的声明。我希望，这次我们这个总攻击能够
成功。六月二十六日，盖布·普拉斯特和欧克尔曼（汉堡）也声明退出
全德工人联合会并同意自拉克等同志的意见。

《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遵行的策略是，经常宣称我们的群众
不是由工人构成，而是由文人、乡村教师和其他资产者组织。

施韦泽继续设法用他所具有的巧妙手腕抓住全德工人联合会
会员由他系统地培养出来的弱点。他在一篇文章里关于反对派这样写道：

“单只一点就可以决定一切。你们是不是民主主义者？你们
断言：是的。你们知道不知道，民主主义者要服从多数——如果这
个多数近于全体一致，更要加倍服从！那么，好吧！全德工人联合
会，即往常的两个联合会几乎全体一致说：是。你们现在服从人民
意志吗？哦，不！在你们的浮夸中，你们‘民主主义者’说人民是一
群羊，说你们的意见不会错误。去你们的吧，你们这些吹牛皮的伪
君子，你们自以为比全体人民、比斐迪南·拉萨尔还聪明些！

比斐迪南·拉萨尔，比你们伟大的导师和宗师还聪明——是的，是的。因为，你们的绊脚石，即拉萨尔组织又完全建立起来了……”

卖弄拉萨尔组织的文字占满整篇篇幅，并且几乎是一期又一
期地继续下去。
另一方面，《民主周报》一期又一期地刊载着由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发出的反对施韦泽的声明。这种声明来自哥达、汉堡、希尔得司海姆、爱尔福特、汉诺威、索林根、威斯巴登、爱北斐特、开姆尼茨（未一个反对门德）。还有一向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秘书的H.罗洛尔，也声明反对施韦泽。

工会的领导人们，卷烟和烟叶工人协会主席弗里茨舍、全德鞋匠协会主席路·叔曼、德意志木工联合会主席特·约尔克和全德裁缝协会主席到布都声明与施韦泽断绝关系。

七月五日，门德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通告说，施韦泽以绝对多数当选为主席。他自己（门德）虽曾两次声明不接受推选而仍得到相当多的少数票。数目没有公布。参加选举的人数比预期的人数相差很远。在门德宣布施韦泽当选为主席的夸张的讲话中说道：

“如马拉——他那时代最伟大的革命家很恰当地描述的。主席要像李上钉着一个球的独裁者那样领导联合会，而且这个球应该是：原则和组织。”

大家知道，这个球确实是件冒牌货。并且门德又一次引证说：

“对组织要忠诚不渝，它定会引导我们达到胜利”，在结尾说：“斐迪南·拉萨尔万岁！他所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万岁！组织万岁！”

施韦泽在他致谢当选的讲话中也同门德一样夸张和强调。结尾时说：“那么好吧！以把你们大家、你们工人由睡梦中唤醒的去世宗师的名义——以我们党的选拔我为领袖的至尊人民的名义——

——

① 一七四三——一七九三年，法国革命家，人民领袖，学者。——译者
以你们全世界的受苦兄弟们的名字，我张开旗帜，举着它前进。紧紧集结的行列，你们这些工人的队伍，跟随着选出来的领袖吧！

拉萨尔的精神不死！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万岁！

这么两个占卜家，后来很快地就显露出来是两个受骗的骗子。所以七月十日，施韦泽下令选举二十四人理事会的成员，他预先提出了候补人名单。当选的理事会仍旧照以往那样分散住在德意志各地。

施韦泽在七月十四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布，全德工人联合会将参加我们所召开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并公布一系列的决议草案，要由他的信徒在会上提议讨论通过。在上述期内中还说，整个自由资产阶级中各色各样的人作我们的代表大会的后盾。所以我们在文人、乡村教师、商人的领导下当然谈不上紧密的、统一的组织。这些人每个都必然找机会以重要人物自居。他进一步扯谎说，全部的资产阶级报刊都由我们支配。他要留意派遣相当数目的代表去参加爱森纳赫会议，但他们是文人和资产者，是真正的工人。

他从现在起说我们的党只是由文人、乡村教师、商人等所构成，与他以往所谈的百分之八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知识分子没有两样。

《民主周报》在七月十七日要求施韦泽不要只派遣他的工具往爱森纳赫，而要他自己来。若是施韦泽大人为礼貌起见还会让自己被禁闭起来，那么，只要到柏林警察那里说句话，就会准他的假。

施韦泽选取了入狱的办法。他发表一篇读着七月十七日的长篇《告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书》，书中又概括地叙述一下存在着的混乱并作了一些将在他从监狱里开释后去实行的诺言。宣言的末尾说：

"请把我牢记在心，就像我在监狱围墙里面对你们念念不忘一样。我向你们告别，高呼：在古老旗帜下再行欢聚吧！全德工人联
合会万岁！

他現在应在“監獄围墙裡面”服刑的期间还有八个星期，他可以在鲁迈尔堡湖上划船和作其他娱乐来消遣。

现在来想一想下列情形。十一月底，施韦泽为服三个月监禁而入狱。十二月将终时，因为他的父亲去世，准他请假八天去处理家务；但是他自由了七个星期，在这期間，在警察和官署的监督下进行着紧张的政治鼓动，到了二月十八日才又入狱。三月四日，政府又一次帮他的忙，为了国会开会准他请假出狱。国会到六月二十二日闭幕，但是施韦泽仍然自由，并且又一次在警察和官署的监督下进行紧张的政治鼓动。等到他高兴了，就又走进监狱。

这种情形，无论在施韦泽以前和以后，在普鲁士都是不可能的。例如，一八八六年基多•威斯博士以违反出版条例的罪名被判了十四天监禁，几个警察在早晨六时袭击睡在床上的他，把他送进监狱。这种在大清早把政治犯从床上拖进牢狱的残暴方式是柏林警察数十年间的习惯。这种习惯的革除到现在还没有几年。施韦泽从来没有因为受这样或类似的虐待而诉苦。他入狱出狱，就像他进旅馆和出旅馆一样。他可以接见一切他愿意接见的来访者。由此可見，对他的怀疑是非常正当的。

* * *

在爱森纳赫会议前不久，特尔克希望在政治方面伤害我，认为必须向我的头投掷一颗臭弹。他在七月二十八日的第八十七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布说，我由福建贼威国王那里每年领到六百塔勒的俸禄。这种指责是愚蠢的，但全德工人联合会也竟有人相信。于是我决意以诽谤罪控告特尔克。我请求威廉•艾希霍夫同志同当时柏林律师希尔塞门采尔谈谈，并问他可否接受这个案件。希尔塞门采尔不肯接受，他认为这个官司打不出什么结果来。法官从断言我领受一个王侯的津贴这句话里看不出有什么败坏名誉。
而拒绝为此提取证据。特尔克充其量不过被判诽谤罪，这对我也
没有什么好处。此外，希尔塞门采尔还认为，我若去请前汉诺威国
王的宫廷大臣普拉顿伯爵作证人，来证明特尔克所说的是否属实，
这样，伯爵单由于前后一致就会拒绝作证，因而特尔克的主张
就好像是有根据的。艾希霍夫曾为此两次写信给特尔克，要求他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公布证据，因为他断言我为前国王服务是
‘确有证据’的。特尔克保持缄默，我为此也同样要求他公布证据。
他不公布证据而是重复他的指责，并要求我控告他。于是我称
他为卑鄙的诽谤者，并且要他在莱比锡法院控告我，因为在柏林这
官司难有结果。事情就这样毫无结果地算了。特尔克对白拉克解
释说，他这个主张他自己并没有证据，但是这意见是一个政府顾
问提出的，只能在我这方面提出控诉时，他才能迫使那个人前
来作证。

爱森纳赫代表大会

社会民主党党的成立和德意志
工人协会联合会的解散

在我们商讨于八月七日在爱森纳赫召开代表大会之后，于七
月十七日在《民主周报》上刊出了宣言，署名的有：各地的前全德工
人联合会会员六十六人，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会员一百一十四
人（其中也有相当数目的前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一批拉萨尔全
德工人联合会会员，瑞士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苏黎
世的德意志共和协会会员；代表奥地利工人的是 H. 奥伯温德、H.
哈同、B. 貝善、A. 马赫尔、A. 斯特拉塞〈格拉茨〉，还有代表日内
瓦国际工人协会德意志支部的约·菲·贝克尔。
宣言上說：

告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人！

同志們！最近在我們党内所做的事情必定使每个正直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滿心欢喜。迄今加在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的束縛被打破了，过去像一个尖銳子插入我們党的骨髓、心癭中的个别人物的自私自利，現在被揭露并被粉碎了。現在要赶快行动，以免我們的胜利果实又會被夺去，并且可由刚刚完成的有益革命中产生纯洁的原则和统一的组织。沒有这些我們党就不能发生应有的影响，不能发挥固有的力量。

长期以来（可惜太长了），个别人物的自私和恶意使得党内自相敌对。但是新时代开始了，它坚定地指示我們，德意志全体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政党本身有必要团结起来，引导党走上伟大工人运动的正确的、建立在国际基础上的唯一能走向胜利的道路。

一个思想正直的社会民主党人，难道能够对这种必要漠不关心嗎？誰能不预料到，由于这样的统一，即在一个共同的组织、一个共同的纲领、一种在政治界社会界的共同行动的基础上的统一，对于我們党有不可估计的利益？——我們毫不怀疑，我們大多数，絕大多数的同志都尊重较好的意见，他們高兴而且乐于为这最后将使我們党能够达到伟大有力的权力发展的宏伟事业贡献力量！

我們既抱着这种信念，于是在今年七月六日在不伦瑞克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关于对此首先必要的步骤完全达成協議，并遵照那次的決議訂于星期六（八月七日）、星期日（八月八日）和星期一（八月九日）在爱森納赫召开全德社会民主党工人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的議程包括下列各项，但是并不妨碍其他建議：1. 党的組織。2. 党纲。3. 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关系。4. 党的机关报。5. 职工会的統一。
有关这五项议程的特别建议，例如有关党组织的提案等的原
文最迟将在本月底印就发出。

参加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必须持有写明他所代表的地方、以
及他所代表的选举人的数目的委托书（全权）以证明其资格。这种
证件可以是用协会或分会的名义的委托书，或者是由为了派遣代
表出席会议而举行的群众大会所出具的委托书。最后或者是由在
某一地方出席的党员同志所签证的委托书。有些地方在地单独
派遣一个代表有困难时，可以由许多地方联合起来，以期至少共同
委派代表一人。

因为有迫切的必要使代表大会在星期六，即八月七日，晚八时
开幕，以便能选出办事处和规定办事规程，所以代表们都务也在这
天（八月七日）到达爱森纳赫。

我们抱着很愉快的希望，伟大的全德意志的一切地方，凡是有
劳动同资本势力作斗争的地方，凡是有人民意志为了自由天天同
国家反动势力作斗争的地方，都委派代表来参加会议——我们希
望代表大会将增进党的福利和发展，党用如火如茶、永不磨灭的文
字在它的旗帜上写着被压迫人民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

起来，同志们，为全德工人代表大会而努力，通过大会为党的
壮大和统一而努力。

此外，我受中央理事会的委托以该会主席的资格在星期一（八
月九日）在爱森纳赫召开全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大会，议程是：1. 理
事会报告。2. 谈论问题：联合会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新组织应抱什
么态度？可能解散联合会。

代表大会召集人委派我为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作必要的准备，
此外，还要写出一个纲领草案和一个组织草案，以便提出来共同讨
论。自拉克和盖布认为，我们必须把认为适宜的建议提出来。梅卜
克内西忙于编辑《民主星期报》和对《社会民主党人报》作笔战，于是
这项工作就落在我的身上。

不仅萨克森王国的国有铁路管理局，而且当时私营的蒂尔根铁路公司董事会也都向我求求，说它们对于参加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人们也按照优待参加会议者的通例减低票价，到今天我还不以颇为愉快的心情欲看那些文件。现今不再有这样的事了。

* * *

约·菲·贝克尔在《先驱》报上论述他对于新的党组织的意见的一篇文章却使我有点为难。年老的约·菲力浦是个出色的汉子，不怕牺牲、不惜舍身、日夜工作不倦，是一个老战士，同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他在巴登革命中担任义勇军团长一样，现在又准备出马了。他也能讲述他那飘泊生涯中的许多故事、笑话和轶事，他非常生动活泼地讲述它们。我常常几小时以听他讲故事为乐。但是对于党组织，他懂得的并不多，而且由于他长期离开德国，他对于国内情况也生疏了。贝克尔不想要一个严密的、尽可能集中而又民主地组织起来、能作有力行动的党，而要一种虽然能够宣传社会民主原则，但是没有牢固的党组织的联合，照他所说，这个联合必须保持一种可以不断改变和能够发展的特点，而且这个联合应该隶属于日内瓦。他在《先驱》报上发表了一个有关的草案，并且希望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对它同意。马克思为了贝克尔的这篇文章的信告诉我说，他们和这篇文章毫无关系而且也不同意它的观点。我为这在七月三十日回信给马克思说：

“刚刚接到尊函，使我很欢喜。我也读到了《先驱》报上贝克尔的建议并且必须承认这些建议使我感到不快，因为我认为由此可以看出，贝克尔所想这样做，是想把有关国际的对德意志的领导权抓到手里。所以我也决心在大会上同这不切实际的、甚至无法实行的、耗费时间和金钱的方案作斗争。我现在能够得到国际总会委员会的支持，感到欣慰。请您不要担心，我决不会在意任何毫无裨益的
情况下把您或总委员会牵入辩论中。而且当贝克尔自己或日内瓦其他代表来到时，我还要设法私下给他分析一下原因。我也可以预先向您担保，贝克尔的建议既不能由我们方面，也不能由全德工人联合会反对派方面，也不能由瑞士或奥地利代表方面得到支持，否则就是我很不了解他们的心情。至于我们对于同国际的关系如何想法，您在本星期的《民主周报》中我起草的并由不伦瑞克和汉堡会同商讨的组织草案一文可以看出。我认为，那是唯一正确和可能的形式。

我写给约·菲·贝克尔一封同样意思的信，信中我也提出对于施韦泽的意见，而且我也同贝克尔谈到施韦泽想派代表参加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计划。

“施韦泽的一切都是弄巧成拙，他自己把这个诡计泄漏了。不
论在巴门一爱北斐特或柏林，我一般同他在一处的时候，曾经观察出
来，特别是当有人当面反对他的时候，他就很容易不知所措而做
出愚蠢的事来。他每逢被人搭住咽喉，他的坏良心就使得他心中
无主。”

我在这里也把施韦泽的外表略加描述。施韦泽身材瘦长，面
带苍白，酒色过度的样子。棕色的头发，两腮和唇上的胡髭都较稀
少。鼻子相当长，末端弯曲而尖锐；眼睛后面是一对冷酷的、闪
烁的眼睛。他在站立或者行走的时候，总是把双手放在背后而把头
部缩进两肩。他一定是非常贫血，在巴门一爱北斐特事件以后，有
一次在柏林我和他握手时我吃了一惊。我好像握着一个死尸的又
冷又湿润的手。

* * *

参加大会的代表为数很多。出席代表二百六十二人，代表一
百九十三个地方。其中有：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日内瓦）、格罗
伊里希和拉顿道夫博士（苏黎世）、奥伯温德和安德阿斯·邵乌（维

77
也納)、霍夫斯台登(柏林)。宗納曼(法兰克福)也出席了，并参与
了几次辯論。但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出席过工人代表大会；他希望在
工人党和人民党之间还能达成协议，但未如願。党的阶级性排斥
了他。“施维泽分子” (我們现在这样称呼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
出席的人数显然大减，还不及从前的一半。这些代表聚在“船舶”
中，我們的代表在“金熊”。由于各方面的消息設施维泽分子要
用暴力破坏代表大会，我找市长和警察那里探听他们对于这种局
势的看法，因为对于我們关重要的当然是使大会得以举行，不能
让巨大的牺牲白费了。据我，我們完全可以随在何时何地举行
集会。在薩克森一魏瑪沒有結社和集会法，所以集会是没有限制
的。此外，我还得到保证，万一我們的安排受到暴力扰乱，警察就
准备加以干涉。我們要求“船舶”中的施维泽分子交委托书来换取
红色出席证，他們拒绝了。随后他們在晚上将近七点钟的时候，约
有一百多人在巨人特尔克聯盟之下闖入“金熊”。特尔克后来在他
那《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目的、方法和組織》一篇文章里谈到他当
时的任务，

“冯・施维泽先生爱用的手法一般是不管在哪里，如須激烈斗
爭，他就派别人前去，而一旦失败时，使他负对党的責任。”

这是完全恰当的；勇敢不是施维泽的优点，反之，在当时，施维
泽要想利用特尔克来干什么，特尔克无不听他使用。

施维泽分子进入“金熊”后，发现在楼梯上站满了我們的人，他
们宁愿把委托书交出来。下午在一个筹备会上预定由盖布和我担
任主席，奥伯溫德和奎克（日内瓦）为候补主席。此外，大家还一致
同意我的建议，如果晚上会议受到扰乱，盖布就宣布闭会。随后就
在星期日中午召开新的会议，只准持黄色出席证的代表进场。

果然不出所料。在推选办事处人员时就已经发生激烈的吵
闹。我們因为光线太差，在办公桌上放了半打瓶子，瓶口上插着洋
蜡。这些蜡烛随时有倾倒的危险，必须用手扶着。吵闹越来越厉害，最后盖布只得宣布闭会议订于次日上午十时在“摩尔”召集另一个代表大会，只准持黄色出席证的代表参加。

我們的策略成功了。夜里，我們（白拉克、盖布和我）检查委托书，把施韦泽分子的委托书都挑出来，由盖布在晨早送给特尔克，请他转给有关代表。此后，会议的进行再没有任何打扰。

我和白拉克被选定为筹款和组织的报告人。约·菲·贝克尔不顾我的一切反对理由，仍提出一个冗长的建议，说党应该叫做“全德社会民主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的组成部分”。这个建议没有人赞成。筹款和组织仅把召集人所拟的词句略加修改就通过了。新党命名为“社会民主工党”。所通过的纲领条文是:

社会民主工党纲领

一、社会民主工党为建立自由的人民国家而努力。

二、每个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都有责任尽力量保证下列原则：

1. 现今的政治和社会情况是极端不合理的，所以党员要用最大的毅力来反对它。

2. 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并不是为了获得阶级特权和优先权，而是为了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为了消灭阶级统治而斗争。

3. 工人对资本主义的经济依赖性构成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所以社会民主政党致力于在废除现在的生产方式（工资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合作社性质的劳动使每个工人得到全部的劳动收益。

4. 政治自由是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所以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分不开的，它的解决是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条件的，而且只有在民主国家里才有可能。

5. 鉴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解放只有这个阶级共同一致地进行斗争才有可能，社会民主工党要有一个统一的可是使每个人都可能影响全体的福利的组织。
6. 鉴于劳动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一个包括一切具有现代社会的国家的社会问题。社会民主工
党在结社法允许的范围内把自己看做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分支，并
与它共同努力。

三、实现社会民主工党鼓动工作中下列最近的要求；
1. 赋与年满二十岁的男子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选举权，去参加议会、各邦的省议会、省和地区代表会议以及其它一切代
表团体的选举。供给当选的议员和代表充分的报酬。
2. 实行人民的直接立法权（即建议权和否决权）。
3. 取消一切等级、财产、出生和宗教信仰的特权。
4. 建立民兵代替常备军。
5. 教会脱离国家，学校脱离教会。
6. 国民小学实行强迫教育，一切公共的教育机构实行免费教育。
7. 司法独立，推行陪审法庭和劳动仲裁法庭，实行公开的和口
头的诉讼手续和免费的司法。
8. 取消一切出版法，结社法和劳动者的联合会，实行标准工作日
制，限制妇女劳动，禁止童工。
9. 取消一切间接税，并实行一种单一、直接、累进的所得税和
遗产税。
10. 由国家促进合作事业，并且在民主的保证之下由国家贷款
给自由的生产合作社。

四、每个党员每月应缴纳党费一格罗申（合三个半卢德意志的
克利特，五个奥地利克利特，十二生丁）。党员同志订阅党的机关
报并取得可靠证明者，在订阅期间免纳党费。至于个别地方党费的
减免，由委员会处理之。

五、党费应按月向党委员会缴纳，邮寄资付讫。
六、对党三个月未履行其义务者，即不再视为党员。

七、每年至少举行党代表大会一次，会中討論和解决党所接触的一切问题，并决定党的总部以及监察委员会的会址和下届党代表大会的地点。——代表大会并规定常务委员会以至个别委员的报酬。

八、如果常务委员会或监察委员会以绝对多数决议，或者全体党员中六分之一建议时，得召开临时代表大会。

九、每次代表大会至少要在会期前六星期由常务委员会在党机关报告公布暂定的議程。在公布后的十天内党员同志方面交到的建議应至少在会前十四天作为确定的議程来发表。单独向大会提出的建議，至少必須有三分之一的代表赞成始能交議。

十、每一名代表一个投票权。已在地方参加了代表选举的党员，可以派遣五个有投票权的委员参加大会。非代表的党员只有討論权。

十一、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必须在会后三个星期内按成本价格使所有党员都可得到。一切有关修改党章、党的原則和政治立场以及党的决议必须在大会后六个星期内通知所有的党员基层組織。表决时以简单多数作决定。投票結果在党机关报上公布。

十二、党的领导机构是一个五人委员会，其中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秘书一人，司库一人（他应具有相当的保证金），助理一人。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必须居留在一个地方或在它周围一哩的区域内，他们是由居住在党中央所在地的党员通过特别的选举手续以绝对多数的票选方式选举出来的。党机关报的编辑部和发行部成员都不准参加委员会。如果在本年内委员会里出缺，中央——除了上述第七条所列情形外——就照这种选举方式来补充选举。

十三、委员会必须在代表大会后十四天内选出来；在这次选举之前，如大会未作其他規定，则事务仍由以前的委员会处理。
十四，委员会共同作一切决议，并且只有在至少有委员三人出席的正式召开的会议上才能有所决议；委员会可以就代表大会所未作决定者自订办事规程。

委员会的一切行为对党代表大会负责。

十五，为了尽量避免常务委员会的专权，党设置一个十一人的监察委员会，所有因常务委员会疏忽而引起的申诉都可向该会提出，该会同时应对常务委员会的业务管理进行检查。

十六，监察委员会应由党代表大会规定的监察委员会驻在地的地方及其周围一哩范围内的党员选举。选举采用票选，最迟在代表大会后十四天内举行。

十七，监察委员会有责任至少每季审核和检查一次常务委员会的业务管理、案卷、账册、金库等，如果有确实理由，而常务委员会拒绝纠正越轨行为时，它就有权停止个别委员以至全体委员会的职务，并采取临时管理业务的必要措施。这种决议必须由监察委员会中三分之二的多数作决定，而且如果常务委员会中半数以上的委员被停职，就要在四个星期内召开党代表大会，对该项事件作最后的决定。

十八，党创办一种报纸，名为《人民国家报》，作为机关报，即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机关报在莱比锡出版，归党所有。编辑部与发行部职工、印刷工的人选和薪给、报纸的价格均由常务委员会规定。关于这方面的争执由监察委员会判断，党代表大会作最后的裁决。报纸的态度要严格符合党纲。党员同志适合党纲的稿件，只要报纸篇幅够分配，可无偿接受。有关刊登来稿或给来稿涂上倾向性的色彩，可向常务委员会申诉，第二级向监察委员会申诉，由该会作最后决定。

十九，党员有义务在各处根据党纲着手创办社会民主工人协会。
在会议进行中，我传达了苏黎世的革命基金管理人拉顿多夫博士及其同事答应由基金拨给我九百塔勒作鼓动费。这就是使特尔克及其伙伴很感痛苦，并把它归在汉诺威国王希挫格尔身上的财源。

我們决定以《民主周報》为党报，并从十月一日起改名《人民国家报》，作为社会民主工党和国际职工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每周出版二次。并选定不伦瑞克—沃尔芬比霍尔为常务委员会的地址，维也纳为监察委员会的地址。起初，人們想把莱比锡定为常务委员会地址。我坚决劝阻了。完全就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前前会员而言，如果把象不伦瑞克这种地方作党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我們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宣传就容易得多。如果我們知道如何安置常务委员会，我們在新党中的势力就得到巩固。事情就这样好了。下次代表大会地点定为斯图加特。九月初，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由李卜克内西代表出席，嗣后斯皮尔（沃尔芬比霍尔）以常务委员会的代表身份偕同他前往。

代表大会的辉煌历程使施韦泽当营中产生极不愉快的印象。在我们都拒绝了施韦泽派往爱森纳赫的代表出席大会以后，他们在“船舵”那边开会，并作了一系列的反对我们的决议。其中一件针对李卜克内西和我个人的决议说：“鉴于所听说的事实，代表大会决议，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两位先生已不配使代表大会继续与他们共事。”特尔克在八月十五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一篇《告党员同志书》，开头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已经过去。我們回顾大会的经过和结果对党的前途可以感到自豪和充分信心。”

在代表大会闭幕后，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举行联合大会，我被选为主席，柏尔格（哥白根）为副主席，党特勒为秘书。克里米亚接受委托检查中央的业务管理，并在党报上提出报告。我所作的报
告指出, 由于纽伦堡的分裂, 联合会落得只有七十二个协会, 在本年度又有五个协会脱离, 但又有四十二个协会加入, 所以联合会最近共有协会一百零九个, 约有会员一万人。收入计四百七十塔勒, 支出四百五十七塔勒, 由革命基金会资助了九百三十四塔勒, 其中拨了八百塔勒补助《民主周报》和作鼓动之用。接着会议一致决议解散这存在了六年的联合会, 并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现有的存款移交社会民主工党, 现有档案 (案卷、书信、记录) 交给我保管。在向中央理事会热烈致谢其劳心费力后, 大家表示希望在斯图加特再会, 就分手了。

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以后

人们很容易想像, 现在两个社会主义党派之间发生了比以往更为激烈的斗争。一篇一篇的声明飞来飞去, 在许多集会中所演出的活剧不是任何笔墨所能形容。特别是工会, 在双方肉搏中受害最大。例如, 在五金工人团体选举主席时就因为选票完全被撕毁而未成功, 此外, 在选举投票时只有二十三次被承认, 有十七次被否决了。

从现在起, 《社会民主党人报》弹奏以往所少见的声调, 捏造事实和虚伪报道, 使读者对于我们这方面的运动获得完全错误的印象。

九月十日, 施韦泽出狱。九月十二日, 他在一篇较长的宣言中宣布, 他将环游德意志, 与他的党徒闭门相会, “以便使各处秩序井然和严守法律”……他在宣言中说, “害怕见我的面的, 是那些自知心怀恶意或者负损害工人事业之罪的人们; 至于那些充当选区代表、鼓动者或其他职务而忠心守着旗帜的人们会欣然欢迎我的。”

人们能不感到所听见的是某一个耶稣宣告审判好人和坏人, 要把绵羊同山羊区别开来吗?
在这次环游中，施韦泽仍遵循旧策略，即不管在哪里如有人对他提出责难性的质问时，他或是沉默，或是加以嘲笑了事。

他对《人民国家报》所采用的策略还是同对《民主周报》一样。他从没有称呼过《人民国家报》的名字，就是对于他也只把它说成爱森纳赫人民党。

他在环游时也到了奥格斯堡，他要求那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把他们所出版的周刊《无产者》停刊。当他们拒绝他的要求时，他就威胁说，要用尽一切方法来毁灭这周刊，即使因此被关五年亦所不惜。随后在八七一一年的新年，施韦泽创办了一种小型刊物《鼓动者》，售价每张六十五芬尼，而首先就拟在巴伐利亚大批推销，为的是使那里的倔强分子阅读。

他在环游归来时声明说，“党从来没有像目前这样强大、团结和繁荣”。这种见解的虚伪在他和门德一哈茨费尔德又发生吵闹时就暴露出来。门德在哈雷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声明反对施韦泽并出版一本小册子，其中刊载了施韦泽的种种罪行。这种事情的发生原是意料中事。但当施韦泽宣布，八七〇年一月一日起《社会民主党人报》将扩大篇幅（这是劳工患者假装健康的努力），门德就宣称，如果到一月十五日他的机关报《自由报》不能得到一千个新订户，他就把它停刊。施韦泽方面的势力却大些。施韦泽通知八七〇年一月五日起在柏林召开他的联合会代表大会。

事先，十一月七日，进步党和拉萨尔分子在柏林发生了巨大的争吵。议员维克教授在普鲁士众议院提出一个缩减军备的建议，后来被众议院多数派否决了。进步党想凭借一个在上述日期召开的民众大会的道义力量来支持这个建议。但拉萨尔分子大批出席并要求担任大会主席，使讨论不能进行。现在既发生了巨大吵闹，议员勤维（卡尔塔）终止了大会。于是特尔克立即重新召开大会。他预先料到进步党的会议要被拝散，曾向警察方面登记在
原会场召开第二个会议，警察对于在同一会场、同一时间的会议接受了双重的登记。而且会议也违反了一切以往惯例，没有警察监督。特尔克主席，施韦泽讲话。在所提出的决议中没有一个字是对政府的，反而把进步党和批评یریင်thus选举权的敌人和标准工作日制的敌人，并且要求取消常备军和实行以青年军事训练为基础的民兵制。

这样，施韦泽又一次设法使人忘记他以前在军事问题上所屡次采取的立场。

附带说明：那时期在萨克森下院以五十五对二十一票通过了缩裁军备的建议。

九月九日，巴塞尔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开幕，讨论的要点是社会主义者对于土地问题的态度。多次会议都充满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最后在七十五个代表中有五十四人，其中有李卜克内西和斯皮尔，赞成下列决议：

“代表大会声明，社会有权利取消土地私有制，而改行土地公有制。”

他们的二人同样也赞成决议的第二部分，即：

“会议又声明，必须使土地成为集体所有。”

这决议在德意志轰动一时，特别是人民党民主派的报纸攻击这决议，把它叫做怪物。李卜克内西没有反对攻击来捍卫大会的决议，却在末期《民主周报》上声明说：

“人们问：社会民主工党对土地所有制的决议表示什么态度？

回答说：完全没有！每个个别的党员能够而且应该表示态度，

党本身无权过问，因为它不管在哪个方面都不受决议的束缚——就像国际工人协会本身不受束缚一样。”
对于这个高明的见解，党内发生了很是混杂的感觉。它没有改善党的地位，却反而恶化了它的地位，于是施韦泽利用了这个情况，他得意洋洋地指出桑纳勒派的不彻底性，说此派在社会主义的主要和基本的问题上就不行了，并且让自己的本党队伍中的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最足以证明，我们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其实在这时出版的第四期《人民国家报》上曾说，“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有关土地所有权的决议是否适当，可能在我们党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决议既作了之后，党如果不否认它的基本原则，就不能否认这个决议。”我们党对于巴塞尔决议的态度不能比这再清楚了。这个声明比第一个正确些，但是和它相矛盾。所以党有必要采取明确的立场，于是我建议，这问题留待下年的党代表大会讨论，委员会也同意这个建议。因为我计划在十一月初往南德意志作大规模的鼓动旅行，我决定在必要时，就为巴塞尔决议作辩护。我的旅行是十一月八日开始，二十八日结束。这期间我在巴黎、科隆、纽伦堡、佛尔特、艾尔郎根、累根斯堡、慕尼黑、奥格斯堡、拉文斯堡、图特林根、雷特林根、麦塞根、斯图加特、艾斯林根、哥平根、阿伦、海登海姆、金根、斯瓦比亚的哈尔和海尔布隆。我只在四个集会中遭到反对。在所有集会中都收到十分令人满意的效果。

在斯图加特，人民党的全体干部和《民主通讯》的出版人尤利乌斯·弗雷塞都出席了集会。在会上我和人民党的党员浩斯迈斯特之间发生原则上的争辩，当然是我的对手失败了。前一天晚上，在一个交际会中，当时的人民党领袖卡尔·麦耶尔问我，党对于巴塞尔决议的态度如何，我声明，党将在斯图加特的下届代表大会上表明态度，并且无疑地会同意巴塞尔的决议。我又加上一句话安慰他：要过决议的实施只有获得了舆论界的拥护才有可能，所以
还用不着着急。加上了这个糖衣，人们就吞下了药丸。在次日的集会中，拉萨尔分子赖克哈特反对我，他质问我，我们对于施韦泽的态度如何，我作了彻底的回答。总而言之，我直讲了三个钟头。

弗雷塞和大部分的人民党人都被我的分析弄得不知所措，于是弗雷塞在《民主通讯》上发表了四篇文章来驳我。我在《人民国家报》上用一系列的文章答复他，这些文章集成一本名为《我们的目的》的小册子，至今还在出版。在这些文章中，我自然也捍卫巴塞尔的决议。弗雷塞同一般纵欲者（享乐人）一样，他一旦感到主张自己的原则不能再满足他那纵欲无度的需要时，他马上就改着良心，牺牲原则，后来他给奥地利首相博伊斯特大人服务去了。

我由南德意志回来后，开始了我的这时在法律上生效的三星期监禁。前面已经说过，李卜克内西和我所以被判处这次监禁，是因为《告西班牙人民书》犯了散布危害国家的学说的罪。

* * *

现在面对着全德工人联合会，我们必须十分努力地争取新党员。所有能够筹措起来的人力和财力都利用到这个目的上。在这里，约尔克作为鼓动者首先成了问题。他旅行的效果不是常常令人满意的。他在一八六九年底因往莱茵区所作的鼓动旅行失败而向我诉苦。他对这事十分悲观。他写信告诉我，当个鼓动者是一种悲惨的生活，这是正确的，鼓动者在那时代所得到的钱只报酬简直是可怜得很。他又想在一个师傅那里找个位置当工人去。约尔克是个细木工。他若没有家室，事情就会另个样子，单独一个人他是能够克服困难的。可是他太富于不怕牺牲的勇气和为事业献身的精神，不能实行他所表示的威胁。

李卜克内西和我利用我们在柏林出席国会的机会在那里争取越来越多的同志。我们特别常常在许多支部集会上演说，成绩极好。
不伦瑞克的委员会经常诉说会员缴费不踊跃。这个申诉是很有理由的。从前工人协会联合会的会员特别难以养成按月有规律地往不伦瑞克向委员会缴费的习惯。它们的习惯是重视把钱财用于当地的需要上。

在不伦瑞克委员会和在莱比锡的我们展开了非常频繁的书信往来，当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把监察委员会由维也纳移往汉堡后，在汉堡开业当书商的奥古斯特·盖布也进入了这种通信。白拉克和常务委员会对《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不断提出责难，说它在政治方面说得过多而在社会主义方面又说得太少。在党内，这样的责难更厉害数倍。

使我非常愤怒的是吕特这个人，他放弃了大学不读而到党内来充当鼓动员，由于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当上了编辑员。他对于劳资漠不关心，而对于报酬（自然也不高）则经常预支。这是同我那关于成续和报酬的观念相抵触的。在工人党内如果有人接受的职务，而不一心一意地履行所接受的义务，拿了工资而不相应的工作，那么，我不论何时，至今还是如此，总认为这是对党最严重的损害和不可原谅的不义行为，必须加倍处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党内担任了专职，照我的理解就是达到了一种理想。他可以照自己的信念去做工作，他不用害怕处分，他如果尽了责任，就会得到同志们的充分表扬。

有一天，我向白拉克严厉地控诉吕特（这封信后来在莱比锡叛国案中还占着重要地位，并印入有关的报告中），白拉克在十月十七日答复我说：“吕特并不坏，至少我不相信他坏。我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完全同吕特一样，而他是一位善良的人。这种人与庸俗人相反，但是他们常在片面性中迷失路途，直到经过长期的斗争是艰苦的阅历后才会变得明智。我自己同这样的性格越不相似（如果考察一下
我的“品行”，我常自以为是个俗人，我就越爱别人的这类性格。总之，我承认，我对吕特认识太少，不能断定他是否同我那个朋友一样。不过我想想这样。你读过塞辛的传记吗？他在一个较长期间是多么轻浮！我常盼望着，也能够轻浮一下，可是难以办到。环境把我束縛在我这辛勤的、严肃的、简直是庸俗的生活上！天生的快乐情调在我实在是非常少的。”

我对白拉克这封信怎样回答，现今已记不清了，但是一定不会同意他对我职员的意见。

白拉克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脱离了极端的唯心主义而参加被剥夺继承权者的政党，他当时有很大的困难。他听弗里茨舍的劝说，为烟叶和卷烟工人生产合作社作担保，在合作社破产后，他必须偿还巨额赔款，陷于异常不幸的地位。白拉克曾在给我的许多信札里诉说他的苦恼，因为我们二人相识后不久即成全逆之交，无话不谈。这个最可怜的人奋斗了多年才摆脱这个因为好心肠和善牺牲而陷入的窘境。他逝世时（一八七九年在他还很年轻，即还不满三十八岁时就死了），全党认为这是件不可补偿的损失。

一八六九年十月，卡尔·马克思到汉诺威拜访他的朋友库格曼博士，在那里住了好几天。白拉克和委员会秘书彭好斯特曾前往汉诺威去考察马克思并向他致敬。白拉克因会晤了马克思而非常欢喜，他写信给我，他是“一个可爱的人”，他们二人非常融洽。我到一八八○年同伯恩施坦一起作“卡诺沙”之行，才在伦敦认识到马克思以及恩格斯本人。这事后再说吧。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奥地利政府向我们开了一个很讨厌的玩笑，它停止了《人民国家报》的邮局销行。当时《人民国家报》的情形是不能缺少户的。这个行动却是对《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诽谤

① 卡诺沙，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公元一○七七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
到此向教皇格利高里七世悔罪，从此著名。——译者
李卜克內西为奥地利政府服务的最好反证。

* * *

本年将终时，在西里西亚的瓦尔登堡发生了矿工大罢工。这是德意志前所未有的最大罢工。这个罢工最值得注意的是，罢工地区的工人，凡是有组织的，都属于希尔施－邓克尔的职工协会，而矿工要求他们退出这个协会。希尔施－邓克尔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利益一致的学说因而遭到了严重打击。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派别都极力赞成并支持矿工。我打算叫人在莱比锡张贴通告为罢工者募款，但是警察禁止张贴通告和募捐款项，因为根据一八四二年的贫民条例为“灾民”募捐须呈请警察局批准。为了贫民条件的这种奇怪解释的原故，我一直上诉到内阁，但冯·诺斯提茨－瓦尔维茨先生（他当时已任内政部长）却同意莱比锡警察的决定。

因为缺少足够的财力，瓦尔登堡的罢工失败了。

* * *

一八七〇年春季，有个任务本来是进步党人或者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应尽的义务，却落在我的头上。齐希尔诺律师死在莱比锡，他在一八四九年德累斯顿五月起义时同豪布诺和托特曾充任临时政府的成员。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齐希尔诺逃到瑞士去，到一八六五年萨克森大赦后才返回莱比锡，但已成残废的人。他需要救济，我为他募捐，捐款由我转交齐希尔诺在德累斯顿的同志沙夫拉特律师。齐希尔诺于一八七〇年春季在莱比锡去世，他的老同志，也包括沙夫拉特在内，没有一个肯为他致悼词；人们耻于或者怯于明显地、公开地以对革命家的同志身份出面。所以我虽同他本人并不相识，而且只由传闻知道他的活动，却不得不去致悼词。德意志的民主党早就失去了丈夫气概。

* * *
一八七○年度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于一月五日开幕。施韦泽的兴致并不高。在人们问问他，他在同东德达成所谓联合时是否缔结了秘密条约，同他否认后，人们又质问他关于金钱出纳的事宜。他把联合会的钱用于《社会民主党人报》了，他没有这个权利，因为刊物是他私人所有的。甚至曾作成一个决议，来明白制止他这样做。对这个决议和对加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批评，施韦泽异常忿怒。他回答说，就信任而论，根据大会的表示，他必须承认他没有取得大会的信任，无论如何，他已失去代表们的大部分信任……人们似乎还不知道，《社会民主党人报》是怎么回事。不是党造成了《社会民主党人报》，而是《社会民主党人报》造成了党……要求一个编辑人必须保证报刊的内容是容易的，只要人们自己没有担负什么责任，而且也用不着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形下，他起先同联合会的敌人，继而同联合会的会员纠缠在气恼之中，也真够了。面对那关于钱财事务应由理事会决定而不像以往那样由主席来决定的要求，他声明说，那么，就选举一个委员会而不要主席好啦。大会于是对财务支出进行详细审查。以五千零九十七票对三千四百零九票通过了如下的建议，代表大会认为本年度财务结算完全满意，并且认为我们党的敌人的一切抨击没有理由，应予驳斥，并且希望财务永远这样。

施韦泽有一次说，鼓动员和代表们已经成为联合会的贵族，联合会里的混乱总是由他们而起，这话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李希特尔（王兹贝克）的一个建议表示反对主席，因为主席曾根据汉堡会员的建议无理地宣布说，凡是同时属于全国烟叶和卷烟工人协会的会员，直到这次柏林代表大会为止，失去会员的权利，这建议以二十四票对十二票，两票弃权，被否决了。这些事情又一次使施韦泽认为应当以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出现。一月九日，举行了一个有二千人参加的公开会议，议程的主题是“军国主义”。施韦泽
在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在德意志国会中曾报名赞成军事法案，
并且他当时在发言中曾经说，他绝不否认和挑择普鲁士的那些
特质，即去年使一个敌对世界佩服和承认的特质，现在他却提出下
列决议，请求通过：

“代表大会声明：常备军是现今反动统治的主要支柱，同时是
社会剥削的主要支柱；民主的原则要求，各处的常备军全由全民武
装来代替。”

这完全像是我们原先的开姆尼茨纲领和现在的爱森纳赫纲
领。经过施韦泽没有参加的较长时间的讨论，这个决议一致通过。
此外，代表大会声明拥护把土地转为社会的公共财产。施韦泽以
极其激进的发言结束了这次会议。

在进一步讨论中，有一个把《社会民主党人报》收回党有的建
议，以六千四百九十二票对二千五百八十五票被否决了。在讨论中
间，施韦泽说过，《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它存在的七年间耗费了大批
款项并且现在也需要捐献。达大批款项由哪里来的，没有人知道。
如果党肯把报刊所耗费的款项偿还一小部分，他就准备出让所有权。
有一个发言人表示顾虑，认为如果有了分歧，施韦泽将会创办
新报刊。听了这个解释之后，多数人把接收报刊看做是件危险礼
物。施韦泽还宣称，从一月一起，哈森克莱米尔和哈赛尔曼加入
编辑部。很多会员提议，要详细而真实地编纂代表大会的记录。

一个较长而且激烈的关于各种建议的辩论开始了，例如，照会
章规定，主席应由代表大会选举。施韦泽反对地却坚决主张选举要
通过他用他的报刊来掌握着的人民。他贯彻了他的意见。屡次提
出的要通过一个申诉委员会来监督编辑部的建议，由于这次决议
对联合会机关报编辑部的一切责难都要向主席提出，被取消了。
在理事会作为监察局的特点方面，理事会对编辑部和主席的工作
效率，行使最高的监察权，并可以对它作出规定。在有关的讨论中
普弗息说，编辑部已经采取措施，把许多出色的会员逐出协会去了。

二月十二日举行主席选举，施韦泽又以四千七百四十四票对二百四十九票当选，这票数与柏林代表大会代表的九千名会员相较，就不能看成是特别的信任投票。

* * *

一八七〇年初，在三个现有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之外又有第四个出现，不过不甚重要而且寿命不长。施韦泽对奥格斯堡出版的《无产者》及其主办人所表现的顽强敌意，使他们非常愤怒。柏林代表大会现在既已声明反对巴伐利亚，他们就决定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且在一月底在奥格斯堡召开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这个分离出来的组织的领导人是弗朗兹·奈夫和陶舍尔；三个人都是排字工人。弗朗兹后来写了一本出色的小册子：《怕马尔特先生与其冒牌科学。一个工人著。一八七三年》。弗朗兹几年前死在美国。奈夫得病很多，陶舍尔至今仍是党员，住在斯图加特。不伦瑞克委员会方面派我做代表往奥格斯堡，以便使巴伐利亚的同志们参加我们的党，并预备成立第六个支别。会议只有九个代表出席。我所代表的立场如下：

“成立新派别只对工人事业的敌人有利。他们又要为这种分裂而欢欣，并且指出，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情的工人，作为政党是无害的，因为他们虽然原则完全不同，却不能团结起来，而且纯粹为了形式上的和个人的考虑而互相残害。另一个主张团结的迫切理由是防止工人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分散。对工人来说，这两者都不丰富。派别越多，必须设立越多的管理机构。管理机构耗费金钱，这样，单是这些管理机构就把工人辛苦得来的几文钱浪费掉了。人们不把钱用来对资产阶级和反动派作斗争，却用于自己人的互相斗争，把本来不充分的精神力量消耗在自相残杀中，而对整体毫无裨益。我深知，人们对于合并主要有两种顾虑：一
个顾虑是我們的所謂聯合，簡直就是同人民黨混合，另一個顾虑是认为我們組織太不一致。这两种指摘都是由于成見，这些成見是由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害怕工人同民主资产阶级接触（施韦泽、門德），并且想在对激进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形态下隐藏他们同反动派的妥协的人們，巧妙地加以传播并在群众中生了根的。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工党是两个完全分立的政党，各有各自的纲领和組織。我們党的纲領几乎是一字不差地作了这次大会的基础，所以不用我再来闡明，不过我們纲領第一部分还更进一步，它还包含着国际纲領的精义，并且也又清楚又精确地表述了它对于现有国家的态度。‘人民党’把我們的政治要求和我們的几个社会要求（标准工作日制，禁止童工）列入它的纲領，因而有某一段路可以和我們并肩前进，就此而言，它同我們是可以互相了解的。如果对它的那些和我們相同的主张作斗争，那就是愚蠢；但是，不言而喻，在它和我們之間有分歧的地方，特别是在社会范围内，我們要处处反对它。人民党是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所組成的政党，这一点我們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它是由大德意志的君主立宪派、資产阶级共和派和少数基本上也承认我們纲領的人所组成，不过后者为数极少。人民党在反对大普鲁士倾向、軍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是一致的，并且从这个观点看来也与我們一同对敌视我們的进步党和民族自由党进行斗争。所以除了由于双方立场的性质自己发生的关系之外，我們同人民党并无其他关系。拉薩尔在一八六三年还劝工人党对进步党发生这种关系，拉薩尔甚至在他論《立宪政体》的著作中許多地方把自己称为人民党人。反對我們的組織的抗議，正像經常責备我們对人民党的态度的話一样，是沒有根据的。如果我們在德意志是在一个自由国家里，則不言而喻，我們在筹划組織时就只须着眼于实际的理由。但是德意志不是一个自由国家，而是由大多数实行反动的邦国所组成，各邦中不受喜爱的人
民团体非常清楚地感到法律的威力。萨克森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被解散、普鲁士许多地方社团的被封闭、普鲁士最高法院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选举协会（这个类似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的决定、巴伐利亚的最近事件等都足以证明，法律如何能够随时消灭这个组织。如果施韦泽把低级法院对那联合会的判决继续诉诸一切上诉法院，则最高法院无疑地会认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因而宣布在普鲁士加以禁止。施韦泽惧防此事，他的联合会所以还能存在的唯一原因，尽人皆知是他享有柏林警察局和政府的恩惠的缘故。我们必须建设的组织，是要既有统一性，同时又使各个地方的党员能在法律面前有形式上的独立性。党的统一性表现在党的常务委员会中，这个委员会是由选举出来的，它的权限受严格的限制，同时它还可以受监督，因而消除了任何‘领袖集团’，并且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个人统治；此外，还表现在每个党员按制度按月缴纳的党费；最后表现在党的机关报，它是党的所有物，所以不至为私人所利用。通过这样的安排，才可能为党的扩充作有力的鼓舞和在一切问题上贯彻党的意志。在地方协会中党员同志可以毫无拘束地讨论党和进行地方性鼓动，法律无法干涉。我们所采取的组织不仅是在想像中好而是实在好，尽管党从存在的第一天起一直受到迫害，组织却没有受到损伤，因为他们就是做不到这点，这就是证明。如果来一个像全德工人联合会那样的组织，我们早就垮台了。

警察对于全德工人联合会没有引用最高法院的判决，这足以表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首领同普鲁士警察的非常和睦的关系。我们没有享受这样的恩惠，我们也不想要它，因此，我们必须把组织安排得不怕警察的侵犯。此外，形式对我们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原则和它的应用。我们不属于那种以正统自居而把外表形式看得比事业还重的人，我们绝不认为组织已经没有改善的余地。每个
党员对于组织的改革都能发生影响，他如能获得多数人赞同，他们的愿望就起决定性作用；一句话，党的整个制度是民主的。"

我的讲话是不妥当的。召集人不喜欢我们对人民党的态度，正因为该党有个激进的纲领，所以必须认为它是危险的而对它作最严厉的斗争。我们的组织他们也认为不合适。

一八七〇年，在第十期《人民国家报》上我所发表的报道里，我还说道：

"我虽一再发言并反驳所提出的顾虑，但立即看出，一切话都是白费，因为人们已经毅然决定了具有完整公教主义机构的第四工人党派。于是我声明，我认为我的任务已了，所以还要参加公开辩论，只是为了向代表大会声明我的态度而已。

此后不久，又举行公开集会，我说明了我不能继续参加会议的理由。同时我利用这个机会又公开地坚决反驳了大会上可能还存在的由施韦泽教导遗留下来的反对我们党的成见。我说完后，收回我的委托书，同我们的同志离开会场。

如果说所正式负担的使命失败了，我从奥格斯堡却带回了道义上的信念，即工人大众已厌倦于因为琐碎的、个别的或者形式上的顾虑而互相争吵不休。工人了解，只有紧密团结，集中一切力量，才可以保证他们胜利，而且尽管组织了社会民主党第四派，如果全体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的时刻不是近在眼前，那我必定就大错特错了。"

这里所说的希望很快地实现了。在六月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即已达成协议。巴伐利亚派转入我们的党。我由奥格斯堡的归程中，在慕尼黑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在听众中有年仅二十岁的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这是他后来随便告诉我的。

一八七〇年一月，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莱比锡市参议会因为工人教育协会声明赞成爱森纳赫纲领而决定取消每年给协会的拨款。
市津贴余额二百塔勒。数日后市参政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后以二十七票对十六票附议参议会的决议。在当天夜晚，我又以一百二十票对二十票当选为协会主席。

*   *   *

自从爱森纳赫以后，我们就全力把为了发展党而进行的鼓动推行到全德意志。在许多次我所召开的集会中，在福格特兰的普劳恩反对麦克斯·希尔施博士的两次特别有趣，因为我的讲话内容造成控诉我散布危害国家学说的又一根据。在这个控诉完毕之前，北德意志同盟的刑法法典发生效力，其中未包含萨克森刑法的规定，这个材料到后来在对我起诉的叛国案中被利用了。这两个在两晚接续举行的（因为在第一天辩论没有终了）集会，结果是麦克斯·希尔施博士（他当时是北德意志国会中普劳恩选区的代表）完全失败。比这早二年，我也曾同麦克斯·希尔施博士在他的故乡马格德堡对抗，在那里他同样遭到一次大失败。在马格德堡后来的一次集会中，我尖锐地批评了施韦泽的行为，一个狂热的建筑工人对我掷来一个啤酒桶，紧靠着我的头边飞过去，打在墙上粉碎。如果我被击中，很可能打破了头。那么这些字句就会写不成了。这正是当时敌对的兄弟们用以款待的盛意。

*   *   *

社会民主工党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六月四日至七日举行。出席代表七十四人。来宾中有那时我才认识的爱德华·法兰克同他的朋友穆尔贝格尔博士。按照北德意志同盟宪法的规定，在一八七○年八月底必须举行新的国会选举（后来因德法战争爆发而中止），所以选举中的策略问题成为讨论的主题。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实际出席议会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关于这点我将在别的地方另行叙述），但是对于下列决议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社会民主工党所以参与国会和关税议会的选举，只是为了鼓
动的原故。党在国会和关税议会中的代表应尽可能致力于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在大体上保持否定态度并利用每一机会指出两个议会的毫无用处并且当作喜剧来揭穿它。

社会民主工党不与其他政党联合或者妥协，不过大会建议，在国会和关税议会选举时，凡是党没有提出自己的候任人的地方，就投那些至少在政治见解方面基本上采纳我们的立场的候选人的票。大会特别建议，在党不打算提出自己候选人的那些地方，可以支持其他政党提出的真正工人候选人。”

魏尔特（巴门）建议，宣布不参加竞选；上述决议是矛盾的。这个建议被否决，我们提出的决议通过了。

接着讨论土地问题，由我作报告。我所建议的决议是：

“鉴于生产的需要——如农学（土地的科学经营）法则的应用，都要求大规模经营农业，因此也有必要像现代工业那样采用机器和组织农村劳动力，并且一般说来，现代经济发展力求大规模的农业经营；——鉴于根据上述，农业和大工业一样，小农中农将被大地主逐渐排挤，有利于少数人的大多数农民的不幸和依赖关系日益增长，这是与人道和正义的法则背道而驰的——又鉴于土地的生产性能不要求劳力就可以成为一切产品和一切有用东西的资料，大会认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将形成一种社会的必要，即农田将转化为公共所有，而土地由国家方面租给农业合作社，合作社负责以科学方法加以利用，把劳动所得根据合同约定的办法分配给合作社社员。为使土地能得到合理的、科学的利用，国家有责任设置相应的教育机构，在农民中间传授必要的知识。大会要求，作为把农田从私人经营过渡到合作社经营的过渡阶段，可从国有土地、君主私有土地、世袭地产、教会财产、行政区公地、矿山、铁路等开始，因而声明反对任何上述的国家财产和地方财产转化为私人财产。”
决议末句曾反复争论，谓不应涉及细节。但决议最后还是通过了。

因为当时面临在维也纳对奥伯温德、安德阿斯·邵乌、约翰·摩斯特等奥地利工人领袖提起的叛国控诉，而且奥地利政府对工人运动领袖进行着疯狂的迫害，《社会民主党人报》却继续攻击李卜克内西，说他是奥地利政府的代办，我就建议以下决议：

“大会声明，奥地利政府由于它对工人运动的态度和对被监禁的工人的一切蔑视人道的待遇，已引起一切国家的工人对它的仇恨和鄙视。”

会议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通过了这个决议。

德累斯顿被选定为一八七一年度代表大会的地点。

施韦泽的结局

当上述事件发生时，《社会民主党人报》以毫不减弱的力量不择手段地对我们继续进攻。例如，它现在的习惯是经常从民族自由党的《法兰克福杂志》（据它说是我们党的一个机关刊物）转载文章，用以反对我们。谎话瞎的几乎是难以为继。可是还有更妙的。

七月三日，《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一篇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号召书，书中要求为国会和关税议会的选举作准备，并根据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在我们自己没有提出候选人的选区，可以考虑能否用我们的票帮助其他工人政党的候选人获得胜利。不伦瑞克委员会当时没有预料到，早在前一天，七月二日，在汉诺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理事会会议上已经通过施韦泽所提出的建议，其内容如下：

“1. 在一个反动分子（保党党员）和一个自由主义者之间复选，投自由主义者的票。

2. 在一个反动分子和一个人民党员（诚实派，他的意思是指我
們)之間複選，或選。

3. 在兩個自由主義者之間複選，投比較進步的候選人的票。

4. 在一個自由主義者和一個人民黨員（誠實派）之間複選，投自由主義者的票。”

前三項一致通過，第四項有四票反對也通過。

人們不難想像當我們讀到這個決議時是如何激憤，我們認為這是無恥透頂。這顯而易見是施特澤和特爾克想利用理事會成員對我們的誤解，使無恥的決議得以通過，來對付這個反對俾斯麥政策最強的政黨。李希特爾（王茲貝克）後來承認說，因為他知道施特澤是受政府的委托而提出這個建議，所以他投了反對票。我姑且寫在这里，但是毫無疑問，這個決議是符合俾斯麥的願望的，这就夠了。

我們队伍中获悉这个決議后，不伦瑞克党委员会立即于七月十一日发出号召，其中說道：“我們的同志們不要理会那个決議，只要对工人的事业有利，就应该支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候选人，要忠于一种思想，即組織所以存在，为的是使所有社会民主党工人能团结一致。”然后繼續说道：“

但是馮·施特澤先生以极其令人憤怒和极不可原谅的方式企图挑撥工人反对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我們为了工人的事业，有责任用全部精力来反对他。所以我们要求巴門—愛北斐特（这个斗争的典型地点）的党员們，在这方面毫不犹豫地采取必要的步骤；党应当并且必须把这个在激進思想伪装下一向为普魯士政府的利益做尽一切事来损害运动的人，从公众运动中清除出去。党將给巴門—愛北斐特的党员同志们以支持。奋勇前进吧!”

七月十三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因为所要求的五百个新訂戶沒有争取到，不得不宣布縮小篇幅。这是对去年年底夸口要扩充
篇幅的回复。增加的数目还不到一百。但是不久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人民国家报》（在一八七○年三月底有二千个订户）都必须继续缩小篇幅。因为德法战争忽然爆发，两派的许多党员都被征入伍，其余的也因突然失业而生活无着了。

关于这次战争的原因和发展，我将在别处再讲。李卜克内西和我认为拿破仑和俾斯麦应对于这次战争负同样的责任，我们在表决所要求的战时公债时弃权。关于这事，我们以一个对国会议案的声明说明了理由。施韦泽及其伙伴则不如此。施韦泽认为这次战争不仅是一个对德意志人民的战争，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的战争。并且每个反对破坏和平者的德意志人，不但要为祖国而战，而且要为反对未来思想的主要敌人，为自由、平等和友爱而战。

把社会主义和战争联系到一起，固然是愚蠢已极，但是在那种情绪激昂的时候，即在荒唐透顶的时候，只要是针对我们，也会有人相信的时候，这一举动是有用意的。

在战乱中，由维也纳传来消息说，奥伯温德、安德阿斯·邵乌、摩斯特和巴普斯特因叛国罪，第一人被判处六年监禁，其余三到五年监禁，每人每月还要加罚素食一天。此外还宣告说，奥伯温德和摩斯特在服刑后还要被逐出奥地利各地。其余被告判刑较轻。一个主要罪状是参与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奥伯温德和邵乌）和承认那里只有用强力才能贯彻的爱森纳赫纲领。

现在差不多整个新闻界都认为我们在国会中的态度对我们进行迫害，其中《社会民主党人报》表现得最为突出，给我们在加“卖国贼”一类的徽号。这还不够，施韦泽还派遣他的各种鼓动员到莱比锡煽动群众起来反对我们。哈森克莱维尔首先出来，他张贴开会布告，其中说，“我们亲切地邀请本市全体工人、市民和居民们参加这个集会。当我们的军队已站在战场上的时候，对于个别的、在这里还很可注意的非德意志分子，我们的居民似乎有迫切必要
来公开表示一下真正国志的意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全权代表。”

但是哈森克莱维尔把事办坏了，在总会中我们占了多数，所以
我们所提出的议案被通过了。在哈森克莱维尔之后，由沃尔夫
（汉堡）和阿姆包斯特（斯德丁）讲话，情形就更糟了。会场立刻发生
乱嘈嘈的吵闹，很快就变成格斗，受惊的店主熄了汽灯，才算完结。
当我们会后聚集在我们的会所里的时候，得到消息说，施韦泽分子
拥向李卜克内西的住所去了，要想打毁他的窗户。我们立即抄最
近的路飞奔前往，可惜到迟了几分钟。果然，李卜克内西家的一些
窗户被打得粉碎，李卜克内西夫人毫无防备，正坐在房里给她的第
一个婴儿哺乳，因而受了极大的惊吓。我们在盛怒之下前去追捕
暴徒，在市中心附近追上他们，把他们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此后
不久，《社会民主党人报》报道它的党徒的英勇行动时说道；

“对人民党的卖国行为的民愤来了许多爆发。李卜克内西的
窗户被打毁了。”

几天后，有一批大学生也想对我来一个类似的敬礼。捣毁窗
户之外还有一阵嘲笑的叫嚣。幸而我住在院子后面一个大商人的
房子里。那天晚上守门人一看出前来的大学生要干什么，他就飞
快地关上门，他们只好毫无结果而退去。

这一切骚扰迫害本不值得再加叙述，却激怒了我的选举人，他
们多半都是穷汉，却认为应当送给我一个银质的桂冠，配上乌朗特
的格言诗句。如果我谈到这件事，我一定会使它不至实现。

一八七〇年八月底，特尔克在《伊塞隆报》上宣布，他暂时把
政治高高挂起而专作人民代言人。于是施韦泽最有力的台柱之一
破裂了。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也忽然转变，它和上面的联
系显然是断了。战争和德国军队的不断胜利，使南德意志和北德
意志的差不多整个资产阶级都拜倒在俾斯麦的脚下。甚至在南德
意志人民党人中间，沙文主义也猖獗起来。现在施韦泽对俾斯麦已是有许多批评，再保留着他也就无益了。

八月三十一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又过头来反对武力吞并阿尔萨斯——洛林。九月初，俾斯麦拿破仑后，该报即发表反对军备协定和反对使拿破仑复位的意愿。因此也就与我们在《人民国家报》上所提出的正相同。九月十四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文中反对军备，并且援引了格奈塞瑙的意见。

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被人们加上锁铐牵往吕森要塞，奥古斯特·盖布也遭此难，在汉堡被捕，当《社会民主党人报》报道这个消息时，它愤愤地说，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这两个主要煽动者叫别人代为火中取栗，自己倒安然无事。过了不久，我们被捕，它也如愿以偿了。后来当约翰·雅可比和海尔比希（哥尼斯堡）被捕，同样解往吕森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又转过来反对这次逮捕了。一八七〇年十一月初，该报报道，它的狂热党徒之一—培曹尔特（莱比锡）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理事会。他不愿再理施韦泽了。

为了决定一笔新的继续作战的捐款等提案，十一月二十一日又召开国会。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宣布，这被行的议员要投票反对捐款。战争在开始时原是防御战争，现在发展为侵略战争了。所以该报在这里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在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国会中所经常挑起的非常激烈的辩论中，施韦泽及其伙伴始终保持沉默，对辩论不置一辞。只有当李卜克内西在一次发言中反对新要问题时，他说，我们与其说他是德国的朋友，不如说是法国的朋友，并且认为，我情愿做法兰西人民的好兄弟而不愿做流氓拿破仑的好兄弟，在这中间施韦泽高呼好呀！好呀！这是他在战争辩论中唯一的表示。

十二月十七日，李卜克内西、赫普纳（《人民国家报》的助理编辑）和我的住宅突然被警察闯入和搜查以后，宣布我们被捕并带去拘留待审。我们被一直拘留到一八七一年三月底，对于在新年后
开始的竞选，我们就完全无能为力了。但是这并不无碍于冯·施韦泽
先生于一九八八年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再次指示全德工人联合会
会员，去年七月二日联合会理事会关于他们态度的决议，是在复
选时要反对我们——爱森纳赫的诚实派。这时我们被关在严密的
隔离监狱里，检察官和法官正共同对我党酝酿着叛国案，这个人却
做出了这件事。

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的会员具有高度的自尊心和阶
级觉悟，不服从他的指示。他们同我们的同志合作，推选我为莱比
锡的候选人。还有一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候选人拒绝在一篇决定
在复选时采取反对我们的策略的声明上签名。冯·施韦泽先生又
一次希望太奢侈了。

一八七一年三月三日，即签订和约的那一天，也是打算选作选
举日的一天，《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一篇社论，表示了极大胜利信
心。但在当天晚上，消息传来，施韦泽在对巴门——爱北斐特
保守党的候选人冯·古塞罗夫先生在复选中并未取得胜利。这
个冯·古塞罗夫先生就是一八六七年秋季付给施韦泽四百塔勒作为
保守党对于他的竞选的津贴的那个人。在复选中施韦泽以八千四
百七十七票对九千五百四十票失败。这个失败使他下决心，退出
社会生活，这最清楚地说明了他的个性。他在三月二十六日的《社
会民主党人报》上一篇《献给党的》长文中宣布，今后他不能继续领
导了，他的决心是不容改变的。他在提到选举事件时说，这虽然不
是他引退的原因，却实在给了他机会，使他早就打算引退的念头实
现了。在他周围的许多同志都能证明，他近一年来早已下了决心。
他把他的职务维持到下次代表大会，等党把他的职责卸掉以后，他把
大权移交给党的最高机构。

他说，他引退的根本原因是多年来为工人政党牺牲了时间、力
力、心神安宁和金钱。没有人能再要求他继续牺牲下去……他尽
了他力量，在岗位上站得也够长了，应该请求退伍了。

这个通告使联合会以及施韦泽的敌人都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在行动上表示过对联合会所赋与他的职务感到厌倦。他的一切措施都与此相反。不过应该承认，他一年来存着可能下台的想法，并且曾对他周围的人说过。但是大概没有人当真相信他。引起他这个决心的原因，首先显然是巴门一爱北斐特的经验和一八七〇年一月柏林代表大会的经过，在大会上证明了，他要想获得联合会的完全信任是永远办不到的，而恰恰相反，对于他的领导和他的行为的不信任和不满意却是有增无已。他所提供的控诉材料实在太多，他的许多行动太令人不满和厌恶，以至到了最后，人们不能像以往那样因为他特别具有作党魁的出色本领，而宽恕所发生的事情。因为那些本领的原故，人们已原谅了他许多在其他情况下联合会所不能容忍的事情。但是这种宽容逐渐消失。另一方面他认清了，他对我们的斗争长久进行下去，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尽管我们的党当时在组织上和在它的各单位的紧密团结方面还有许多缺点，但是党不断地壮大，党在道义上的威信就是在它的敌人眼里也是无可否认的。所以他不久就会有一天不得不设法与我们解决，这无异于一个对他以往整个行为的判罪。他认为这对他是莫大的耻辱，他不愿忍受。这种可能性迫使他宁可放弃在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个已失去上面支持的职位。

施韦泽已经作过试探来博得一个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一八七一年一月，他有个三幕剧《卡诺斯》在柏林舞台上演，他借这个表示他也具有戏剧才能。从这以后，他就在这个领域内干下去。

* * *

四月三十日，拉萨尔全德工人联合会有一部分会员决定脱离该会并转入我们的党。当时在不来梅的奥古斯特·曲恩在一封《公开信》中也主张各种党派的团结，这对于工会运动尤其是绝对
必要的。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大会由四月三十日延期到五月十九日召开。但施韦泽在四月底就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所以该联合会现在没有机关报了。

在大会上特别关于财务情况的讨论占了很多的时间，末尾通过了弗罗梅的建议，建议说，“因为一部分的钱很不适当地用于鼓动，主席应受谴责”。在会议继续进行中施韦泽申述，他因为财政上的原因被迫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四月底停刊。同时他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报》任何时候都是入不敷出，所以他也没有得过编辑薪金。有一个代表指出，自一八七零年十月一日到一八七一年一月一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失去约一千七百个订户。《人民国家报》在同一时期失去三百个订户。大会决定《社会民主党人报》仍然原样复刊，但为联合会所有。该报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名称于七月一日出版。此外，还决定设立一个由三个会员组成的管理及申诉委员会。哈森克赖尔当选为主席，接替施韦泽的职位，哈塞尔曼为主任编辑，德罗席为秘书。从现在起，主席每月支薪五十塔勒。

最后，大会对施韦泽给党的有力领导一致表示衷心感谢，并对他在这个岗位和领导地位上表示惋惜。显然人们在敷衍他的面子，而把他从前许多信徒对他的引退所感到的满意藏在心里。

次年（即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五日在柏林召开的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讨论，却与这次一致同意的信任投票有鲜明的矛盾。在代表大会上宣读了八七二年三月三日汉诺威的理事会会议记录，在会上，施韦泽以往的亲信特尔克发言说：

“如果考察一下联合会的历史，就会看出，每逢联合会上升时，就随便来一个小小试验，又使它降下来。”

对于这一点，人们有理由来回答他：他是共同搞这些试验的。
但是他对此一直不说出来。特尔克进一步说：

“施韦泽不让印制联合会卡片，因为他把收进来的钱自己立刻花掉。他（特尔克）却不能写信告诉宣传部，如果这样做，就会在党内不断产生裂痕。当时奥尔曾说过，联合会金库不守制度，这对的，因为施韦泽曾从联合会金库取去五百塔勒，送到一个银行家那里。因为顾虑到党，所以人们没有说出来。”

特尔克继续说：

“施韦泽与警察局有联系，凡有什么事发生，就向那里告密。施韦泽在鲁迈尔堡服刑之前不久曾对他讲，他（讲话人）在任何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求助于警察局，施韦泽也曾同他一道去到那里，并且向他介绍这个地方，这时施韦泽显出对那里各房间都很熟悉。随后他陪他在整个院子绕了一遍，那里警官等站立着向博士亲切地问候。施韦泽也告诉他，他（讲话人）随时可以到内政部长那里去。”

关于这一点，还是说。答应特尔克说，他总是与党在暗中摸索，上次代表大会上他还在为施韦泽辩护。另一个发言人认为，根据他的自供特尔克是远超过施韦泽更为恶劣的叛徒。第三个发言人说：“他发觉施韦泽博士出席，就质问说，是否准许非会员出席，施韦泽既不能以会员身份，也不能以监视的警官身份出席，那他就必须立即离开会场。”

经过证实，施韦泽自从辞去主席职务以来，即未再缴付会费，因此，不再是联合会会员了。于是施韦泽离开了会场。

接着林格诺建议，决议不再接受施韦泽入会，他希望把他开除。

这个建议，即不再接受施韦泽进入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决议在表决时以五千五百九十五票对一千一百七十七票，一千二百零九票弃权，被通过了。

108
于是施韦泽的政治生涯结束了。他竟被那些多年来对他几乎是绝对信任的人或者是像特尔克那样的帮手所抛弃和判处。麦耶尔在书里认为，联合会所以把施韦泽开除，是因为他对保守党的社会政治家鲁道夫·梅耶尔有文学上的友谊。这是错误的，在那时候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人们没有这种敏感。果若是，则哈森克莱维尔也必定被开除，大家都知道，当时他同样与鲁道夫·梅耶尔有往来。这种往来当然也不足以构成开除出党的理由。后来弗·恩格斯和我也同鲁道夫·梅耶尔有过私人关系，一八九三年在布拉格他曾作我们游览全城的向导。我认为，联合会对施韦泽的决议并不缺乏最重大的理由，用不着另外去找。

施韦泽的下台就等于这样一个人物脱离政治生活，这个人如果除了其他性格以外也具有工人党领袖所绝对必要的性格，即无私、诚实和完全献身于所代表的事业，他就无可争辩地会像我所强调指出的那样，终生充任党的第一领导人。人们可以惋惜人格上的这些巨大缺点，但是不可忽视这些缺点。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他是那理想的人，就不可能发生那些消耗了时间、力量、健康和金钱而毫无结果，为共同的敌人所快意，又阻碍了无数要参加运动的力量的多年苦斗。施韦泽所播下的种子还在继续结果。不错，他懂得如何把社会主义思想非常清楚和生动地带给群众（这是他的功劳，并且这种活动同他所扮演的两面政治角色毫无矛盾之处），但是他在政治上播下了不幸的种子，滋长了狂热，并且企图用这个争斗的根源来保持工人运动的长久分裂，因而削弱了工人运动。

我确信，这就是他真正的任务。其正确性可由上面所引用的特尔克在柏林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来证明，他说：“看一下联合会的历史，就会看到，每逢它上升时，就随便来个小小试验，又使它降下来。”关于这，联合会的历史上有很多例子。职工会也完全如此。当
职工会应时代的潮流非创办不可而创办起来以后，就来一个荒谬透顶的组织阻碍它的发展。如果说施韦泽在这里没有达到他的目的，那是因为运动过于健全，不容人布置，它已发展得超乎他之上。

他的活动的真正目的，即在俾斯麦心目中的主要目的，是为政府创造一个政治上驯服的工人运动。因此进步党的立场被坚持当作工人运动反对派的分界线，照施韦泽的话，那个进步党在社会的事业上是个退步党。根据我在这里所综合的事实，施韦泽为俾斯麦服务，已经毫无疑问。至于人们不知道他充当这个角色领到多少款项，那不能作为任何证明。这类事情，如我所反复提及的，必定不会在公开市场上市议，而且对施韦泽这样的人，也决不会由低级官员经手办理此事。我确信，连柏林警察局长也不会知道此事的详细情形。

他经常并且终年不得不同债权人纠缠不清，也不能作为他受贿的反证。因为在俾斯麦统治普鲁士的初期，对于像施韦泽所做的那种服务，不会付太多的代价。机密费到以后才受俾斯麦的绝对支配。对于被全部反对派报纸所攻击的机密费，施韦泽从没有表明曾著地写过和说过一个字。他在另一方面是属于是欲无度一类的人，即使有银行经理的收入也不难把它花光。他也可能希望并且他的野心也表明，到适当时期在一个部里或国家机关里摘个相当的位置，如社会政治枢密顾问之类，俾斯麦自己承认他当时的枢密顾问什么也不会懂得。

但是，就施韦泽所扮演的角色而言，能够自由、独立、随心所欲地处理他所领导的联合会，却也是绝对必要的。独裁制就属于此类。独裁制使他摆脱一切监督，容许他为所欲为，他没有必要把他的阴谋诡计告诉别人或甚至征求别人的同意。如果那样，他就不能独裁并且演不成这个角色了。所以他通过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政变，又摆脱了代表大会刚刚给他带上的桎梏。并且因为拉萨尔
自己有独裁欲，于是创办了一个容许领导人有独裁权力的组织，
所以必至于把这组织变成不触的火金风，攻击这个组织，就被
加上叛国一类的罪名。主席的绝对权威必须保持不可侵犯。此外，
必然有助于对此的是对拉萨尔和他所创办的组织的经常崇拜，这种
崇拜为玩世不恭者所笑而，反而他对那些仰受他领导的人们更加
蔑视。

因此，施韦泽在别处一样，也曾对鲁道夫·梅耶尔抱怨工人的
忘恩负义。这种怨言是符合他给我们的印象的。对于他在运动
中的地位，他正是抱着完全错误的观念。一个党的领袖只有老老实
实为党尽他的力量和才能，才会成为真正的领袖。一个参加并属于
民主运动的人的义务和责任，就是尽其所能做最大限度的工作。
他通过他的成绩获得群众的信任，而群众因此拥戴他为领袖。但
是，这只是把他作为他们最信任的人，并不是当作他们所盲目服从
的主人。他是保卫他们的要求的战士，他们的渴望，他们的希望和
志愿的表达者。领袖只要适合这种任务，他就是一个党信任的人；
但是党一旦发现它受了迷惑和欺骗，并被引上歧途，那它不仅有权
利，而且有责任撤消领袖的领导权和收回对他的信任。一个党不
是为领袖而设，领袖却是为党而设。因为任何权力地位都含有被
滥用的危险，党就要有责任对领袖的行为加以严密的监督。

但是施韦泽对事情的认识，却与他所必须认识的正相反。他
觉得自己是个慈善家，把党只看成他向上爬的脚架，看成满足他的
野心的手段，满足他的享受欲的机会。但当他这一场赌博失败时，
他就抱怨别人忘恩负义。但是群众只要相信他们的领袖是诚实的，
就不会忘恩负义。如果他们先对某一个人加以信任，就很难使
他们相信他们受了欺骗。这一类的例子很多。谁抱怨群众忘恩负
义，谁就是告发自己。他应自负其咎。

在施韦泽不得不放弃赌博之后，他忽然认为应该把握他在位时
一直竭力阻挠的事情向他的党徒提倡。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二日，
他发表了一个题为《告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我个人的朋友》的传单，
十分坚决地拥护两个党派的合并。当然，如果不先試行为他以往反
对我们的著作进行辩护，就不能这样作。据他看来，我们现在毫无疑
是一个社会民主党派，但这种局面首先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很多的
活动分子转到我们这方面来所造成的，这些活动分子，他先把他和
我们一律看待，并且都称之为工人、教师、商人、四分之一和八分
之一的知识分子。此外，他还反对最近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
决议，这个决议使他不得再当联合会的会员，而他却是那个联合会
多年来被人称颂的主席。他认为这个决议和一年前代表大会所给他的
信任投票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慷慨地保证他的勤勤恳恳为党
服务的志愿。然后他分析了两派分裂和互相斗争的场面，并要求召
开一个联合代表大会，由此产生一个集中的组织，按他现在的理
解，这个集中的组织就是拉萨尔组织真正的本质。他要求同那些
“愿意联合的领袖”联合起来；“如果他们不愿意，就不同他们联合；
如果他们反对，就抵抗他们”。人们看到，他也能这样说。

施韦泽起初想把他的传单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但被拒绝
了，并不是因为我们反对团结思想，而特别是因为李卜克内西不相信施韦泽。
他认为传单是个圈套。我从这个建议所得的印象是，
施韦泽想借此激怒他的后任，并使他陷入进退两难。施韦泽要求
团结的呼声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完全无效。在某种意义上，他现
在亲身体会到多年来煽动反对我们的后果了。必须又度过多年之
后，在内外情况逼迫之下，才实现了德意志社会民主党的团结。

最后我还须叙述一下施韦泽的几种行为，借此更足以正确地
说明他的性格。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事件，自
然也为资产阶级新闻界所知晓，于是他们对被提出的对施韦泽的
忘恩负义，作了各种各样的刻薄评论。施韦泽为这在《柏林交易所
报》上发表一篇声明，在结尾时说道：

“如果您认为这事是有特点的，那我完全同意您的说法。对于这些聚集在一起的‘领导着’和‘鼓动者’，形式问题只是个借口而已。像这种循环不已的忘恩负义的证据，足以说明，在那些人们中间，可惜只有极小部分为对新思想的热情所鼓舞，而绝大多数，使我看着不得不伤心，只受到对上流社会的嫉妒心（没有比他更狂热地煽动这种嫉妒心了。——奥·倍•）或其他不光彩的动机所驱使罢了。为此去掉狭隘的眼光，对这种忘恩负义或者愚昧无知就不再惊奇了。”

他在《柏林人民报》上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自从辞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职务后，就决没有主动地过问社会民主党的事情，在将来也不愿与时事发生任何关系。他对联合会感到十分厌倦。这个声明把施韦泽自己揭露得不能更加彻底了。

但是，他以上述方法表示他对由他多年领导过的运动的代表者的仇视，还嫌不够。差不多在他发表《告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我个人的朋友》传单的同时，在柏林的一个舞台上演出他所编写的三幕七景新奇滑稽歌剧《我们伟大的同胞》。他在剧中尽情讽刺和嘲笑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鼓动者，而他们的教导者却是他。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报纸也把这种行为斥为侮辱人格。

施韦泽患肺结核病多年，最后他到瑞士去疗养。但是没有效果。一八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他因肺炎去世，年四十二岁。据古斯塔夫·麦耶尔所述，他的遗体于同年十月七日葬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祖墓。送葬的只有他的家属和一个天主教神父。全德工人联合会中以往追随他和崇拜他的人却无一送葬。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他在去世以后早就死亡了。社会民主党给他的悼词决不会是颂词，赞誉也不是致悼词的地方。也没有身后声誉来表明人们还怀念这个以往的领导人。一个著名的德意志工人运动领袖就这样
样完结了，他的命运是咎由自取的。

我的国会活动的开始

在北德意志的制宪国会里

我一接到我选入国会的正式通知，就怀着有点激动的心情在一八六七年三月五日启程前往柏林。会议已于二月二十四日开幕。我面临一个完全新的政治活动。在此之前，我对国会生活一直是完全陌生的；我也不认识一个能指示我这种生活的人。施拉普斯律师和我是同一个党选举出来的，他所知道的议会生活同我一般多。然而就下水。当我到了国会的会场莱比锡大街旧贵族院前要推开门，门由里面开了，弗里德里希·查理亲王走出来，他也承认会委员。我当时想，最高层社会的人在这里遇见了最低层的人。我到办公室报到后，就往沙夫拉特律师和维加尔特教授的住宅去打听一下国会里的情形。我带着老朋友的介绍信，但我却不认识他们。他们两人都埋怨他们的普鲁士同志（进步党人），即使是他们中间最好的人也不能把自己提高到真正自由、民主的立场。还有分立主义的萨克森，枢密参议冯·韦希特尔及其伙伴已被俾斯麦弄得惊惶失措，不敢再主张他们的立宪观点了。

我想说明一下，当时保守主义的萨克森·汉诺威诸邦已经有过一段比普鲁士长得多的宪法生活，它们拥护甚至自由主义的普鲁士也不敢主张的立宪观点并且在它们国内已经实现。

我被分配在第一组。对不明内情的人要说明，国会议员是用抽签方法分为七组，在当时他们还要经过最后的选举审查，并且像现今那样选出专门委员会。由于这个原因，委员会委员的名额必须是用七除得尽的数目。
三月八日，我写信给我妻说，施拉普斯和我构成了最左翼，我们坐在相应的地点。再向左去就被墙挡住了，我们却不便用头碰壁。

议员中间当时有北德意志政治家的精华和议会的权威人物。在那里我又看到冯·本尼格森，他去年主席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议员会议；还有卡尔·布劳恩博士（威斯巴登），他是国会中的激进派，又据说是最会品酒的人；红色贝克尔，我与他重叙一八六三年的友谊；麦克斯·邓克尔，他以自己的头发自豪；冯·博尔肯伯克，他后来是辛孙的继任人，是国会中从未偏见最深的候选人；古斯塔夫·杜伦格，著名的小说家；鲁道尔夫·格奈斯特，后来有一天陆军部长冯·隆恩在全院面前将他，说他是一个能够证明一切的人；短小的拉斯克尔，当他在台上讲演时，两条短腿常常像鼬鼠那样跑，共产主义者同盟前盟员米凯尔，一个头脑精明的人和演说家；普兰克博士，后来是民法法典的主要编辑和注解人；欧仁·李希特尔，他看起来还是同一八六年我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认识他时那样冷淡；辛孙博士，曾任法兰克福议会主席，现在在国会里仍然这个职务；因为他在主持会议时，那种威风凛凛的样子，大家戏呼他为雷神；石威林（普查尔），曾当过“自由主义时代”的内阁大臣，他后来实行了国会每星期指定一天（照例星期三）讨论议员的提案，所以至今在国会隐语中称这一天为石威林日。舒尔采一德里奇（特维斯登），他因为同冯·曼托伊斐尔先生决斗而特别出名；冯·翁鲁，一个自由主义的反动分子；瓦尔德克，进步党原来的领导人；梅克林堡的维格尔斯坦兄弟，两个以往的革命家，其中一个属于民族自由党，另一个属于进步党。联邦立宪派中除了温德荷斯特以外，马林克罗特最为突出，他是后来中央党中头脑最精明的人。中央党由当时是由老自由主义者组成的，其中有乔治·冯・文克，是国会中讲话最快的人，为速记员所惧怕。最后，站在
极右派而且是它真正的领袖的高级机密参议员海尔曼·瓦格纳，一个又瘦又长的官僚形象，他的面孔精瘦无情，他的声音招人厌恶。

一个重要人物，卡尔·麦耶尔·冯·罗特希尔德，是由被合并的法兰克福以《法兰克福报》的支持而进入国会的。他是一个矮胖而宽肩的人，漆黑的头发和黑鬓理得非常整齐；他在相当大的肚子前面佩着一条重金链并且服装总是非常考究。以往我从没有见过他的照片，可是见一面我就认得他了。我在下届国会遇见施韦泽时也是这样。国会里还有亚格尔·冯·法尔肯施泰因和冯·施坦因麦茨两位将军，他们是因去年的战绩而当选的。

但是比上述所有这些人更使我感兴趣的是以前我没有见过的俾斯麦。当时他出席国会，几乎总是穿着黑色礼服、黑背心和机密参议式的黑领带，露着白色的硬领角。他还剩下的几根头发和剪得很短的胡子也都是黑色。所有漫画家都把他那三根头发画在光光的秃顶上，好像广阔原野上长着三棵白杨树，我倒是没有看出来。这也许仅是存在于画家的幻想中，或者是在制宪斗争中成为他敌人手中的战利品了。我急于想听他讲话，但是这个大人物站起来，不发出狮吼或宏大的声音，却尖声尖气地向议院讲话，令人大为失望。他的语句又长又很复杂，有时稍带口吃，但讲得始终引人入胜，并且井井有条。

俾斯麦固然已同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特别是民族自由党人言归于好，但他总还是不相信他们，并且害怕他们可能又陷于渴望议会权力的错误，又要为他惹麻烦。所以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拟定宪法草案，但是这个草案如果不作一些比较大的修改，即使十分安分的自由派也是不肯接受的。最后他对他们作了相当的让步，但在主要的两点上，即铁的军事预算和拒绝议员日俸，他们对他让步了。关于日俸，他后来曾一度承认，如果在第一次表决时以大多数票通过日俸的自由派加以坚持，他也一定会准许的。但是早在那
时，特别是民族自由党人，就已经习惯于变节。不可想像，如俾斯麦所威胁的，如果宪法中存在议员日俸，他就把宪法付之流水。他不能当着全世界出这种丑。此外，在立宪国会中，除普鲁士、梅克林堡和南斯拉夫的议员外，其余各邦的议员都支领日俸，例如我们萨克森的议员是由邦金库每天付给四塔勒。

相反地，俾斯麦在三月二十八日会议上讨论将来的国会的选举法时，却须为这种选举法进行辩护。民族自由党右派议员冯·西培尔、格隆勃莱希特（哈尔堡）和迈耶尔博士（托伦）以及各种右派的发言人说出了对这种选举法的顾虑。西培尔认为这就是“民主的独裁”。俾斯麦对这解释说：“普选法有几是我们的关于德意志统一而得到的一份遗产；这在法兰克福所草拟的德意志国家宪法中就曾有过；我们在一八六三年曾用这来对抗奥地利当时在法兰克福的企图，我也只能说，至少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好的选举法。”

然后他阐述如何在这个行将建立的二十一邦的同盟中，完全不可能找到一个选举法的其他共同基础。难道人们还想要三等选举制吗？“是的，谁要仔细观察一下三等选举制在国内所起的作用和造成的状况，谁就必定说，在任何国家里再也想不出一个比这更坏的，更不合理的选举法了。”他对这选举法任意和苛刻地加以指责，如果它的发明人能想像它的实际效用，就绝对不会制作它。他自然也感觉到，一个人若被这种选举法列在低级的选民阶层里，就会把自己看成公奴，看成政治上的死亡。

我的第一条议会行动是使国会做了一桩不合法的事。因为这件事没有记入史册，在这里略加叙述。当我第一次参加小组会议时，适逢议程上列着莱比锡议员冯·韦希特尔教授的选举问题。韦希特尔在复选中以五千四百三十四对四千四百零三票当选。但是莱比锡市参议会犯了个大错，该会不是照选举章程第七条所规定的那样，把选区划为若干选举组，每组居民不得超过三千五百人，
而是把全市选民按照名字的字母排列，分为八个位于市中心的选举地点。所以一个人的当选不是以选举组而定，而是以选民姓名的字母次序而定。报告人贝图苏—胡克伯爵述说了这个情况，据他了解，这情况是很严重的。在讨论选举是否有效的时候，我也发言说，我居住在莱比锡已经六年，对该市的政治情况认识得很清楚，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按照法律规定来划分选区，选举结果也不会两样。我这个完全不顾法律规定的理解竟被通过。委员会以十四对十一票决定选举有效，全体会员未经辩论即一致同意这个建议。

如果选举被宣布为无效，莱比锡市参议会就会大大出丑，我这样就使它免于出丑了。但是我也拯救了该市的代表，因为国会在四月十七日就要闭幕，如另订选举名单重新选举，时间就来不及了。不过这种决定，当然也只有在不稳的情况下，象新国会开第一次会议期间，才有可能。

我在上文曾提到贝图苏—胡克伯爵的名字。这位先生是那时期的一个肤浅而多言的人，并且特别喜欢讲些荒唐话。例如，有一天他这样说，“人们必须把时间的河流缚在前额头发上”；又一次他谈到议员时说，“他们满怀希望，想回家到他们的父亲的耕牛那里”，一句话惹得全议会哄堂大笑。

既然当上了国会议员，我有必要在全体会议上作个长篇的发言。在我的选区里，人们也渴望这个发言并向我提出了相应的问题。但是讨论终结时的建议非常频繁，并且在宪法草案的总辩论中我的发言又被打断。我终于在第四条，南德意志诸邦对北德意志同盟的关系上，获得了发言机会。我讲道：

我确信，普鲁士在创建北德意志同盟时决不是为了德意志的统一（右翼激烈反对），相反地，人们所注目的只是普鲁士的特殊利益，霍亨索伦王室权力的加强。（右翼激烈反对。）长官要求安静下来，说人们应当在我发言后再来反驳我。细细看一看同盟，就可见共
余诸邦陷于对普鲁士完全不正常的关系中。同盟只是一个由附属国围绕着的大普鲁士，而各邦的政府不过是普鲁士主政下的各省总督而已。（右翼激烈反对。）

我继续讲道。

如果普鲁士愿意把南德意志诸邦收进同盟中去，这本来是能够办到的。有人说法国会反对，我以为不然，因为由于同盟南德意志诸邦的军事协定，在战时德意志的军事力量就统一在普鲁士的手里。因此，法国将注意避免声明反对南德意志同盟吸收南德意志诸邦。法国方面如果干涉德国内政，结果将使全德国一致起来反对法国。

如果可以认为布拉格和约只是国际订立的南北德意志之间联合，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普鲁士对这问题如何想法。因为普鲁士强定了布拉格和约，如果普鲁士政府发现和约对他有害，就要毫不迟延地把它撕毁。（右边：啊！啊！）我也坚信，一旦奥地利能够洗雪过去的失败和耻辱时，也会这样做。普鲁士政府所以不愿吸收南德意志诸邦入北德意志同盟，是因为害怕被多数票所压倒。普鲁士通过军事协定把军事力量抓在手里就满意了，此外是力求通过关税条约在存在中的鸿沟上架个桥，但是并不把它填平了。我们不支持这样的政策。我反对把这样的政策叫做德意志政策，我反对这种不是宣布德国统一而是宣布德国分裂的同盟，我反对这种把德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军营（激烈反对）而把自由和民权的最后残余毁灭净尽的同盟。

民族自由党议员魏柏尔（斯塔特）认为我的讲话会使会议发生不和，但是他希望，把这些不和讲出来，可以提供解决这些不和而归于和的机会。

议员米凯尔也反驳我，说我不惜德意志同盟强夺了小公侯们的权利而使他们处于总督的可怜地位。这是对我的话的曲解。

129

119
我只是想用警喻来说明，北德意志同盟是个怎样特殊的产物。即使当时所有的中小诸侯全被吞并了，我也会袖手旁观。米凯尔另一句格言是：普鲁士邦不是军事国家而是个文化国家……奇怪的是，那些敌人用怎么样的联合来反对这个新的国家形式。一方面是最坚决的民主主义者，他们的倾向却不过是对于小公附臣的威权特别感到兴趣，与他们在联合的是（如果要公开说）那认为我们的祖国不在别处而是在罗马的山南党。

请看，在我们的议会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就已出现情况，我们成了当时在北德意志国会中还缺少有组织的代表的山南党的同盟。这样，米凯尔就是他的同志至今还用来对待我们的老朋友的创始人。此外，他也表示希望，愿普鲁士国王将不再与蒋伯尔这类的敌人打交道。这个希望至今尚未如愿，还有三百年后所传的，社会民主党只是一时的現象，也是如此。

议会的哈佛拉斯克尔对于我的发言自然也难安缄默。他见第一个发言（我）就这样激烈攻击我们的政治领袖，很感惊讶。据他所知，我所隶属的那个党，在爱北斐特一巴门曾有力地支持了首相的选举。（他指权威选举。）此外，他一定要我承认，我是把在酒吧间里常有的闲话照样在这里反映出来了。这时议长打断他的话，说他（拉斯克尔）无权对同事的发言作这样的批评。在一次私人谈话中我回答拉斯克尔说，由于他的攻击使我能够把我的党的态度解释一下，倒是很合我意。我并不属于在巴门一爱北斐特帮助俾斯麦伯爵当选的那个党，那个党名叫拉萨尔党。他（拉斯克尔）从我在这里反对俾斯麦伯爵的政策这个事实，就可以了解这一点了。我不属于拉萨尔党，而是属于激进民主党，或者如果愿意，也称为人民党。关于他对个人的攻击，议长既对他斥责过，我就没有必要重提了。

我的发言也在院外引起重大的轰动，特别是我的选举人感到
非常满意。相反地，自由派的《格劳経日报》发泄它的怒火写道：
“莱比锡的年轻做工师傅彼倍倍尔幸运地发表了他学得烂熟的处女演说词，因此猪肉跌价三分。”次日，在也是格劳経出版的《顺堡公报》的一个广告上对这回答说："所期望的猪肉跌价沒有实现，但因东普鲁士的牛（暗指作者）大批购到，所以牛肉大概要大跌价了。"

关于我的处女演说还有两个余波。《凉亭》杂志那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文章中談論到国会里出色人物的姿态。我也荣幸地被列在文章里。作者描述，当我发言时，好像是革命的海燕在会场中咻咻飞过。这种称赞，在《凉亭》出版人艾恩斯特·愷尔看来（我以前同他曾为政治事件会晤过多次）太过份了。该期的印刷因而临时停止，并且修改了那句话。

几星期后，我又回到家里，有一天天仪表轩昂的先生到我的作坊里来，我正站在作坊里的高脚凳前锯牛角。其中一位先生探問做工师傅彼倍倍尔。我回答说："就是我。"发问的人有点惊愕地看着我，并且说："我说的是国会議員彼倍倍尔。"我有点愤怒地答道："是的，是的，就是我！"他惊讶地把我从头看到脚，然后自我介绍说，他是罗塔的冯·弗里森男爵。他是部长的兄弟。他读了我的国会发言，喜欢其中某些章节。我以鞠躬来答谢他的恭维。接着他问，谁是約翰·雅可比博士，他在普鲁士邦议会中作了那么好的发言反对吞并和反对俾斯麦所要求的赔款。我向他作了他所希望的说明。然后两人离去。

在那时代我們的分立主义者对俾斯麦怀着极大的怨恨。他們为了消灭他，不惜与魔鬼结盟。国会开会期间，大部分萨克森議員住在贵族院对面的萊比锡花园。我們与店主商定，每天在开会后为我们准备午时会餐。有一天我坐在議员哈柏康旁边，他是齐治的市长和萨克森下議院的議长。在談話中間也谈到俾斯麦，俾斯麦在当天上午会議上又作了激烈的发言。哈柏康对此还是非常激
动，他用最激烈的言辞来反对他。

会期将终时，国王邀请全体国会议员到宫中赴宴。我和另外几个议员没有参加这次宴会。次日午前，在国会遇到与我已成好
朋友的红色贝克尔。贝克尔还带着酒意，大片外露的衬衫胸部还
带着酒渍。当时他还是个光棍。“喂，贝克尔”，我问他，“昨天在威
廉那里怎么样?” 于是他得意洋洋地站在我面前，双手放在我的
肩上轻轻摇着回答说，“小倍倍尔，真了不起呀，威廉有美酒儿呀”,
说着他还啧啧咋舌，“我背后还站着一个人，我的酒杯一空，他马上
斟上。”我笑着问他：“那么今后您在宫中有请必到啦!”他也笑着回
答说：“我的亲爱的，这是您可以料到的。”

贝克尔和米凯尔是北德意志国会中两个从前的共产主义者同
盟的盟员，各人以自己的方式发迹。贝克尔当过多特蒙德的市长，
后来是科伦市长，由于这个资格也成为贵族院议员。米凯尔爬得
还高几级。他起先是欧斯纳布鲁克的市长，以后是美因河畔法兰
克福的市长，逝世前是有名的受封为贵族、领取俸退休的普鲁士财
政部长和农业党的红人。

先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若干盟员一般都有了特殊的发展。
除了贝克尔和米凯尔之外，有以往的排字工人瓦劳，他逝世时是美
因茨的市长，还有柏尔格，曾长期担任《莱茵报》的主编，在立法时
期当选为一任德意志国会议员。他和当时的贝克尔同属于进步党。

四月十六日，举行对北德意志同盟宪法的记名投票。出席议员
二百八十三人（原会议员合计二百九十七人），赞成者二百三十
票，反对者五十三票。反对者除施拉普斯和我之外，还有全体进步
党、波兰人、温德荷斯特、韦希特尔、哈柏康和若干汉诺威人。根据
当时进步党的见解，北德意志同盟宪法中没有包含着制定议会必
须由它批准的权利。没有基本民权，没有认可捐税权，没有部长责
任制，没有议员日俸。而代之者却是铁定的军事预算和同盟首相
的巨大权势。从一八七一年起，同盟首相称为帝国首相。国会在四月十七日闭会；共举行会议三十五次。

会期将终结束时我叫我妻来柏林游览一下。那时的柏林不能同今天相比。又长又直的大街上没有装饰的屋面，使柏林显得单调乏味。房屋像一队兵士整齐地排列着，毫无使人兴奋的色彩。交通比今天也差得多。有时两匹马拖着一辆公用马车在石块路面上来往颠簸。出租马车很少，那时柏林人还嫌它太贵。唯一近代的交通工具是有轨马车，由钢穴到沙罗登堡。卫生情况恶劣。还没有下水道。各家的污水汇聚在沿着人行道的水沟里，热天臭气熏人。街道和广场中没有公用厕所。外乡人，尤其是妇女，有时需要时，毫无办法。就是在房屋里面，这类设备也简陋不堪。有一天晚间，我同我妻往王室剧院，当我在两幕间休息时进入男小便处时，吃了一惊。里面正中间放个大桶，沿着墙壁放几十个便壶，用过后自己提起倒入大桶里。这真是舒适并且完全民主的。实际上柏林这个大城市到一八七零年以后才由野蛮状况进入文明状况。

我养成了习惯，每次国会会期过后到我的选区去旅行，并在主要地点举行几次选民大会。会上我作关于国会辩论和我的活动的报告。因为我们在处都有大会厅可供使用，估计听众必然踊跃，并且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从我开始鼓动起，妇女就占到会人数的一大部分，后来她们成了我们热心的女鼓动者。因为我们没有印刷厂，在选区内所散发的几张传单只有少数人可以看到，而敌人的报界却不断地特别反对我，所以这些集会是必要的。我与我的选举人渐渐形成融洽无间的信任关系。敌人在各种选举中曾力图使我下台，终属徒劳。十年后（一八七七年），我因在两个地方当选而放弃这个选区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如果不这样做，党就要把
新赢得的选区（旧城——德累斯顿）又失去了。

在北德意志国会和关税议会中

第一立法时期的北德意志国会在一八六七年九月十日开幕。新当选的议员中有特别突出的是冯·霍维尔柏克男爵、弗兰茨·齐格勒和冯·奇尔希曼。三个人都属于进步党。奇尔希曼同齐格勒一样也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民主主义的活动时期。他在一八四八年普鲁士国民大会中是属于抗税派的。他也是受迫害最多的普鲁士法官之一，反动派对他不惜采取卑鄙的手段。最后他被撤去拉提布上诉法院副院长的职务而无退休金，因为他作了一个关于自然界的共产主义的演讲。他在演讲中主张限制人口增加，以求文化的更高发展和取消经济的不平等。他对听众说：“人类在幸福和健康方面逐渐平等的理想，深藏在每个人的胸怀，所以人们用不着灰心。您可以确信，向这个目标的移动和接近是规定了的。即使要用四千年之久才仅仅赢得高度的平等权利，我们也不要气馁，因为财富的平等，这个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在两世代内是不能达到的。”这个演讲竟认为“不道德”，而且这样不道德的高级法官是普鲁士这个一贯虔信宗教和讲道德的国家所不能任用的。奇尔希曼诚然是国会中最具有哲学修养的人，无论如何他在修养和学识方面远远超过那些撤去他职位的法院官员。除了上述三人以外，议员中还有毛奇元帅。此外，议院里还有后来声名狼藉的史特鲁斯贝克，他极善于拉拢许多普鲁士高等贵族人士做他那投机公司的诱饵，他们的签名也光耀着他的计划书。可是史特鲁斯贝克的外表即已给人以极为可厌的暴发户的印象，所以这种现象就更令人难于理解了。他是以自夸富有的面貌出现。他所举办的宴会，在那时的柏林轰动一时。柏林报界为此刊载了长篇的报道。像他那样的挥霍无度，在柏林私人方面是空前未有的。大资本主义的纪元由
史特鲁斯贝克开始了。贵族和财阀结成了亲眷。

我在这次会期中的第一次发言是对九月二十四日关于请愿的讨论。我对这提出异议，因为国会向同盟首领（即普鲁士国王）请愿，自称为德意志民族代表。议长打断我的话，说没有其他民族代表。我对此回答说，国会只代表民族的一部分。人们对弃了一千万万万德意志人（一千万德意志—奥森利人，八百万南德意志人），还有卢森堡也被排斥在同盟之外。此外，根据布拉格和约第四条也会有一天把北什列斯维希地区转让给丹麦的危险。这不是民族政策。

俾斯麦为此次发言。他不是反对我个人（他说时稍带恶意），而是因为我成为广泛流行的错误的喇叭筒。卢森堡并未被遣弃，他企图用一连串的诡辩来作证明。难道我希望因卢森堡而掀起战争？这当然是我绝未想到的，我只想证实，该邦同德意志的老关系将因俾斯麦的“民族”政策而被解除，而且是由于拿破仑的要求。卢森堡以前是德意志同盟各邦之一，在法兰克福的同盟会议中有席位和表决权，并且卢森堡城是德意志同盟的要塞，且因卢森堡大公是荷兰国王，所以荷兰的利益也是同德国利益高度相结合的，这在国际纠纷中是有利的。

十月十七日，在讨论有关兵役义务的草案时，我第二次发言。这个法律草案所要求的只是表面上的普遍兵役义务，因为这样长的服役期限，不可能让所有适龄的人都来服兵役。但是一切适龄的人受军事训练，却是一件公正的举动和对国家有益的事情。这只有施行由于因霍斯特和格奈塞瑙的军事改编而在一八○九年到一八一三年在普鲁士所施行的那种国防制度，才有可能。较短的兵役期限也同样能提供善战的士兵，一八六六年的绝大多数士兵从军不过九个月的萨克森证明了这一点。普鲁士现行的一年志愿军制度也证明了这一点。
非常反对我的汉斯·布鲁姆对我大发雷霆。说我哪里有脸作这种发言？(议长斥责。) 在私人谈话中我答复布鲁姆说，他的父亲曾在一八四八年法兰克福议会中作与我类似的要求，我的脸就从他那里得来。李卜克内西和我这个法律草案的发言，在外面引起震惊。我们收到三十多封赞成信，几乎全是由普鲁士各城市发出的。莱比锡的同志送给我们一只九磅重的火腿作为表扬，这是我们这些现在还无薪给的议员们深为欢迎的。

在讨论护照法时，李卜克内西和我提出一个建议，说警察无权把人驱逐出境。关于迁徙自由法，我们建议，警察不得给任何人以居留限制，这种限制只能根据法院的判决。这条法令一发生效力，以往实行的一切驱逐处分，应一律取销。李卜克内西在申述建议的发言中提到了他一八六五年被逐出普鲁士，并在一八六六年秋天又因违反禁例而被判处的那些事件。这些建议当然被拒绝了。

会議早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即行結束。

一八六八年春季三月二十三日开幕的国会集会被中止，在耶稣复活节后，四月二十七日，在柏林召开关税议会。会議是在普鲁士邦议会的会場（当时在端工场广場）举行，因为贵族院的会場容纳不下一百人左右的议员。筹办人在分配席次时曾稍怀恶意地把罗特希尔德的座位放在李卜克内西的旁边。全场都笑了。但是这位法兰克福的世界銀行家不久就不能忍耐这个危险的邻居，他让人给他安排另一个座位。

在南德意志关税议会的议员中间，不少人已经过在政治上起过作用，例如路易·班伯格、法律教授布隆赤里、天主教的社会政治家约尔格·統計学家科耶博士、霍亨卢恩侯爵(希令斯福斯特，他后来任首相)、馬夸特森教授、麦茨一达姆斯塔德的律师摩里茨·冯·莫尔、律师奥斯特伦(斯图加特)、前部长冯·罗根巴赫、沙夫
莱教授、塞浦教授、斯陶芬堡男爵、塔弗尔博士（斯图加特）、冯·沃比勒尔部长、律师斐尔克（春天的百灵）等等。

我因为参加了关税议会的开幕会议，所以我同议员汉斯·布鲁姆、冯·瓦茨多尔夫和图比阿斯一起作年轻的秘书。那时国会对的办事细则中还规定着，在会议开幕时由出席的最年轻的四个议员会同高龄的议长组成临时办公室。人们恨这现象使社会民主党人得以进入办公室，后来就把办事细则改变了。现在是由高龄的议长选拔临时办公室的四个秘书。对于反对派，国会总是不乏斤斤计较小节的。

南德意志的议员中同李卜克内西和我结成较亲密的关系的也有几个，阿迈尔·哈勒、弗赖斯康克、科林伯、奥斯特伦、嘉夫莱、塔弗尔等。其中许多是属于民主党的，例如科林伯和塔弗尔。大多数南德意志议员在新秩序之下只觉得很为难。关税议会是两年前进的内战的后果，在南德意志还是创伤未复。人们总觉得自己是战败者。加之，关税议会也是个政治上不得已的办法，非驴非马，是一个应急的产物。自由派以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代表人的身份，想把关税议会造成一个完满的议会；这不仅是俾斯麦考虑对法国的政治关系和南德意志的情绪而加以反对，就是南德意志那些看不到北德意志同盟及其宪法和组织中有政治理想的一切其他政党的代表，也都反对。另外，那时候南北德意志的人民在思想上还存在着特别尖锐的对立，因此，南德意志人对于维也纳和巴比对于柏林还熟悉些，那时期南德意志人很少去访问柏林，所以人们了解到，一有相当的机会，双方的精神就冲突得很厉害。在这里却也表现出，南德意志人在坚韧性方面不及北德意志人。李卜克内西和我时常为和我们接近的一部分南德意志议员竭力撑腰。

民族自由党人想通过致普鲁士国王的请愿书的尝试在热烈辩论后以一百八十六票对一百五十票失败了，这使建议人完全莫名
共妙。在这次会议期间我作了两次较长的发言。第一次是反对征收烟叶税的法律草案，第二次是关于关税同盟和奥地利之间的关税条约。在这个辩论中，我同议员拉斯克尔发生了猛烈的冲突。他又一次以各种各样迂腐谬调反对我们，并且以夸张的口吻攻击各小邦中的情况。我有力地反驳他那迂腐谬调，并且说，我听得由他嘴里攻击小邦，更觉惊奇，因为他原是由一个小邦（迈宁根）得到他的委托的，由于这一点，胜利属于我了。

* * *

五月十四日，由柏林的民主主义者和党员同志们在音乐大厦召开民众大会，参加委员会的有商乔纳斯（他后来因为营业失败而移居美国，在那里合夥创办了《纽约人民报》，他任主任编辑）、路德维希·勒维、保尔·辛格尔、弗·斯台法尼、铁尔德等。南德意志议员有弗赖斯勒本、科尔伯、奥斯特伦、沙夫莱和拉弗尔，此外还有李卜克内西、莱因克博士（他是由伦内普－弗特曼区的全德工人联合会选举出来的）和我出席。李卜克内西猛烈攻击进步党的政策，尤其激烈攻击瓦尔德克及其伙伴，而且他是那么尖锐地反对北德意志同盟，致使委员会中部分委员惶恐不安。我发言说，现在在德意志统一的形式下所着手的东西绝不是也永不是统一的德意志。我们希望有一个由全体人民的意志支持的德国，领导它的是一个由人民自由意志所产生的政府，只有在这么一个德国，才能期望为人民，尤其是为劳动人民，谋求真正的福利。我并且批评北德意志同盟的军国主义发展的情况说：结果不是减轻负担而是加重负担。

麦克斯·希尔施博士带领着他的党徒参加会议，意欲引起吵闹；我们之间早已绝交。这是很早的事了。他那吵闹的党徒被斥责得安静下来。

* * *

128
在五月間的一個星期天，柏林裁縫協會邀請李卜克內西和我参加宴会。我們照他們的意思邀了奧斯特倫、沙夫萊和塔弗尼諾議員同往參加。在跳舞會上來了個所謂女士跳舞的節目。女士們一齊衝向我們五個人。每人都要同我們跳舞。但是四位同事聲明不會跳舞。於是她們都向我這倒霉的進攻。四次舞都順利地過去，到第五次，我的頭和胃都不好過。我病了，只好逃到庭園里去。次日午前，有個婦女代表团到我的寓所來慰問。我請她們放心，這點艱苦是可以克服的。我們那天晚回家時，沙夫萊對于舞會的美好風格和全部情調極為驚訝，認為是不能再好了。他認為，南德意志的工人舞會中不可能這樣好，在那里會演成斗毆。我反對他這種理解。我固然沒有參加過南德意志工人舞會，但我確信，在一個有組織的工人的宴會上不會發生那樣的事。

五月二十日，柏林商界宴請关税議會的議員，每份餐費計二十五塔勒。我沒有參加。有些赴宴的同事第二天向我斷言，宴会布置得非常不好，以至相當多的客人簡直沒有能吃飽。

南德意志人大半都以他們在柏林參加了四個星期無薪給的會議後得重返鄉而感到高興。再說，會議大多很少人參加，致使柏林人有一句笑話，說关税議會等于空虛議會。中斷的國會會議的閉幕會，我沒有參加。

北德意志國會的下次會議于一八六九年三月四日開始。會議的主要討論事項是工商業管理條例草案。我于第十次會議時才出席，并立即參加條例草案的辯論發言。我同別人一起駁斥樞密參議瓦格納，由于他在討論中的行動，我稱他為普魯士王室的宫廷社會主義者。此外，我 против那激烈攻擊我們的施杜姆男爵。我為我們的鼓動和組織辯護。他曾指責工人的組織是國際性的，面對資本主義的國際性，這是必然的結果。對議員米凱爾，我也同樣
应战，他认为我们的社会事业比英国和法国进步。我回答说，无论如何，在英国和法国再不会像我们这样为了自由自由和迁移自由争吵几年之后。此外我还说，议员瓦格纳曾对议员舒尔茨—德里奇说，他（舒尔茨）所要求的，因为由此得出导致反动的经济制度的最后结论，所以适合他（瓦格纳）的意思。我认为，他（瓦格纳）把结论弄错了，最后不是反动而是革命到来，而且必然到来。

我在发言中声明反对由委员会讨论该方案，因为议院没有选我们一个入委员会。这话起作用，我被选派到委员会去。

我想在这里夹叙一下，出席国会和关税会对于李卜克内西和我是巨大的牺牲。我们的选区，尤其是我的选区，虽然尽力在经济方面接济我们。但是我们对选民的经济接济感到痛心，因为他们都是德国最穷的人。当时还没有党的津贴，又没有钱发给议员生活日俸。自党发给生活日俸是一八七四年才开始的，不过也够菲薄的。我们往来柏林的旅费也必须自己掏腰包。这样，我们就常常缺席，甚至在为了我们党的利益应该出席的时候。施韦泽及其伙伴在这方面就好些。他们住在柏林，只有莱因克例外，但是他在一八六八年即已辞职，由弗里茨接任。他们不必费力，也不用不着较大牺牲，即可参加每次的重要会议。但是时常缺席的并不仅是我们。大多数的法律都是由不足法定人数的会议通过的。大家知道，这情形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年春季实行日俸制的时候。

第二次讨论工商业条例时我们提出了一批建议，但其中只有个别的侥幸通过。我们建议作一些规定，据这些规定凡有关预告期限等的争执应转交劳资仲裁机关处理。此外，我们要求禁止实物工资制；所有超过十个工人企业有义务订立工厂规则，拟订时应听取工人意见；我们还建议规定学艺合同的条款，取消工作簿。禁
止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在工厂做工。另外，我们还要求禁止星期天工作，超过十个工时工人的企业每个标准工作日为十小时，职工组织有完全的联合自由，实行工厂监督。施韦泽及其伙伴的建议大半与此相同。

我的取消工作簿的建议获得意外的成功。这是这样来的。莱比锡警察局公布一个规定，各旅馆主人，遇有漫游的艺徒到来，须在他们到达后立即索阅他们的漫游身份证，并把它送交旅客事务所。但如有艺徒不肯出示漫游身份证时，应把他带到旅客事务所，不得延誤。此外，旅馆主人应注意，凡是迁移来此的或者失业的艺徒不精警察的许可不得在莱比锡停留二十四小时以上。

这个规定同护照法有尖锐的矛盾，护照法已经取消了国内的身份证限制。于是我发言說，萨克森的工商业条例中有关工作簿的规定，将因护照法而失其效用。拉斯克尔支持我的建议，因而建议得以通过。十年后保守党山南派的多数派审查工商业条例时，又对二十一岁以下的人們实施工作簿。

我那取消工作簿建議的被通过，激怒了孤立業者的手工业者。我提这个建議时所用的所謂全部訛詅，C. 罗設尔博士（已故的著名国民经济学家、马克思和拉萨尔都討厌的 W. 罗設尔的儿子）在一篇题名为：《德意志工商界怎样失去工作簿。一部社会小说的未完稿》的文章中作了叙述。根据 C. 罗設尔的说法（他今今还在萨克森政府的一个高级机关中工作），我的訛詅是我同我的“朋友突比克”（这人誠然从来没有过）搞起来的；有一天晚上当他到“我的凄凉的房间”来找我时，我正在为我的建議起草一篇（附带說）很短的发言。于是我（都按照罗設尔的说法）在同突比克的倾談中把我明天将在国会中如何愚弄别人的打算詳細地告訴他，以博取他对我的建議的赞同。我讀着罗設尔硬加在我身上的欺骗尊敬的同事们的设计，不无驕傲之感。这个行动自然是完全同我所计划
的那样成功了。当议长宣布建议获得多数票时，有人听到在讲坛上有忍耐住的窃笑声。那就是我的朋友恩齐克，他为我的计划成功而暗自欢喜。我确信，有些人读到了这个描写会信以为真，并且自言自语说："这个倍倍尔原来是个混账东西！"但是这个描写并没有历史的真实。而历史常常就是这样造成的。

我的第二个得到通过的建议价值较小，就是把条例上凡是用"闲暇"一词的地方改为"休息"。政府自己也看到"闲暇"一词不适宜，遂接受我的建议。此外，我们的其他一切建议均遭拒绝。

在这次会议中也规定了国会的选举法。施韦泽和哈森克莱维埃尔提议把二十五岁改为二十岁，并规定选举日必须是星期日。我提议在整个同盟范围内在同一天选举，选举日必须是星期日或假日。此外，我要求删去凡现在或在选举前一年曾接受公共团体或者地方团体的津贴的人丧失选举权的决定。

不用说，我们虽费尽言词，这些建议还是被否决了。而今现役军人也失去现在的选举权。热烈拥护这一点的是民族自由党人。各邦政府并没有提出这些要求。

在讨论预算案时（四月二十四日），议员冯·霍维尔贝克主张裁减军备。我对此回答说，我认为，像现今欧洲的情况，到处是专制政治当权的时候，竟要以裁军为可能，那就是愚蠢。我们的专制君主们每个都在伺机袭击别人和打倒别人，会想到赞成裁减哪怕一点点的军备，我认为也是不可能的。这里就正像寓言中所说的两头狮子相扑，相吃得只剩下尾巴。这对于我们只能有好处。

五月十三日我发言，反对公侯们免付邮费的特权。我的发言一再被猛烈地打断。我的讲话伤害了部分议员的"忠义感"。但是我却得到选民的纷纷赞成。

六月三日，关税议会议又开幕了，但在六月二十二日即行闭幕。我没有参加讨论，因为那些辩论对我来说是重要，再说，我的营业也
需要我回莱比锡。

*       *       *

一八七〇年北德意志国会春季会议的主要讨论题目是北德意志同盟的刑法草案。在这个讨论中我只发言一次，那是在关于死刑的第三讨论的时候。在第二读时，国会的大多数表示反对死刑（在一八六八年公布的萨克森刑法中取消了死刑，在巴登也同样取消了），而现在在俾斯麦的威逼之下又以一二七票对一一〇票赞成死刑。萨克森议员中唯一赞成死刑的是汉斯·布鲁姆博士，即一八四八年秋季在维也纳附近的布利基特瑙被枪毙的罗伯特·布鲁姆的儿子。当布鲁姆表示赞成死刑时，我们在最左翼大声嘘他。

汉斯·布鲁姆是社会民主党的最卑鄙最阴险的敌人；为了同我们斗争，他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不言而喻，他是俾斯麦的热烈崇拜者，俾斯麦也厚待他。但他却无法挽救他的可耻的没落。布鲁姆因为无耻行为而被撤消律师职务。以后他到瑞士开设了一个雪茄烟工厂。他作为一个富翁，死于一九〇九年。

我在一八七〇年春季会议中的第二次发言是附议拉斯克尔的建议，他要求修正军事刑法。建议以一一七票对七十三票通过。

一八七〇年关税会议的会期还是很短，仅约三星期。会议开始时议员科尔伯博士（巴伐利亚）辞去关税会议的委任。关税会议是个只为普鲁士的权力地位服务的欺骗机构。值得注意的是民主资产阶级如何厌恶斗争。可是这样一来，就无法维持党的生命，更不用说加强党的力量了。在当时聪明人就已看出，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日益增长的阶级对立越来越加剧精神的分歧。

一八七〇年的春季会议是关税会议的末次会议。因为数月后大悲剧开始，德国的政治情况也起了巨大变化，使关税会议成为多余的了。
策略上的分歧

在我叙述德法战争的悲剧之前，必须先简单谈一下李卜克内西和我之间因为我们对议会的态度而形成的策略上的分歧。

早在讨论俾斯麦的同盟改组建议时（一八六六年春季），李卜克内西就曾经在曼海姆的《德意志杂志》上表示反对选举一个这样的国会。但是这个刊物在我党内几乎未被看到，而且因为（就我记忆所及）李卜克内西既没有在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也没有在民主协会，也没有在其他集会中提出他的否定立场，所以也没有进行对于这种立场的辩论。后来在一八六六年圣诞节当我们在谷劳绍的邦集会上毫无异议地认为当然参加选举，并且推举李卜克内西（他那时正在柏林市警察局受三个月的监禁）为萨克森第十九选区的候选人的时候，他也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个提名。一八六七年盛夏在他第二次候选时，他也当选了。起初他自己还提出了对法律草案的建议，但是不久，他反对议会制度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并且我们之间在关于应在国会中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据李卜克内西看来，北德意志同盟是我们必须用一切手段把它打到消灭为止的结构。依照他的意见，参加同盟的议会，如果不是表示否定和抗议，就是放弃革命立场。因此，绝无妥协，绝无和解，也就是说绝不企图以我们的意见来影响立法。

这样来理解我们的革命立场，我不能同意。在适当的场合，首先在反对一切恶劣的和有害的东西时，要抗议和否定，然而同时也要求有积极意义的鼓动，我们对各个法律草案都要提出我们的建议，借此以表明我们对于事物的看法。由于我们提出了这些建议并作了对此有利的发言，这些言论即使被割裂删节，因为登在报上为千万人所阅读，我们就发挥了最高度的鼓动宣传作用。
我們之間的這些意見分歧最突出的表現是，在我對工商業條例和其他法律草案提出許多建議時，李卜克內西僅僅勉強地投了他的一張票。最後他認為應當作一次演說來說明他的不同立場，一八六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他在柏林民主工人協會中就这样作了。后来这个演說印成小册子，题名是《論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对国会的政治立场》。

李卜克內西在演說中說：社会运动是一个革命的改革过程，不是在十二年間就能完成的……但是，新社会和旧国家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新社会的首要意图是谋求消灭旧国家……为了社会实践，社会民主党須先創造国家基础……国会中的斗争只是一种假斗争，只是一幕滑稽剧……只有在有共同基础的地方，才能进行协商……原則是不可分割的，必須整個地保持或者整個地牺牲……面对着国会中几乎是唯一代表的統治阶级，社会主义就不再是理论问题，而简直是实力問題了，它同其他实力問題一样，不能在国会中，而只有在大街上、在战場上来解决……一切认为国会中发言有价值的话，都是站不住的。难道人们会相信談話能够把国会威化过来嗎？这种談話是无用的，説无用的話，乃是愚人的一种消遣。

他接着反对过份重视专制国家里的选举权，没有公民自由、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結社自由，則普遍选举权不过是专制主义的玩物和工具而已。

国会也沒有实力，即使我們在那里占了多数，一連军队就可以把这多数赶出神殿……革命不会是取得高級主管当局同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会在现代的国家内实现；要实现社会主义思想，必須推翻这个国家。“同现代国家决不和平相处。”

李卜克內西的这种純粹否定的态度，尽管他屡次争取使它在党内成为準则，却沒有成功。不过当八十年代在反社会党人法統
制之下，无政府主义在德国各地得到发展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当然要利用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把我们当作“议会党”来斗争。党的第一领导人的言论经常被用来反对党的活动，这种情况是不能任其持久下去的。关于这，在八十年代中叶的一次议会党团会议中我提出注意李卜克内西立刻同意我的意见，于是在再版时加上个序言，说明他在小册子中的立场只是指帝国建立之前那时期而言。后来，李卜克内西又在圣加勒代表大会上（一八八七年十月）公开不讳地声明说，现在他才看到在议会中的实际活动对党是必要的和很有益的。因此我们之间在议会策略上的意见分歧消除了。

李卜克内西的言论还在司法上有个余波。柏林市法院因为他
传讯不到而缺席判决他诽谤当局的规定，判了他三个月的监禁。柏林市法院根据法院互助条例要求引渡李卜克内西到案。人们抓住这一点，当时还没有共同的刑法和共同的诉讼程序。萨克森法院拒绝引渡，因为根据辛克森新刑法，没有李卜克内西在柏林所被判决的罪名。现在普鲁士政府又要求萨克森政府以诽谤同盟制度罪追捕李卜克内西。萨克森政府也做了应允要求的姿态。事情却长期拖延下去，后来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言论和我在普劳恩的言论一样，都被当作珍贵的公诉资料，列入我们将来的叛国案文件中了。

德法战争

宣战前奏曲

在这次战争爆发和进行的期间，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国会内外所持的态度成为几十年的议论和猛烈攻击的对象。起初，在党内
也是这样。但是不久以后，大家就认为我们是正确的。我承认，我们当时的态度毫不可悔恨之处，而且如果我们在战争爆发时即已知道随后几年内根据官方和非官方发表的文件所获悉的情况，那么我们的态度从一开始起就会更激烈得多。我们就不会在第一次要求战争拨款时弃权，我们必然直接投票反对。

今天已毫无疑问，一八七〇年的战争是俾斯麦所愿望的，并且他事先早有准备。如果说，他在一八六四年和一八六六年两次战争时期企图把自己装扮成无辜被迫应战的人而没有成功，那末，这一次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战争中他完全可以如愿以偿了。除了一小部分熟悉内幕的人（连当时的国王，即后来的皇帝威廉一世也不在内）知道俾斯麦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从事于对法战争外，俾斯麦欺骗了全世界，竟能使世人相信，战争是拿破仑煽动起来的，而他，爱好和平的俾斯麦，以他的政策处在被侵略者的地位。官方和半官方的历史记载直到今天还在广大人民中维持着这个法国是侵略者而德国是被侵略者的信念。

无论如何，拿破仑在形式上宣了战，俾斯麦政策的可钦佩处就在于他能把牌洗得这样巧妙，使拿破仑不唐人易与否不得不打出现这张王牌，于是他看来是破坏和平者。

甚至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人物，虽然他们对于判断欧洲政治站在比我们高明得多的立场上，却也在短期内有这种见解，并且公开表示，拿破仑是和平的破坏者。宣战以前的经过非常使人迷惑和惊讶，以致人们竟完全忽略了这个事实，即法国虽宣战而军队毫无作战准备，相反地，德国虽好像是被迫应战的一方，却有战争准备，连炮架钉子都已备齐，并且动员工作也顺利完成。

就我的记忆所及，公开控诉俾斯麦为德法战争的祸首，是我在党内于一八七三年第七十三和七十四期《人民国家报》上的两篇文章中提出提出的，文章的标题是“九月二日”。我把两篇文章交给李卜
克内西，他只作了一点形式上的小小修改就登在报上，并且把两篇文章转载在他后来出版的小册子《埃姆斯的电报或者战争是如何造成的》的前面。

德法战争早已尘埃落定。德意志问题的解决一旦操在内阁而不操在人民之手，则由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所造成的德意志和欧洲的局势，就恐怕要受外国的干涉，首先是受当时由傀儡以欧洲审判官自居的拿破仑统治的法国的干涉。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敌对，以及当时德意志同盟的整个形势，使拿破仑容易充当这种角色。俾斯麦也照顾到这种角色，他从一八六四年到一八六六年同拿破仑进行过各种可疑的谈判，其中涉及到割让德意志某一部分土地作为普鲁士吞并德意志诸邦的补偿。这我在本书第一卷中已经说过。

在一八六四年和一八六六年，俾斯麦都欺骗了拿破仑；在改变德意志状况有利于普鲁士的时候，拿破仑毫无所得。但是他对一八六六年和谈的干预，却足以使普鲁士不能实现吞并萨克森的计划；而且布拉格和约第四条的规定也要归功于拿破仑的影响，该条规定，北什列斯维希斯得丹麦语部分应划归丹麦；此外，普鲁士必须放弃吞并美因河界以南的企图。还有，次年卢森堡问题的解决不利于德国，也应归咎于拿破仑的影响。

显然，拿破仑这样扰乱俾斯麦的天下，使俾斯麦产生了报复的思想，急欲破坏拿破仑和法国在欧洲的优越地位。自从一八六六年以来，新普鲁士一德意志的政策的目的是，只要有有利的机会一到，就对法国开战。狂热地进行军事改组和扩张军备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无微不至地布置一切，以便一旦时机到来，就向法国挑衅。

自从一八六六年以来，所有的政治家都确信下次战争将是一个对法国的战争。在军队中，也把这看做当然的事，并渴望其到来。因此，我们控诉俾斯麦的政策，是因为这个政策给德意志造成了自
从一八一五年以来它所没有的局面。一八六六年战争结果所导致的同奥地利的紧张关系，使这个问题对德意志愈加危险，因为深恐奥地利为了报一八六六年的仇会乐意同法国结盟。事实上，法国和奥地利之间也进行过有关的谈判，但是没有结果，因为战争意外迅速地爆发了，而且德军以几次胜仗击溃了法军，使奥地利聪明起来，避免干涉。由于这种情形，人民对于德法战争感到极大的不安，而因为在广大人民中间还认为法国是不可战胜的，所以不安更甚。另一方面，这当然也是确实的，由于拿破仑充当干涉角色没有取得积极的利益，他在本国的威信大为降低，并给资产阶级反对派提供了大批党员。这种情调在一八六九年五月的选举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选举中政府的候选人只获得约四百四十六万九千票，而反对派的候选人得了三百二十五万九千票。关于这次选举结果，当时有人从巴黎写信给《法兰克福报》道：“不仅欧洲的精神利益而且物质利益，都使共和政体在改变我们的状况上成为绝对必要。”

议院中反对派增长到一一六人。这促使拿破仑在一八七〇年一月初提名反对派的成员奥利维为稳健自由派内阁总理，并且为了支持他的政策，在五月八日举行了一次所谓公民总投票，虽然投票结果为七三五万票赞成，一五〇万票反对，但是很可忧虑的是陆军和海军在票笼里投进了五万张反对票。此外还有许多城市，首先是巴黎，投了很多反对他的票。

巴黎对拿破仑的敌对情绪，早在一月间作家维克多·诺依尔出丧时即已显露出来，诺依尔是因为私人争端被比埃尔·拿破仑亲王阴谋枪杀的。浩浩荡荡的人群示威似地伴随维克多·诺依尔的遗体。情况已经和爆发革命差不多了。

所有这些事件都使拿破仑精神颓丧，他当时已经患着疼痛的膀胱结石症，最后也因此丧命。这个病症使他丧失了精力和活力。
动力。

而且就法国的军事情况看来，和强园作战也有危险。当普鲁士一德意志从一八六六年以来倾其全力扩充和训练军队的时候，法国却没有这样做。虽然拿破仑有一个武官斯托菲上校驻在柏林，进行密切的注意，不断把普鲁士在军事发展上的巨大进步报告上去，并促请作类似的措施，然而一切都是白费。斯托菲上校在对隆子说教。斯托菲的一些意见，由于具有历史意义，可以在这里叙述一下。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他这样写道：“据我看在法国的人们对于有关普鲁士的一切，不论是普鲁士国民还是普鲁士军队，都毫无所知。”他于一八六九年八月十二日预言说：“普鲁士敏锐的眼光足以认清，它所不希望的战争还是要发生，所以它竭尽一切力量准备应付任何意外的事变所引起的战争。”另一次，他又提到，“普鲁士的远见和法国的昏庸的这种鲜明的对比是使我恐惧的主要原因。”他非常愤恨一八四八年阻挠在法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梯也尔。“这个人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一种比打二十次败仗还要坏的厄运。”在战争爆发时，他称这次战争从法国方面来看是以无预见、无知和愚蠢来对有预见、有训练和有才智的战争。拿破仑发了病，革命已迫在眉睫，又加上皇后的愚蠢。

在一八七〇年七月初，即战争爆发前十四天，法国下议院还决议把征兵限额由十万人减为九万人。陆军大臣列伯夫声明，他赞同减低名额是因为想为内阁的和平倾向作证。并且内阁总理奥利维解答议员茹尔·法夫尔的质问时说，无论何时，维持和平没有比现在更有保证了。没有发生任何使人发怒的问题。

但是战争还是突然到来了。

“远在南方的美丽的西班牙”无意中给这次战争造成机会。自一八六八年秋季以来，西班牙是个共和国，但是统治阶级却渴望君
主政体。所以他们在物色一个国王。事后得悉，早在一八六九年九月，卡尔·安德·冯·霍亨索伦侯爵已经得到通知，说希望他的儿子，
当时做普鲁士近卫团少尉的列奥波德来做西班牙国王。普鲁士驻
慕尼黑的大使魏尔特恩男爵曾参与此事。俾斯麦是否知道？俾斯
麦不承认他与闻此事，但是谁相信他？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亲王
做西班牙王位的候补人，这不仅对霍亨索伦家族，而且对拿破仑是
一件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拿破仑和法国感到，如果除在东面与
霍亨索伦家族为邻之外，又在南邻加上一个当大国统治者的霍亨
索伦家族，他们的利益就受到极大的危害。如果对德国作战，则法
国必须防范由南方来的突袭，这就大大削弱了兵力。

值得注意的是，国王威廉对于把一个霍亨索伦亲王提升为西
班牙国王这样重大的计划竟然毫不知情。直到一八七〇年二月
底，他才得到消息，并在二十六日写信给俾斯麦说道：

“附件对于我好像是个晴天霹雳！又是一个霍亨索伦家
族的人来做王位候补人，而且是西班牙王位的候补人。我没有回复一
个字，并且最近同王储拿以往他被提名的事开玩笑，二人在同样
开玩笑下抛弃了这个思想！您既然已从侯爵那里获悉详
细情形，我虽然向来反对这件事，我们也将必须商量一下。

您的威廉”

但是俾斯麦并没有被国王这个意见所迷惑，他仍然坚持他的计
划，而且终于在一个由国王主持的，由王储、霍亨索伦侯爵、他和毛
奇都出席的会议上通过了列奥波德亲王的候选。

拿破仑起初听到霍亨索伦亲王当候选人的消息时没有特别反
对，这表现在他的淡漠和怠惰上。但是当七月初西班牙临时政府
声明赞成霍亨索伦为候选，并且这个决定传到法国时，法国的大
部分报纸都大声疾呼起来，因为一个霍亨索伦登上西班牙王位对
于法国就意味着危险。现在拿破仑也必须行动起来了。他派遣使
臣貝內德梯去向俾斯麥了解情況。这个人回复说，內閣对此毫无所闻。在《紀念和回忆》一书中，俾斯麥自己就这样叙述这件事。在這部書第二卷第八十頁上他動聞說，在政治上他对于这問題無動于中。但是在次頁上他却說道：“如果格拉蒙特公爵（在一本一八七二年出版的小冊子里）力图提出證明，說我对于西班牙的建議不会持拒絕的态度，那么，我也找不到理由来反驳他。”

一个崇拜他的人說得对：“当俾斯麥写历史时，他是在制造历史”，这就是說，他把事实歪曲成对他合适的样子。

继法国报界的喧豗之后，德国的报界也喧豗起来。不过起初还不普遍。七月十二日，《科伦日报》还为欧洲的安定很坚决地表示反对霍亨索倫家族的候选。那时資产阶级对于軍国主义如何看法，有七月十曰科伦的莱茵普鲁士进步党受托人大会的決議为证。大会決議：

“我們期望并且要求当选为国会議員的人，在国会下次开会时要特別保证减少平时兵額和缩短兵役期限以减轻軍事負担，如果这个要求遭到拒绝，則行使宪法权利拒绝同意同盟政府提出的一切軍事撥款。”

今天在資产階級政党中誰还会想到这样的措施，虽則此时海军和陸軍的装备已发展到那时沒有人认为可能的規模。

七月十三日这一个有决定性的日子到来了。根据日方和中官方关于貝内德梯伯爵在埃姆斯会见国王威廉的叙述，据說貝内德梯无礼地要求国王声明，他永不再让一个霍亨索倫家族的人做西班牙国王候选人，于是就在当天由于国王的催促，霍亨索倫亲王取消了他的候选。国王吩咐一个副官把这事告诉貝内德梯，說他认可弁权。貝內德梯再度請求与国王会談，如侍从武官长拉契維尔亲王后来在一个声明中所述，国王曰“我在飯后六点钟左右，第三次回答貝内德梯伯爵，陛下坚决拒绝就对将来有约束力的声明进
行繼續商討。今天早晨他所說的話就是對這件事情最後的話了，他只能以此為憑。貝內德停聲稱，他那方面听得这个声明就放心了。” 于是这个意外事件事实上告一段落。但是对俾斯麦来说没有结束，他那同法國冲突的计划被国王的声明打消了。他自己在《纪念和回忆》中叙述，那一天他正同毛奇和罗昂一起吃饭，他们听得霍亨索伦亲王放弃西班牙王位的消息而沮丧万分。俾斯麦恼怒得简直想要辞职。不久以后，由埃姆斯打来一份长电报，阿伯肯奉了国王的指示，叙述他同贝內德梯最后会谈的经过。这封电报的内容打消了同法國发生冲突的最后希望。俾斯麦叙述说，罗昂和毛奇大吃一惊，放下了刀叉；因为战争的希望消失，使他们食不下咽。于是俾斯麦——仍然照他自己的描述——坐在旁边的桌前，拿起笔来把电报改得性质完全不同。当他把自己的措辞念给毛奇和罗昂听时，二人的眼睛马上光芒四射，沉默寡言的毛奇并且叫道：“这样一来，这是另一种声调，从前是个投降号，现在是个进行曲了！”于是三人兴高采烈地在桌前坐下，食欲极盛地进餐。战争是靠得住的了。

这个电报传遍全世界，并且官方分送到巴黎以外的所有外国内阁，这对法國政府是件莫大的侮辱。在窜改过的电报里写道：

“埃姆斯，一八七零年七月十三日。在西班牙和政府把霍亨索伦王储放弃王位的消息正式通知法兰西帝国政府以后，法国大使在埃姆斯还向陛下提出要求，要国王陛下向他保证将来永不同意霍亨索伦家族重提它的候选。国王陛下拒绝接受法国大使，而派遣副官告诉他，国王陛下没有别的话可同大使说了。”

俾斯麦的这份电报得到了所想望的效果。电报一公布，马上在法国和德国以及两国以外的广大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骚动。七月十四日下午，我在前房我的理发师那里，当时由卡尔•比得曼教授博士編輯的《德意志总汇报》拿进来，上面登载着那个电报，我于
是得到了消息。我一读到那个电报，就把电报扔到桌子上说道，“这就要发生战争了！”理发师闻言大惊，我不得不对他分析电报为什么有这个意义。

果然不出所料，七月十五日，法国议会在很少的少数票反对之下批准了高达七亿法郎的战时公债，七月十九日，法国就对德国宣战了。

意見分歧

上述事件又一次引起了李卜克内西和我之间的意见分歧。李卜克内西认为拿破仑想要战争，而俾斯麦则没有勇气接受挑战。于是他在七月十三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道：“波拿巴的法国对俾斯麦的普鲁士提出了战争问题，如果后者不是决定作可耻的退却，则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了。”七月十六日他又写道：“勇者在更强大的面前退让了。霍亨索伦家族的候选人在波拿巴的威胁之下退却；和平保住了，伟大的北德意志同盟应当为德国争取国家的尊重，而竟像往昔在卢森堡事件中那样恭顺地屈服于法兰西帝国之前。”

我的看法与此相反。虽然是拿破仑宣战，但是依我看来，他是落入俾斯麦为他布置的陷阱；后者想要战争，他达到了目的。我对《人民国家报》的说法极为愤怒。李卜克内西和我之间遂发生激烈的争论，直到盖布来调解，我们之间才取得谅解。自七月二十日起，《人民国家报》代表我完全同意的见解。

没有预料到战争的爆发，我们定在七月十七日在开姆尼茨召开社会民主工党的全邦会议。当然，我们必须对战争问题表示态度。这就由李卜克内西和我提议而一致通过的下列决议表示出来。

“全邦会议反对任何不是为了自由和人道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认为那是对现代文明的侮辱。全邦会议反对只为王朝利益而
进行的战争，反对只为满足几个当权者的野心而把数十万人的生命、数百万人的幸福来作孤注一掷的战争。会议以愉快的心情向法兰西的民主党，特别是信奉社会主义的工人的态度致敬，会议声明，完全同意它们在反对战争方面所作的努力，并且盼望，德意志的民主党和德意志工人也按照这种精神来大声宣传他们的意见。”

巴黎工人已在我会之先表示反对战争。许多城市的工人在公开集会上作了和我们类似的声明，其中有巴马、柏林、纽伦堡、慕尼黑、哥尼斯堡、佛尔特，克累腓尔德。

不伦瑞克的共产党会却是另一种想法，它在七月十六日召开民众大会，在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说，与会者的观点是，拿破仑和法国人民代表的多数派都是破坏欧洲和平和扰乱欧洲安定的恶魔。相反地，德意志民族是被侮辱者，被侵略者，所以会议把防御战争看做不可避的灾难，然而要求全体人民千万百计地争取人民自己像一般的完全自决那样决定战争与和平。党的许多地方委员会都在拥护共产党会的这种观点，尤其是在北德意志，所以党内存在着强烈的意识分歧。

*        *        *

国会于七月十九日开会。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十八日由开姆尼茨上车，铁路已为军运所占用，使我们在哥斯尼兹车站等了许多小时以后才继续开行。我们在乡里商谈了在国会中所应遵守的策略。李卜克内西认为，我们必须严厉拒绝索款的要求，因为双方应负战争的责任，我们不应偏袒任何一方。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按照事物的情况，我们毅然不能偏袒战争的任何一方。但是我们如果投票反对公债，则所引起的印象就正是偏袒一方，而且会有利于拿破仑；所以我们只有弃权，别无他法。最后，李卜克内西请我草拟一个声明，次日带到柏林去。我照办了。李卜克内西把我的草稿加以修改就同意了，并且要我把声明交到国会去。在七月
二十一日的会议上，我发言说：“因为，我们听说，希望能不经过辩论而把议程了结。我们虽然对议会的这个观点难同意，但仍愿表示一致，不挑起辩论。我们决定在当前的问题中弃权。我们的动机将由书面声明存入议会的档案中。”

辛森以议员身份认为：我们这样做，他不能加以阻拦。我们采取这个立场的动机是：

“目前的战争是个王朝战争，是为了波拿巴王朝的利益作战，正如一八六六年的战争是为了霍亨索伦王朝的利益作战。

我们不能同意为了进行战争而向国会请求的拨款，因为如果同意，就是对以一八六六年的措施准备这次战争的普鲁士政府投信任票。

我们对于所请求的款项同样也不能加以拒绝，因为这样会被理解为赞成波拿巴的凶恶和犯罪的政策。

作为原则上一切王朝战争的敌人，作为不分国籍对一切压迫者作斗争而力求把一切被压迫者团结成一个兄弟大同盟的社会共和主义者和国际工人协会成员，我们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间接表示赞成目前的战争，所以我们弃权，同时我们也确希望欧洲各族人民通过现在的不幸事件获得教训，竭尽全力来争取他们的自决权，并且把今天的武力统治和阶级统治当作国家和社会的一切灾难的根源而加以铲除。”

所要求的一亿二千万塔勒的战时公债被国会批准了。弗里茨舍、哈森克莱维尔、门德和施韦泽投票赞成，福尔斯台林早在春季已辞去开姆尼茨的委任。在补缺选举时哈茨费尔德派失去了该区。但当认购公债时，德意志的资本家却对全世界表现了一种可伶像。虽则公债有百分之五利息，而且认购一百塔勒只须付出八十八塔勒，将来仍可还本一百塔勒，但是只认购了六千八百万塔勒。这是莫大的丢脸。在法国却不然。那里募足了所发行的七亿法郎，而
且给与和德国同样的利息。

* * *

我們在国会中所持的态度使我们与党委员会之間的分歧越来越大了。于是在书信中发生了极其激烈的争议，特别是李卜克內西与委员会之間，因为李卜克內西不愿按照委员会的意思编辑《人民国家报》。虽曾劝李卜克內西服从理性，但是无效。七月二十六日，他写信给白拉克等说道：“我并不以为你们的爱国热忱是坏事。但是，你们也要有容忍之量，即使你们不同意倍倍尔和我在国会中的态度，现在也应不感任何代价来消除这种不睦，或至至少避免公开的决裂。在现在这关键时刻，党内不应该发生看来是不团结的情形，我恳求你们，对一切足以加剧分歧的，都加以克制。”

这个请求无效。最后李卜克內西愤怒之下，以出走相威胁。他厌恶这种纠紛和民族主义狂。我也厌恶不伦瑞克的唠叨不休。我在八月十三日写信给那里说：“如果委员会继续反对李卜克內西，我們不再为《人民国家报》写稿了。根据您們的来信（信是针对李卜克內西写的，并对他进行威胁），好像您們已陷入了一种民族主义狂，好像您們不惜任何代价想使党丢脸和破裂。您們不能指出我們在国会中的态度对党的原则有什么抵触。您們不以冲突沒有尖锐化為满足，反而要求那些主意坚定的人們改变和否认这种观点。《人民国家报》正是在最近几星期严格表现为党的机关报。我們的敌人异口同声地疯狂叫嚣就是证明。难道您們也附和民族自由党的叫嚣吗？您們谈到薩克森的分立主义。而我们却恰好在薩克森是十足的社会共和主义者，并且我們都把全部战争看作是一个王朝的战争。馬克思也曾表示赞成我們。”

九月一日，李卜克內西写信给白拉克说：“所以有离开的愿望，不是因为害怕那些热中官职的人，而是由于厌恶那种爱国主义的迷醉。这种病症必須经历它的过程，在这期间我留在这里是十
分多余的，而在其他地方，例如到美国去，可能甚为有用。毕竟不至于遭到这种程度，那我也就用不着走开了。”

奥古斯特·盖布（汉堡）又设法调解。这次却比历次的调解较为顺利，我们不久又站到同一战线上去了。

声明和布告

七月十七日，在柏林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普鲁士一德国战争的前途如何，从毛奇的同时以罗昂的名义发出的声明表明了：“普鲁士所进行的战争，关于它的军队组织、装备、给养等方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成功的把握的。关于法兰西装备的进步（他倒应该说落后。——奥·倍）都有十分详细的情报，据此，不用害怕来自法国的军事袭击。”这个见解的正确性马上就被证实了。德国一般人都以为，这在破命宣战以后，法国军队马上就会侵入德国领土。但是人们枉然等候着。宣战把法国弄得手忙脚乱，没有一个军团作好战争准备，从上到下都一团糟。八月初，已有二十八万德军与二十五万法军对垒。德意志自由派人士对这情况如何看法，表现在来比锡的比得曼教授在大学生宴会上祝词中，在七月底他已说：“我们要把法国打倒，使它在一个世代中不再想打仗。我们要这样做，因为我国注意使法国的躯体稍稍消瘦一些。”

这里在还没有开战之前，就已经暗示着吞并土地了。所以人们预计胜利绝对可靠。这时候官方文件却说得完全不同！七月十九日国会开幕时的御前演说说，“我们号召全国力量保卫我们的独立”，“德国土地具有抵抗法兰西侵略的暴行的意志和力量”，人们满怀信心地向“德意志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发出保卫德意志人民的光荣和独立的号召。”结尾时说，“我们将按照我们祖先的榜样，为了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对外国侵略者的暴行作斗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除了追求保证欧洲的持久和平以外，别无其他目的，上
帝会像保佑我们的祖先那样保佑我们。”

按照这个庄严的声明（由洛塔尔·布赫尔执笔），则进行的只是一个防御战争而不是侵略战争，其目的是保证将来的和平。

国王的御前演说中还有一句有趣的话，那句话是：

“德意志人民和法兰西人民同样享受并追求基督教文明和日益提高的福利，他们的使命是进行比武装的血腥竞争有益的竞争。”

普鲁士国王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一日的宣言也足以说明政府的情调，他宣布，他进入法国并担任了总司令：我是同法兰西的兵士作战，不是同法国的公民作战。”

弗里德里希·查理亲王的布告在各国各界获得好评：

“第二军的士兵们！

你们踏上了法兰西土地。拿破仑皇帝毫无理由地对我们宣战，他和他的军队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他并没有问法兰西人民是否愿意同我们的德意志邻人进行血战，所以没有理由来和他们敌对。因此要记着，对于法国的和平居民要表现出，在我们这个世纪两个文明民族即使在战争中，彼此之间也不忘记人道主义的信条，要常常想着，如果敌人侵占了我们的土地（上帝禁止其如此），你们的父母在家乡会如何感觉。对法国人要表现出：德意志人民不仅伟大和英勇，而且对敌人也是讲道德、有义气的。”

并且早在七月二十五日，国王就在众所周知的布告上发表了一封感谢信，其中说道：

“由于对共同祖国的热爱，以及德意志各族人民及其公侯们的一致奋起，使一切分歧和对立都结束了、和解了，并且空前团结一致，德国才能同心协力地、有理由地保证：战争给它带来持久的和平，并且从鲜血的种子里长出德意志自由和统一这一上帝恩赐的果实。”

149
要注意的是，这个感谢书的结束语把自由放在统一的前面。我在许多公开的大会中提到了这句话，这在后来造成了我的厄运。

不伦瑞克常务委员会的被捕

七月三十日，党委会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一篇宣言，表明了当时它和我们不同的立场。它在要求党进行有力的活动之后接着说：“我们的任务是，当这个如我们所希望的包括整个德意志的国家诞生的时候，坚决地共同努力，如果可能，从而创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民国家（111——奥·倍·），而不是王朝的国家；我们的任务是（也许新成立的国家在诞生时还带着王朝的色彩），用严肃的、艰苦的斗争把它打上我们的理想的烙印。”该会希望，我们的同胞用热情和勇敢不久即可在法国得到胜利，但是人们也不要让自己沉于胜利的陶醉之中。人们必须以两个民族的兄弟交战为遗憾，可是德国在战争上是无罪的，有罪者会很快地遭到惩罚，然后我们才能够保持强大，为世界一切被压迫者进行光荣的联合斗争。若是拿破仑失败，法兰西人民就可以较自由地呼吸，于是我们就提醒我们的当权者，哪些东西是因上帝和正义之故而理应属于人民的，哪些东西是战争的无耻牺牲者和痛苦使人民加倍地和双倍地有权利要求的。

委员会当时在乐观情绪中没有料到自己会成为作为胜利光荣的代价的第一个牺牲者。法兰西帝国的军队在紧紧相连的几次战斗中被打垮了，整团整团被俘的法军俘虏出现在德国各行政区，这些俘虏的暴行问题不久就成为一种讨厌的负担。在色当战役中，看拿破仑作这一战的情境，人几乎要相信他有意这样调动，以便往德国去当俘虏，而不想回法国作战败的皇帝。当他被俘的消息传到德国时，到处欢腾，我们也都同欢腾。全世界渴望着战争结束，它的伤亡惨重的战斗已令人对战争产生憎恶的心情。普鲁士国王
在麦茨战役后写信给王后说: “我不敢询问伤亡的情形。”他打电话给符腾堡国王说:“最近一次战斗（六月十九日）的损失同前次一样非常重大，使胜利的快乐大为减色。”席多·威斯所编的柏林的《未来》报上写道:“那些生来就批紫袍的贵族们在死者退色的紫袍前面鞠躬。甚至无所畏惧的人也感到恐怖; 镰刀伸得太远了，原野上施肥太多了。”

可是战争还在继续。巴黎对拿破仑在色当被俘的回答是宣布成立共和国，这件事变特别使德意志司令部很不愉快。进行战争，原不是为了把法兰西弄成共和国。人们毫无理由地害怕这个表现出来的恶例。当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来到德国时，李卜克内西极为激动，含着眼泪冲进我的作坊来报告这件事。他见我对于这消息所持的冷静态度，吃了一惊。但是在不伦瑞克委员会中，这个消息也像个晴天霹雳，引起了思想的急速转变。现在我们之间的分歧一下子都消失了。我们现在共同要求立即同法兰西共和国媾和，要求赔偿一切战费，但是放弃任何吞并领土。同时，自卫战争变成了侵略战争。比得曼早在七月底即已暗示的，在继续多次胜仗以后，成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报纸的普遍要求。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发表了一个论这次战争的宣言，登载在八月七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宣言说:“一八七○年七月的军事阴谋不过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的政变的修正版。”这个战争显得这样无意识，连法国也不相信它，甚至资产阶级反对派也拒绝付款。加入国际的法兰西工人认为战争是王朝战争。“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四页。——译者
(2) 同上书，第五、六页。——译者
誰把德國弄到必須處於防禦的地位呢？”(1) 側面接下去一段是對俾斯麥政策的批評，《人民國家報》必須刪去。“如果德國工人階級容許目前這場戰爭失去純粹防禦性質而變為反對法國人民的戰爭，那末無論勝利或失敗，都同樣是要產生災難深重的後果。”(2) 總委員會然後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俄国有利。

不倫瑞克委員會現在按照總委員會宣言的意思，在九月五日發表了一篇《給一切德意志工人》的文告。提到法國最近情況，委員會期望，新的共和政府應該設法同德國達成和議。德意志工人必須支持共和政府的這種意圖，要求同法蘭西人民成立光榮的和平，並且工人類群要為此大聲高呼。

然後委員會引證了卡尔・馬克思(但是沒有提出他的名字)的一封信說，如果人們堅持吞併阿爾薩斯-洛林時，將會而且完會有任何後果。引文說:

“誰沒有完全被當前的叫囂震聾耳朵或者不熱中于震聾德國人民的耳朵，他就不應該了解到，一八七〇年的戰爭必然孕育著德國和俄國之間的一場戰爭，正如一八六六年的戰爭孕育著一八七〇年的戰爭一樣。……這場戰爭已經把歐洲大陸的工人運動的重心從法國移到德國。所以德國工人階級負著更大的責任。”(3)

委員會接受這種解釋，要求宣布反對吞併阿爾薩斯-洛林，並擁護同法蘭西共和國的光榮和平。号召結尾說:

“如果我們現在看到，一個偉大的民族怎樣又把它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如果我們今天不僅看到在瑞士的和在海洋彼岸的共和國，而且也確知看到了在西班牙的共和國，在法國的共和國，那麼讓我們厲聲高呼，即使德國今天還不能是個共和國，自由的曙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五、六頁。——譯者
(2) 同上。
(3) 同上書，第二八三、二八四頁。——譯者
光也有一日为德国透露出来，让我们大声欢呼，共和国万岁！

九月十一，《人民国家报》转载了上述的号召，而在十四日的下一期上发表了李卜克内西和我党对党报同志的谈话。谈话中我们指出，汉诺威的伊格尔·冯·法尔肯施泰因将军（已证实是不顾公理和法律）下令逮捕党委员会委员，即布朗克、彭布莱特、斯皮尔、曲思和印刷所主人魏菲尔斯。在军队森严戒备下押往东普鲁士的吕森要塞，囚禁在那里。被捕者所遭到的待遇，即使是残酷的，也是极端粗暴的；只为了前往哥尼斯堡，就用了三十六小时。在旅途中公众到处都把他们当作捕获的卖国贼，也就按照对待卖国贼的方式对待他们。我们要求，在监察委员会还未另作指示之前，请把信和钱寄到汉堡的盖布那去。结尾说：“

“同志们！党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也许随后还另有打击。

要立定脚跟，不要动摇；在危难中才能得出真正的信念，才证明出真正的决心。

努力传播党和我们的原则，但是言论要小心，写作也要小心——与我们为敌的势力在设法利用一切来反对我们。

努力推广机关报，在这精神斗争的时刻，我们的威力和我们的优势就在那里。

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万岁！社会民主组织万岁！”

在我们的谈话中提到了盖布的名字，这就足以使伊格尔·冯·法尔肯施泰因有把他也送到吕森去的借口。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在哥尼斯堡集会上演讲反对吞并的约翰·雅可比，和担任那个集会主席的大地主海尔比希。伊格尔·冯·法尔肯施泰因以北德意志总司令的身份来处理这些事，他的任务是在北海岸防备法国人的万一登陆。他在军事上无事可做，就忽然想到做保安全处。

雅可比和海尔比希的被捕在自由主义界界造成了不愉快的印象。一家左翼自由主义报纸认为：“这种行动是和伟大的战争不相
称的，并且因而引起疑问，是不是德意志民族赢得了外部的荣誉，却丧失了内部的自由。”

我们认为当权者的这些行为和活动是当然的事。但党委员会却抱有幻想，以为新秩序具有自由的模样。而据说给与这个新秩序的却是一个素来表现为任何自由主义发展（姑不论民主主义发展）的最大敌人，现在以胜利者的姿态把帝国的靴脚的人。

在哈尔堡的约尔克和赫尔维利，在哈尔伯斯塔特的纳特尔斯也都被捕入狱，以他们散播党委员会宣言的罪名起诉。萨克森第十二军团司令在九月底发布一条命令，禁止一切讨论战争最终目的的民众集会。这时期的一线光明是在奇尔希堡和米特维达（两个都在萨克森）的市议员选举中，我们党取得辉煌的成就。克里米亚虽在战时，却在八月一日出版一种每日出版的党报《市民和农民之友》，由卡尔·希尔施编辑。接着在次年二月一日出版了《海姆尼茨自由报》，也是每天出版。我们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区别也在于，我们不阻挠创刊新的党报。

十月初，半官方的《北德意志总汇报》惋惜李卜克内西和我没有像不伦瑞克委员会、约翰·雅可比等人那样被捕。它不久就如愿以偿了。

监察委员会把新的临时委员会迁往德累斯顿。新委员会是由克尼灵、科勒和奥托·瓦尔斯特等同志所组成的。因为我们知道，不伦瑞克委员会被捕时，大批函件被没收，所以我写信给新委员会的秘书瓦尔斯特，应以不伦瑞克事件为戒，不要保存信件。但是瓦尔斯特不听忠告。后来果然不出所料，他那里也被搜查，连我的劝告信也落在警察手里，然后列入即将到来的叛国案的文件中。

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十月底经历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十月三十
一日是路德把他的第九条纲领张贴在维登堡皇宫教堂门口的宗教改革日，这天在萨克森是个节日。在这节日的两天之前我收到一封挂号信，信里说因有十分重要事件，恳请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十月三十一日到米特维达去。我们接受了这个邀请。下车时在车站上有人秘密地迎接我们，绕了半个城市后我们到一个饭店里，我们吃了一惊，看见里面聚集着上厄尔茨山区和下厄尔茨山区的全体受托人。于是一个发言人质问我们，为什么袖手旁观而不要求动手起来，军队仍在国外，在国内的不难战胜我们。我们对这种幼稚说法只是摇头。我首先讲话，指出发言人的要求是荒谬的。李卜克内西当然也作了同样意思的发言。我们没有费很大力气就给与会者讲清楚了我们的立场的正确性。与会者同我们一样也是被两位党员同志请到米特维达来，而不知道这里要干什么的。

与此同时，苏黎世的党员同志举行一个公开集会，当时担任检查官的党员同志福莱尔在会上发言，他只讲了下列的议案：

“1. 我们同情法兰西共和国! 希望它能努力反抗，来削弱霍亨索伦家族的军事力量，使它不得不立即接受和平。

2. 我们向德国和英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志表示最热烈的敬意。

尤其是你们，在德国的兄弟们，不管迫害和镇压，不管枷锁和牢狱，以男子的气概捍卫你们的原则；我们坚决地信任你们，你们要尽你们的责任，并且表明你们无愧于你们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历史任务。”

当时苏黎世同志的赞扬使我们深感满意，我至今还有此感。
吞并和皇冠

在色当战役以后，对法战争以毫不衰减的力量继续进行。帝国的军队显然不是被消灭，就是被俘虏了，现在是以甘必大和弗累西奈为首的国防政府来组织新军。这支军队可以说是在战争中间从地下锻造出来的。关于这个伟大的成就，有一本有趣的书《雷翁·甘必大和他的军队》，冯·哥尔茨男爵著，一八七七年在柏林出版。但是主要的功绩不是甘必大的，而是原先的工程师弗累西奈的。对帝国的战争历时还不到六个星期，现在对共和国的战争却持续将近六个月。而且新政府虽然作战勇和的尝试，只因俾斯麦在吞并领土而未成功。俾斯麦始终想使拿破仑复辟，也声明说，国防政府不是一个可与谈判的稳固政府。可是最后他还是必须同这个政府缔结和约。

十月底，巴赞以麦克连同十五万大军和大批军事物资投降了，这对德意志军队指挥部是一件幸运的事，它可以用全力来对付新成立的法兰西的罗亚尔军和北方军。

十月二十六日，雅可比、彭好斯特和阿尔比希都由吕森释放出来。普鲁士的邦议会选举已到眼前，所以不便把违反公理和法律所逮捕的公民拘押不放。几星期后，十一月十四日，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又带着镣铐由吕森运回不伦瑞克。在这里要上演一出控诉他们叛国的案件。最后在十二月初，在汉堡市政府的催促下，盖布终于也从吕森释放出来了。对他提不出公诉材料。

十一月二十四日，北德意志国会召开非常会议，会开得固然短促，但是很激昂。会议是关于批准继续作战的军费，同南德意志诸邦讨论凡尔赛条约和新宪法的问题。

迄今所知道的有关凡尔赛条约的消息，在自由主义人士中引
起了极大的反感。根据那条约，给与南德意志诸邦，特别是巴伐利亚，以所谓特权，这样只会给国家的统一添麻烦。北德意志同盟宪法必须根据凡尔赛条约进行一些极为必要的修改而成帝国宪法。国王在七月底的感谢书中所预先许下的自由，仍在原处——营房。议员认为仍未批准。这些事件就足以使人情绪沮丧，何况又加上战争延长，造成各种莫大的牺牲，还不知何时结束等等事实。九月初，毛奇写信给他的兄弟说，他希望十月底可以回到克莱索（他在西里西亚的田庄）去猎兔子。但是兔子并没有被毛奇的猎枪所惊扰。

战场上的消息在国会中造成了十分忧郁的气氛。人们没有想到战争竟有这样的进程。《科伦日报》的记者冯·维克德还在十二月底就写道：

“这个可怕的战争是以巨大兵力进行的，规模之大是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的历史所未有，事实上无法预料。人们认为，战争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而现在却发觉，月底还是同月初一样。我们一再打败法国人，成千地杀伤他们的士兵……而他们的败兵总是再集合而又再集合……并且常常以不谋死活的勇猛气概向我们突击……现今在许多被我军摧毁的特别厉害的地区已经发生可怕的饥荒，在盛夏中人们像苍蝇似的成批倒毙，到了严冬，这种情况将更可怕地变本加厉。”

国会开幕，同盟秘书长德尔布洛克宣读国王演说词，演说词中说，法国现在的当权者宁愿使一个高卢民族的力量牺牲在一场无望的战争中。同这句话有一定矛盾的是说：法国没有一个可以与之谈判的政府，也由于人民的态度，持久和平的希望毁灭了。一旦法国的力量恢复起来，或者由于缔结联盟而自觉足够强大，它必将重行掀起战争。由此可见，吞并领土的欲望将把未来的发展推到哪里去。
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提议上列的请求继续拨款案（一亿塔勒）。

我发言谈到这个要求。在我之前有议员莱克斯波史表示赞成。我的发言不长，但引起了我的演说从此没有再引起过的风波。我谓，我是同前一位发言一样好的德意志人，虽则我在研究问题之后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我摘要叙述了到帝国灭亡为止的法国简史，并且指出，在拿破仑被俘后，战争的根源就已消除。对此我所依据的是七月十九日的御前演说和八月十一日普鲁士国王宣言。我的讲话引起巨大的骚动和激烈的反对。断言法国没有政府可与谈判的主张是错误的。我在讲话中证明它的错误。便和约不能缔结的是吞并领土的要求。然后我对那不准我们在公开集会中说明我们关于吞并领土问题的立场的禁令，进行尖锐的批判。我详细说明了我们这个立场。讲话又已被屡次打断。然后当我指出德意志资本家阶级在发行第一次战时公债时扮演的可怜角色而法兰西资产阶级在同样情况下却完全不同的时候，风潮就完全爆发了。议会中一大部分人都真正发了疯；他们用最粗野的话骂我们，几十个议员高举拳头向我们冲来，并且威胁着要把我们轰出去。我好几分钟说不出话来，最后，我建议大家通过李卜克内西和我所提出的建议。这个建议是：

“国会决议；

否决有关为作战而继续筹款的法律草案，并同意下列建议：

鉴于在七月十九日由当时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所宣布的战争在路易·波拿巴被俘和法兰西帝国崩溃后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鉴于根据普鲁士国王在七月十九日的御前演说和八月十一日对法兰西人民的宣言里自己声明说，在德意志方面这个战争只是一个防御战争而不是对法兰西人民的战争；

鉴于从九月四日以后所进行的同国王的言论极相矛盾的战争，已经不是对那已不存在的帝国政府和帝国军队的战争，而是对
法国人民的战争，它已不是防御战争，而是侵略战争，不是为了德国的独立的战争，而是为了压迫高卢的法兰西民族的战争。根据七月十九日的御前演说，法兰西民族有资格‘同等享受并追求基督教文明和日益提高的福利，进行比武装的血腥竞赛有益的竞争’。

国会决议否决所要求的作战拨款，并且要求同盟首相力求放弃吞并法兰西领土，尽快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合约。”

在我之后是由议员拉斯克尔发言，他用极为义愤的声调痛駡我们和法兰西人民。说的他如何为金融界辩护而反对我们的指责。他说：“不错，广大的金融界没有踊跃参加，那里没有获利的希望（一旦胜利还会有相当大的利润。——奥·倍·），这是商人的作风，如果看来无利可图，就不愿以商人身份来参加，商人的本性原是如此。现在，那里还有些人（用手指着我们），他们说利润与报酬，可是他们从事理想活动却是为了报酬（大笑），并且使他们被称为使徒的行为，结果是为了议员日俸。（大笑。很好！）这些先生们，按他们的行为的性质也许只要一笔较小金额就会满意（会场的笑声激起屋宇），却又嘲笑追求利润，这是怎样糊涂的想法！因此，大金融界认为这个时机不适于做有盈利的生意。”

昔德意志资本主义做辩护，实在不能比这更无聊和更充满矛盾了。（我在第二次发言时给了拉斯克尔适当的答复。）继拉斯克尔发言的是布劳恩（威斯巴登），继布劳恩的是李卜克内西。他有力地抨击前面的一个自由派的发言人。发言一再被猛烈地打断。议长高呼遵守秩序。

李卜克内西在发言中说道：

“在七月间宣战的政府已被消灭，它的领袖与威廉平起平坐而且是普鲁士国王的好弟兄，当德意志战士在外面流血并且在对法兰西人民的战争中忍受极其可怕的艰苦的时候，他却沉溺于帝王的穷奢极欲之中，而法兰西人民无论如何总是我们的兄弟民族，而
且他們是願意同我們和平相處的。（騷動，高呼。）做法蘭西人民和法蘭西工人的兄弟，實在比做那個與我們平起平坐的流氓的親愛弟兄更光榮些。（議員馮·施韦澤博士：好啊，好啊！）

李卜克內西結尾說，

“要求簽訂的公債是為了吞並領土，這在御前演說中也可以看得出來。但是吞並給我們帶來的不是和平，而是戰爭。因為就在和平以前它也會經常製造出戰爭的危險，所以它在德國巩固了軍事獨裁⋯⋯由於這些理由，我當然反對與時公債，并且和我的朋友傅恪爾一起建議予以否決。”

這個建議只有五票贊成，被否決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會議的議事日程上，列着戰時公債的第三讀，由我們黨所選出的歌茲博士（林得瑙，他在同年三月間還拥护約翰·雅可比的國會競選）在會上發言擁護戰時公債，雖然他斷言，這對他是勉強的，并且由御前演說中他也看出戰爭不能帶來和平，也沒有希望減輕軍事負擔。他的發言非常荒誕無章。表明特徵的是，在這次會議中我們對攻擊採用大聲打岔來自衛時，拉斯克爾就問議長，可不可以立即改變議程來結束這種“胡鬧”。李卜克內西在回答時指出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會議上我們所聽得的無理喊叫和言語。當李卜克內西想就戰時公債的法律草案第一篇方面回答所聽得的攻擊的時候，議長打斷了他的話，說他不能重提一般的辯論。李卜克內西以充分理由不承認這種觀點，因為第一章中包含着為繼續作战而籌款，這時在議長建議之下，議會剝奪了他的發言權。第三讀中反對戰時公債的有：埃瓦爾特博士（漢諾威人）、弗里茨舍、哈森克萊維爾、李卜克內西、門德、施拉普斯、施韋澤和我。

几天以后，在議程上列有議員邓克尔及其伙伴关于在戒严时期宪法条款执行問題的质問。他們反對馮格爾·馮·法爾肯施泰因將軍的措施。我們因為得不到所必須的三十人連署，所以就不
可能提出这类问题。如果说，资产阶级人士不反对那样对我们的党委会的暴行，却非常憎恶约翰·雅可比的被捕，这很不符合人们对新国家的期望。雅可比在被捕后直接向凡尔赛司令部的俾斯麦申诉，因为他的被捕是非法的，所以请求将他释放。俾斯麦在答复雅可比的信里间接地认为他有理由。可是他没有做什么事使他获得释放，表面上是因为他与司令部的军人已很不和，不愿再增加恶感。但是根据忠实地报道俾斯麦的公私言论的他的随身记者摩利茨·布士的记载，他在十月二十日谈到雅可比被捕时说，“我对于这件事不感到愉快；党人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样可以满足他的报复心情，政治家、政治没有这样的心情，政治只问虐待政治上的敌人是否有好处。”并且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在国会中的质问以前不几天，又谈到这个题目，俾斯麦说（仍根据同一来源），军人征求他的意见太少了。“在委员会格尔·冯·法尔肯施泰因时也是如此。而他现在处分了雅可比。如果我必须当着国会谈论此事，我可以推卸责任，人们不能拿讨厌的东西来打扰我。我已成为战斗中习于炮火的马，将来我还要参加国会活动，如果不使我生气，我就让人把我的位子放在最左翼。”

可惜他没有使这个恐吓成为事实，如果在下次开会时有他站在我的一边，作为我的战友（在那次会上只有我代表最左翼），那我就非常高兴了。

十二月三日的讨论异常激昂。邓克尔指出雅可比和海尔比希是非法被捕的，他认为我们那些被解往吕森的不伦瑞克的同志也是如此。他要求（这中间有如上述，被捕的普鲁士公民因为当前的普鲁士邦议会选举而被释放了），将来不得再发生此类事件。同盟秘书长德布布律克代表俾斯麦讲话，并企图用这种处分作辩护。温德穆斯特答复他，尖锐地攻击他，并且尖刻地说，他今天听了秘书长的讲话以后，他就不甚相信能实现战争开始时所承诺的“德意志
国家将是一个敬仰上帝，有良好风向和真正自由的国家”。他讽刺地建议，在同法国的和约中规定把开云和兰贝萨也割让给我们，这样可以有个合适地方来安置不服管束的人物。然后温德荷斯特严厉斥责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对被捕的汉诺威人的虐待。在讨论过程中，我也发言来描述我们的被捕同志在往来吕森途中以及在吕森拘留期间所受的待遇。我也控诉了萨克森的禁止一切集会，对公理与法律的蔑视。米凯尔，不出所料，不仅同意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的措施，而且竟认为我们的态度会使法国加强反抗。我立刻指出这一主张的荒谬。人所共知，质问照例是自欺自毁的，这次也是如此。

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同巴登、黑森、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等邦所订的条约。我声明我反对这些条约和任何新宪法。人民不久即可判明德意志的自由和统一究竟如何。德国十年来所进行的三次战争在自由方面只有后退。人民却总有一天会要求而且获得他们的自治权，然后自己制订以共和为目的的宪法。

在我之后，秘密参议瓦格纳发言，使李卜克内西和我大吃一惊。他说道，他从方才送到的《金融消息报》上看到，我们由法国驻维也纳的领事勒菲弗尔那里收到了法兰西共和国感谢我们在国会中的态度的一封信。（热烈高呼，听啊！听啊！嘘嘘！）对于这个，我只能在私人谈话中答复，直到此刻为止，李卜克内西和我都还没有接到这样一封面貌，而且使我更加莫名其妙的是，刚才还听说，《北德意志总汇报》也转载了这封信。我认为这封信是普鲁士新闻局想败坏李卜克内西和我的名誉而散播的卑鄙谣言。在下次会议上，瓦格纳仍然坚持他的主张，说这封信寄给我的信是真的。在会议结束时我回答他说，直到此刻为止，我并未接到那封问题所在的信，所以必须保留我第一次的声明。但是，我终于收到了那封信给李卜克内西和我的信。这样，信毕竟是有的。注日期是十二月二日，用了
六天的时间才递到我的手里。信上说：

“我的先生们！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委派我为对德民主党的特别代表，我以法兰西共和国的名义认为我有责任，对您们在柏林国会中，在一个沉醉于军国主义和侵略精神的狂热会场上所作的宝贵发言，表示我的谢意。您们在这种场合所表现的勇气已使全欧洲注意您们，并在自由战士的行列中给您们取得了一个光荣的地位。德国的自由思想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正如您们，我的先生们，所雄辩地证明的，目前遭到我们在第一帝国时期所遭到的那种压抑，并且走向同样的觉醒。粗暴统治的欲望控制住开明的精神。不久以前放出那样的光辉普照着全世界的思想家，今天却在俾斯麦先生的威召下成为毁灭和杀害整个民族的宣教者。我的先生们，您们和您们的党在普遍罹落的时节保持了伟大的德意志传统。——在我们的眼里，您们是德意志民族的伟大代表，而我们是以真正兄弟友爱抱持而且永远热爱德意志民族的。法国向您们致敬，我的先生们，并且感谢您们，因为在您们的身上看出的德国的前途和两民族之间和解的希望。”

这封信可能是出于善意，但是在那种时候却是非常不合时宜的。谁把信公开了，我们从未知悉。我猜想，这位长官受了要消灭我们的那方面的煽惑，才写这封信的。——

在讨论宪法时，有一幕可笑的场面。巴伐利亚国王路易第二在长期逼迫和谈判之后声明，请求德意志同盟的公侯和自由市，把德意志的皇冠给普鲁士国王。这个消息传到国会后，应当有某种庄严惊人的事实改而。在议会上，议员弗里登塔尔起来提出与此有关的质问。于是同盟秘书长德尔布律克庄严地站起来，要宣读有关的文件。但是，他不知道把它放在哪个衣袋里。在极度兴奋中，他紧张地寻找所有的口袋，这一幕引起了哄堂大笑。最后，他找到了信件，但是效应用落了空。德尔布律克是个十分干练的官
員，却是一个人们可以想像的最缺乏头脑的官僚。他绝不是那种表演庄严宣誓的人。俾斯麦在凡尔赛听到宣言没有成功，大发雷霆。

在这个辩论中，李卜克内西关于新宪法和新帝国的发言惹起暴风雨般的愤怒。他回顾往日所追求的德意志统一，作为往日所追求的目的的德意志统一与现在所实现的德意志统一迥然不同。现在的这个统一是来自上面的暴行的产物；公侯们同意了，国会就必须和只得唯唯称是。这个宪法表现出来，它来自凡尔赛的军营。在那里和南德意志诸邦所缔结的条约，却显示出连外表上的统一也没有谈到。霍亨索伦王室成为德国真正统一的障碍，它的利益是和德意志人民的利益对立的。新皇帝的加冕应在最适于象征此事的（柏林的）宪兵场上举行。因为这个帝国只能借宪兵之力量来维持。议长对这个发言提出了多次遵守秩序的号令和一连串的斥责，使这个发言显得很重要。

十二月十日，选举代表团把国会所决议的祝贺皇帝登基的请书送到凡尔赛去。进步党多半曾同我们一道投票反对宪法，他们通知办公室放弃参加代表团。代表团的成员是由抽签决定的。我们保持沉默，要看一看我们中间是否会有一人中签而列名代表团。中签的人当然也不会接受。但是我们并没有这种运气。当罗特希尔德的名字由票箱中抽出时，温德荷斯特肃然起敬地向他走去，用力握着他的手祝贺他的当选。整个会场哈哈大笑。

由于旅途中遇到的许多阻碍和凡尔赛司令部的招待，代表团没有感到快乐。这种招待与代表团对他们的“崇高使命”所作的想像完全不同。国王本人把作皇帝看得无足轻重，所以当皇储告诉他，在此的公侯和将军们希望在代表团呈递国会请愿书时能够出席，他吃了一惊。国王冷静地回答说，如果所谈的人有哪一个真的高兴参加，他是不反对的。如果代表团能够约许他一旦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就使之隶属于普鲁士，他对新尊位的感情大概就会
比这好些。这是第一次霍亨索伦家族打了胜仗而没有为普鲁士掠得领土的大战争。这是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人所难于克制的。

所以这正像许多其他历史传说一样，竟认为国王当时渴望登德意志帝位。因此，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德皇威廉二世在勃兰登堡省议会宴会上讲话所作的述，也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当时的威廉二世提到德国的统一时说道：

“旧德意志国家受两方面的迫害，外国受它的邻国的迫害，内部受它的党派的迫害。唯一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国家一度团结起来的人是德皇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德意志人民至今还为此感谢他。从那时以后，我们的祖国瓦解了，好像没有人能够再把它联合起来。天意创造了这个工具，并且选拔了那个我们可以尊之为新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位大帝的统治者。我们可以注意他，看他怎样慢慢从艰苦的考验时期成熟起来，直到他将近老年成为适合于工作的熟手，他对于他的职业有多年的准备，就已在他的头脑里完成了那使他能实现国家复兴的伟大思想。我们看到，他怎样先把军队建立起来，把从各省雇来的农民子弟编成有力的、武功灿烂的队伍，我们看到，他怎样做到和军队一起渐渐成为德意志的主导力量，并且把勃兰登堡一普鲁士置于主导地位。这一点完成以后，就到了他号召整个祖国，在敌人的战场上实现统一的时刻了。”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不是老威廉而是他的儿子，皇储（后来的德皇弗里德里希）渴望帝位，当时在凡尔赛竭力贯彻他的愿望。他的朋友，著名作家古斯塔夫·夫赖塔格竟认为，霍亨索伦家族所以能获得帝位，只应感谢皇储。确实的是，除了皇储以外，俾斯麦也竭力为霍亨索伦家族攘取帝位。俾斯麦在这方面肯定是最适当的判断者，他在《纪念碑和回忆》一书中说到国王对帝位的态度时写道：

在他看来，帝位显得是一个给与他的现代的职位，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这种皇帝的权威曾受到过反对，这种权威曾抑制过大选侯。
在第一次讨论时他说：“化装舞会长该叫我做什么？”我回答说：“陛下当然不欲永远做中性的‘das Präsidium’（首长）。”‘Präsidium’一词是个抽象概念，而‘Kaiser’（皇帝）一词却有巨大的动力。”

帝位问题在皇储弗里德里希的日记中讲得又详细又富于教育意义。日记是照密参议格夫肯在弗里德里希死后发表在一八八八年十月号的《德意志评论》上，这惹得俾斯麦大发雷霆。弗里德里希在一八七〇年九月三十日的日记上写道：

“我同陛下谈到正在临近的帝位问题，他认为这完全没有希望，并引用杜布依斯－雷孟特的话为证。他谈帝制已倒，在将来只能有一个普鲁士国王，即德意志公爵。我怀着敬意指出，三个国王强逼我们以皇帝来掌握最高权威，千年的帝位和王位是与现代的帝制无关的，最后他的反对减弱了。”

一月十七日，即国王宣布为德意志皇帝的前一天，弗里德里希写道：

“对于国旗的颜色并未加以考虑，它，如国王所说，并不是由垃圾堆里升起来的，他却只容许国旗与普鲁士的国旗并存。他不希望听到帝国军队的说法，但海军则可使用帝国字样，由此可见，明天他必须与他坚持不放的老普鲁士分手时心情将何等沉重。当我提到家族史，我们怎样由城堡司令升为选候，而后又升为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如何也行使假王职权，而这个职权如此浩大，使帝位现在落到我们身上，这时候他回答说：我的儿子以全副精神应付新情况，而我则对此丝毫没有作为，只是掌握住普鲁士而已。”

国会闭幕后，十二月十一日，李卜克内西和我回莱比锡。十五日，我们在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协会的公开集会上报告国会的辩论经过。参加集会的人非常踊跃，竟成了个民众大会。听中有许多便衣的法国军官，他们被拘留于莱比锡的战俘。集会的经过非常好，它以很大的热情通过一个决议。感谢我们在国会中所持
的态度。还有许多地区表示拥护我們的态度。这次是我们在一段
长时期内所举行的最后一次集会。十七日，我們长久期待的打击
到来了。我早在十二月一日给霍包肯的 F. A. 佐尔格的信里就已
写道；“爱国的”人們对我们无限痛恨，如果他們最近能够抓我们，
那他們确定无疑地会这样做。

我們的被捕

我們在九月七日的《人民国家报》的第一版上报道，据最可靠
方面的消息，我們获悉，由于德意志司令部，特别是俾斯麦伯爵的
坚决要求，萨克森政府决定对我们党采用一切强硬手段。搜查和
逮捕近在眼前。几乎全体新闻界，由自由派的报纸带头，好像奉了
命令似地一齐发表煽动性的社论反过来我們。他們竟可耻到这种程
度，以至控诉我們有把国家出卖给法的罪行。后来十二月间，在
当时出版的半官方的《蔡特莱尔通讯》上，发表了从不伦瑞克委员会
没收到的李卜克内西和我的信件中断章取义地摘出来的词句，
以便为他們的控告我們作辩护。我于是把下列声明寄给柏林的《未
来》报发表:

“我从这里的报纸上看到，在瓦盖纳先生合作之下，靠着傻子
打趣出版的《蔡特莱尔通讯》，为了完成它的密告任务，把在逮捕不
伦瑞克委员会时所查获的李卜克内西和我的信件中断章取义地转载
了。虽然我认为只有由于一个官员违背了就职誓词，《蔡特莱尔通
讯》才能够发表那些断章零句。我却必须表示，希望不是把我們的信
的断章零句，而是全部内容予以发表。

我有理由确信，由于這樣的发表，可以明白无疑地证实，
蔡特莱尔先生及其伙伴断章取义发表的私人函件只能是由一个
丧尽天良的官员暗授给他們的，他們所以这样发表，是因为想使他
们的阴险勾当在信赖的群众中起更大的作用。
我对这种行为并不觉得奇怪。半官方报界的狐群狗党所做的正是本性和官方命令他们做的事情。

莱比锡，一八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奥·倍倍尔。”

十二月十七日早晨，我正在作坊里做活，我妻忽然面无人色地冲进来告诉我，一个警官在楼上我们住房里要找我谈话。我知道原因在那。我急忙由后面的楼梯跑了上去，在我的卧室里遇到一个我认识的警官，不过还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兵士。当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时，我妻回答说，这人是刚才来此住宿的。警官接着通知我，他奉命来查封我的文件。事情发生得很快，但我已被文件清除了。警官又通知我，他还奉命逮捕我。我赶快换好衣服，同妻子和小孩告别并且安慰他们说，我不久就会回来的，乘上马在门前的一辆木车，先到警察局，由那里再到地方法院。在这里的地方法院监狱里指给我一个囚室。我不起诉，在狱吏照老规矩把门上的一把大锁和两根铁门插上以后，我愤怒欲狂，在小房里跑来跑去，咒骂我的敌人，但有什么用呢？聪明人能让步。次日早晨（星期天），检察官和作为地方监狱总监的地方法院院长走进来，问我有无什么要求。我请求准许给我这些书来和夜晚到十时熄灯。院长对于二者都答应了，但灯亮到八时。检察官告诉我，要检查我的被拘留的敌军和叛逆重罪的全部鼓动活动。检查将持续很久，因为我必须向外地调查。明天我将第一次在预审官前受审。我异常紧张。法官是高等法院参议阿乃尔。当我被引到他面前时，他面孔严厉，非常矜持地对待我。我现在才知道，我和一同被捕的李卜克内西和赫蕾纳被控的是图谋和准备叛国罪。李卜克内西与我一同被捕，我认为是当然的事，但倒霉的赫蕾纳，他不久之前才担任《人民国家报》的第二编辑，也应被捕吗？他与初生婴儿同样无罪。法官又告诉我，因为检查材料的主要部分还在不伦瑞克，所以他还不
能继续进行检查，这使我大为吃惊和觉醒。不过，他希望材料在新年前还可以到达，那时他将竭力进行工作。那末，严格说来，我们被捕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因为法官和检察官都不知道作为我们被控根据的起诉材料。所以显然是司令部想尽快使我们不能为害而决定逮捕我们的。

回到囚舍时，我非常愤怒。我现在有充分时间先研究这间小屋子了。囚舍里空有空间，因为它差不多是空的。在门侧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个大的带盖木桶，关于它的用途我不必言说。靠一面墙放着一个小书架，上面有一把水壶和一本赞美诗和新约全书。在另一面墙上装着一条几呎长的窄板凳，不能移动，在它前面，算是特别优待，放了一张小桌，那么小，我若在上面展开一卷《凉亭》杂志，就把桌面全遮住了；没有床，夜晚铺在地上的垫褥，次晨搬在走廊上的一大堆垫褥上。窗子上牢牢钉着铁栏，只有爬上小桌才能及得窗子，窗前下面，日夜有一种奇怪的响声。我爬上窗子一看，原来下面庭园里放着六个烘咖啡的大机器，在为战场上的军队大量烘制咖啡。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冬季也许是我们的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严寒天气。战场上的可怜虫——无论德意志人或法兰西人——遭到可怕的寒冷和冰雪。坏天气开始既早而结束又晚。就是在我的囚舍里也是酷寒难忍。这个古老时代的老铁炉，每天早晨五点钟用一把煤生起火来，也不会发出特别热度。况且我也需要新鲜空气。因此，我早晨一开窗子盖板，那一点点温暖立时消失干净。我冻得非常之惨。我为取暖，坐在小桌上把脚伸到长凳上，用我那件做盖被的白毛毯把两腿裹起来。虽然如此，我还是得了肺病炎。不幸，我的囚舍还是朝北的。李卜克内西在我们中间年纪最大，他们让他一间当时为了所谓交换俘虏所准备的房屋。这是我妻来探望我时告诉我的，她每星期可以当着法官的面同我作一次短时间的谈话。我也被准许在法官监察之下与她通信。
但是不久，我很不愉快地发现，我不是独自住在这囚舍里；这里聚居着许多虫子。现在，我颇有时间来狩猎，而且收获比毛奇所希望的克莱勃兔子还多。白毛毯成为陷阱。不久我的猎获达到了最高纪录。有一天我杀死了，女读者请不要害怕，八十一个人们叫做跳蚤的褐色小虫。我渐渐把小屋肃清了，也没有用杀虫药粉，我妻曾应我的要求而送给我两次这种药粉，但都未收到，因为看守者自己也需用。我也做到了把垫褥留在小屋里，以前垫褥总是每晚爬满了跳蚤后又拿进屋来。我刚把我的“家”弄干净，就按照医生的指示迁移到西边去了。我现在迁进去的囚舍，据我的看守人亲切地告诉我，原先是个杀死婴儿的女囚犯所住的。现在我必须重新从事于清除工作。

像我们这样的拘押待审是各种监禁中最难堪的。被关在严格单人的囚舍里，不知道要关多久，也不知道当前有什么控诉材料，令人非常焦急和精神错乱。一月初，我终于又被带到法官面前。我进法官的房间，就看到窗前的座位上放着一大捆蓝色的文件。那是我写给党委委员会的信件，党委会把这些信同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特别小心和热爱地保存在一起。如果我此刻把党的秘密秘书彭好斯特抓在手里，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来。然而我马上又觉得我没有理由因这些信件被没收而发怒。法官告诉我，前两天他才收到控诉材料，但他决意尽可能赶快加以审查。他履行了他的诺言。每来一次新的审讯，法官的态度就和蔼些。我们的信件当然是他所审阅的第一批材料。因为这些信件几乎全是十分亲密性质的，所以那里面我们不仅互相提到党的困难，而且也谈到大大小小的私人困苦，由此可见，我们没有一个处境良好。审官一定会意外地发现我们不是叛国和弑君的犯人，而是抱着最好的意图和满腔热血的人。二月底，法官把那数量极大的材料（单是信件就约有二千封）审查完毕，检查工作也告结束。我们后来由我们
的律师奥托·夫赖塔格那里得知法官是一个极有才华有良心的人，他获得的信念是，我们不但不能被判处为企图叛国，而且不能被判处为准备叛国。因此，他建议释放我们，但是检察官不同意。

一九八一年二月底，奥地利的内阁霍亨瓦特一沙夫泰伯府执政，实行大赦，释放了维也纳的叛国犯奥伯温德、安·邵鸟、摩斯特等。一天晚上在审讯时，法官一声不响地把《莱比锡日报》放在我的面前，上面登载着关于大赦的电报。我不禁说道，这样的好事到不了我们身上，我的看法得到证实。我之所以确信我们会被判罪，并不是因为我自觉有罪，而是因为我对你们的攻击，甚至在我们拘押期间还在对我们继续进行，使我对于陪审员的情绪不能信任。此外，我也认为，政府要集中全力来设法判我们的罪。否则，这个案件就成了它一件丢脸的事。我甚至在一封由我妻转交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们大概还要在牢里蹲两年。我妻把我的这种看法告诉了李卜克内西夫人，她大吃一惊。但是我的预言又应验了。

* * *

我们被捕后，莱比锡的同人写信给当时的《克里米亚市民和农民之友》报的编辑卡尔·希尔施到莱比锡来，要他接任《人民国家报》的编辑。卡尔·希尔施情愿帮忙，像他这样在最困难的期间编辑报刊是应受到党的感谢的。他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二〇二期《人民国家报》上宣布他依照我们的愿望接任编辑，并且接着说道：

“对我们的朋友所进行的检查，我希望，历时不会很久，并且我确信，将得出他们无罪的结果。目前我将拿我们的朋友一向领导《人民国家报》所持的高尚、勇敢、不是‘叛国’反而是真正爱国的态度，当作我编辑时的榜样。

报纸的倾向和出版都无所改变，敌人方面所抱的希望，即我们的机关报所受的打击将使党缄口结舌，被毁灭了。”

希尔施刚刚参加《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比得曼教授就开始
在《德意志总汇报》上对他进行攻讦。《蔡特莱尔通讯》报怀着同样的意图，像它故意寻章摘句地发表我们的信件那样，来对付在不伦瑞克所查获的希尔施的信件。希尔施有力地摆脱攻讦者。此外，希尔施把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棒树之战》转载在一八七一年一月一日《人民国家报》的报头上作为答复。

一月间，宣布国会议员选举将于三月三日举行。在一次党的全国集会上又在我们所的老选区提出我们的名字。莱比锡的拉萨尔派同我们的同志一致推我为候选人。我通知委员会说，为了使财力和人力能集中在富有希望的选区，我不能接受莱比锡的候选，但该会坚持这样做。资产阶级集团的人民捐款来阻止李卜克内西和我当选。在我的选区（格劳乔—美拉内—荷亭斯坦）, 敌人一致以舒尔采—德里奇来同我竞选。舒尔采接受竞选，但拒绝举行选民大会，因为我是无法举行这类大会的；也许是因为这样对他不利。一月底，德累斯顿的党临时委员会辞职，为了集中力量，汉堡的监察委员会指示，以莱比锡为临时委员会所在地。财力当然十分拮据。如今的同志想不到当时用何少的钱来进行选举。任何地方的选举费差不多都不超过五百到六百马克。

选举进行得不顺利，它在不断的钟声和炮声中举行，因为三月三日临时和约在凡尔赛签字。仅有的胜利者是施拉普斯和我在第十七和第十八萨克森选区当选。我以七千三百四十四票对四千六百七十九票战胜舒尔采—德里奇。施拉普斯严格来说已不属于党，并且应当推举尤利乌斯·.dev. 莫特勒来代替他，他以五千八百七十五票对五千七百零六票获胜。李卜克内西在第十九萨克森选区以三千九百一十票对五千一百三十四票失败。斯皮尔在米特维达—弗兰肯堡经过复选，但以四千零十七票对五千四百三十票为比得曼教授所败。在莱比锡市我得了二千五百七十六票，我的对手市市长斯台法尼博士则获得七千三百一十二票。这个结果还算
是很顺利，一八六七年秋季，我们只得到九百票。在莱比锡乡区被提名的是约翰·雅可比，他以二千八百七十七票对五千七百一十八票为对方所败。白拉克是开姆尼茨和第二十二萨克森选区的候选人，得了二千九百七十七票和三千四百七十七票。我们在萨克森为我们的人共搜集了三万九千多票。在许多选区，例如比莱菲尔特，我们的党员同志支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候选人（普凡古赫），在中德意志和南德意志各地，他们几乎全不想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全德工人联合会总共为其候选人搜集了六万三千票。

由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参加选举的人不多，到处都不见对于新帝国的热情。贸易和运输业的沉重负担，失业、战争的一切后果，再加上也使群众受重大牺牲的又长又冷的严冬，造成非常消沉的情调。

我一接到我当选的正式通知，就由监狱里把下列感谢信送给我的选举委员会发表：

“选举我的人们！同志们！你们又辉煌地表示对我的信任，你们这是第三次选举我做第十七选区的国会代表了。

虽然我不能到你们中间来说明我对于新形势的立场，可是你们仍对我保持着信任。你们也没有被敌人在竞选时所使用的激烈而卑鄙的斗争方式所迷惑。

这个，再加以失败的敌人可算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有名望的大人物这个事实，使这次选举对于我加倍光荣。请接受我为此表示的最热烈和最衷心的感谢和我将尽力做去不辜负你们的信任的诺言。

社会民主党万岁！这是我们迎接新斗争的口号。

莱比锡，地方法院监狱，一八七一年三月十三日。

此致
社会民主党的敬礼

你们的奥·倍倍尔。”

173
我一生中常常幸运地受到歌咏，不论是好意的或者是恶意的。在现在刚过去的竟选中，诗歌也起了些作用，虽然这作用还是有疑问的。荷亨斯坦市长就这样发表了下列当然是匿名的一首诗。

拿破仑和倍倍尔
一个坐在威廉斯赫埃①，
一个蹲在地方法院。
一个痛风在脚趾，
另一个却痛风在头脑里。

在《美拉内周刊》上有另一篇匿名作品嘲笑我說，

“威廉斯赫埃人给倍倍尔的信
亲爱的倍倍尔！

让我们谈句合理的话！您瞧，我是个老手，您当前要做的事，我都已经做过了。唉，倍倍尔，如果《纽约论坛报》那个贪睡汉最近又给我一点希望——我担心，我却很担心，我将一无所成。我没有力量再从头开始。

但是您，倍倍尔，毫无疑问，您是有前途的。您还年轻，具有令人爱怜的仪表、好胃口、大胆量、令人生畏的言谈和慷慨的性情。再加上妇人的宠爱和教会的友谊，这样就有了一个年轻人飞黄腾达所需要的一切性质了。

现在，倍倍尔，我想告诉您一句关于共和国的要紧话。如果由自己来做大总统，那末共和国就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如果不是这样，那共和国也就与一切其他国家形式，包括教皇制在内，同样有缺点。至于如何能当上总统，倍倍尔，我要向您密谈。不过，我马上可以十分公开地对您说，由总统到皇帝只差一步。”云云。

在莱比锡，就是在我们被押期间，对我们个人的嘲笑也还在继

① 威廉斯赫埃（加塞尔附近）是普鲁士国王的城堡，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被普鲁士人俘虏后，曾在因于此。——译者
续进行，这在文化史上有几分趣味。在一个杂剧场上演了一出名为“内簿尔和皮卜克内西”的滑稽戏；在市区的另一个较大的酒馆里演出一出名为“倍倍尔或者开明鞋匠及其徒弟”的滑稽戏。“爱国主义分子”就用这种方式来发泄他们对我们的愤怒。

一部分自由主义的报刊对于我们的当选极为愤怒，因而鼓动说，国会开会时应表示反对把我由待审拘押中释放出来。《马格德堡报》也为莱比锡这种思想所鼓舞。我们的律师奥托·夫顿塔格为此发表声明说，认为我们被控叛国或图谋叛国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我们被控由于我们的鼓动而犯了图谋叛国的罪行。李卜克内西和我在战术问题上的态度绝没有起一点附和作用。如果，检察官和法官反对释放，那也是无耻的谎言。相反地，法官曾对他讲，检查完毕后，就毫无顾虑地实行释放。检察官对于开释也没有顾虑。

三月二十七日，施拉普斯在进步党的支持下，在国会中提出释放我的建议。与此相反，议员斯台法尼博士（莱比锡）和比得曼教授建议，向首相请示办法。他们在盲目的憎恨中，竟毫不觉得他们做法的无聊和卑鄙。三月二十九日，议长打算把这些建议都列入三月三十日会議的議程。对于这，议员施拉普斯在声明会議程序时说，他得到消息，我们已于昨天开释。

事实上也是这样。萨克森政府要避免国会讨论，所以命令把我们释放。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将近四点钟，我的关的锁和门被急急忙忙地打开，看守人进来喊道：我想，您要自由了！当我走出囚室时，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已經站在走廊上。我们一句话不说，三个人就互相拥抱起来。我们自从十二月十五日那个不祥的会議以后从未晤面。我们被引到法官面前，他宣布释放我們，但我们必须保证，决不企图逃亡，并说不得他的同意决不越出萊比锡市区一步。我們把杂物收拾在一起以备来取以后，急忙各自回家来一个欢乐的团聚。我的小女孩欢呼一声，抱住了我的脖子。
两天后，三月三十日，不伦瑞克委员会也被释放。沃尔芬比台尔的高等法院拒绝了所提起的叛逆和卖国的控诉。不伦瑞克委员会被禁闭二百天，我们一百零一天。乐观者认为，现在对我们提起的叛国公诉也要放弃了。

一八七一年秋季，不伦瑞克委员会以犯了许多刑法条款的罪名被不伦瑞克地方法院判处监禁：白拉克和彭好斯特各十六个月，斯皮尔十四个月，曲恩五个月。沃尔芬比台尔的高等法院在撤销申诉时取消了第一审的判决，而另以他们违反结社法的罪名判处：白拉克和彭好斯特各三个月，斯皮尔两个月的徒刑，曲恩是六星期拘留。待审拘留就算服刑了。

我以后的国会活动，莱比锡叛国案及其他

德意志国会的第一次会議

一八七一年四月二日，我为行使我们所被赋与的全权前往柏林。国会这一次是三月二十三日特别隆重地由皇帝在全体德意志诸侯和自由市的代表陪同下开幕，在端侯府广场附近的普鲁士议会大厦开会。

我首先往访我从前寓所的女主人，打听一下我可否仍在那里居住。她表示非常抱歉，不可以接待我住宿。当十二月间李卜克内西和我走了以后，警察来到她那里，为了她给我们的住处而大大加申斥。在那次会期中秘密警察寸步不离地跟随着我们，好像我们是犯人。波兰人的遭遇也向我们一样。政治警察一旦对政权敌人进行迫害，其特性就是无聊和可恨，总而言之是卑鄙。这个我们后来在德累斯顿充任萨克森的邦议会议员时也领教过了。
当我走进国会时，左翼的座位已满，只有最右边有空位。尽管我不大喜欢与最右翼的那些可敬的先生们做邻居，我还是坐在那里。但是，他们了解我的不幸，并没有使我因为有如扫罗置身于众先知之间而难为情。虽然我对这位邻居也确实使他们不舒服，他们的举动却十分像绅士。每当左翼反对右翼，我在最右边起而同情左翼时，常常惹得全院哄堂大笑。我是许多假面具中唯一有情感的心胸。

帝国宪法在作了必要的编辑上的修改以后，现在也得到了德意志国会的核准，关于宪法的总辩论已成为文化斗争的辩论。一八七〇年在罗摩梵蒂冈的主教会议上教皇永无谬误的宣言唤醒了这些才子，尤其是自由主义者急欲借着文化斗争这面响亮的鼓（文化斗争这个名称是议员维尔特教授创造的），使人忘记他们所牺牲的公民自由。天主教的政党在温德荷斯特和马林克罗特领导下组成中央党。在文化斗争的战士中奇菲尔（巴登）特别突出，他担任着高级法官的职务。我在四月三日发言时，表示对于辩论所采取的宗教性质深感诧异。我说，看来在新德意志国家中宗教辩论挤掉了其他一切。一个像我这样已与宗教信条断绝关系的人，在这种到现在为止我所出席的两次会议中，除去宗教几乎听不到别的东西，而仍要继续听取这种讨论，是需要一定的克制功夫的。（大笑。）

我于是攻击民族自由党人，因为他们发言人的冯·特赖奇克教授曾声称，要求宪法的基本人权，那是属于政治童年的事。我同意他的说法，如果人们在一八四九年要求普鲁士国王接受包含有全部出版自由，全部结社与集会自由，教会与国家分离，保证个人自由和其他好事的宪法，那才真是政治的儿戏。向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人要求这些东西，诚然是幼稚。我然后批评自由党人，他们宁愿放弃一切自由，而不顾同一个被认为革命的政党来往。同时我希望，在十九世纪终了之前我们能实现我们的一切要求。（巨大骚
动。）如这个期间所指出的，这种看法未免很乐观了。

米凯尔继我之后发言，他认为我的党暂时还无危险，他将不同我辩论。但是对那些在他以前发言的先生们（中央党）却不然，他对他们大放雷雹。会议结束时我针对米凯尔作了个人发言。他对我的党有点蔑视的表示。我对这并不以为怪，但是我却愿指明，议员米凯尔（诚然有一个他既不是银行经理也不是市长的时期）曾隶属于他现今所攻击的党，即属于共产党。这个揭露使会议大为惊愕。米凯尔沉默。会后有许多议员到我这里来打听所提出的指责的真实程度！议员米凯尔从那时起对我相当尊敬了。

宪法改革刚过去，舒尔采—德里奇及其伙伴就来了，建议修改宪法的第三十二章，目的在于实行议员日俸。在讨论宪法时，虽则那是提出这个建议的适当时机，但并未把它提出。我在有关的一次发言中说，只因对社会民主党的恐惧，使那些先生们不敢在国会中实行在其他一切代议制团体中已经实行的日俸。俾斯麦嘲笑建议人。他不愿完全确定，实行日俸后会议的组成是否还是这样。但是他不想作这个尝试，当他怀念起这逗人喜爱的会议而无可奈何时，那他就太痛苦了。（大笑。）无日俸的参议院常欲缩短会期，有日俸的众议院则情况与之相反。

四月二十四日的议程上列有进一步筹款来支付战争所引起的特别费用一案。法国国民议会固然在二月二十六日同意了临时和约，但军费赔偿问题还未确定。在法国的德国大军还需要款项。俾斯麦首先发言，劝证提案的必要性。直到现在法国还不能履行其付款义务。诚然可以干涉法国内部事情，但是还不想这样做，因此希望给法国些时间，由它自行安排。我在俾斯麦之后发言，指出他的解释表明了，他同他的政策已陷于困境。然后我再次陈述我们对于战争问题的立场。如果不坚持吞并土地，则数月前和约即可结成。我们就可以免于损失无数的人员和金钱，德国的处境也将
比现在好多了。那时二十亿的价值要超过现在的五十亿。此外，法国的任何政府，不管它是什么名称，决不会忘记阿尔萨斯—洛林的丧失。在寻找同盟，俄国将来在这个问题上会改变态度。首相要愚弄俄国，是否能像他愚弄拿破仑那样成功，我很怀疑。（哄堂大笑。）可以断言，我们将来的军事预算一定远高于放弃吞并而与法国作合理的协议的预算。首相在德国的政策同拿破仑在法国的政策一样，是被资产阶级支持的。只有双方的工人拥护和平。人们现在又可以看到，巴黎公社受了那么多的攻击和蔑视，而处事却极有节制。（持久的大笑。）巴黎公社是从三月十八日在巴黎宣布成立的。我并不完全同意巴黎公社所采取的一切办法，但比如它对待大金融家有节制的态度，或许我们可以用在类似的情况下就难以应用。（笑声。）冯・卡尔多尔夫先生针对着我发言，要证明全德意志不掠夺领土就不合乎，我用激烈的辩驳否认这种意见。

在这次国会会议也讨论了关于伤害赔偿责任的法律草案（雇主责任法草案）。我在第三读时发言并且强调指出，工界人士对于这个法律所抱的希望，曾一度被政府的法律草案打消，后来更被国会的决定打消了。我详细论证了这一点。我特别尖锐地批评了拉斯克尔加到草案中的第四条，根据这条，由保险机关，矿工协会基金，救济基金，医病基金，或类似的基金所支付的全部金额，如果企业主支付至少三分之一的保险费，就将统计算入赔偿总额里面。企业主既从工人的劳动中得利，自应对工人所受的意外伤害单独负起全部赔偿的责任。

最后我要求，在确定赔偿时，由当事人双方聘请专家以陪审团的形式参与，而且雇主与工人的人数要相等。因此，像现在这个草案，我不能赞同。

因为我单独一个人在国会中（施拉普斯严格地说是不能算数的），所以为了出席会议，就不如往常更加频繁地来柏林。可
是现在我的生意也迫切需要我亲临。这种双重地位使我异常苦恼，
这在五月十日给我妻的一封信中表现出来，我写道：

“这里的事务是不可言状地讨厌，我的处境因而极不舒服。
我的地位和我必须而且愿意亲临生意场所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
是产生你和别在我身上所察觉到的恶劣情绪的原因。”

那些当时为我在国会中的活动而欢呼的人们，想不到我的
情绪如何。

五月二十五日我又必须开火了。议程上列着关于阿尔萨斯－
洛林与帝国合并的法律草案；同时还要把阿尔萨斯－洛林的专
制制度维持到一八七三年一月一日再撤。我又追述一下战争的过
程和普鲁士国王所作关于战争是防御战争的保证。妥协领土是和
这个保证不相容的。妥协领土只意味着扩张霍亨索伦家族的权力。
阿尔萨斯－洛林只会按照皇帝的意思来治理。至于专制意味着什
么，我们在这里被吞并后的期间，如我所举例证明的，已经尝到
了。人们在这里谈到了法国的省长制度，据说阿尔萨斯－洛林将
从这个制度中解放出来，但是普鲁士的行政区长官制度丝毫不比
它好，反而比它更坏。不久以前，索林根有一个人当选为市长而未
被批准，原因是他作为官员竟连公文摘由都搞不好。（大笑。）首相
最近在一次我所没有参加的会议上谈到，必须把普鲁士的城市自
由给与阿尔萨斯－洛林。是啊，他甚至还说，巴黎公社的努力基本
上将达到在巴黎实施普鲁士城市规则的结果。但是为此斗争，却
不值得，因为这不值一粒子弹的代价。如果首相说的对，我却无法
了解，他何以能够接受五月十日在法兰克福双方所同意的和约里
的规定，即把被俘军队供给法国政府来推翻巴黎公社。他还在同
一和约里规定，在巴黎公社垮台后三十天，法国应支付第一期的五
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可是他却以如何奇怪的方式对待这些在巴黎
争取普鲁士城市规则的战士。但是，如果德国方面这样对公社作
斗争, 那么, 我这方方面面地声明, 无欧洲的无产阶级却是满怀热望地
仰望着巴黎。巴黎的斗争只是个小小的前哨战, 过不了几十年, 巴
黎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 “对宫殿作战, 对茅屋和平, 消灭困苦与懒
惰”, 就会成为全欧洲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我结束发言时说出我
的希望, 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应了解他们的自由使命, 占同我们
一起在德国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 借使欧洲人民终于有一天获得
完全自治权。但是这只有在欧洲各族人民认识到共和国体是它们
的奋斗目标时, 才能达到目的。(骚动。)

一八七八年秋天, 在反社会党人法的讨论会上, 俾斯麦侯爵
说, 就是我的这一篇演说使他眼见社会主义的危险性。但是关于
这个, 在我作这个发言的那一天, 一点也觉察不出来。俾斯麦侯爵
接着我讲活, 开始时说: 您们不要害怕, 以为我是来答复上一位
发言人的; 您们大家和我有共同的感觉, 他的发言在这个会场上是
无需答复的。(同意。) 这就是他对我所言的一切。就是随后的一
些发言人也对我十分宽大, 几乎全没有提到我。因此, 在外面新闻
界中, 对我攻击得更加激烈。于是李卜克内西在《人民国家报》上
断然声明说: “俾特尔所言的东西, 是他所必须说的; 为巴黎公社辩
护是他的责任!” 在对我的怒气中間, 《柏林交易所报》上刊出一篇
以完全不同的很不伤人的声調說的星期日闲話。这显然是当时任
《柏林黄蜂》报编辑的斯台登海姆写的。我在“柏林新闻界”协会中
認識他, 我曾应罗伯特・施维舍尔的邀请往那里去过几次。这协
会也就是斯台登海姆在那篇闲话中说的那个协会。其中与我有
关的部分是:

“柏林是安静的!

人们有时听到的枪声, 并不意味着处决叛徒, 而是台盖尔区进
行炮兵演习的声音, 遮天的烟雾, 不是火烧皇宫的浓烟, 而是由我
们可爱城市的各个领上升起的, 把鸽子、麻雀和其他鸟类从空气里
消除出去的各种灰尘的集结。

我們极其匆忙地把这个得自最可靠方面的消息发表出来，借以安慰柏林很多人的恐惧情绪……

……在《十字報》上竟钻出来一位八个月男孩子的母親，她要求柏林所有的母親起来请求皇帝为了防止一个像巴黎那样的刑庭，让人把柏林所有一切能够危害我們儿童的道德的机关、建筑、繪画、书籍等等全都加以破坏和毁灭……

……倍倍尔的演詞起了这样的作用！

我們认为我們有責任，来平息由一位八个月男孩子的母親投向《十字報》广告栏的幻想所激起的浪潮。

倍倍尔的演詞誠然有点激烈。它与普通的宴会讲话有所不同，它的恫吓和观点使胆小的人战战兢兢。‘对宫殿作战！’听起来是有些不平常。大家知道，听到这样一个号召，特別使没有宫殿而租屋居住的人感到烦躁。柏林住在宫殿的人惯于信赖他的看門人，遇有可疑的人来访，他就与他扭打，直到警察前来把歹人带往岗亭为止。

倍倍尔高呼：对宫殿作战！他誠然又加上一句：对茅屋和平！但這还不能安慰一位有八个男孩子的母親的流血的心……对茅屋和平！这是什么意思？

最重要的是，茅屋已經完全沒有了。人們只建筑三四层的楼房。在柏林哪里有茅屋？茅屋和平已没有多大用处，而且倍倍尔可以許下这种和平，就像他可以对所有穿草鞋的許下免税一样。免税固然不坏，但是今天誰还穿草鞋呢？

中午倍倍尔作了他那个火矩报告，晚上我們又在一个协会中遇见他。

这个协会并不搞政治，而是搞其他蠢事的。人們用闲談和啤酒来消磨时光。
人們想像一个鲜红头发、雄赳赳鼻子的大力士——但这不是倍倍尔！

倍倍尔是个仪表秀丽的人，从漂亮面孔上，一双必已获得了许多妇女心的眼睛炯炯发光。但倍倍尔不是个登徒子。他诚实，甚至拘谨，绝不风流，主要是谦虚。我們曾发现，他把火柴匣推得远远的，显然他讨厌硫磺气。

現在我們問每个母亲——并非每个有八个男孩子的母亲——，我們問柏林的每个单身汉、已訂婚的、做父亲的、做祖父的，人們根据倍倍尔的言論把他当作烧毁德意志的房屋和建筑物的魔王，看来他的外貌与他的言論一样吗？我們敬倍倍尔一支雪茄烟。

我不会吸烟！倍倍尔文雅地辧說。

我們还應該引用点什么来安慰首都居民呢？倍倍尔不吸烟。倍倍尔连一支雪茄烟都不点——他会放火烧宫殿嗎？

可惜我們忘记问问他，他在晚上点的是油类还是煤气。我們确信，倍倍尔家中沒有煤气。那么，这样一个人会——？

不会！倍倍尔的灵魂中沒有煤油！

我們还过多把他糾纏在关于他絕不全知道的柏林宫殿和同类建筑物的談話里，我們为了慎重起見指出，柏林宫殿实在不多，所以完全不值得对它作战。倍倍尔显然沒有想到，我們会对他的言語这样说，‘对宫殿作战’这句话无疑地他只是脱口说出。‘至于柏林的茅屋’，我們繼續說，‘首先要提到碎冰装置，其他一切茅屋都不及这个很不美的建筑物。即使这个碎冰装置消灭了，柏林也不至于惊慌失措。’倍倍尔恭恭敬敬地听着，但他很难了解我們的暗示，我們是說，‘对茅屋作战’到最后仅只限于一个比任何其他破坏都更受我們欢迎的破坏，这他似乎也认为我們是正确的，因为他和其他任何世人一样不喜爱碎冰装置。
于是我们就这样把倍倍尔和他的言论分开了。在我们的国会里所谈论的东西，有许多阅读起来要比单字付诸实施好些或可怕些。请您敬仰的读者回忆一下齐格勒议员的惊人语：‘文化部长必须革职!’ 首先生就坐在一旁，耸了耸肩膀。他今天仍然端坐在‘席位上’。

倍倍尔是宫殿问题上的齐格勒!
齐格勒是文化部长问题上的倍倍尔!”

这里我所引的有关巴黎公社的言论，将为大部分读者所不了解。其中一部分人根本不知道巴黎公社是什么东西，另一部分因读过了反对公社的东西而有成见，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人知道巴黎公社的历史。但是我们对它的态度，在斗争中，特别是在七十和八十年代的竞争中是很重要的。甚至在九十年代，我还须在国会中为我们在国会的态度作辩护。

1876年3月，我在莱比锡同莱比锡民族自由党的主要鼓动者布伦诺·斯巴利希有一次大辩论，在辩论中我重提相当的章句，并把当时我关于巴黎公社的言论付印。

* * *

国会在一八七七年五月将终时闭幕。回家后结识了约翰·莫斯特，他在大赦后被驱出奥地利而来到莱比锡的。他被释后，他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是人所熟知的。他的父亲，我若没有弄错，是奥格斯堡的教义慈善团体的职员。这位父亲曾企图使儿子改“邪”归正。

莫斯特在一八七一年一月十三日给父亲的复信中说：

“我向您保证，如果您给我一个月薪一千古尔盾的位置，而要我为一个同我思想敌对的政党服务，另一方面，如果我的党内同志只拿给我干面包，我将不加思索地伸手要干面包。”

这封信表现了莫斯特性格的优点。他所写的是他的真诚信
念，因为他的天性原来是很好的。如果说他后来在反社会党人非
常法之下越来越走入歧途，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和直接行动的代表，
这个一贯刻苦节欲的模范人物，最后竟在美国落得醉鬼的下场，这
个恶劣的发展应归咎于把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逐出境外的反社会
党人非法。如果莫斯特能留在那些懂得如何领导他和如何控制
他的热情的人物影响之下，则党就能保住这个最热诚、最乐于牺牲
和永不疲倦的战士。他后来自己创办的《自由报》（起初在伦敦，
以后在纽约出版）的编辑，常常对我猛烈攻击。他对付伊格纳茨·
奥艾尔和李卜克内西比对我更为凶狠。虽然如此，我对于这样一个
任赋独厚而竟堕落得如此悲惨的人，深感遗憾。

莫斯特到莱比锡几天后又被驱逐出境。他去到开姆尼茨，在
那里担任《开姆尼茨自由报》的编辑，并领导一八七一年仲夏所发
生的五金工人大罢工。

*

党不久就从战争时期的影响下恢复过来。现在开始的辉煌的
工业繁荣时期有利于这种运动。德意志问题达到了一个结束，它
虽然不能使我们满意，一时却也没有更改的希望，它消除了迄今
争执不休的工人党派间的各种分歧之点。战壕更加明显和简单化
了。爱森纳赫党（这是我们党的简称）不久就出版了一批党的机关
报。除了克里米亚和开姆尼茨的报刊以外，在不伦瑞克也由不知
疲倦和一贯不怕牺牲的白拉克创办了《人民之友》并设立了一个自
己的印刷所。此外在汉堡一阿尔托那、德累斯顿、纽约、伦敦、kea
来在慕尼黑和美因茨也是如此。相反地，奥格斯堡的《无产者》报
在六月中旬停刊了。

第一次德意志义工会议

德法战争后开始的繁荣时期，鼓舞着工界人士创立新的和扩
充旧有的工会組織。在特别受压迫的織工群众中也感觉到同样的需要。我的选区发起了一个德意志織工会会，定于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在格劳紡开会。出席的有受八十五个地方的一百三十四个单位委托来参加会議的代表一百四十七人。代表中也有当时隶属于全德工人联合会，后来当选国会議员的哈尔姆（爱北斐特）；莫特勒有急事事务走了，我代替他作三个问题的报告：
1. 为什么織布业的工资这样低？
2. 如何才能提高？
3. 如何才能得到与目镜环境相称的工资？在演讲中间，我指出，否弃阿尔薩斯一洛林以后，它的高度发展的棉織工业将与德意志的同一工业部门展开有力的竞争，也将毫无疑问地对德国迄今的生产方式（非常普遍的家庭織布业）起一种革命作用。出席旁听的格劳紡商人当时是通过他们的经理人使家庭織布业为其工作，听到这个議論都很摇头。但是当我受长期监禁之后，一八七五年回到我的选区时，各面都证实了我的議論是正确的。我的选区中的城市景象也使我确信我的正确，那些城市的工厂在几年間雨后春笋似地生长起来。我提议和阿尔薩斯一洛林的織工进行联系。我还提出一个議决案，即要求禁止工厂中的童工和以法令实行十小时的标准工作日制，都被一致通过了。此外，还議决要求取消星期天工作，只有两票反对。另一个由我提出的在激烈辯論后也通过了的議案，是有关罢工方面的，其中說道：
“全德織工会會向所有的同业建議，在組織罢工时要特别慎重，如果沒有充分的財力和支持来确实保证胜利，就絕不要举行罢工。”

关于仲裁机构，我提出了以下的議決：
“第一届全德織工会会认为宜組織仲裁机构，由工人和雇主以相等的比数来组成，以便由和平途徑解决有造成罢工之势的分歧。”

186
最后成立一个五人委员会（地点在格劳约），掌握同业的鼓动
和组织事宜，并按期发行载有同业通告的传单。在柏林举行了第
c二个工程师会议，也同样发行一批传单，但是以后这运动又瓦解了。

薩克森的其他事项

一八七一年六月十四日，我们在莱比锡召开民众大会，议案
是：“高额的地方税和市政”。自从一八四八年以来，莱比锡历次参
加大会的人从没有像这次这样踊跃。这真是向大会会場来的“民族
大迁移”，会场虽能容纳五千人左右，却还容不下这次参加者的三分
之一。大会是为了答复莱比锡报界对我们党，特别是对我个人在
国會中的行动的猛烈攻击举行的。我严厉批评了市政机关。我所
提出的议案指責了捐税制度为富人的利益而给平民加上无理的负
担。此外，议案还指责了地方税的主要为有产阶级谋利益的用途，
因为只有通过现有的阶级选举法才可能有这种管理方式，所以要
求实施普遍、平等、不记名和直接的选举法。大会在暴风雨般的掌
声中通过，只有三票反对。自由主义的报界咆哮起来。

现在在萨克森也开始了迫害时期。当希尔施接管《人民国家
报》的编辑部时，瓦尔特希作希尔施的代理人参加《克里米亚市民
和农民之友》报，七月间他以报刊犯了亵渎皇帝罪而被判监禁三个
月。此后不久，卡尔・希尔施也因同样罪名被监禁四个月。

八月三日，检察官宣布李卜克内西、赫普納和我被控图谋叛
国，此外还控诉李卜克内西有亵渎皇帝罪。九月二十七日，法庭决
定接受检察官的建议。十一月十日，我们为这向德累斯顿上诉法
庭所提出的撤消控诉被驳回了。

德累斯頓党代表大会

大会在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举行。出席代表五十
六人，代表七十五个地区的六千二百三十个党员。我担任第一主席，白拉克担任第二主席。演讲富有兴趣，讨论得很热烈。在开幕词中我满意的说，在一个对社会民主党迫害至烈的邦的邦会举行会审时，对会议不会有损害。当时由伯恩施坦主编的《柏林人民报》对党特别仇视，它抱怨莱比锡的预审官没有做他所不能做的事，即禁止我们（李卜克内西、赫普纳和我）出席会议。约尔克作有关法条的报告，他的演讲很好，并提出一个要求冻结标准工作日的报告。他的报告很好，并提出一个要求冻结标准工作日最多不能超过十小时的议案。我作关于议定会选举和区选举实施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选举法的报告。白拉克作关于新的雇主责任制的报告。他提出一个议案，国会对以非常令人不满的方式制定法律，就要受到谴责。莫斯待代替临时不能出席的李卜克内西作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态度的报告。讨论这个问题时，引起了激烈的争吵。在场监视的警官上责机关的名义要求我通知演讲人，他应避免任何牵扯到巴黎公社的东西。我拒绝了。这个偶然事件却为莫斯待帮了忙。他的讲话固然短，但因而更为尖锐。他说，有人打算给他套上一个道德的口罩。全世界，甚至中国人也加以审辩的事物，竟有人要禁止我们讨论。加之由于我们的态度，我们不断成为最猛烈攻击和最卑鄙诬蔑的对象。在被各方面这样用粪土沾污我们，用石头打击我们之后，还要禁止我们解释我们的立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警官企图辩明，他的命令只就谈论巴黎公社而言。但我们的所关心之点，正是要说明我们对于巴黎公社的立场。

在莫斯待之后由我发言。我觉得，官厅干涉我们的讨论并设法影响我们的讨论的方式，是与一个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不相称的。（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我不明白，对巴黎公社发表评论是非法的。同时，一切与会者都知道，我们对公社抱什么态度。可惜我们对官厅的措施面前无能为力，我们只能对它抗议。
我提议，因为我们不值得在加到我们身上的限制之下进行讨论，所以报告人不必讲话，我们对当前的议案不加讨论就付表决。时代的悲哀标志是，现在在有关公社的正式文件发表出来并且确定数月以来反对公社的言论是谎言、诽谤、胡说以后（暴风雨般的掌声），仍要禁止我们宣布这种斗争方式的罪状。

莫斯特声明，因为时代已大有进展，他对于我的建议更加同意了。他认为，当他作如下声明大家一定会同意他的，即：如果反动势力在国际上联合起来，那么革命当然也必须在国际上联合起来。（暴风雨般的掌声）他结尾说：

“请看从东方到西方，
火炮熊熊好明亮；
我们坚持忠诚，我们坚持不变，
因为我们旗帜是红的!”

随着他的演说响起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我把决议付表决，决议说：

“代表大会声明，完全同意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去年有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态度。代表大会特别赞成通过《人民国家报》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国际工人协会保持精神上的联系。”

决议一致通过。代表大会然后讨论党的内部事件，临时党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报告，修改党章的建议等等。关于《人民国家报》的报告是，它拥有四千零二十个订阅并负有一千六百七十五塔勒的债务。这里应该注意，在具有最好的党组织的地区创办地方报纸必然是非常有碍于《人民国家报》的销路的。根据这个观点看来，报纸的情况是可喜的。亨利希·邵乌原住在斯图加特，后来被驱逐出符腾堡邦，他严厉斥责我们符腾堡的党员同志同人民党眉来眼去，这是我党在那里国会选举失败的原因，并且总的来说，促进党内的混乱。容斯多夫的党员的一个建议被接受，建议说：“国会
选举时只支持本党的党员并酌量支持其他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候选人。”然后根据麦茨诺和约瑟维茨的建议，以不辩论而在原位起立来表示对巴黎公社的承认。最后讨论怎样能最有效地在乡村劳动者之间进行鼓动和组织的问题。根据我的建议，代表大会决议遵照萨克森只需有限保证即可设立的合作社条例在莱比锡设立一个印刷合作社。常务委员会的地点是汉堡，监察委员会的地点是柏林，下次代表大会地点在美因茨。在向会议办公室和德累斯顿地方委员会致谢以后，这个以极满意的方式进行的代表大会结束了。

在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后不久，又在莱比锡、开姆尼茨等地举行第一次妇女大会，并在开姆尼茨成立第一个妇女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也在柏林向同一方向进行。

德意志国会的第二次会议

会议在一八七一年十月间召开。月底，在议程上列有一八七二年度财政预算案的第一读。当时的财政预算年度是由一月一日开始。议员拉斯克尔和李希特尔都比我先发言。我驳斥了他俩的言论。拉斯克尔议员有一次曾反对我，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不一定是反动的。可是这一点在德国即可证明，哪里的政府是强有力的，国会就软弱无力。国会中的一切决议，凡是不合首相的意思的，不管理由如何充足，都被丢到字纸篓里。李希特尔议员的要求自然也不例外，他要求法国把最后五亿美元赔款付清，就立刻取消盐税。根据和约，这要两年才能实现。但在这期间，首相又要重新拖延谈判，于是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战争（事实上我们在一八七五年就接近面临一个这样的战争）。盐税并没有取消，不仅现在，而且在两年内都没有取消。所希望的减少军事预算也未实现。拉斯克尔议员错误地斥责薛尔议员，说他误认为人民会相信帝国成
立后将减轻军事负担。这种信念确实存在，而它的代表就是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没有这种信念。资本主义日益发展所造成的阶级对立日益加深，已足以阻碍常备军的缩减，关于这一点就是拉斯克尔议员的发言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常备军总可以认为是现有秩序的支柱，是错误的。法国也曾有一支大军，但不能阻止巴黎公社的产生。此外，无产者增加得比常备军快得多，而且随着常备军的增加，军队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也就增加，因为工业的无产者在军队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虽然如此，自由主义者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军队上，凡是为了军队而提出的要求都同意。

十一月八日讨论毕金的建议的第三读，他要求在每个联邦国中必须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议会。这个提案在第二读中通过了。我对此声明说，我今天要同保守党和中央党一起反对这提案，廿四又被说是黑红联盟的危险。以前我们曾表示反对联邦扩大权限，是希望在中、小邦中能活动得较为自由些。这是个错误，例如在斯克森，人们反对我们的作为是难以复加了。因此，如果首相想囊括所有的中、小各邦，我们也不反对，如果不是这样，以后我们还要对付其中一个邦。（笑声。）我所以反对这提案，是因为它内容空虚。新叫做在每个联邦国中必须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议会？由什么选举？大概是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吧？说现今各邦的议会是国民代表议会，就是欺骗。（大笑和巨大骚动。）有人说，首相自从一八六六年以来更加遵守宪法了。这是错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由主义政党更加顺从了。（巨大骚动。）人们制定了一种不能更反动的帝国宪法。（大笑。）这是伪立宪主义，赤裸裸的独裁主义。议长辛森早已冒火来，打断我的话，并且威胁说，如果我不这样讲下去，他就要求要你授权来阻止我继续发言。（热烈的赞成。）根据会章，他对此是毫无权利的。因此，我抗議他的威胁，并继续发言说，如果梅克林堡的宪法也是同样的坏……
一次打断发言。他说他把言论自由的限制放宽了，但是像我这样的演说来反对我们生活所依据的宪法，则超越了一切限度。他又一次以禁止发言来威胁我。我重又抗議，并且引证說，反对派（辛森当时也在内）在普鲁士冲突时期的讲话要比我今天的尖锐得多。議长答复說，那时如何，与他无关，而今天准许讲什么，则由他决定。

我再次抗議。我接着描述伪立宪主义的欺骗性，这样一种宪法有什么价值？我不願在许许多多抵不得书写用纸的价值的德国宪法以外再加上一个新宪法。

議长又激动起来。这种描述是否也指帝国宪法而言？我沒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声明，我对帝国宪法誠然也是如此理解的。（巨大騷动。）于是議长請議会授权给他，来制止我发言。多数贊同了。

在我以后由国会议员的傑姆斯克拉尔議員发言。据他說，我們在国會中和在帝国中享有可想像的最大限度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他说，这一切我们还觉得不够，我們要想用粗野的暴力貫彻一切，而使自己超出法律之外。（我大声打断发言，議长警告我守秩序。）我只是不相信，人們养着四十几万人的军队为的是反抗我的努力。公民们会自己来处理这个问题。他在这里还說，公民们会用棍子打死我們的。后来他在速记本上把这句话划掉了。他又說，德国公民比法国公民还要勇敢得多，說我是一个幻想家，相信我們能够达到目的。

会议结束时我作了个人讲话，指出，議长沒有斥责那說我是个幻想家的侮辱。我相信，拉斯克尔議員比我更是幻想家。我也沒有自夸，說德意志人民站在我們这方面。我知道，我們还是微小的少数，如果人民站在我們这边，拉斯克尔議員和他的朋友就不会坐在会场里了。（大笑。）此外，拉斯克尔議員竟敢對我的党进行诋蔑。至于他关于公社所說的话，我下次再来批駁。維格尔斯議員也駁
斥我，说我在拒绝他们的发言中表示赞成梅克林堡的现状。我回答说，那可能是个误解，他并没有听到我赞成把梅克林堡并给普鲁士，如果这样，倒帮助了他和他的梅克林堡的同党。（笑声。）

次日在进入议程之前，我发言声明。声明说昨天议会应议会的要求，以秩序为借口终止我发言。但是议会本身却因此极其严重地破坏了秩序。我根据议程的条文来证明这一点。议长只能在我明显地召唤两次遵守秩序以后才能阻止我发言。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议长未在召唤遵守秩序就打断了我的发言。他必须清清楚楚对我说：我要您遵守秩序!因为议长没有注意到现行规则，所以议会的决议也是完全不合理的，因而是无效的。

我的抗议使议长感到不安，他明明知道他和议会错了、我。他现在把问题归在一点，即在他喊遵守秩序时是否必须使用“我警告发言者遵守秩序”这个公式。他认为不必，如果我另有看法，他就要把这件事移交议程委员会。

于是我声明，对于议长和议会的措施我必须保持我的意见。根本没有办法，因为仅仅由议长打断我发言，决不能当作呼喊遵守秩序。他可以把问题移交议程委员会。辛森声明准备这样做。

这件事引起很大的震惊，几乎全体新闻界都站在我这方面。议长和国会是错了、我。国会神经过敏，失去了判断事实的能力，只要我一讲话，一家自由主义报纸马上予以发表。《爱北斐特报》在前几天就写道，德意志人民的代表团体尽管有一切优点，却也有缺点，即太不能容忍它血管里点滴异己的血液。人们应该用最严格的法律限制来阻止个别国会议员的叫嚣，但是不应丝毫超越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但是在星期三，这个法律惯例毫无疑问被议长和议会自己破坏了，今天拉斯克尔也是错误的。

后来当十一月八日会议的速记报道提出的时候，我再次在进
入議程之前發言。按那次會議的速記報道，拉斯克爾議員想要說，公正和有產的公民要用自己的力量把他們（我們）打倒。這句話是捏造的；他原來說的是；用棍子把他們打死。他（拉斯克爾）固然是謹防不要拿一根棍子來領導公正的公民；但是就他來說，他的话正是有趣的很，他當着我總是，而且在上述會議上又是裝作禮貌和道德的代表，而且以文明的名義來說話反對我。因為副主席霍亨盧恩-謝林侯爵（后来的首相）打断我的話，不許我繼續講下去，我又同他衝突起來。

隨後拉斯克爾發言，以充滿義憤的演說把我形容成万惡之首，但附加說，他原想使他的話語緩和。我回答說，問題並不在乎他（拉斯克爾）要想說什么，而在于他說了些什么，這無論如何必須記入速記報道中。然后我轉过来反對他又談到公社的話。我為公社辯護，并且指出，現在自由主義的報界本身也不得不把以前罪過於公社的一系列所謂惡行，加以更正。議會又激動起来，有人打断我的發言，並且用最強烈的諷刺句諷笑我，而議長卻連一個字的譴責也沒有。

十一月二十二日，這個偉大的日子是要解決議長和我之間所爭執的問題的一天。議事規程委員會很輕易地完成了它的任務。議長對他們提出的問題是，他在嘗試遵守程序時是否必須說，“我警告發言人遵守程序。”議長原想也使我上這個公式的圈子，他要我在他所提的建議上署署。我拒絕署名。這種問題提法是完全錯誤的，委員會的回答也同樣不對，因為議長本來不必一定按上述格式來叫發言人遵守程序。進步黨黨員克勞茨（柏林）是委員會的報告人。中央黨議員格萊爾（巴爾）首先發言反對委員會那种根本錯誤的态度，並且站在我這方面。继他之后是薩克森的總檢察官馮·施瓦採博士為委員會的決議作辯護。隨後我發言。我毫不留情地批評了委員會的決議。我原沒有主张議長在任情況下必須用
“我警告发表人遵守秩序！”这句话来自某人。他也可以做：“我不得不警告某某某发表人遵守秩序！”并且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决定性的使发表人和发言者知道，发表出遵守秩序的呼吁。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有这样去做。接着我引证一八六六年二月十三日辛森的讲词。他当时说，言论自由会被滥用而且常被滥用，我们中间能够免于这种指责的大概还不多——怎样改变这种情况呢？尼布尔不是说过：凡是不能滥用的东西，就是没用的东西。这句真理吗？辛森在这个演讲中也控诉政府说，政府对一切稍像自由的东西完全不能容忍，有自由的报界，它就不能统治，不能操纵法院的组织，它就不能统治，从而损害司法在国内的威信；不能左右选举，它就不能统治，而选举结果却与人民的信仰相反；它不能用自由的地方来统治；最后，它也不能同一个以第十八条实行言论自由的议会来统治。

我质问，议长如何能使他对我的态度与一八六六年二月十日他的演说相协调。俾斯麦有一次曾说，必须通过议会制度来弄死议会制度。”议会以它对我的态度很好地证实了这句话。继我之后是外交家温德荷斯特发言，他所说的是他那出名的在鸡蛋中间跳舞的一套。议事规程据说是不够清楚的；最后他提议把提案交还委员会把有关的条文加以修订。他说道：“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辛孙，也不赞成或反对倍倍尔。”还有进步党的发言人霍维尔贝克男爵和弗兰茨·邓克尔也是不热不冷的。董克尔赞成温德荷斯特的建议，霍维尔贝克则相反；他被认为除了掷石块打我以外，别无更好办法；温德荷斯特的建议最后通过了。老齐格勒对于国会特别是对于他的演讲的这一幕戏非常愤怒。决议刚一通过，齐格勒就气得发抖地走向我的座位来，说道：“您听着，倍倍尔，我们全都是混蛋……您如果取得大权，您就把我们全吊死在街灯架上！”我带笑答应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奉行他的亲切的建议。辛孙认
为议会的这次决議等于投下信任票。他辞职, 自然又当选了。

这个事件以及我在最近三次会议中的态度使我在工人和民主的资产阶级中的声望大增。当时还有拥护民主的资产阶级分子。例如在柏林就有相当多的以约翰·雅可比为首的富裕资产者同情我们。他们团结在基多·威斯的周围。威斯是主要由他领导的《未来》报的主编。这个报是一个民主主义的大报，一八六七年由豪富的雅可比派（这是我们对雅可比的特别信徒的称呼）创办的。但因费用过大，不得不在一八七一年春季停刊。属于这一派的还有大染厂的创始人 W·斯宾德勒的儿子威廉·斯宾德勒、范·德·赖根、G·弗里特兰德博士、毛尔顿·赛维、迈尔施太因博士、包斯、斯台法尼博士（后来充当《福斯报》主编）等。还有我通过罗伯特·施维舍尔认识的当时还很年轻的弗兰茨·梅林，也属于这班人。李卜克内西和我星期天如果住在柏林，就照例在一一家酒店里会到许多上述的人们，其中也常见的有保尔·辛格尔。大家彼此默契地喝所谓的廉价摩塞耳酒，每杯五十分。随后也常到啤酒店去。我的酒量始终是最小的，但是施维舍尔、李卜克内西、基多·威斯、梅林都是海量。我们曾有好多次喝到太阳已在天上放光明才回家去。

我的威望的一个后果是使我受到敬重和招待。常常被邀请到熟人家中进盛大的午餐或晚餐。但是我不甚喜好这种宴会，总是尽可能避开。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写信给我说：

“我把今天这个星期日所有的邀请都谢绝了，我向各方声明，我已有约在先，但这不是实话。人能有几小时再做一个自在的人，就是快乐的了……此外，我希望能够早日离开此地，我对于这里的

214 生活十分厌倦，我渴望着你们和我的家庭……如果认为人的幸福在于吃喝，那我在这里必是很幸福的了，但我并不幸福。”——

国会中的事件在新闻界掀起了更长时间的浪潮。奥格斯堡总
汇报发表了一篇会议概述，其中谈到我对毕星建议的立场，非常善意地说道：

“倍倍尔又一次证明了他那辉煌的演说天才，从而证明了他是个完人。因为知道的人还不多，所以值得特别提出，这个莱比锡的年轻的旋工师傅，虽则他是完全孤立的，而且他那偏激的见解受到差不多一致的指责和惋惜，却在国会中赢得了完全特殊的地位，并且在多数派中，特别在极端保守派中间赢得尊敬的赞扬，他并且利用在柏林的余暇在一个同行的手艺工人那里工作，借以维持家庭生计，因而声誉更高，拉斯克尔部分无理的攻击，不能加以损害。倍倍尔同时是一个天缘凑巧的例子。如果他在童年不是过于孱弱，那末，他这个普鲁士下士的儿子一定会在军事孤儿院中教养成人，而且可以预料，现在已经成为严守纪律的卫士长了。但是他那时在维茨拉受到温克勒慈善机关的教养，而且他那固有的天资和他的勤勉，使他成为一个人虽然不无危险性的人民党的领袖和德意志议会中卓越的演说家。”

报道人说我在柏林的一个同行的手艺工人那里为我的家庭生计而工作，这自然是一个传说。这毕竟是件不可能的事。但是这个传说开了例，许多年以后我在一本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书中又看到了这个传说。历史常常就是这样造成的。我后来还得到类似的证据。

这个时期党内的发展是完全符合愿望的。已经大力开始对党进行的迫害，无损于党而且对它有益。每当一个人在斗争中被摧残，就另有三个来补他的缺。有一件事可算得当时的奇事，莱比锡的市政府驱逐莫斯特出境，因为理由不充足，莱比锡警察局把驱逐令撤销。在我在柏林期间所召开的各次集会上，照例有一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鼓动者来围攻我，这对我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
們之間的关系，尽管施韦泽辞去主席职务而由哈森克萊維尔继任，
也并未改善。尤其哈森克萊維尔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出了
一种极其粗暴的声调。十一月间，当我在制革工人罢工协会发表
演说时（在这里我初次认识伊格纳茨·奥艾尔），有整整一队发言
人在哈赛尔曼领导下和我对抗，想在道德方面把我打垮。这个尝
试给他们造成恶果。会议结束后，当我和我的许多敌人在私人谈
话中赞扬他们的阴险斗争方式的时候，其中一人，齐努夫斯基和菲
克拉德同声回答说，您必须同我们斗争，因为如果社会民主党今
天统一了，政府明天就会用所有的权力来加以干涉，而把党镇压
下去！这两个是预言家的人，因为后来统一实现的时候，发生的事
情差不多就像他们所说的这样。哈森克萊維尔初任主席时也喜欢
施韦泽的作风。因此，他在阿尔托那也乘坐两匹白马驾着的大
马车游行。但是他不久就感到，他不是施韦泽，不适于扮演这样
的角色。

十二月间，警察局长吕得尔借口莱比锡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协
会违背联合禁令而予以解散。在其他地方也仿效这个禁令的。
这时我们纽伦堡的党团同志在安敦·梅明格的领导下发出援助那
住在纽伦堡附近、生活极为困难的哲学家费尔巴哈的号召。由于
地方上的争端他住在纽伦堡不可能了，梅明格后来就完全右倾了；
他成为巴伐利亚农民同盟的领袖和农民同盟在新闻界及巴伐利亚
邦议会中最狂热和最干练的代表之一。

萨克森警察和法院的迫害随着德意志帝国的成立而空前加剧，
却在党内引起极好的情绪。一八七二年一月九日，我们在开姆
尼茨举行全邦集会，出席代表一百二十人。全邦的每个区域都有
代表参加。我担任主席，莫斯特任秘书。决议是，力求彻底改革结
社和集会法律；应为邦议会选举和区选举要求普选、平等、直接和
不记名选举权；贫民救济应由国家法令来规定，其费用通过累进的
所得税来筹措。向受处分的协会和工会建议，把申诉一直进行到最后的法院，如果这样没有效果，就成立地方协会。此外，要求撤销差役制度，并建议那些已经失去宗教信念的党员同志退出地方教会。

一八七二年二月一日，瓦尔希被关入胡伯图斯堡的要塞监狱；以后卡尔·希尔施也被监禁了。同时，其他监狱却也住满了被判决的社会民主党人。个别同志还遭到极重的狱刑。

莱比锡叛国案

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柏林王宫的所谓白厅举行的第一届德意志国会的开幕典礼上，俾斯麦侯爵走向冯·施瓦采议员说：“现在，检察官先生，控诉倍倍尔及其伙伴的案子怎么样了？”对方耸一耸肩回答说：“什么也没有！”于是俾斯麦不高兴地说：“那么就不该把这些人关起来，现在诉讼的仇恨要落在我们身上了。”萨克森财政部长冯·弗里森听了俾斯麦同施瓦采的谈话，就走向莱比锡地方代表一议员比恩包姆教授说道：“这里我们的施瓦采做了一件蠢事！”

不过冯·施瓦采先生并沒有做蠢事，他只是以法学家身份，对案件内容详细了解以后说了所必须说的话。施瓦采同审问我们的法官一样，认为无法判罪，而俾斯麦完全忘记了，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十七日逮捕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据我们图谋叛国的任何证据，而是因为想利用在不伦瑞克委员会中查到我们的信件这一事实而把我们关进牢里。甚至有人告诉我们要说，俾斯麦亲自在总司令部发出逮捕我们的指示。

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被指定在春季开庭期间给我们判决。审讯于三月十一日（星期一）开始。莱比锡群情非常激昂。官方人士估计会发生暴动。因此我们在三月六日和九日的《人民国家报》的
报头上发表下列的要求：

"同志们！

你们知道，由三月十一日（星期一）起，刑事陪审法庭开始对我们进行叛国案审讯。你们之中大概有许多人要想参加旁听。因此我们向你们恳切要求，既不要表示拥护，也不要表示反对来打断审讯。不管那里发生什么事，您们都要保持安静。我们的敌人可能用恶毒的挑衅文字或者通过雇佣的代理人设法来刺激你们，你们要粉碎这些阴谋诡计。将来的清算是免不了的。

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赫普纳。

莱比锡，一八七二年三月三日。"

这个告示并不多余。因为害怕对我们的判决会失败，所以布鲁克洛斯的《德意志总汇报》、《莱比锡日报》和由汉斯·布鲁姆博士所编的《边疆使者》报把这送给陪审员煽动性文章而使他们反对我们这件事当作最重要的任务，并且还亲自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去影响他们。

我不想叙述这个案件的十四天审讯过程的详细情节。控诉的材料包括我们在协会、集会中的全部鼓动活动、文章和小册子以及在不伦瑞克委员会被没收的一批信件。此外，凡是过去德文版的社会主义小册子等著作，即使我们对它的出版和推销毫无关系，例如《共产党宣言》，几乎也全都算在我们的账上。还有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卡尔·汉森的一本名为《一个欧洲士兵写给他的伙伴》的小册子，虽然我们在审讯前丝毫不知有关这本小册子，却也算作起诉材料。这小册子在党委员会的档案中找到了一本。因此，起诉材料在数量方面应有尽有，但在质量方面，像我们在审讯期间所一再提出的，却是越来越糟了。

我们在国会中的发言，根据宪法是不能提起控诉的，但是莱比锡自由主义的报刊设法把其中最尖锐的辞句向陪审员报道。
检察官把曾参与一八七〇年我在拿格特兰的普劳恩城举行的反对麦克尔斯·希尔施博士的两次集会的人请来作证的证人。那些演讲的内容（当时因德意志刑法典生效而未能提以起诉）和李卜克内西的演讲《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地位》（他因为这个演讲在一八六九年在柏林被缺席判决几个月的监禁），现在都被利用作为国案的材料。起诉证人是曾出席监视我那两次集会的普劳恩的宪兵队长，此外还有其中一次会议的主席奇尔巴赫律师、一个编辑、一个首席教师和会议召集人。作为无罪证人，我们把自拉克和斯皮尔请来，他们后来一直参与这案件的审讯直到最后一场。

刑事陪审法庭庭长是冯·穆凯先生，包岑地方法院的院长。冯·穆凯先生同他的名字恰恰相反①，是一个魁梧的汉子，双手像刀，前额很低，使人惊异地问，脑下在这个头颅的何处。显然，司法部长阿伯肯是在萨克森法院院长中选择了一个智力最差的人充当刑事陪审法庭庭长。如果人们要想在一个政治案件中无论如何硬要判罪的话，那么就应该选择一个无良心的野心家（这样的人当时在萨克森好像还没有）或者一个容易拿鬼的蠢材来充当这种诉讼的领导人。冯·穆凯先生绝不能胜任，他既不能掌握极其广泛的材料，也没有一个作这种审讯领导人所首先应有的公正和冷静。而且直到那时，他对社会主义显然还是一窍不通。常使人大笑而使他彻底丢脸的是，当他不能了解我们讲话的意义和影响而大发脾气时，于是想扮演他毫无能力也无理由扮演的驳斥我们的角色。他可算头脑简单到一无所知了。

律师奥托·夫赖塔格和哈恩海特·夫赖塔格充当我们的辩护人，他们辩护得非常出色。他俩反复纵横地盘问，使这常常不懂这些问话或者不知道它觉的影响的庭长狼狈不堪。

① Mücke，是蚊子的意思。——译者
陪审员中有六个商人，其中三个是由莱比锡来的，一个骑士地主，一个林务官和几个地主。这次审讯在莱比锡是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日复一日，宽敞的审讯厅里挤满了各阶层的旁听者。司法部长和检察长也出席了许多次。并且因为德国所有的大报纸都有详细的报道，它们的读者现在第一次听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追求什么（就报纸可能报道的范围来说），所以审讯发生了很好的鼓动作用。我们当然也通过我们的态度来照顾这一点，特别是原为本案领袖的李卜克内西。各式各样的小活剧也不缺乏。比如当庭长因为拙笨的发问和言论而被李卜克内西所窘的时候，或他问我对于《共产党宣言》起过什么作用，我回答说：宣言出版的时候我还不到八岁，又如赫普纳再回答说，当这个或那个文件出版时，他根本还未出生。每当这种情况发生，就成了小活剧。

我们的敌人天天到饭馆里寻访每逢在那里聚会的陪审员，企图影响他们。他们就把当天的经过谈一谈，并企图适当地加以利用。例如有一天晚上，一个上诉法院法官穆勒说：“您们想想，我的先生们，昨夜我梦见倍倍尔被释放了，我因而大为生气。”他好像认为，人们只想把李卜克内西判罪就完了。至于个别陪审员的品质如何，也可由上述一事来说明：有一天我们的一个律师在街上遇到一个陪审员，问他对于所提出的文件的内容能否有个明确的概念？这个陪审员回答说：“律师先生，坦白地说，我若不时时使用鼻烟，我就要睡着了。”最后我们以八票对四票被判有罪，为了判罪，法律上要求七票以上，就是这位先生的一票造成了有罪。

开审的第十三天，把问题向陪审员解释明白以后，在旁听者十分拥挤的情形下开始辩论。公诉人在结束他的发言时说：“如果您不把这两个被告判罪（他没有提到赫普纳，他放弃了他），那您就是永久批准了背叛国家！”
奥托·夫赖泽格律师首先答辩，他开始先声明说，虽然在检察官的公訴发言和他的话语之间有三刻钟的休息时间，公訴人陈述理由时引起的他的惊訝尚未平息。他在数小时的出色发言中彻底粉碎了起诉的理由以后，建议释放我們。次日早晨，伯恩哈特·夫赖泽格律师发言。他在雄辩和法学方面的才干并不低于他的哥哥。大约讲了三小时以后，在结束时向陪审员说道：“如果您們肯定这个问题，那就是在薩克森創造和批准一个非法的局面。”为了这句話，他同庭长发生激烈争辯。庭长斥責了这句話。

在检察官的结束发言以后，奥托·夫赖泽格再度发言。与此相反，他的弟弟声明，因为检察官沒有答复他所提出的检察官控告我們的“一定企图”究竟何在这个问题，他在一种奇怪的纪律統治着这个大厅的情况下，放弃继续辯論。我們赞成他这个声明。因此，审訟經過预定日期提前一天结束。当庭长宣讀陪审员的“法律訓詞”时，他同我們的辩护人又发生了激烈的爭論，我們的辩护人认为“法律訓詞”是由錯誤的假設出发的，不能生效。他俩事先即已通知撤消辯訟。

經過两小时半以上的討論后，陪审员宣布，他們认为李卜克內西和我犯了图謀叛国罪，赫普納释放。检察官认为图謀行为离开成为事实还远，所以建议判我們两年徒刑的最高处罚，对赫普納建議释放。法院即根据这个建議判决，并把李卜克內西和我在侦查期间的联邦折算为两个月。

我們的党员同志对于这个判决极为愤怒。我强颜为欢，在审訟結束后同辩护人和同案被告人說，“你們知道什麼，我們不管判决如何，今天晚上要往奥尔巴赫酒店（因歌德的《浮士徳》中酒店一場而出名）去喝瓶葡萄酒。”奥托·夫赖泽格說：“我們就这样办”，“而且由我們（他和他的弟弟）来会账。”

我們的妻以大声哭泣來迎接我們，她们对于这个建議自然是
难以同意。认为做这类事是无聊行为，我们会成为可怕的人物。但是她们是英勇的，并且最后同我们一起前往。还有白拉克同他年轻可爱的妻子（她是陪他一同到莱比锡来的）和斯皮尔都参加了这酒会。在判决以前我们的家庭特约医师还用颇为别致的方法来安慰我妻。“倍倍尔夫人”，他同她讲，“如果您的丈夫被判一年徒刑，那您还应该高兴，因为他是迫切需要静养的。”

三月二十七日，即我们接到法院判决书的那天，李卜克内西和我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一篇简短讲话《给党员同志》，我们要求他们对事业要勇敢，尤其要设法传播现有五千五百订户的《人民国家报》。同一天我们在《人民国家报》上还发表了第二篇声明，《关于我们的判决》，其中说道：

“陪审员先生的裁判是不对的。我们所希望的和已经做的事情，我们的毫不隐瞒地承认了，我们并没有准备做刑法法典上所谓叛国行为。如果要我们有罪，那么一切在野政党都是有罪的。判决我们为有罪，就是排斥言论自由。”

由于你们的裁判，我们的陪审员先生们，您们以资产阶级的名义批准了吕森的暴行，并发给反动派一张空白的特许状。这个结果对于我们是无关紧要的。这官在传播我们的原则里起了这样强大的作用，我们甘愿受（判决一旦生效）判处我们的两年监禁。但是社会民主党却超过刑事陪审法庭的权限。我们的党将继续生存，并取得胜利。但是您们，我的陪审员先生们，由于你们的裁判，也许宣布了现今刑事陪审法庭制度的死刑，这个单独由资产阶级组成的制度，无非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而已。“

全部民主派和自由派的报纸——在当时它还有作用——都站在我们一边，只有《柏林国民报》除外。该报断定地说：刑事陪审法庭是人民之声。人民之声是上帝之声，因此……。前任上诉法院院长台麦（他是迄今为止法官界中最为正直的人士之一，
但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成为反动派的牺牲品）为了我们的判决也在一家维也纳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尖锐的文章。我荣幸地于一九八二年他逝世前不久，在他退休后所居的苏黎世认识了他；他是一个特别富于同情心的人物。

冯·穆凯先生和检察官霍夫曼因为他们的救国行动而荣获奖章。至于检察长冯·施瓦策则因在起诉时协助有功，早已获奖。四月二日，约翰·雅可比声明参加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对判决的答复。柏林民主协会——不要同民主工人协会混淆了——以大多数赞成爱森纳赫纲领，就此点而言，它赞同雅可比这一行动。

我们的党员同志在党报上和许多次的民众集会上提出反对这个判决的尖锐抗议，结果自然又是不少人被判罪。

诉讼结束后不久，我患了非常疼痛的肋膜炎，好几个星期躺在床上。鼓动、国会活动、待审拘押和诉讼，再加上要求我发挥极大力量并迫使我把我的小企业加以扩充的营生上的紧张活动，都伤害了我的神经。我除了剧烈的疼痛外，还患严重失眠症。在我辗转床上不能入睡的许多夜里，我常常想到俾斯麦，据当时报纸的报道，他也正患失眠症和神经痛，就此点而言，我们是同病相怜。既有同病人，痛苦就减轻了一半。

德意志国会的第一届第三次会期

一八七二年四月底，国会又开会了。我病刚好就往柏林，并在五月一日发言讨论霍维尔和贝克及其党友取消盐税的建议。我在发言中反对一切加于生活必需品上的间接税。资产阶级为了它的阶级利益设法维持这种税务制度并继续加以扩充；他们尽可能逃避对国家的负担，却使直接税成为政治权利的尺度。议会是否相信，这种情况会导致不同阶级的和解？适得其反；资产阶级也不必惊奇；如果我们说在尔关于葛思勒所谈的话，“同老天爷算账去吧，州
官，你必得滚，你的时辰已经到了。"（暴风雨般的笑声。）欧仁·李希特尔声明，他不愿答复我，这就是说，不愿给我个人和我的主义本来没有的重要性。在这点上，我在私人谈话中驳斥李希特尔说，他这鄙视我的说法只是遮盖他缺乏反驳我的理由罢了。李希特尔回答说，他完全没有把我当作不值得答复那样的不重要，不过他至少当时没有把我当作像首相那样的重要（大笑），所以他没有时间来答复我。——

一八七二年“文化斗争”趋于顶点，“文化斗争”是俾斯麦在内政上最大的失策。它使德国内政向极为有害的方向发展。俾斯麦向国会提出驱逐耶稣会士出境的法令，因此掀起了激烈的斗争。在六月十九日第三读时，我发言说，英国文化史家柏克尔根据宗教争论在一个民族中的重要性来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化程度。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国德国的文化程度是低的。很久以来，任何问题都没有像宗教问题引起这样多的注意。当然，宗教的理解与一个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情况有着内在的联系。中央党在议会中所以强大，并不只是由于它的宗教观念，而特别是由于它所代表的社会和政治利益。天主教民众中的经济落后阶层特别喜欢加入中央党，其他资本家阶层则喜欢加入自由党。耶稣教是简单、朴实、平常、有些不拘形迹的宗教，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宗教。这整个斗争，凡是涉及宗教问题的，只是一个假斗争，实际上意味着与国家统治权的斗争。如果自由资产阶级诚心地要求进步，它就必须与教会决裂，因为资产阶级实际上是没有宗教的。宗教对他们来说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来支持他们所行使的权力和在工人中培养驯顺的剥削对象。

有人说，耶稣会与天主教毫无关系。这是不对的。耶稣会是天主要教会最坚强的支持者，中央党说，耶稣会的斗争就就是对天主教的斗争，只就这点来说，它是对的。该案的辩护人主张，他们想通
过该案建立和平；但是适得其反；他們得到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

有人还说，关于永无谬误的教条是对国家有危险的。这一点我不能了解。一切教条最后都是同科学和健全的理性相矛盾的，由这个观点来看，同样是对国家有危险的。（大笑。）一种教条越是荒谬（教皇的永无谬误的教条就是这样），就越遭到一切有思想的人的反对。也有人主张，耶稣会是不道德的。可是国家从来就毫不过问道德的事，而且首相也是最不会关心这回事的人。首相所以生气，是因为人們沒有把他的政策看成永无谬误的。（大笑。）如果耶稣会士和中央党的先生們乐意声明支持他的政策，那么他們就可以在教会方面至所欲为了。（很对。）而且耶稣会越反动，首相就越喜欢它。他只是想把山南党变成他的工具。人們敢于把这样一个法律草案向国会提出，那就是蔑视国会的表现。（骚动。）自由派只是想通过对耶稣会的斗争来恢复他們由于牺牲一切人民权利而丧失的在人民中的信用。用特别法令同耶稣会作斗争，结果只会使它的信徒较以往增多起来。人民群众同情受迫害的人。公布一纸法令，要把一个人弄得无家可归，像一只野兽似的从一个地方驱逐到另一个地方，那是行不通的。在德国我引例导的压制法令已經足够，我們用不着再添新的了。是谁把耶稣会扶植起来的？国家。如果把每年用在杀人工具上的多少亿万用之于人民的教育上，这种方法要比一切非常法令更能损害耶稣会。人們建立一个现代水平的教育制度，把国家与教会分开，把教会势力排除学校，不要十年，僧侣的煽动就会完结。于是这些先生們就可以用上帝的名义在教堂中讲道，而不再有人出席。（大笑。）但是人們却不願这样做，他們大家都需要权威，而教会则是这权威的主要支柱。人們知道，天上的权威一停止，人间的权威也就垮台了。人們害怕，这样一来，共和政体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在社会方面，无神論在宗教方面就要得势了。我反对这法令，但是必須驳斥那說山南主义
和社会主义是同盟者的主张，认为它是无耻的诽谤。如果我们执政，则对山南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样不妙。（骚动。）

在辩论过程中后来担任国会议长的巴兰斯坦伯爵也讲了话。谈到我的讲话时，他认为，我的发言指出了，人们如果通过法律草案就会走向哪里去。人民既失去了对天上的天堂的信仰，就要要求地下的天堂，而这个天堂是国际所允许给他们的。我强调这句话，用力高喊“很对”。

此后不久，在国会中传诵着一个有趣的事。中央党的几位先生在一家饭馆谈论着教会学者多灵格和教皇永无谬误的新教条。多灵格是激烈反对永无谬误的宣言的。因此，一位教会的先生——慕尼黑的议员说道：“这个老蠢物既相信那么多荒谬的东西，他何妨也相信这个。”这句话在国会里尽人皆知，传为笑柄。

我的瀛君案

公诉处决定把李卜克内西的瀛君公诉与图谋叛国的公诉分开处理，并移交莱比锡地方法院。四月初李卜克内西在这里被释放。一八七二年五月底，德累斯顿上诉法庭驳斥了我们的撤消辩诉的申请，于是刑事陪审法庭的判决发生了法律上的效力。六月中旬，李卜克内西入胡伯图斯堡监狱。我在国会闭幕后还有一个控诉案要了结。我同样因为莱比锡区的两次民众大会上的讲话而被控犯了瀛君罪。我曾结合着普鲁士国王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五日的感谢书的结束语，“我希望战争的结局将是德国的自由和统一”，作了各式各样的批评。我曾说，我们固然取得了统一，但是自由却落空了；而且在这方面比以往更坏，这我用事实为证。这正是照例发生的事情。国王们在危难的时候，不免作各种漂亮的诺言，可是等到人民牺牲了自己，救了国王，诺言就被忘却，不予兑现。检察官认为这些话里有瀛君之处，法院在一八七二年七月六日进行审
訊，審訊時由我自己辯護。檢察官建議在我已被判的要塞監禁上增加刑期。法庭卻不顧這建議，判我九個月監禁。因為這是一種與已判給我的處罰不同的處罰，所以附加刑被拒絕了；否則，如果這是九個月監禁，加上已宣判的要塞禁閉大約就有二十八個月了。此外，在第二點上，法院也不顧檢察官的建議，剝奪了我的國會委任。

這一項決定是法院方面一個政治上的大錯誤，因為它既不能褫奪我的被選舉權，同時我的党内同志，又會推舉我為以往選區的候選人，並且我一定當選，法院就不能得承認它的判決為無效。事情果然是這樣。我的重行當選對於法院是一個明確的耳光。這是後話。

我們的要塞監禁和在這期間所發生的事情

胡伯圖斯堡

一八七二年七月一日，白拉克寫給我一封告別的信，他在信里說：‘如果不是因你的家庭，我幾乎要慶祝我們敵人的拙笨！比如說，你可以休養身體并多多學習，于是你就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了，并且最后，你亲爱的妻子虽倍尝离别的辛酸，你如果能这样经过一个使你一生又强健起来的療養时期，她也将感到满意。’七月八日，即我入獄之日，我发表了下列聲明：

‘給我的薩克森第十七選區的選民！

朋友們和同志們！承蒙比錫地方法院的厚意，以‘賣君罪’除判我九個月徒刑外，还‘剝奪我所充任的公職以及由選舉而产生的各種權利’。

通過這個判決我喪失了你們付與我的委托。

朋友們和同志們！這個打击不仅是對我的打击，它也是對一
向我所代表的你们的打击。它也打击了我们所隶属的党。我们要
表明，它所做的打击是徒然的。你们面临采取重新选举这一
看。我向你们请求在重选中再做候选人。如果按照你们的意思我沒有
辜负所负与我的信任，那就再选举我。

我向你们保证，所受的‘刑罚’不能使我软化。要塞和监狱这
些办法不能使我对于腐败的社会情况发生较好的观念。倚靠这种
办法来施教的社会，就应当消灭。

因此，我们将要用一切我们所能支配的力量和一切坚韧不
言作战，通过新选举把工具交在我手里，使我在以后几年还能参
与这一斗争。我们的时刻总有一天要到来的。

告辞了！在新的斗争和胜利时刻再见！”

当天下午，我前往胡伯图斯堡。在车站上有一大批男人女人
给到我送行。我妻应我的请求同我们的小女孩留在家里。我所带的
行李中有一个大鸟笼盛着一只美丽的雌金丝雀，是一位德累斯顿
的朋友送来做我在狱中的伴侣的。后来我把它找到个配偶，我在
胡伯图斯堡的狱中繁殖它，它后来繁殖了成群的子孙。在我要换
车去胡伯图斯堡的达兰车站，人们为我举行一个别致的欢迎会。
当我走出车厢时，所有的车务员排成一长队站在列车前面，把手放
在帽缘上表示致敬。火车头司机挥舞帽子，大部分乘客也在车窗
上挥舞礼帽和便帽向我告别。这种清客的仪式使我非常感动。

我到胡伯图斯堡后会到李卜克内西，他笑我还没有招致于九
个刑监禁。在这里他却是聪明些。他笑得好。他后来却因为由胡伯
图斯堡秘密写给《人民国家报》的一篇文章，而给负责编辑人招来
了远远超过九个月的徒刑。他自以为多么小心呀？当他起草文章而
在措辞上有所怀疑时，他就找我商量。他把有关的章句念
给我听。如果我觉得文章中有值得考虑的地方提出警告时，他就
设法证明那些章句为什么是不危险的。他照例得到我这
样的回
答：“检察官和法官如果也照你这样想法，那你就是正确的。”于是他咬着指甲再思索新的字句。但是新的字句时常较原来的更为尖锐。他很不乐意割舍一个在发表后会使敌人发怒的思想。

在要塞监狱中除李卜克内西外，还有卡尔·希尔施和一位开姆尼茨的党员同志。瓦尔特的刑期已满，法院却正注意延缓。我们同伴多半是五、六个人，有时也有个别因为决斗事件而被短期拘押的大学生。到我的刑期满时，我成为寄居在胡伯图斯堡的最后一人了。

我们觉得奇怪的是，我们必须到胡伯图斯堡去服刑而不到萨克森的要塞哥尼斯坦因去。原因是哥尼斯坦因没有容纳平民犯人的房间，这种房间尚有待于设置。

胡伯图斯堡是因为一七六三年在这里缔结结束七年战争的和约而远近驰名。城堡是一座斑式艺术的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它的前面有一个宽大的院子，周围是一些二、三层的楼房，往昔充作内廷官吏和僕从住宿之用。当时在那里任并在那里办公的是集合在胡伯图斯堡的各机关职员们。这座建筑有些部分曾长期作地方监狱之用。这个建筑的耳房设有七、八个囚舍，是留给我们的这些要塞犯人的。与胡伯图斯堡相连的有一个妇女病院和一个妇女精神病院，还有一个盲童和幼童收养院。里面住的人，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囚舍的窗子很高，还装有铁栅。隔窗可以看到我们散步所在的大菜园，墙外是森林、原野和远处的摩次申小镇。

我们的囚舍的清洁由一个所谓工役来管理。为了囚舍的清洁和租费（监狱房屋国家也不免费供给），我们每月付费五塔勒。我们膳食取自与胡伯图斯堡相邻的维姆斯多夫的一个饭馆。我们的生活日程如下：早晨七时必须穿好衣服，然后打开囚室门以便打扫清洁。乘这段时间我们在囚舍前面的宽阔走廊上用早餐。卡尔·希尔施利用这个空闲同一个个民事犯人下棋，他俩照例争吵不休，使
我們非常好笑。八時到十時我們又被煮起來，十時後我們在園內散步。十二時起，在冬天關到三時，夏天關到四時，而後是第二次散步，自五時起或六時起又關到次日早晨。因為我們有權利在晚上點燈到十時，于是这几个鐘頭成为我的主要工作時間。几个月后，我請求在上午八時到十時把李卜克內西也关在我的禁舍内，教授我英文和法文，得到许可。借这机会，我們也得以討論党内事務和政治事件。关于营业通讯，我根据我妻每天寄来的資料来处理。

李卜克內西和我都是很爱喝茶的人。可是我們得不到茶，因为防止火灾，也禁止私自烧茶。但是禁令的存在，就是要供人破坏的。因此，我秘密弄到一个烧茶器和所必需的配料。一到晚上看守人关闭禁舍走了以后，我就开始煮茶。为了使李卜克內西也能同享，我在园内截了一根长約二米的竿子。一端用一根小绳系上由我编织的小网，里面可以放一只盛滿茶的玻璃杯。茶煮好后，敲敲在我隔壁的李卜克內西的墙，于是他走到窗子那里。然后我把一杯茶用竿子伸出窗外，再转向李卜克內西的窗子，他一接到杯子就都说声，“得到了，谢谢！”来告知收到。我們每人都急欲閱讀的报纸，也用类似的方法来交换。我們在囚舍窗子的铁栅上横穿一根绳子，把两头接連起来，誰把报纸看完了，就用一个鉤子把报纸牢挂在绳上，敲邻居的墙，于是邻居到窗子那里把报纸拉过去。

我刚把囚舍整顿出个家庭样样，就像一把怀中小刀似地直不起腰来了。近几年来过于努力和兴奋的生活，使我不觉得我的体力如何大为衰退。現在我被迫休息，紧张渐减，就不能支持了。身体非常疲憊，我好多天不能从事严重的工作。但是绝对休息和新鲜空气又渐渐使我振作起来。我的家庭医师曾安慰我妻說，一年禁閉对于我的健康是有益的，他这话很有道理。后来医师給我仔细检查身体时，也发现我的左肺有严重的结核病，并查出一个空洞是在要塞里痊愈的。朋友们知道这情形后，开玩笑说，我應該感
謝國家把我送進監獄。我回答說，國家果然是為了我的健康而判我徒刑，那我就應該感謝。我一生常常走好運，这一次又是这样。一件可能使我灭亡的事却发生良好的結果。

在我确定无疑地要丧失自由三十一个月以后，我就决定利用这个时间竭尽全力来稍微弥补我在知識上的缺陷。因此，我一能恢复工作，就用全副精力投人工作，这是渡过逆境的最好方法。我只是学习国民经济学和历史。我又学习一遍当时只出了第一卷的馬克思的《資本論》、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拉薩爾的《既得权利体系》、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杜林和卡莱的著作、拉維莱的《原始财产》、罗伦茲·斯坦因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史》、柏拉图的《理想国》、亚理斯多德的《政治学》、馬基雅弗利的《君主論》、托馬斯·莫尔的《烏托邦》、馬·屠嵐的《孤立的国家》。在我所读的历史书中間，柏克尔的《英国文化史》和威廉·齐美尔曼的《德哥農民战争史》特别吸引了我。齐美尔曼的书鼓舞我写了一篇通俗性的論文，题目是《論德哥農民战争，着重中世紀主要社会运动》。这本书由威·普拉克在不伦瑞克出版，后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禁止发行。第二版需要修訂，我因打无暇及此，没有再版。我也沒有忽略自然科学。我閱讀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海克尔的《自然創造史》、路·毕希納的《力量与物质》和《人类在自然界的地為》、李比他的《化学书》等等。我还用一部分时间来閱讀古典著作。我患有真正的學習迷和工作迷。

此外，我在服刑期间翻译了伊維·居尤和西基斯孟·拉克罗瓦的《基督教社会教义的研究》，这譯本現今仍以《基督教教義》的书名在出版。我为此还作了一篇反駁文章，命名：《伊維·居尤和西基斯孟·拉克罗瓦的《基督教教義》批判，附录：妇女現在和将来的地位》。附录的文章，我相信是党員同志以社会主义立场論妇女地位的第一篇作品。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来自于我对于法国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空想家的研究。我这次在监狱里也写出我的《妇女》一书的初稿，这书到一八七九年才由《妇女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书名出版，虽然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禁止推销的情况下仍出了八版。一九〇年出版了第五十和第五十一版。

我在狱中能够把这段时间为我自己的利益加以利用，这是美好而且有益的，然而我还是盼望和欢迎恢复自由的那一天。但是，因为每个犯人都盼望早日恢复自由，从而表现得十分不安和不耐烦，计算着天数和钟点，所以我力求以此控制这种心情，即我为自己提出一项工作去完成，而这一只有尽其全力，才能有成。后来在丧失自由时，我也使用这个方法，我觉得这方法效果很好。

我们的家属每三、四个星期来看我们一次。最后我们也办到了使他们能利用三天假期的来回车票。他们在这个时期住在乡下。三位妇人来时每人带一个小孩，李卜克内西夫人带着他们的大儿子，他比我的女儿稍微小些。旅行是辛苦的，尤其在不利的季节。妇女和小孩必须在早晨七时由家中动身，花数匹马车，三位夫人认为是罪过。他们可以自上午九时半到下午七时留在我们的囚舍里，并可同我们一起在园中散步。这对我们在监狱中很大的安慰。

我很需要体力劳动。因此我想我们应该为此在园里开辟几畦地。我们请求为此拨一点土地，遭到拒绝，但我们可以耕种沿着围墙几尺宽的地边，要用多少都可以。就这样办了。我们带着必需的工具去做工。李卜克内西当时在写关于土地问题的论文，他自以为是农业专家。他保证，我们可以把空地边上垦成一块出色的良田。但是当我们用锄头掘地时，发出了深深的叹息声。我们每一锄都碰到石头上。李卜克内西看到这样结果，也拉长了脸，我们大笑不止。这块地不是肥田，而是瘠土，我们要想有收获，就必须像我们的看守人所断言的进行施肥。于是李卜克内西和我拿着
一只大筐走向园子一个角落里堆着的混合肥料堆。凡是认识这种堆肥的人都知道，若是挖它一下，就会气味扑鼻，印度和阿刺伯的一切香气都不能压倒它。但是我们不顾死活地去干，我们装满筐子以后，用两根竿子穿入提梁，李卜克内西在前我在后跑向我们的菜地。在园内做工的妇女们看到我们的动作都哈哈大笑。我在当时和以后常说，如果政府要我们做这类工作，我们会勃然大怒而加以拒绝。这是强迫与自愿之间的区别。

我们在菜地内种上萝卜种子，热烈期望有所收获。种子出得很好，叶苗茁壮地往上长，但是所期待的萝卜却不见踪影。每天上午，只要我们一出来散步，就来个向萝卜哇竞赛，每人都想收获第一个果实。总是一场空。有一天，我们摇着头站在萝卜哇周围，并且深入研究不结实的原因，我们的看守人在那边听我们的谈话，笑着说：‘您们为什么得不到萝卜，我的先生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施肥过多了!’唉呀，这样，我们的每一辛勤都白费了。

* * *

在一八七三年的头几个月内，国会又要开会，这样萨克森政府不管好歹就必需为我所保有的选区安排一次新的选举。选期规定在一月二十日。整个党把这看成一件荣誉攸关的事情，不仅要使我重行当选，而且还要使票数增多。一切能调动的鼓动力量都赶快来到选区。奥艾尔、马特勒、瓦尔特希、威廉·司冯桑、瓦尔斯特、约尔克等都来做工作。敌人把格劳宁地方法院院长培·尔特·提名为对方的候选人，他为人平易近人，是选区里一位令人十分爱戴的先生。然而，这也无济于事。在选举日的计算员，我得一万零七百四十票，我的对手是四千二百四十票。不消说，这个结果在选区以及整个党内引起狂欢。这结果也给我取消了我的委任的法院一个响亮的耳光。我这次比一八七一年三月三日还多得约四千票。不仅如此，在选举以后过了几天，我那失败的竞选人在这选区
报纸上对我党公开表示感谢，认为党是以很公正的方式同他进行竞选的斗争的。

在选举后，奥艾尔和约尔克先到莱比锡访我妻给于道喜，而后来到胡伯图斯堡见我也向我祝贺。这是一次愉快的会晤。

随后当国会开会时，我试向萨克森政府请假参加会议。正如我所预料，没有成功。现在施拉普斯在一批自由主义议员支持下提出建议，要求在开会期间将我暂释。这个建议被大多数所否决。冯·马林克罗特议员说，他很惋惜我不能参与国会会议，但是帝国宪法第三十一条没有把议员的免罪引伸到刑事犯。

我承认，我并不反对这个决议感到遗憾。如果将我暂释，那么我将因请假而延长坐牢的时间。如果我在服刑期间遇到三、四次会期，则服刑之期就不在一八七八年早春，而最早也要延迟到一八七八年夏天了。

在一个立宪国家，一个在服刑的议员，一到会期开始就马上被开释，以便能够尽他当议员的责任，这原是当然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德国的人们是不干预的。不过对于一个像我这样长期服刑的议员，如果每遇会期就照例给假暂释，决不如一般的错误想法，认为是件愉快的事情。我至少把这看成是加重我的徒刑，因为它首先会加重损害我的经济生活。

236 李卜克内西和我当然需要至少同外面的领导同志尽可能保持接触。不过这只是在有限程度内可能。我们也可以常常秘密往外面带信，但是这样通讯有因回信不巧妙而被监狱长发现的危险，结果是对我们不利的。所以要小心才行。尽管直接通信要经过官方的检查，我们还是尽可能直接写信。往来的信件有时也呈现幽默性质。有一次我接到莫斯科由兹维考地方监狱给我的信，他因为各种出版和言论的罪名须在那里服刑一年以上。因为这信同时把莫斯的个性表现得非常之好，所以我把它转载在这里。莫斯
兹维考，一八七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倍倍尔！

你的来信好像黑暗天空中的一道灿烂电光照射到我的阴修处，由来信中我高兴地看出，你们这些用笔墨危害国家的恶棍过得很不好。——你现在也想知道我的情况如何，我想知道，因为我可以想到，你现在所遭遇的，正是我在迁入这里之前所遭遇过的，这就是说，你听到兹维考（Zwickau）这个地名总想到兹维肯（Zwicken）并且猜想听到一个 yacc 的叫声。我不得不承认，我虽具有猫的坚韧性和绝望中的幽默——却流于战战兢兢的呆气——，当我来到此地之前想到它的时候，并不像著名的五百母猪那样对它有十分的好感，但是现在既然到了这里，事情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当然我不是像你那样过行宫狩猎的生活，而是沙特勒斯修道院僧侣的生活，不过我也还没有感到烦闷，因为我还有许多东西要补习，所以我现在努力攻读。我所收到的报纸可以供我消遣，我照习惯的方式（饮食，衣服等）满足一切生活上的需要。总之，我所忍受的只是自由上的惩役，而不是肉体上的惩役，虽然我也受到了对于一个犯人除剥夺自由而外的一切。除了一张写字用的桌子而外，我没有写什么使我舒服的东西。一张自己的床铺，我觉得没有需要，不过我使用自己的枕头。囚室完全像瓦尔特希所描写的那样（他也曾在兹维考地方监狱里住过一个长时期）；这里没有别的囚舍，此外，人们不久也就对这习惯了，特别是这些囚室的窗子虽高，但还很亮。每天在一个半庭院半花园的空地上，我独自一人散步二小时。没有人来访问我，所以我自然也不能接见任何人。你在那时是不禁止你同家人往来的。人们对我也同对你一样，不让我刮
鬍子。我的灯点到十点钟。这些情况就是我由我这社会主义者隐居处能向你报告的主要事项。关于学习，你当然要好得多，因为你教授就在你身边。在语言学习上我特别感到，这里多么缺乏教师，尤其是会话没有这样一个教师简直学不成。顺便问问！你学法文用的什么课本？瓦尔特希因为我希望有一本法文文法，转送来一本十分古老、无用、繁琐不堪并且荒谬的书（希采尔出版），我有几次在盛怒之下极想把它撕成两半。——你的关于梯也尔的文章写的很清楚。这个矮子是法国最大的阴谋家，他是个活的钱袋并且是唯一懂得如何促进君主政体的，当然不成功，可是计划至少做得不错，尽可能长期维持现状，然后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使共和政体消失而使君主政体出现。别的任何一个君主政体拥护者在他们的地位，早就会发动政变，于是——同时折断了脖子，像一般君主政体的最后残余所遭遇的那样。在西班牙——企图使人相信——那些执政的长舌妇人只顾喋喋不休，丧失了她们那微乎其微的智力，否则她们实在不可能不与一小撮杀人放火的卡罗斯派①决裂。现在希望那里也像在法国那样，不久就来个有力的大扫除。——我们事业在最近时期有这样进步，你感到惊讶，产生这些作用的原因是很多的。我告诉你，只要有一千个像你这样的人，或者甚至只是像我这样的人（不是自夸）——欧洲，不仅是德国，在五年内就会社会主义化。新生力量固然是够多的，如果胆怯不那么严重，新生力量就会表现得更多，而现在却是太少了。我们应该相信，人们在出生时大都是头朝下或者甚至嘴朝下的，因为他们不能充分张开嘴。我们不要别的，只需要嘴和心长在正当地位的人而已。——如果我说我已不抱什么大的希望，那末，我仍然非常欢喜地期待下次的选举。至少要展开宣传，使火花四射。局势正合我们

① 指西班牙克里斯廷娜派和卡罗斯派的斗争，亦即资产阶级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斗争。——译者

218
的要求。进步——破产、得胜狂欢——颓唐沮丧、伤兵問題、住宅問題、学校問題、几十亿問題、和平問題、投机商問題、“文化斗争”事件、厂主同盟、惩处、迫害、混乱等，这些都稍微有利于我們。因此我保养我的肺叶去磨砺我的长嘴，以便将来如果掀起选举战斗，就可以真正快乐地把许多政治海盗們打倒。——在萨克森我自然不能直接敲起鼓来，不过别处也有许多人，他們必須由人們把钉在他們脑袋前面的板子拆除下去。因为，我被警察骗逐出萨克森，虽则高等法院对于这件在法律上不可行的事情应否执行还未表示意见，不过我也不期望什么好事，至于事情结果如何，在我却也“无所谓”。对我来说，不是“所谓的”，甚至简直不可解的是，对于这一行为……①可敬爱的尤利乌斯②到现在还没有感动作出说明。对了，最妙的事我几乎忘记了：万一我不顾驱逐而又在萨克森出现，则根据条文就要把我送进反省院去！！——关于这姑且不说。——那末，若是我重获自由，也就有机会去……。

一般說来我是很舒服的，并且异常乐观。祝你好，并向社会主义学院的老住客們和你謹致敬礼！

约·莫斯特

科科斯基写給我們的信，却与莫斯特这信的性质不同。科科斯基在一八七一年在哥尼斯堡出版《民主报》，但不久不得不停刊，而应白拉克的邀請于一八七二年底参加《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编辑部。他具有极为幽默的性格，在当时党代表会议的饮酒晚会上常常被称道。他也遭到那时代的党报编輯的命运。他担任編辑的时间并不长久，却遭受了好几个月的监禁。但这并没有损害他的幽默，由下面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

不伦瑞克，一八七三年五月十四日。

①这个地方被检查官检查掉了。
②瓦尔特希。莫斯特归罪于瓦尔特希，說他没法打消他在开姆尼茨的国会的竞选，并且不让在《开姆尼茨自由报》上发表各种通告。
尊敬的朋友們！您們好，父親般的國家照顧周到，把您們置于特別照管之下，使您們在沉思默想中体会到一個好政府的恩惠。那三個人既然能够在火炉中唱赞美歌，那末您們，如果要塞监狱的规则并不禁止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在胡伯图斯堡的围墙内也这样做呢？

仁慈的天意，也给我三个月的要塞禁闭，因此至少一个时期不必听到吓人的呼喊。科科斯基先生，稿件不够！已使思想有些安定的是，偶尔接到的几封信是必须先经过检查的，所以那些讨厌的和有刺激性的消息被去掉了。这样我也就放弃一切革命的报道，虽然我很乐意为您们阐明关于军事装备的情况，关于手榴弹和硝化甘油炸弹的最成功的制造法。这些都是产生真正奇迹的。仅仅这个消息：

汉堡，五月二十七日。煤油较稳定，当地一六·二〇——八十马克，五月，十六·二〇马克，八月——十二月，十七纸马克，一六·九〇金马克。

资产阶级已经开始羡慕您们了。最近在一个资产者团体中谩骂社会民主党人时，有一个被认为很可靠的、甚至是最可靠的投机者说：“今天交易所的消息好像冰块放在我的头上一般，我要羡慕倍倍尔，他能泰然坐在胡伯图斯堡，用不着关心行市的涨落。有人按百分之一百三十付给这样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以贴现银行的三万塔勒，然后使它跌到八十五，或者使路易士地下工程超过票面价格的百分之十五，我可以告诉您们，他们受够了惩罚。”这样，您们必须学习着由这方面来观察事物，而热腾的蛟龙毒液才会变成虔诚的思考方式的乳汁，此致衷心的敬礼——我这封信结束了，因为信就要送往邮局——我永是

您们忠实朋友和同志 S. 科科斯基。

* * *
一八七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拿克森国王犹翰死了。他的儿子阿尔伯特即位。因王位更替照例要带一次大赦，我們的妻子也盼望著大赦。这也难怪她们，我們的刑罚和监禁在我们看来是我们活动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而她们则受到最大的苦难。但是我們一知道她们抱这种希望，就写信告诉她们，不可以存这种幻想。大赦将会到来，但不是为我們。我写给我的妻的信里说，新王将宁可赦免拿克森监狱里的一切犯人，也不赦免我們。大赦的结果是很有分寸的。据我的记忆，被关在拿克森县监狱中的许多党员同志，没有一个被赦免的。这样倒好。国会在一八七四年初举行普选（因为当时国会任期只有三年）所表现的一种情绪，并沒有因大赦而败坏。

我有这样一种念头，虽然我当囚犯，也可以用很有效的方式来参加选举鼓动。即编写一本小册子论述历来的国会活动，为党的候选人和鼓动者提供必要的材料。想到了就作到了。小册子按时出版，书名：《国会及邦议会的活动和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三年的社会民主党》。我在小册子里加入了国会选举法、选举法条例、刑法法典中有关的规定、結社法等最重要的条款和鼓动指南，作为附录。这个匿名出版的小册子，受到党非常满意的欢迎。二十年后，有一天在往汉堡的旅途中，議員欧仁·李希特尔和我在一个車厢中遇见时，他甚至还为这件事恭維我。直到那时为止，我們虽已在国会中同亊二十五年以上，彼此却还从未作过私人談話。現在我們暢所欲言了。在談話中間。李希特尔叙述说，七十年代时，他在萨尔根一个城市里的民众大会上作过讲演，在大会辯論时有一位我党同志提出他的一系列的罪恶，其中有些他早已忘記。他注意到，发言人的責难是引自一本小册子的，他曾請求他的同党偷偷走到发言人那里，以便弄清他所引用的是一本什么小册子。后来他得到了这本小册子，从它的内容看，他认为作为小册子的基础的想法很好。于是他决定把这种想法——虽然是用另一种形式——也拿到
他的党内加以贯彻。这样，就产生了他的著名的政治入门一书。在这一刻，我以老师的身份坐在我那位鼎鼎大名的政敌面前，有点自豪。大家知道，后来其他党派也照我们的榜样，出版这类政治入门的书籍。

我的小册子的另一作用是引起了威斯特伐利亚的旭夫市的一位牧师霍好夫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许多文章驳斥我对于基督教和文化斗争的见解。我也写了一系列文章作答复，后来出版为小册子，名《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到今天已出了很多版。

选举定于一八七四年一月十日举行。结果使我们非常满意。我们在第一回合中被选上了六个议员——盖布(夫赖堡)、李卜克内西(司透耳堡—什内堡)、莫斯特(开姆尼茨)、瓦尔特勒(米特维达—柏格斯代特)、莫特勒(克里米朝—兹维考)和我(我的老选区格劳绍—美拉内)。在莱比锡城郊第十三选区，约翰·雅可比进入复选。全德工人联合会有两个候选人当选：哈森克莱维尔在阿尔托那和莱迈尔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选区施施格。哈赛尔曼在巴姆—爱北斐特进入复选并获得胜利。约翰·雅可比也以七千五百七十七票对六千六百七十四票获胜，但他又拒绝接受委任，这使全党不胜惊讶和不快。不错，在询问他是否愿意担任候选人的时候，他并没有答应接受选举。他在他的信里说过：他对普鲁士的德意志帝国的看法，党内同志是熟悉的；他们由此可以推断，他多么不愿参加那些无益的国会讨论。党如果由于策略的原因认为提他做候选人是有利的，他也不反对，但是他必须预先声明，如果当选，他将保留决定接受或拒绝委任的自由。在辞谢信中他声称，他对于德国的新秩序的想法，一八六七年五月六日在普鲁士下院声明过了，所以他把这次参与竞选当作抗议性的竞选。他不相信，通过代议制的途径能够把一个军事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国家。

错误是在选举委员会，它在第一封信里没有要求他来个干脆
明白的答复。当我們的候选人威廉·白拉克在复选中以五千六百七十六票对对方将近八千票而落选时，党内对于雅可比这一行为更为愤激。我自己也为这件事很生气，给雅可比的朋友基多·威斯博士一封信对这个想谢委托的事加以指斥。

于是社会民主党的两派现在在国会里共有议员九人代表它們。候选人得票总数是三十五万一千六百七十，其中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候选人得十八万零三百一十九票，社会民主工党的候选人得十七万一千三百五十一票。两派的追随者人数差不多同样多；得票总数约等于一八七一年的两倍，共計约增加二十三万六千票。

这次选举的辉煌成就使高级官垣以及资产阶级集团非常生气。这个结果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这说明了，党不顾一切迫害和诡计，还在不断发展，因而权威集团中蓄意已久的以特别法规来迫害党的思想也越来越浓厚了。

* * *

一八七四年二月底，古斯达夫·拉式的访问很有趣地打破我们监狱中的日常单调生活。拉式是一个有点危言耸听的作家，他喜欢使他的作品有些夸张。在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上半期，他在《凉亭》杂志上和许多自由派报上发表了很多关于奥地利人在威尼斯的丑事和丹麦人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腐败的文章，引起很大的注意，因而卓著声名。李卜克内西和我是在柏林认识他的。他现在所以来访，是想为一篇文章搜集材料。这样的访问应在办公室里当着一位官员进行，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但是这对拉式是不适合的。他要求狱长让我们二人单独谈话，并希望看一下我们的囚室。狱长拒绝了这个要求，说他（拉式）应该站在他的地位上想一想，就知道这是行不通的了；如果他（拉式）是狱长，也不能有别的办法。而拉式以那诙谐的泰然自若的神情回答说：啊，如果他是狱长，他一定允许！这句话引得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哥 基 斯 坦 因

三月间，我們接到正式通知，将于四月一日把我們轉移到哥基斯坦因要塞去。这个消息使我們很不舒服。李博克内西的刑期到四月中旬結束，我們到五月中旬滿期，这时我們非常不便于带着书籍、稿件和各种家具再搬一次家。但是届时又延期迁移，这样，李博克内西得于四月十五日由胡伯图斯堡起程往莱比锡。但是我却须于一八七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动身往哥基斯坦因，由一位便衣官员陪同前往。我在起程的前一天向狱长辞行，并且对于他在許多事件中的盛意表示感謝，他非常感动。他亲热地握著我的手，然后放开我，說道：“上帝保佑您！”这在他看来，大概认为是能够赠給我的最好祝詞。次日早晨五时，我要起程时，看守人全家集合起来，前来送行。这个看守人現在已調到瓦尔特亥姆监狱，我相信，他在看守我們的那個时期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此后不久他就死去了。

四月二十三日是一个美丽的日子，整个易北河谷一片緑色，百花盛开，春光十分艳丽。在走上要塞时，我們遇见要塞司令冯·雷翁哈第中将，送我的人把我介紹給他。当我们一同往上走时，将军和我谈起話来。他想知道，在胡伯图斯堡的日程和待遇怎么样。我把他所希望知道的情节告訴他以后，他表示意見说：“呐，您在我这里是不会比那里坏。”

指定給我住的地方是一所从前认为可以防御炸弹的老建筑物，原先的军火库。走廊上支撑屋頂的梁柱的粗大，只有在老教堂的地基上才可以看到。房间却宽敞，有两个炮眼式的窗子，上面装着粗铁条，好像是个关杀人犯和放火犯的地方。一边的墙角立着一个巨大的釉砖火炉，国家每天配给我的五磅煤炭在这个火炉里，就会不見了。虽然冬季已过，春光明媚，可是室内还是冷得厉害。我若不愿冻坏，就必须自己出钱买燃料。如果我們的全部监狱都
在那上边渡过，我們单为燃料就要耗费去一份小家产。

我的看守人的为人很有风趣。他年已七十，在要塞服务已三十六年，一八四九年薩克森临时政府的两个成员——托特和豪布诺，还有奥古斯特・勒克尔和德累斯顿五月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米歇尔・巴枯宁（他后来是一方面徒有声名而另方面臭名远扬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都曾受过他的看管。

我散步的地方十分狭窄，这地方以唯一的短短路径通向要塞小花园，那里还常常站着一个岗哨，以便把许多来游哥尼斯坦因的人同我隔开。唯一令人满意的是由要塞的一个小饭馆领取的伙食。饭馆主人似乎对我特别好；飲食不仅物美价廉，而且也非常丰富。当我第一天去探看指定给我的一份食物时，感到奇怪，吃过以后更是不胜惊讶。高山空气发挥了他的效用。这里的一小队驻军的士兵诉苦说，他们在这边从沒有吃饱过，都在盼望着三个月满期后换防。

五月十四日，我被假释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在来我家问候我的人中間也有爱德华・伯恩施坦，他特意为此由柏林来到莱比锡。我在一八七一年在柏林已經認識他了。通过我的律师奧托・尤特塔格的接洽，内阁同意给我六个星期的緩刑，然后到茲維考地方监狱服九个月的徒刑。在这期间适逢圣灵降临节，我同我妻和女儿以及几个朋友到薩克森的瑞士和哥尼斯坦因远足。这里使我很愉快的是，我所住过三星期的囚舍在这期間已升格为要塞的名胜了。导游人指点着使人注意我当时所住的囚舍的窗子。后来禁止他这样做了。德累斯顿的党员同志长期开玩笑地把哥尼斯坦因叫做倍倍尔堡。

茲維考

在入狱之前，我先访问了一次地方监狱狱长，打听他允许我作
为政治犯在拘留中作何消遣。然后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我进入这个监狱。监狱的设备以及对大部分政治犯所允许的消遣在莫斯科的信里已经给我叙述过。我可以在这里提一下。每月准许我在一个官员监视之下接见我的家属一小时。在我被监禁的第三个月，我妻来探望我一次，以后我们双方都愿意不再做这种会晤。花了路费，而晤谈中每一个字还都要忍受一个官员的监视，这个牺牲太大。其他方面的访问，我也只是个别地接见，我对这种访问并不渴望。

我现在又以全副热情投身于工作。使我非常激动的是我关于我们在营不难于的报告，因为这时工业大危机极其严重地爆发了，再加上一个新兴的工厂企业又对我们进行毁灭性的竞争。谁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谁就体会不到完全无法想样的感觉，使一个被监禁的人如何抑郁。我在狱中的主要工作是前面所说的《德意志农民战争史》（这书早已绝版），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参考书，所以这本书不会是杰作。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觉得，一九五五年的伟大农民战争和紧在其前的那些革命的农民起义，都是德意志近代史中最重要的事件，而官方史籍却可耻地避而不谈。

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我接到一份由莫特勒转来的电报，说明尔克于昨天亡故。约尔克虽然性情固执，却也是一个不疲倦和具有高度牺牲精神的人。而且他非常谦逊。他在做书记的第二年，他满足于，如他所告诉我的，连一条新袖子也不能购置的薪水。他身后极其贫苦，党报将他赡养了他的妻和小孩。至于约尔克的书记职位，前一年秋季已由奥艾尔担任了。

兹推考的九个月监禁到底也忍受过去了。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俾斯麦六十岁的生日），我被释放。在这里，狱长和我的告别也是亲切的。我一贯奉行的箴言是，尽可能适应不能改变的必然的
状况，争取有利的一面。由这个观点出发，我在监狱官员执行艰巨任务时，只要对于我的人格丝毫没有损失，就尽量以遵守所规定的制度去迎合他们。所以他们总是感激的。在较大的监狱中，官员们十分忙于对付那些社会危险分子和堕落分子（我们这个美妙社会秩序的可悲产物），所以他们的工作是最艰苦的；他们若能同所监守的人们以人道相交往在他们就感到幸运了。

兹维考的同志们，在我被释放那一天，集合起来表示欢迎。我们赠给我和我妻一对精美的咖啡杯，上题有献辞，祝我们将来长在完全安静和闲暇中永不分离地享受萨克森的民族饮料。这种祝贺是好意的，但实现就不行了。

在许许多多祝贺者中间，也有当时还是民主主义的《法兰克福报》，它在提到俾斯麦的生日时写道：

“……我们的祝贺是对另一个地方的另一个人的。他就是那位朴实的市民和工人，他在几乎不断的三年监禁后，明天要出狱了，他仍然同按判辞（关于判辞，即使今世还办不到，来世也将予以裁判）入狱时一样声誉无瑕，他的党内同志爱戴他，他的敌人惧怕他，注意他。我们既不是他的同党，也不是他的敌人，但是我们不管在哪里发现忠于主义和公正无私的努力就加以重视，对于任何一个为这些而受难的人，我们充满了极大的同情……因此向国会

议员奥古斯特·倍格尔致敬和祝福。”

几个月以前，《法兰克福报》的主要业主列奥波特·宗纳曼曾把葡萄酒二十瓶给我送到监狱里，因为狱中禁止饮用，我把它转送到家里去，后来同我妻和友人同饮。四月一日，宗纳曼还为了我的被释写信祝贺，信内说：“我希望你的长期苦难就此结束。”我们自一八六六年起就以你我相称了。

* * *

我由兹维考出狱不久，接到沙夫莱教授从斯特加特给我的一
封信。沙夫莱在脱离维也纳的霍亨瓦特内阁以后，回到斯图加特，在这里以研究学术度日。一八七四年他出版一本小册子，名《社会主义精义》，他在书中给与社会主义以客观的评价，因而这本书轰动一时。他现在又把他的三卷著作《社会机体的构造和生命》的第一卷寄来，并附一信，内容如下。

他不知道，我从关税委员会以来是否还记得他。从那时起，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但常常常常听到彼此的消息。虽然我们对于人生的理解有若干不同之处，但对于社会问题我们都仍然深感兴趣。所以他对我的新书寄给我一册，大概我对其中很多说法会感兴趣。如果我愿意接受他这本深费思考的书，作为纪念，他将感到欣慰。

我相应地作了答复，并且还特意向他他在参加霍亨瓦特内阁时努力为被剔为“叛国犯”的邵美、莫斯科、奥伯温德等取得赦免。

一八七七年夏季，沙夫莱到莱比锡来拜访我。我们谈话很久。谈话的主题是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何时可以胜利。我这乐观主义者认为这个时机已经很近，他则相反地认为至少还要等两百年。我们因此争论起来。我在一八八〇年到斯图加特回拜他，我们同样地又作一次长谈。这说明，他对我们也总是友好地对立的。但在以后几年，他却完全变了。俾斯麦在开始实行社会保险法以后，认为他的那些精密参政对这方面懂得太少，于是注意沙夫莱。沙夫莱也很想领受德国意志帝国的官职。为了不让对他有任何不利的成见，他现在写了一篇文章，名《社会民主主义的绝望》，这表达了和他以前的见解相反的见解。海尔曼·巴尔在幼年时代也同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地热于社会主义，他为此写了一本小册子，书名《沙夫莱先生的无知》，书中对沙夫莱及其作品作了中肯而幽默的嘲笑。我和沙夫莱的关系从一八八〇年起终止了。但是他想做政府官吏的希望，如所知，终未实现。

228
自一八七一年到哥达的统一代表大会

各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

在统治集团中，巴黎公社引起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极大恐慌。公社在一切具有社会主义运动的国家中得到了工人的同情，这种同情被看做是最讨厌的，并且使厌恶继续增强。再加上资产阶级和政府对于国际的力量所作的夸张的——姑且不说可笑的介绍。例如，巴黎公社虽然有法国银行的财力和巴黎各兵工厂贮存的弹药和武器可供支配，仍然说国际供给了公社二百万法郎、几千支枪、弹药等。此外，从九月初起，即从德国人势力包围巴黎时起，也就是还在资产阶级政府执政之下，就已经实行全民武装了。在德国也有不少的响亮呼声要求对社会主义运动采取严厉的措施，这要求是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们所乐于接受的。在这种情形下，加里波第的态度是十分公正的，他在给《罗马纽尔》编辑卡波雷拉（一八七一年八月）的一封信里写道，国际所代表的是社会中为少数特权者之故而受害者的多数部分。因此，他们必然拥护国际，如果说它的机构中有缺点，那就必须改善它。

虽然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在奥地利无关重要，而且霍亨瓦特—沙夫茨内阁也没有显出要进行迫害的丝毫倾向，可是首相冯·博伊斯特伯爵仍应俾斯麦的邀请前往加斯泰因参加两国皇帝及其首相的会议，商讨取缔国际的办法。沙夫茨曾劝阻这个会议，但他与博伊斯特不睦，而且博伊斯特还想借此同他多年来的密切敌人会一次面，俾斯麦则为了将来的外交政策，希望同他一八六六年的敌人接近一下。就众所周知的而言，这次关于
国际所达成的协议是，首先要“研究”社会的局势。

但是在这期间，一个意大利的阿马谢亲王做了西班牙国王。一八七八年二月间，他的政府在致列强的一个通电里发出呼救声，说国际努力违反人类的一切传统，消灭精神上的上帝，从生活中取消家庭和世袭制，并且通过它那可怕的组织形成莫大的危险。所以西班牙政府希望有一个大国来担任反对国际这件事。这个要求遭到了英国政府的冷遇。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勋爵复西班牙政府一封公文，这封公文打消了西班牙政府任何进一步行动的兴趣。他宣称，尽管国际是世界各地工人和职工会联络的中心，它在英国却主要仅限于给罢工工事提些建议。而且它的金钱也很少。根据英国现行法律，一切外国人都有绝对的权利到英国来居住，在居住期间，他们同英国的臣民一样受法律保护。他们只有犯了法，经过公开的诉讼程序，并有以公开审判手续提出的证据为佐证的判决，然后根据正式法院的宣判，才能予以惩治。任何外国人，除非根据与外国所订互相引渡刑事犯的条约而加以遣送外，不能驱逐出境。最后格兰维尔说，直到现在还没有理由来修订有关外国人留在英国居留的现行法律。

由于英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一切反对国际的国际协定都没有可能了。最后，国际于一八七八年九月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以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前者马克思，后者巴枯宁）之间发生分裂而告结束，国际的这个结局也向最胆怯的政府指出，所害怕的危险暂时不会发生。并且国际把总委员会由伦敦迁往纽约，这证明它自己也认为它的改组是必要的。

既然这样没有对社会主义者进行国际迫害的希望，俾斯麦却更加努力坚持在德国通过特别法令来迫害工人运动。这方面于一八七八年四月底他在上院的发言，在发言中他声明，对付国际党（他这样称呼我们）也要像对世界的神甫（中央党）一样，有用严厉
的法令的必要。

这次宣布以后紧接着就是行动。一八七三年六月初，他提交国会一个出版法草案，其中第二十条这样说：“凡在印刷品中用破坏道德、法律意志或爱国热情的方式攻击家庭、所有权、普遍兵役义务或其他国家制度的原则者，或者把法律上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描写为值得仿效的、有功绩或理应如此的行为，或者以危害公共治安的方式讨论公民社会关系者，均处以二年以下监禁或要塞拘留。凡借出版物进行德意志帝国刑法法典第一六六条（违反宗教罪）所规定的行为者，处以三个月以上到四年的监禁。按照第二十一条，定期刊物的负责编辑人应与当事人同罪。

这些凶恶的规定改变了刑法的主要实质，使那些有受刑之虞的问题不可能作任何科学的讨论，此外，对一切党派都可以运用，于是这些以及其他规定使国会多数派也都顾虑重重。法律草案被否决了。

但是俾斯麦认为他的出版法草案还不够。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又建议修改和加重工商业条例第一条三天，以往最多处罚三个月禁闭的情况，现在可以判处六个月，甚至一年。此外他还建议修改工商业条例第一〇八条，根据新条款，雇主和受他雇用的工人之间的争端应由劳资仲裁机构来决定，这机构的主席应由有关的联邦的最高司法监督机关选出，陪审员则通过区代表会议选举。因会期终了，法律草案没有解决。

次年继之而来的是破坏契约法草案和新的出版法草案，以及一八七五——一八七六年会期中的修改刑法法典的草案，最后是在一八七八年春季在暗杀事件以后的取缔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因为从一八七八年以来社会民主党通过它的代表又能在国会里发言，我还要更详细地叙述对于这个法案的处理。
两个派别的合并问题

一八七二年以来，对社会民主党两个派别所进行的迫害的性质，按说应该唤起它们对牢固团结和统一的要求。但是对于这点，暂时还感觉不出。在一八七二和一八七三年间，两派在报刊上的互相攻击，还较以往更加激烈，报刊上的声调也蔓延到集会上。当时因为除约尔克外，奥艾尔是我们最热心的很有影响的鼓动者，所以他俩特别尝到这种斗争方式的后果，尤其是奥艾尔在柏林作鼓动宣传时，他俩常常写信到胡伯图斯堡向我诉苦。不过奥艾尔还讲到特尔克的学说和特尔克分子。由于这些事情，奥艾尔有几次在党代表大会上讨论到统一问题就采用严厉的声调，还有他在哥达统一代表大会上的态度，都得到了说明。但这并不妨碍他诚心诚意合并，既至合并在他的协助之下终于到来时，却再没有人能比他更加努力来调解在多年激烈斗争后必然存在的种种私人之间的对立。

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二到二十五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柏林代表会议中，第一次正式讨论了统一问题。在会上，早全德职工会会议上表现非常和解的会员哈尔姆，以爱北斐特同志们的名义建议“大会应当寻求方法和途径，使德意志工人党的各派别统一起来”。这个建议在对我党进行强烈攻击之下遭到激烈的反对，最后决定转入境事日程。

一八七二年九月七日到十一日，社会民主工党在美因茨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莫特勒和瓦尔特希担任主席。来宾中有哈同（维也纳），他现在代表瑞士职工会。一八六九年，在维也纳叛国案开始时，也要把他逮捕起来，他却逃脱了。他在苏黎世多年，从事于瑞士的运动，后来引退，当了大木工场的主人。在苏黎世过着富翁
的生活。哈同的亲密友人奥伯温德留在奥地利当《民意》报的编辑。对他发出的驱逐令撤消了。但是他现在在奥地利工人运动中所充当的角色越来越模棱两可，最后导向分裂。他并不经常居住在奥地利。在反对社会党人时期，他住在巴黎，我们巴黎的党内同志怀疑他为普鲁士警察服务。他同党告别了。后来他回到德国担任《德累斯顿公报》（这是一个市政会的官报）的主编。一九一一年，奥伯温德辞职回到故乡兰河上的维尔斯堡。

我在叙述哈同时所以附带在这里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在我这个作品中屡次想到奥伯温德。安德阿斯·邵尔也是当时奥地利运动中的领导人之一，他同奥伯温德发生冲突，遭到严重迫害而逃亡国外，到英国去了。

在美因茨代表大会的五十一个代表中，年轻的卡尔·格利仑贝格第一次露面，当时他已在纽伦堡工人运动中初露头角，因而受到他在里面做矿工的那个克莱麦一科列特工厂的处分。

大会上也曾讨论了统一问题。首先是布伦诺·盖塞尔的一个长篇的建议，他严厉谴责《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对《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笔战。他要求《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立即停止笔战，这类事情只有经党委会批准才可以。这个建议被否决了。此外还讨论了三个全是拥护统一的建议。最后通过了下列建议，其他建议也因而解决了。

“全德工人联合会按照它的社会主义原则乃是社会民主党工党唯一的天然同盟者；因此，代表大会向委员会建议，不断作新试探同全德工人联合会取得原则上的合作；此外应负责使所有不喜欢254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基层组织持和解态度，《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应立即停止对全德工人联合会及其领导人的任何论战，即使全德工人联合会方面有新的敌对行为，如果委员会不是例外地认为绝对需要作就事论事的答复，则仍以缄默作回答。”

233
此后不久，一八七二年九月二十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一篇以《给爱森纳赫党的工人的一句正经话》为题的文章，文中还是保持着老策略，对我们不称党的名字，而且在党内制造工人与非工人之间的对立。文章中，《人民国家报》曾一字不遗地加以转载。严厉指责《人民国家报》和个别党员不遵照美因茨决议而对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所谓攻击。在它那方面，经常只是站在自卫的地位，然而《人民国家报》却是攻击者。于是《人民国家报》在九月二十八日一篇以《一个答复》为题的文章里作了答复，文章署名“编辑部”，把每个批评都加以驳斥。这篇文章是李卜克内西和我在胡伯图斯堡起草后送到编辑部的，结尾说：“我们愿意从现在起对《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停止一切笔战，条件是：1. 要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承认我们的党是一个社会民主党，并且在提到它时，无论何时都要称呼它的正确的名字；2. 要停止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攻击。

我们这方面仍按以往的常例声明说：1. 我们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当作我们的党内同志，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全德工人联合会里某些人物长久抱着断然的怀疑，直至我们怀疑的原因得到明确的反证为止；2. 我们声明，准备支持召开两派的共同代表大会来商谈如何统一分歧点的建议。即使统一以至合并还不可能，那么至少必须拟定一个共同纲领并规定共同行动（在选举、鼓动等的时候）的活动形式，应由一个双方平均选举出来的委员会来主持执行规定的各点。此外，我们希望设置一个由双方平均选出的仲裁机构，以便调查和判断由两派的一方对他方各成员所提出的控诉。我们愿意指出，我们已把类似上述的建议一再向全德工人联合会成员暗地提出，而且他们也同意了。”

在美因茨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工党以极其郑重的形式正式表示了和解的心情，现在握住那只伸过来的手，把和平给与德意志工人界，就落在全德工人联合会身上。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用毫无意义的遁词来答复这个建议。当后来不久拉萨尔派在柏林用暴力解散我们党内同志的一个集会时，《人民国家报》对《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一篇形似宣战的文章，结语说：“必须使工人事业的公开叛徒不能为害。”

两派之间的斗争因此又燃烧起来，在两个主要报纸上互相攻击，并且双方互相指责非常激烈，好像统一这件事较以往更加渺茫了。最后在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日的选举时，《新社会民主党人报》要求它的第十七萨克森选区的会员不要反对我的再度当选，这必须看做是两派在相互对待的态度上有了进步。

使我们这方面很不愉快的是，F. W. 弗里茨舍原本在一八六九年在爱森纳赫参加建立社会民主工党的，现在忽然又倒向另一方面来反对我们。

在这次互相斗争中，驻在布勒斯劳的由盖塞尔领导的监察委员会认为应当申诉《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因为它擅自作了和解的建议，由此又引起了对《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斗争。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下次代表大会答复了监察委员会。

* * *

在那时进行的警察迫害方面，莱比锡警察局长企图使德国其他地方的同行相形见绌。他在解散狂和驱逐狂上又附加一道不准人们参加海牙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禁令，以违者处以四个星期监禁为威胁。他也禁止支部发展成员和为国际募集款项。当后来赫普纳不顾禁令前往参加海牙大会时，遭到了所警告的命运。他被判处四个星期禁闭，并在次年春季根据这个处罚被逼出莱比锡，后来他在莱比锡周围地区屡次遭到同样的惩罚。而且因为他同党委会也有冲突，遂决定迁居布勒斯劳，那里设立一个出版社。

赫普纳恼恨党委会，特别恼恨约尔克的担任书记，他只看到了其中顽固的拉萨尔分子和党里的恶劣精神，致使他通知马克思
和恩格斯说，党看来是异常阴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切拉萨尔的东西都抱着过分的怀疑，所以赫希纳这个叙述就足以使恩格斯，同时以马克思的名义，写给李卜克内西一封劝告信。李卜克内西把信的内容通知我，我因此写给马克思下列的信：

“胡伯图斯堡，一八七三年五月十九日。

尊敬的朋友！

……自从上次写给您一封关于施韦泽的信以后，已经五年多了。这个人幸而垮台了，自从那时以来还有许多别的人也垮下来了。然而我们的党却大大兴隆起来，我希望再有五年，它能够达到发表重要意见的地步。赫希纳似乎向您和友人恩格斯把我们党的情况描写得非常暗淡，非常不正确。关于这我曾详尽地写信给友人恩格斯，他也会通知您的。大致说来，我认为党的情况是完全令人满意的；所有缺点都会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克服掉，当然也有必要保持适当的和气而不要强行争辩。我以为主张和气，是因为我深知，持异议的人也对党的利益怀着最大的诚意和谅解。在这种情形下，我认为严厉对待意见分歧，从而激起分裂，是不正确的。但是请您不要认为，我们会因此把和气变成软弱，和气是有止境的；而且我们并不缺乏财力和权力来贯彻我们的意志……

李卜克内西希望您能把它著作当作一篇批判论文的对象，我也完全赞同。这样的文章是完全必要的，为了能达到必要的作用，必须是您而不是别人来发表它。这样的批判可以在各方面为德国的党铺平道路。

为了新版的《共产宣言》，我曾同李卜克内西商谈过多次；但因考虑到末段，我们不能冒这个险。这件事会马上给我们套上个叛国的罪名。宣言固然当作文件印入此等叛国案的册子中，也印制了几百本单行本，但是这还不够，必须能够大力介绍和公开出售。这个文件再配上一篇合适的序言，就会使许多人醒悟，它将证
明拉萨尔派的建议是如何极没有价值。请您考虑一下这件事。
友谊的敬礼

您的信倍尔。”

我给恩格斯的信的主要部分是:

“您上月十七日给李卜克内西一信的内容，我已知悉，因而奉上数行。赫普纳关于我们党的处境所谈的显然是过甚其辞，而且特别把约尔克的影响和企图说得很坏。赫普纳这种举动，我不以为怪，他是一个非常正直忠诚的同志，但是容易动气，由于一系列的争执他对委员会而且特别对约尔克非常忿怒，认为他们坏到极点，所以措辞也极为严厉。”

于是我详细详细地分析赫普纳和约尔克为什么成为不可和解的对头，继续说道：

“约尔克除缺点外也确有优点，他十分热心地进行鼓动和按时催缴会费，这件事是很必要的，而且是从一八七〇年的混乱时期（不伦瑞克委员会被捕）以来就陷入了混乱状态。这里是他的领域，这方面他确是有些功可述的。

第二点是我们对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的态度。如果您认为，我们可以不顾一切地进行，而不至于对党有严重的损害，那么您将同赫普纳一样确实陷入错误了。对拉萨尔的崇拜必须连根拔掉，这我是完全同意的，对于拉萨尔的错误观点，也必须进行斗争，但要谨慎从事。您在那里对我们的情况不可能判断清楚，而且赫普纳也太不切实际。

请您不要忘记，拉萨尔的著作事实上（这是不容辩驳的）以其通俗的语言奠定了群众的社会主义观的基础。这些著作传播在德国，比任何其他社会主义作品多十倍、二十倍，所以拉萨尔享有这样大的声望。这种声望，通过您已充分知道的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施韦泽等人的媒介，被提升为崇拜，虽则这种崇拜由于群众
的健全感情和我們自己的活動，已經大大降低，而且天天在繼續降低，可是如果以魯莽的行動傷害這種感情，卻是不明智的。

在我們自己的党内，对拉薩尔的崇拜差不多已經絕迹，但还有个別地方，例如萊茵区和西里西亚，这种崇拜仍有信徒，而特别使我們不可太粗暴从事的是，以前哈茨費尔德罷工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很多工人越来越同我們接近，并且部分已經加入我們方面。至于拉薩尔主义在德国有时在占上风，是絕不能設想的；所以我們任事務安安發展下去，哪里有打击这种特殊拉薩尔主义的机会，就在哪里打它一下。我认为，《人民国家报》一直以来就是這樣做，如果約尔克和另外几个人为此发怒，那就随他們便吧。

如果友人馬克思依照李卜克內西的願望（我所完全同意的）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几篇持客观論調的文章，科学地证明拉薩尔的理論的錯誤和缺点，就会给拉薩尔崇拜一个致命的打击。馬克思在经济学领域的学术权威，是确定无疑的，所以这样一篇著作会发生莫大的作用。請您協助我們，促請友人馬克思为党做这一工作。

把以上所述簡單扼要說来，事情是这样，約尔克的影响是不重要的，他本人决沒有危险性：拉薩尔主义在党内也很少传播，只是考虑到許多诚实的但被引入歧途的工人，在适当的对待下对我们是可靠的，所以要謹慎。

我希望在这次說明以后，您不再迟疑与《人民国家报》保持合作。引退（恩格斯曾以此为威胁）会是您所能做的最錯誤的事，这样一来，您将給敌对分子一种它所绝对沒有的重要 性，而损害了党……

友誼的敬礼

您的倍倍尔。

威廉·布洛斯代替赫普納为主任編輯。布洛斯以前曾在南德意志充当很多民主报纸的編輯，后来做我們党報《佛尔特民主周
报》的撰稿人，而该报的主要读者群众却在纽伦堡。布洛斯于一八七二年加入党和国际，代替被捕的科科斯基为《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的编辑，以后为《人民国家报》的编辑，李卜克内西被释放后，他于一八七四年秋季脱离《人民国家报》，以便依照李卜克内西的愿望受任美因茨的《南德意志人民之声》报的编辑。

在那些年代，对《人民国家报》的司法迫害非常厉害，经常有两个；有时三个责任编辑被捕入狱。我们的其他党报大半也与此相似，当时除了《人民国家报》外，还有《不伦瑞克人民之友》、《德累斯顿人民通讯》、《开姆尼茨自由新闻》、《克里米亚市民和农民之友》、《佛尔特民主周报》、《候夫日报》、美因茨的《南德意志人民之声》和《屠林吉亚人民通讯》等，都是党报。

那时的领导人物都或多或少和监狱结识过，很少例外。在萨克森，还加上由地方和由整个专区驱逐出境，被驱逐出境的人中除奥斯特和赫普纳外，还有奥艾尔、达士诺、吕塞尔、穆特、吕特、乌佛特，后来还有麦克斯·凯塞尔。

一八七三年爱森纳赫的党代表大会

巴伐利亚在那时也在反动势力之列。党委会定于一八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起在纽伦堡召开党代表大会。七月三十一日，纽伦堡市的国王特使传引巴伐利亚结社集会法第十七条禁止开会。并且召开代表大会亦恐违犯帝国刑法第一百〇一条、一三〇、一三一各条和第三六〇条第十一款。委员会立即改在爱森纳赫召开大会，所以对这个奇怪的禁令并未提起申诉。现在莱比锡的警察局长吕得尔以为不应该落在纽伦堡特使之后。于是他也不妨碍那些爱森纳赫次会议，违者处以四星期监禁。事实上由于这禁令，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莱比锡没有代表。

这次大会出席代表共七十一人，代表一百三十二个地方的党
员九千二百二十四人。大会由盖布和莫特勒主持。在讨论过程中也曾提到梅明格的讨厌事件，这事件使纽伦堡一佛尔特的党员同志发生了许多年的分裂。站在梅明格方面的右格利伦贝格，反对他的是奥艾尔和勒文施太因。大会大多数决议，梅明格做于党有害的事犯了错误，他并且通过一系列的行动置身于党外。

关于统一问题的讨论，虽同样列入议程，但由于全德工人联合会五月间柏林代表会议所采取的态度而受到极不利的影响。在那次代表会议上，弗罗梅、哈森克莱维尔、哈特尔曼和其他发言人都坚决反对要求统一的建议。最后全体对三票通过了希特尔（王兹培克）的一个由特耳克、哈尔姆（爱北斐特）、达斯巴赫（哈瑞）连署的建议，建议说：

鉴于：1. 所谓‘社会民主工党’本是在一八六八年纽伦堡的舒尔采一德里奇的工人教育协会联合会和一八九九年爱森纳赫的代表大会上创立的，其目的只是想通过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之外再创立第二个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党派，它提出一个好像在政治上更为革命的纲领，以便吸引工人并由此导致德国工人的分裂，来破坏德国的工人运动；

鉴于：2. 莫・施韦泽先生现在同所谓‘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们的合作是共同搞垮和消灭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个组织的最确实的证据，消灭全德工人联合会是社会民主工党领袖们的主要目的，他们为了这个目的不惜同那些真正无疑的反动分子相勾结；

鉴于：3. 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组织和策略是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纲领和组织完全不相容的，

所以大会同意今年一月五日全德工人联合会理事会的决议，决议是：

考虑到对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在原则方面和形式方面都绝对没有理由为了同爱森纳赫党合并而改变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
还考虑到，那个党的成员原可以任意按照全德工人联合会章程来参加联合会，联合会正是通过它的强有力的组织以及显然多得多的会员人数提供了团结工人的最好基础，

所以理事会把爱森纳赫党的所谓统一建议搁置不议而按议程进行讨论。”

代表大会收到一批有关统一问题的建议，其中一部分赞成统一，一部分反对统一，一部分想在一定条件下在当今的国会选举中支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候选人。

在辩论中奥艾尔也发了言。他指出，根据以往经验，我们的党已不值得再与全德工人联合会妥协。布洛斯也表示同样意见，他更进一步要求，也不要同人民党妥协，该党在相反的情况下不同意其成员投工人候选人一票。最后奥艾尔为了阿尔伯特（格劳绍）的建议撤回柏林的建议，阿尔伯特的建议是：

“社会民主党把国会选举只看做是鼓动手段和宣传党的原则的考验，拒绝同任何其他党派合作。”

这个建议连同隆斯多夫的同志们的建议一起被通过了，后者是：

“因为我党方面已经采取了使整个德意志社会民主党统一的步骤，而全德工人联合会今年的代表会更却几乎全体一致地拒绝统一，所以代表大会声明，同时党派，不管是为了党的统一或是为了选举，不再作任何尝试了。”

后来当我们党内同志依照这个决议在阿尔托那提出我来对哈森克莱维尔为国会选举的候选人的时候，《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却予以反对。奥艾尔由德累斯顿写一篇登在第一二三期《人民国家报》上的通讯嘲笑它，结尾说：“我在结尾提一句格言，请哈赛尔马拉先生和稻草人哈森克莱维尔加以考虑：先做好事，招来祸殃。”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如何进行笔战。
关于一八七四年初一月十日的选举结果，我已经报道了。那时我们这方面用多少金钱参加国会选举，也许人所关心的。党在整个德国的支出达一千三百塔勒。萨克森邦委员会为了在萨克森选我们候选人的九万一千票花费了七百八十塔勒。莱比锡市和郊区的选举，包括莱比锡郊区复选在内，用去了七百三十三塔勒，开姆尼茨选举用去了三百四十五塔勒，布吕尔堡—奥德朗（盖布的选区）用去了一百六十五塔勒，司波耳堡—什内堡（卡尔克内西的选区）用去了三百五十塔勒。这些数目较之今日为同样用途所付出的费用可谓微乎其微。可是那时与现在却有不同。如今党内同志捐款较多，而选举工作也有报酬。往昔党内同志捐钱较少（因为他们所有不多，并且比今日人数也少），但是他们从事选举工作，多半是没有报酬的。在当时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个别同志必须拿出平均比如今大得多的个人牺牲。当然不可忽视，现今在德国敌人所进行的选举鼓动比从前规模尤其完全不同，因此我方就需要更大的努力和更多的用费。

一八七四年新国会的第一次会合

会议于一八七四年二月间开幕。我们的代表向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建议组成一个议会党团。他们拒绝了这个建议。反之，双方同意在提出建议时互相支持，并且力求在报纸上和集会上双方不再互相攻击。这固然不算多，但其他的也必会随之而来。双方有相当多的党Torrent同志已渐渐厌倦了这种只对敌人有利的互相攻击，他们希望，即使统一还不可能，也要就共同行动达成一个协议。

在我国内，人们不满意于当选的代表们在国会中的态度。人们认为他们发言太少而且讲话不够尖锐。这种愤慨也屡次表现在党报上。这次会期在卡尔克内西被释放后不久即行结束，所以他没有出席会合。我就接到各方面写来的信件，控诉国会中的同志们
所持的态度。这样，我在会期结束后写信给罗伯特·施维舍尔（他在迁居柏林后任《小说报》编辑，因而不能参加公开政治活动），社会民主党议员的态度普遍令人失望。在选举得到辉煌结果以后，人们期待另一种态度。党却没有促进这种态度。《开姆尼茨自由新闻》的发行人吕伯诺写信给我said：“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在国会中巧妙地胜过了我们的同志，因此我们的人大为忿怒。”议员们自己则十分抱怨议长在通知发言时偏向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这种意见也有几分真实。博尔肯贝克代替辛森的职位，这个人，如我上文所述，是国会中最不公允的议长了。使他这种偏袒更加方便的，是取消发言名单，以便尽量阻止社会民主党议员发言。从现在起，议员们必须用暗号先向议长表示要发言，差不多像小学生在学校里对教师表示自己能够回答问题所做的那样。因此，对于这种发言要求看见与否，议长颇不注意和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个要求，都凭议长任意安排。博尔肯贝克肆无忌惮地利用他的职权。因此，后来温德荷斯特和他的朋友建议恢复发言名单。我们现在提出的瓦尔特希为这个建议发言，却被驳回了。于是莫斯特在会期结束前不久在国会中公开检举议长的不公。他虽曾多次要求发言却只得到一次发言机会。这对他好像是一个报复行为。莫斯特在会期开始时，在柏林以前，错误地在他担任编辑的《开姆尼茨自由新闻》上发表了一篇类似对国会的宣战书的文章，宣布将对国会作白刃战。他现在显然自食其果。他能作的唯一发言是关于种痘条例草案，这个发言又失败了。他结束这个短短发言时说：“目前我们要求公共浴室，在我们得到这个以后，我们也就得到标准工作日制了。”无怪莫斯特嘴里的这个结语，引起敌人的一大笑。

但是从这次会议起，还有另外一件受博尔肯贝克支持的以后越来越厉害的不法行为。有一个民族自由党人，希尔特堡豪森的议员，名叫瓦兰丁，曾以律师为业，他经常准备提出讨论终结的建
議。傅尔肯貝克只要想結束辯論，他就將瓦兰丁一個約定的信號，
瓦兰丁就順从地提出討論終結的建議，于是多数派——民族自由
党人和保守党人——就像奉命一样服从这个建議。这种打断发言
的方法在国会中被称为，想发言的议员“被瓦兰丁了”，这就是說，
精神上被砍首了。这种胡闹最后竟发展到把瓦兰丁的終止討論的
建議在办公室预先准备好，由議长随意使用。瓦兰丁的这种活动
博得他的党团的敬意，如国会里所傳说的，在他的生日他們送給他
一小箱印出的討論終結建議。

还有可以表示国会当时情况的是，議员邦伯格尔竞敢称社会
民主党的議員为受容忍的客人，人們可以不許他們有当家作主的
权利。还有卑鄙的表現，即李卜克内西和我在监禁期間，每当点名
表决时总是在名单上注上“未救免”字样，这种胡闹行為直到瓦尔
特希在公開会議中提出强硬的控诉才告结束。

在国会所討論的議案中，有許多是特別重要的。有一个新的
軍事法案要求把現役人数提高到四千万零一千人以上（期限一年
的志願兵还不計在內），而且服役期限为七年。当时自由党人包括
民族自由党人在内，对于反对规定为达五六年，还觉得有宪法上的
顾虑。辯論十分激烈，但是最后俾斯麦以辞职相威胁，于是民族自
由党人屈服了，接受了这个法案。在第一讀时哈森克萊維尔发言，
在第三讀总辯論时莫特勒发言。二人都要求成立国民军。在这次
辯論中毛奇曾为議案作辩护，后来常引用他所說的話：

“我們用武器在半年中所爭得的东西；我們就要在半个世纪内
用武器来保卫它，以免它再被夺去。在这一点上，我的先生們，我們
不可陷于錯誤：自从我們战胜以来，我們到处赢得尊敬，而沒有一
处赢得热爱。”

我們在一八七O——一八七一年所屡次預言的話由此证实了。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的后果，即吞并阿尔薩斯—洛林，在欧
洲造成越来越紧张的局面，给俄国造成了优势地位，并且不断引起新的扩军备战。对于我国关于国民军的建议，毛奇说：“我的先生们！枪支发出去容易，但是再收回就困难了！”（大笑。）

议员克林克罗特建议服役期间二年，瓦尔特希表示赞成，盖布反对，卫特和席勒亦有反对。哈森克吕维尔、哈赛尔曼和莱迈尔提议，准许五十四万人服役两个月，一万八千人再继续十个月，此后并实行十四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受军事训练。这个建议只有提案人投票赞成。对于这些表决社会民主党议员的活动并不突出。

第二个对工人阶级重要的议案是工商业条例的修正案，这是把上次会期的议案在形式上略加改变又拿出来。这一次人们勉强同意把第一五百条订得更加严密，即违反该条者处以最高处三个月的监禁，今后则改为六个月以下的监禁。但是，在新的第一五百条甲款里却建议，破坏合同者处以一五○马克以下的罚金或禁闭。在滥设公司时期，常因破坏合同而发生罢工，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因为减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以及不遵守规定的停工通知期限而举行自卫性罢工，这些罢工使企业家极为愤慨。企业家向联邦政府和国会提出增加的风潮，以期达到对违背合约者处以刑事处分的目的。联邦政府以第一五百条甲款的提案应允了这个要求。此外还有以往已经提出的有关工商仲裁机构的条例再度提出，不过略加修改，即高级管理机关可以决定陪审员的选举是否应由参与的工人和雇主来举行。哈赛尔曼对于这个法律草案有个很好的发言。我们这方面派德国参加委员会，但是没有参加讨论，只作个沉默的旁听者，因而各方面对他都很不满。委员会删去了违背合约的条款，同样拒绝了加重第一百五三条；此外并决议，工商仲裁机构的陪审员只能通过利害关系人的普遍选举来产生。但这个草案在全体会议中没有讨论。国会的多数派方面暂时还不倾向于订立特别规定或加重要现行法令。
第三个重要提案是出版法草案。在这个草案里包含有去年的第二十条的下列条文：

“凡是借印刷品把不服从法律或违犯法律说成是允许的事情或者是有功的事情的人，处以二年以下徒刑或监禁。凡是借印刷品从事德意志帝国刑法第一六六条所规定的行为的人，处以三个月到四年的徒刑。”

哈赛尔曼对这草案也作了一个好的发言，除他以外还有盖布发言。草案的第二十条在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被否决了。此外，该法令取消保证金并禁止现行的报纸印花税和广告税。该法令实际上只改善了普鲁士、不伦瑞克和沙克尔登堡历来的情形，而对于萨克森、中德意志和南北德意志各邦却造成了种种恶化，一部分是严重的恶化，所以该法令是否被接受，起初还是疑问。这里也同帝国一切其他重要法令一样，改善总有恶化与之对立；一个对于大家都意味着基本改善的政治法令，国会是提不出来的，它总是对政府压力，即对一切反动事物的代言人普鲁士让步。

应该提一下，在会期开始时又提出了在会议期间把我暂时的建议，但结果还和以往一样是被否决的。赞成建议的发言人是瓦尔特希和哈森克里韦尔。进步党认为提出也无济于事，所以拒绝支持这项建议。

社会民主党的两派在国会中讨论问题时常常不得不共同合作，这事实对于所有希望两派合并的人们是一股促进协商的新推动力。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到六月五日的

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向这里迈出了第一步。F. W. 弗里茨舍、哈尔特曼（汉堡）、迈斯特（汉诺威）等人提出建议，要声明：“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认为德国一切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必须联合起来，以便达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后目的，并提议为了给这样的联合开辟
道路，他们在一切公开集会上以及在报上不要再互相斗争和敌对。关于联合的总结报告，在爱森纳赫派代表大会确实表明它也真诚追求联合之前，还不能提出讨论。”

这个建议虽然经过长时间辩论后以五十对十九票被否决了，但辩论显然是以与从前谈这类事情时大不相同的感情进行的。

社会民主党在下月，即六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在科堡举行代表大会，李卜克内西自一八七一年以来第一次又出席党代表大会。同盟问题在这里也拿来讨论，并提出了各种建议。盖布以常务委员会名义所作的报告中对这事已经说：“如果我们最后还要叙述一下我们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态度，那么我们的叙述只须确认，自从国会选举以来，旧恨就在动摇中。对此大有裨益的事实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现在被人从上面用与衡量我党的标准相同的标来衡量它。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态度实际上还是保守的，从它的代表大会上所提出关于联合的建议在六十九个代表中只有十九票赞成而被否决，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我们要相应地保留，首先要注意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根本态度，因为由此可以为我们联合策略的准则找出基本的、即使不是最根本的时机。”在后来继续讨论关于联合报告时，奥艾尔也讲了话，他对这问题态度仍然冷静，以悲观的口吻说：总的说来，我们大家都赞成联合，但是双方在原则上的分歧还很尖锐的时候，真正的联合是不可能设想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这方面所显示给我们的希望很小，这表现在它最近的决议中，仍按本派自称为“拉萨尔派”。我们对和解的梦想直到现在没有多大益处。达成联合的唯一方法是：加强我们的力量并使拉萨尔派感觉到我们的力量。我们仍站在二年前在《人民国家报》上公布的联合方案的立场。（参看三八八——三九□页。）为了讨论联合问题，可以召开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伯恩施坦对于这个问题比奥艾尔乐观。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已有许多会员赞成联
合。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经过证实了他的理解。他说，为了求得谅解，他也赞成召开代表大会。李卜克内西在一个较长演说中说，即使合并最近还不可能，也必须为联合而努力，随后合并会自己到来，台森多尔夫先生和事实的逻辑会照管此事，如果领导者不一起来照管，就会不顾领导者而来照管这件事。美特勒报告了关于以哈森克莱维尔和哈赛尔曼为一方面以我们的代表为另一方在柏林举行的会谈的情况。哈森克莱维尔和哈赛尔曼曾宣称，因为全德工人联合会是个绝对较好的组织，所以合并是不可考虑的。但对于在报刊和集会上上和睦地并肩行进双方却是同意了。最后以绝大多数通过了盖布的一个建议，建议说道：“代表大会声明，它倾向于两个德意志工人党派的联合。至于这种联合的方式则有待于下次会议由委员会和党的国会议员方面提出建议。此外党会转而讨论议事日程。”

在科堡代表大会上也曾经对一事发生热烈的辩论，即有些党员同志常常以不合时宜的热心在较大地区发立财政不甚可靠的地方报纸，然后使党十分为难，因为从此以后不得不计任何代价把这种报纸维持下去。大家知道，直到最近还屡次发出怨言。有不少的这类报纸难以维持，而给党的领导造成严重的忧虑。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有些报纸被打垮，这对一方和他方可以说是好事；它们至少是在战场上对优势敌人作斗争而光荣牺牲的。

科堡代表大会也曾讨论修改纲领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提出了一批建议，其中也有白拉克的建议。科科斯基一格利伦贝格及其伙伴的一个建议说，大会承认纲领需要修改，但考虑到问题在目前还不成熟，所以把修改纲领延至下次代表大会办理。这个建议在长久辩论后被通过了。纲领的修改应在报刊上提出讨论。

此外还举办一些公开演讲，其中有李卜克内西和美特勒讲的关
于社会民主党政治地位，约尔克和格利伦贝格关于工业和乡村的工人问题。格利伦贝格讲后面一个题目，作了一个对于这个问题富有启发性的好演说。

台森多尔夫为联合开辟道路。联合的商谈

盖布和李卜克内西说得有理，由于全德工人联合会现在遭到由上面来的同对我们一样的待遇，这就促使他们倾向于同我们合并。一八七三年夏季，检察官台森多尔夫由马格德堡被调到柏林市法院，成为这种迫害最重要的实行者。他在柏林市法院的第七庭中遇到该庭庭长赖希，陪审法官冯·欧索夫斯基和基尔式这三个意气相投的人，他们对于他的“救国热情”在各方面与以支持，在长久年代里在对很多党员同志的案件中成为真正的血腥法官。

台森多尔夫在马格德堡已经获得社会主义者的凶手的称号，其结果当然是，他所迫害的和痛恨的党，每次受到他所进行的打击之后就更强盛，更有力了。他是我们这个具有大量因名求利的时代中最恶劣的一个。早在一八七一年，台森多尔夫因为在我们的叛国案中没有插上嘴，就显得那么懊丧。这有下面一件事作证明，我把这件事叙述得详细些，因为它把这个最狂热的社会主义者的死敌暴露得很清楚。当我们在牢里不能自卫的时候，《马格德堡报》曾在莱比锡的通讯中屡次对我们肆意谩骂。随后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在苏黎世一个由侨居该地的德国人假座当地音乐厅举行的庆祝胜利大会上，发生了巨大的骚乱，据《马格德堡报》的莱比锡通讯说，我们是那次骚乱的动作者，而我们苏黎世的党员同志是执行者。附带说明一下，后来法庭确认我们苏黎世的党员同志同那个暴动毫无关系。因此，我们的律师奥托·夫赖塔格在马格德堡市法院和地方法院对《马格德堡报》提出了刑事诉讼。使他吃惊不小的是，检查官台森多尔夫在一篇长文中证明他拒绝由官方来
控诉《马格德堡报》。他在文中还对我们的一切行为作了冗长而讨厌的政治性的研讨。夫赖特格答复说，他从来没有想央求普鲁士王室的检察官来援助我们，这有他的刑事诉讼呈文可资证明。此外他应该把台森多尔夫干涉与他无关的政治事件认为是越权的行为而加以驳斥。一个月后，台森多尔夫又写信给夫赖特格重提这件事，在信中他轻率地承认，他直到现在还在等候《人民国家报》发表他的信件。如果是顾虑到他本人而未发表，那他愿意奉告，这是用不着顾虑的。夫赖特格于四月二十八日给他一封尖刻的回信，结尾的几句话是：

“您在当前事件中的整个态度给我证明了，即使您对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先生的那种苛刻行动没有大肆公开宣传，您也可以荣任普鲁士王室的检察官和警官了。您可能另找路子去印您那个信件吧。”

台森多尔夫发迹了。他后来升任莱比锡最高法院的检察官。但他没有能实现他那作普鲁士司法部长希望和欲望就死了。当时在此莱菲尔特另外还有一个热中利禄的检察官，在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竟公开警告居民订阅《人民国家报》。这是无耻之尤。

台森多尔夫充分符合他的上司，特别是俾斯麦所寄与他的期望。此后几年内柏林经他的建议而在臭名远扬的第七法庭判刑的人为数甚众，而且判决越来越严峻残酷。但是我党同志的反抗也与迫害同时增长，如果台森多尔夫和第七庭的法官在临终时诚实得清算一下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说：我们是徒劳无功的；我们毁灭了无数生灵，破坏了许多家庭的幸福，并且以严酷的判刑摧残了许多人的生命，但是我们原想控制的运动，却把我们控制了。我们是失败者。我们想消灭的那些人依然是胜利者。

一八七八年，莫斯特在柏林因为关于巴黎公社的讲话被上述法庭判处一年半的监禁。柏林最好的组织者排字工人汉士同志，
因为排印一首诗而被判一年监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 A．卡培尔被判九个月，但被高等法院减为三个月。弗罗梅也是被判九个月而高等法院减为六个月。大批其他同志也被处以同样重的，一部分还更重的处罚，这些案件所涉及的几乎全是些起诉无效的事情，如果在其他法院，不过处以几个星期的监禁或者罚款而已。在某些集团里，神经过敏症有加无已。一八七四年，整个普鲁士在一百零四个案件中有八十七个拉薩尔分子共被判监禁二百一十一个月又三星期。在薩克森也与此相仿，判决也越来越严酷。以往论月就够了，现在论年来处罚。我們党的人在被刑者中占主要份額。

与司法判刑同时进行的是警察的制裁和解散。柏林全德工人联合会六月底被警察封闭，以后当该会主席哈森克萊維尔把会址移到不来梅时，他因为违犯社会法，被判监禁两个月。此外，在柏林遭解散的还有社会民主工党的支部、劳动妇女协会、全德鞋匠协会、全德细木工协会和全德泥水匠协会。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警察仿效他们柏林同志的榜样，也解散了那里现有的大多数工人组织。还有汉诺威、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和其他地区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以及社会民主工党的各支部都遭到警察解散。薩克森和巴伐利亚也不落在普鲁士之后。所以在慕尼黑、纽伦堡、艾尔郎根、侯夫的工人组织也都垮了台。同时，在慕尼黑有一系列的工会组织也被解散了，其中有全德裁缝协会，画匠、油漆匠和镀金匠工会，全德五金工人协会和全德木匠协会。

所有这些事情都有助于使甚至最反对的分子明白，面对这种对两派毫无差别地施行的强暴惩罚，只有合并才能提高反抗力量。

因此，一八七四年十月十一日，李卜克内西写给我一封寄往兹維考地方监狱的信，信里说：

“昨夜特耳克在这里，他想同我们合并，弗里茨舍今天给我来
的信意思相同。根据弗里茨舍说，莱迈尔和哈赛尔曼也愿意，至少是联合起来；合并还不可能。余容面谈——国会开幕前八天我来拜访你。只说这些可以确定的是，全德组织要完全解散；特耳克（同他的会晤抄报了）后悔地承认，神圣的组织没有表现它的优点。我们的不顾立即在十一月十五日召开联合会议，使他大失所望，而我又说明，我们不可能再退回到拉萨尔纲领，即使是改革了的纲领也不行，这使他更加失望。特耳克认为，根本用不着提到拉萨尔的名字，总之，拉萨尔崇拜纯粹出于策略性的原因，云云。特尔克的前妻，是受了哈森克莱维尔（他在英法）的委托，并且取得沃德的同意的。这是一派——另一派是哈赛尔曼——莱迈尔。两派之间的所谓公正人是弗里茨舍。特耳克非常痛恨哈赛尔曼。当我问起，哈赛尔曼是否对他——特耳克的措施同意，他回答说：不同意，但他必须同意！当我又反驳他说：如果你们反对掌握《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哈赛尔曼，那你们就会被毁灭，像当年施韦泽对付反对派一样。但特耳克回答说：哈赛尔曼不能有所作为，报纸在法律上的所有者是哈森克莱维尔。”

李卜克内西还写道，他向特耳克解释说，凡在莱比锡不能作决定，他应先到党理事会所在的汉堡，在那里同盖布、奥艾尔等进行商谈。在圣诞节以前召开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而且必须先举行一次讨论会。人们还不必慎重从事。“合并还不可能考虑”，李卜克内西结尾时写道；但是已经开始了，事情就会继续进行下去。

在汉堡大家一致建议，双方以相等人数组成一个委员会，讨论联合的条件并拟订提案。这个为联合的努力在我们党内一为人所知，就收到普遍的欢迎。当窦赛尔同志（兹维考）十月十五日给我一封寄到监狱里的信，他听说正在进行有关合并的协商，我回信说：这我已知道。我很高兴，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人们现在向我们靠拢，并且为和解而伸出了手。如果他（窦赛尔）得到的消息是李卜克内
西“不加思索地”拒绝了建议，那是传闻失实了，李卜克内西在汉堡的行动显然与此相反。李卜克内西和我对这个和平建议是以满意的心情予以欢迎的。“历时八年的斗争费去了我一大部分精力、许多时间和其他牺牲。好了，这个斗争要一劳永逸地胜利结束了。”

关于哈塞尔曼和莱迈尔的鼓动，一八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特耳克由伊塞隆写信给理事会委员沃德（他在哈森克莱维尔服刑期间担任联合会副主席），信里面说道，

“据《人民国家报》的通告来看，‘爱森纳赫派’正在积极地进行联合计划的商谈。如果我们的不满被他们赶过去，那么，我们也必须作最勤奋的活动，同时还要顾到哈塞尔曼和莱迈尔两位先生的反感。特别请注意的是，哈塞尔曼和莱迈尔通过他们在第一一九期《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讲话公然说出了他们的意图，要想毫不顾联合会的领导而完全自由地进行鼓动；对于这些先生们似乎根本没有副主席存在。

因此，从各方面看来，迅速协商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认为必须按下列方式进行：

1. 因为按照哈森克莱维尔的看法，既不能由他，也不能由你或者由理事会委员在这事件上采取正式的步骤，又因为人们到处在等待着我的旅行结果的消息，所以我在这方面为了召集联席委员会会议作些通讯工作，直到委员会开幕为止，是大有好处的……

2. 为了使某些反鼓动不生危险，我必须迅速在乌塔尔河谷召开一个委员会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全权代表会议……”

然后特耳克也为包括卡塞尔在内的南方作出同样的建议并且自谦到法兰克福、欧芬巴赫、哈瑙和卡塞尔去一趟。他在信中接着说：

“哈塞尔曼以昨天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社论，特别是社论结尾的话，已开始了他的反对代表会议的鼓动。”
特耳克在信的末尾请求立刻不倦地行动起来。

哈森克罗维尔赞成特耳克的办法，可是他同卜克内西和其他几个人在慕尼黑监狱中的一次谈话会议，等到他十二月初释放以后再作下一步的行动。于是双方代表为了讨论此后的步骤在柏林会晤了。在那里商定，各方推选数目相同的会员，并各拟好自己方面的关于纲领和组织的建议。而后双方代表相会，根据这两个草案再拟订一个草案，呈交代表大会作为商讨的基础。

哈森克罗维尔给那协会成员的通告进一步公开了正在进行的合并努力的最初消息，这个通告是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与《人民国家报》加以转载。他在通告中说，当他自己知道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大多数会员赞成合并以后，就同也怀着合并愿望的社会民主工党进行谈判。拉萨尔派希望把拉萨尔的观点和要求纳入共同纲领，并且设置一个统一的严格的组织，这可以考虑，但不宜轻率讨论，这一点双方代表是一致的。

合并的消息第一次向群众宣布是在柏林。在这个集会上有七个多从监狱释放的国会议员出席。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一个关于联合的决议，还决定把会议关于通知在柏林的弗斯特和在兹维考的许。

第二次合并运动是在汉堡约克尔克安葬的时候，前面已经报道过，他是在一八七五年一月一日夜间逝世的。两派共五千人拿着二十面旗帜，跟在这个为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后来又为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之一，而且全心全意地为运动服务的人的灵柩后面。

一月十九日，爱德华·伯恩施坦给我一封信，在信里他道歉，因为他身为在柏林举行的民众大会的秘书受委托向莫斯特和我传达大会最诚挚的同情，到如今才履行职务。

“我不知道您对于联合如何想法，但我相信，有一点我们大家
是同意的，即这种关于联合的思想要尽可能长期坚持下去。我决不作幻想，但我知道，就是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中，对于联合的需要也是很大的。可惜那些人都是顽固不化的拉萨尔分子，所以关于这方面我们必须有所让步。”

规定的委员会由双方各八人组成。拉萨尔派委任了哈森克赛维尔、哈赛尔曼、R. 和O. 卡培尔、沃德、赖因德斯、哈尔特曼和瓦尔特，爱森纳赫派委任了奥艾尔、伯恩施坦、鲍克（哥达），盖布、李卜克内西、莫特勒、拉姆和瓦尔特希。以后，一八七五年二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委员会在哥达开会，以便把两个非常分歧的纲领和组织草案打成一片。这个工作很不容易，最后指定由盖布、哈森克赛维尔、哈赛尔曼和李卜克内西组起草委员会。后来该委员会宣称，参与者对于工作结果完全满意。但在党内并非处处如此。当三月五日李卜克内西把纲领草案给我送到监狱来附带说，更进一步是办不到了，这对我好像是个晴天霹雳。我必须顺便说明，李卜克内西虽曾允诺来看我，可是并没来，而且他和莫特勒都不认为值得把有关谈判的任何消息通知我，这已使我有几个月非常激动，愤怒万分。我认为，可以期待会告诉我的。现在我坐下来，写了一封长达数页的、非常刺激的信，在信里我尖锐地批判了纲领并且另外一个确实过于冗长的详细的答案。我又一次证实了，与外界隔离后是多么有利于空想。李卜克内西请我原谅他没有来访我和同我商谈。不过他的工作太忙，此外他还说，在一个官吏监管之下谈论棘手事件不是愉快的事情。这是对的。但是，当一个囚犯知道外面在谈判抓住了他的全部思想和感觉的事件，纵然发言受限制，他还是渴望来一次发言。李卜克内西把我的信送给汉堡的党委会，在那里这封信当然也被拒绝接受。即使我最后放弃了自己的建议，我对纲领草案的不满并未因而消除。除我以外，白拉克也激烈反对这个草案。当他祝贺我四月一日毕竟出狱时，他非常
激昂地表示反对这个纲领。自拉克在最近几年也不得不保持一定
程度的谨慎。他因不断害病，曾屡次实行易地疗养。另一方面，营
业关系（他是他公司的店主的负责人，而且因为创办一个印刷和出
版企业，财务上的负担很重，只有谨慎从事，才能避免严重的损失）
迫使他不能参加党的许多重要事情。结果是自拉克不属于合并委
员会，令人很是遗憾。他告诉我，他给盖布写的信曾提到，纲领第三
部分简直是荒谬的。拿这种胡言乱语传染党员同志，而把反对意
见排斥出党，党员资格也以此决定是否而定等等，这是可耻的。
我们之间展开了书信往来，自拉克在四月十九日写信给我，说：
“这一次，要由我这方面请求原谅了。可是我也这样没有时间，
而且必须承认，草案的第二部分使我非常扫兴，所以不乐于对这件
事勉强挤出一个中肯的时间。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这个草案是无法修改的，必须另拟一个
全新的草案；我现在很愿意同你在马格德堡会晤，但恐怕不能拟出草
案，哪里有时间呢？”

最后他认为，我们既没有时间来彻底讨论，而且谁都没有时间
来草拟一个草案，所以应当把委员会的草案通过批判尽可能加以
改动之后，接受它作为临时纲领。对于被拟的草案的详细节目他
也表示不同意，认为这应该归在一本小册子里。除我之外，自拉克
为了纲领草案也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因而引起马克思写他
那著名的批判，发表在《新时代》第九卷三八五页上。

我因此在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给恩格斯的一封私人信件
中问道：“您和马克思对于联合问题意见如何？我不能作充分有效
的判断，因为我一概不知，我只晓得报纸上的报道。我急欲在我四
月一日出狱时听到和看到事情的情况究竟怎样。”恩格斯给我的回
信如下：

“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二十八日于伦敦。”
亲爱的爸爸：

我已经接到您二月二十三日的来信，并且为您身体这样健康而高兴。

您问我，我们对合并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可我们处境和你完全一样。无论是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给我们一点消息，因此，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所登载的那些，而直到大约八天前收到纲领草案时为止，报纸上并没有登载什么。这个草案的确使我们吃惊不小。

我们党经常委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拉维等、哈塞尔曼等和特耳克等的无理由拒绝，而且就连每一个小孩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就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不能利用我们的党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我们应当以极其冷静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能否达到合并，这取决于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合并基本上接受一八六九年的爱森纳赫纲领或这个纲领的和目前情况相适应的修正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即使不完全放弃国家帮助乃至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附属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要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第一，接受了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
說法，對工人階級說來，其他一切階級只是反動的一咎。這句話只有在個別的例外場合才是正確的，例如，在像巴黎公社這樣的無產階級革命時期，或者是在一個不僅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國家和社會，而且繼它之后民主派小資產階級也已經徹底完成了這種改造的國家里。拿德國來說，如果民主派小資產階級屬于這反動的一咎，那末，社會民主工黨怎么能同他們，同人民黨握手合作了這許多年？《人民國家報》怎么能從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法蘭克福報》中吸取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內容呢？怎么能在这个綱領中列入了整整七項簡直逐字逐句同人民党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綱領相符合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項政治要求，即一到五和一到二，這七項要求中有一項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要求③。

第二，工人運動的國際主義原則在目前實際上已經完全被拋棄，而且是被五十年来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一直極其光榮地實行這一原則的人們所拋棄。德國工人之所以處於歐洲運動的先導地位，主要是由於他們在戰爭期間採取了真正國際主義的態度，任何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都沒有能做得這樣好。現在，在國外，當各國政府極力壓在某一个組織內實現這一原則的任何企圖而各國工人到處都強調這個原則的時候，他們卻打算拋棄這個原則！工人運動的國際主義究竟還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

③ 指的是哥达綱領草案的下列各項：

“德國工人黨提出下列要求作為國家的自由的基礎：

1. 凡年滿二十一歲的男子在國家和地方的一切選舉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絕對的選舉權；2. 實行人民有權提出和否決議案的直接的立法；3. 實行普遍軍事訓練，以人民軍隊代替常備軍，由人民代表機關決定宣戰與媾和的問題；4. 废除一切特別法律，尤其是關於出版、結社和集會的法律；5. 建立人民法庭，實行免費訴訟。

德國工人黨提出下列要求作為國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礎：

1. 通過國家來實施普遍的和平的公民教育，實施普遍的義務教育。實施免費教育。2. 科學自由，信仰自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編者
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共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是对和平同盟中的资产者的‘欧洲联邦’的希望！

当然根本没有必要谈国际本身。但是，至少不应当比一八六九年纲领后退一步，而大体上应当这样讲：虽然德国工人党首先是在它所处的国境之内进行活动（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但是它意识到自己和各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并且经常准备着，像过去一样地继续履行这种团结一致而带来的义务。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一部分，这种义务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罢工时进行援助并阻止工贼活动，设法使德国工人通过党的机关报刊了解国外的运动的情况，进行反对迫害的或正在爆发的王朝战争的宣传，在这种战争期间实行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所模范地实行过的策略等等。

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而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马克思和斯麦尔的口述，工人总是太多了（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是非常复杂的，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像拉萨尔所想像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了解。拉萨尔从马克思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克思斯式的论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五页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的这一论据，已被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一书中驳斥得淋漓尽致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那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它的一个错误的论据。

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
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这是在白拉克非常出色地揭露出来这个要求毫无用处之后，在我们党的几乎所有的，甚至全部的发言者在同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不得不起来反对这种‘国家帮助’之后提出来的！我们党是不能比这更自卑自贱了。国际主义竟降低到阿曼特・戈克的水平，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提出这个要求来对付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夺取他们的阵地！

拉萨尔的‘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目的而实行的许多措施中的一个，而纲领草案却用软弱无力的词句表述这个目的：‘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好像我们还有一个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似的！所以，如果说，‘德国工人党企图通过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并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项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那就是没有一个拉萨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驳来的。

第五，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它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经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就是最残酷的反动势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样）现在也决不可能摧毁它。既然这种组织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我们认为，在纲领里提到这种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织中给它一个位置，那是绝对必要的。

这就是我们的人为了讨好拉萨尔派而作出的一切。而对方做了些什么让步呢？那就是在纲领中列入一堆相当混乱的民主主义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纯粹的时髦货，例如‘人民立法’，这种制度存在于瑞士，如果它还能带来点什么东西的话，那末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更多。要是改成‘由人民来管理’，这还有点意义。同样没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

260
活動方面都應當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負責任。至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的資產階級政府中都会列入而在这里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学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說下去了。

自由的人民國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國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時候，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國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國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國家”这一个名词把我們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駁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經直接指出，随着社會主義社会制度的建立，國家就会自行分解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鎮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說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純粹是无稽之談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國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鎮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时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們建議把“國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間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會主義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观点，这种看法作为一定发展阶段在當時当地曾經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會主義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經有了闡述这一問題的更精确的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違文字也写得干癟无力的綱領

261
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它是这样一种纲领，如果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将对它采取（而且也要公开地）什么态度。请您想想，在国外人们是将我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负责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要我们替《民主周报》创办以来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和所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话负责。在人们的想象中，我们是在这里指挥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几乎从来没有什么对党的内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干涉过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对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的确是仅仅限于理论上的。但是您自己可以理解，这个纲领形成一个转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们拒绝替承认这个纲领的政党承担任何责任。

283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像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纳赫纲领还倒退一步。总还得想一想，其他国家的工人对这个纲领将会说些什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主义的这种投降将会造成什么印象。

同时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难道我们的党的优秀分子会愿意不断地重复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和国家帮助那一套背熟了的词句吗？我想看看，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的听众就会向他们喝倒采。而且我相信，拉萨尔派会死抱住纲领的这些条文不放，就像犹太人夏洛克非要他那一磅肉①不可一样。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那时我们已经恢复哈赛尔曼、哈森克莱贝尔和特耳克及其同伙的

①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
诚实的’ 名声，分裂以后，我们将被削弱，而拉萨尔派将会增强；我
们的党将丧失它的政治纯洁性，并且再也不可能奋不顾身地起来
反对它自己在一个时期内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拉萨尔词句。如果拉
萨尔派以后又说，他们是正直的和唯一的工人党，我们的人是资产
者，那末，他们是可以拿这个纲领来证明的。纲领中的一切社会主
义措施都是他们的，而我们的党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些要
求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添进去，这个党在同一个纲领中又把小资产
阶级民主派说成是‘反动的一帮’ 中的一部分！

我把这封信搁下来，是因为您在四月一日庆祝俾斯麦生辰那
一天才会被释放，而我是不愿意让这封信去冒以走私方式传送时
被搜去的危险的。刚刚接到了白拉克的信，他对这个纲领也有很
大的疑虑，他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意见。因此，为了迅速起见我把这
封信寄给了他，让他看一下，而我也就用不着把这个麻烦东西再全
部重写一遍。此外，我同样也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朗姆，我给李卜
克内西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关于全部事
件直到可以说太迟的时候他还连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们（而朗姆
和他人却以为他已经详细地通知我们了）。他从来就是这样做
的——因此，我们，马克思和我，同他进行了许多次不愉快的通
信——，但是，这一次做得实在太可恶了，我们要坚决不和他一起走。

希望您设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您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
好，我们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这对于过了很久服欲的生活的您一
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您的友好的弗・恩。

马克思刚刚搬了家，他的住址是：伦敦西北区克雷森特街梅特
兰公园路四一号。”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一一十页。
关于我目前的态度，白拉克随后在五月十日写信给马克思
说道：
“我起初曾认为，倍倍尔会倾向于坚决行动，但是一方面受了
损害的健康和必要的恢复营业工作，另一方面李卜克内西的恳切
请求似乎妨碍了他。”
使我不把对于纲领草案的不满公开发表出来的，不仅有李卜
克内西的请求，而且还有关方面的劝说，说不要因为我的行动而把这
事声张出去，因而也许使合并成为不可能。
我向这个要求让步，因为合并也是我的心愿。党对于合并的
要求非常强烈，必须把对于纲领的一切疑惑置而不谈。毕竟所造
成的错误以后可以加以补救。

由于国会复会，议员们要比较长久留在柏林，这样基本上促
进了领导人对于联合的努力。国会于一八七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开幕，可是在一月三十日就闭幕了。我们的代表参加讨论并不活
跃。议员们对于党的联合谈判较之国会的讨论感到更大 的兴趣，
尽管国会所办理的是些重要案件。议会有法院组织法草案、刑
事和民事诉讼法草案，还有一个有关国民军的法律草案，关于该草
案李卜克内西和哈塞尔曼后来都曾发言。

请求在开会期间准许我们请假出狱的建议自然是又提出了，
这次建议包括着汉森克莱维尔、莫斯特和我。在申述建议理由时，
李卜克内西发言，他不肯放过机会把我们有罪的讼案细细检查，
并彻底粉碎这些判决。他特别注重当时莫斯特在普略曾湖所遭受
的无理待遇。

继李卜克内西之后是温德荷斯特发言，他也同样激烈地控诉
老汉诺威军营对于政治犯的待遇。但是关于释放我们的建议，他
考虑到宪法第三十一条的内容不能赞同，不过他希望，如果一位在

264
押的议员提出请假，政府对此应欣然同意，首相先生并应予以支持。俾斯麦为此发言并加以嘲讽说，“首相先生”在当前的情况下将赞成犯人的请假，如果他请假是因为人们在国会中长久没有听到像前面两位发言人的那种富有教育意义而又为人们长久以来所缺乏的发言的话。（大笑。）国会没有料到，它由于像以往一样作了否定的决议，因而不久就陷入一种尴尬的境遇。李卜克内西等人的建议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讨论的，但早在十二月十二日，议员拉斯克尔在议员冯·本尼格森、申克·冯·斯陶芬堡、冯·博尔肯贝克、海乃尔博士、温德荷斯特、冯·邓麦、施瓦茨博士和霍亨卢恩侯爵（兰根堡）——即全部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支持之下认为有必要提出下列建议：

“鉴于据可靠消息国会成员冯·容克先生由于一件法律上已生效的刑事判决昨天已经被捕，事情是委员会以急件交议下列事项：1. 根据德意志帝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在国会开会期间不经过国会同意而逮捕国会成员是否为宪法所容许；2. 为了预防国会成员在国会开会期间因法律上生效的刑事判决，不经过国会同意而被逮捕起见，可否采取步骤和应采取何种步骤。”

这个建议是很可笑的，议会却立即予以讨论。结果像国会屡次地并且最后到十一月二十一日才决定的那样，认为宪法第三十一条不适用于议员的刑事拘捕，所以主管机关也无可争辩地有权在会议期间逮捕议员。议员冯·容克因为担任《日耳曼尼亚报》的编辑而被判处一年监禁，这个案件引起莫大的惊奇。也无可置疑的是，他的拘捕在国会开会之前不久不是没有俾斯麦同意而执行的。因为事实上判决已从九月二十三日起生效，冯·容克的拘捕既然未在会议开幕前执行，所以可待至会议结束后，即一月底执行，亦无损于司法。但是俾斯麦不愿意这样。他显然为了十二月四日的辩论要给中央党一个警告；至于这样一来，国会在精神上也挨了一个耳光，
并且根据自己的决议而不得不忍受这个耳光，在他看来，却无
有关重要的。他认为自己出席讨论也是不值得的。因此，拉斯克尔的
建议被交由议事规程委员会，但该会，如所预料，对于任何建议也
不能取得一致，几天后还是毫无结果。提案又回到议会。在这里，
辩论经历了同样可怜的过程。所提出的一系列建议总是被某一多数
所否决。结果是使国会丧失体面。

我叙述十二月四日的辩论，作为俾斯麦对马其克的报复行为
的理由。在十二月四日的会议上，天主教的社会政治家约尔格发
言评论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和不召集联邦政府委员会来监督这个政
策。当时有许多法国主教把阿尔萨斯—洛林的德国籍公民当作他
们的教区居民，发出一封主教通告，在通告中他们反对德意志的文
化斗争的处置，这使俾斯麦很生气，发给该国大使一个通电，他在
电报里说：应该查明，如果德国不可能同它的西邻持久和平相处，
那末人们将不会坐待法国人完全作好了作战准备，而要自行选择
适当时机先发制人。这是以战争相威胁，引起巨大不安。根据
《北德意志总汇报》上俾斯麦所写的名辞，这通电获得了一个
历史性的名称：冰冷水通电。约尔格认为俾斯麦的这种办法是一
个轻松愉快地使国家冒重大危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他还诉
不平说，库尔曼去夏在基星根行刺俾斯麦的事件，人们也要中央党负责。
约尔格说，库尔曼是个半疯子，对于这种人中央党不能负责。俾斯
麦为此在发言中极力攻击中央党。他提出库尔曼在狱中向他（俾
斯麦）供认，读了中央党的报纸才决定行刺，他控诉中央党是行刺
的共犯，库尔曼是处在中央党卵翼之下的。这句话始全引起了大的喧
嚣，中央党在中间向俾斯麦连续发出呸！呸！声。在争吵中的
主要呐喊人是后来的国会议长巴莱斯特伦伯爵。

俾斯麦始终不忘记这件事，因为他的狂暴天性的主要特色是
一个善于怀恨的人。他的怨恨总引起我的赞赏，可是他满足怨恨
的那种卑鄙讨厌的方式，却使我极为憎恶。在报怨上，他是不择手段的。

在这个开会期间，我們有个意外收获。莫斯科用一个請願书向国会申诉他在普鲁士所受的待遇并建议依法整絓刑事监禁。须提出关于此事的报告的請願书审查委员会不认认可莫斯科的申诉。在全体会议上，李卜克内西也发了言，以大多数通过委员会的下列建議，

“請願书要求首相先生办理的是，在那些迄今没有依法管理执行刑罰的联邦，特别是在普鲁士王国，联邦政府要迅速整絓刑罰的执行和监禁制度，以此保证按照刑法法典，特别是第十六条的意义来执行刑罰，尤其是徒刑；

此外，請求首相先生在普鲁士国王政府办理的是，删去同刑法法典第十六条第二段相矛盾的一八三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规定中的第二十三条、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司法部訓令（五C）和柏林监狱规章的第三十七条。”

我在三十一个月的监禁以后于一八七五年四月一日（俾斯麦的生日）被释放。这一天不仅是我的家庭和个人的一个喜庆日。各地党组织给我大量的贺信和贺电，所以可以说，党大部分也把这一天看作一个喜庆日。

我的选区订于四月十一日在格勞紹举行欢迎大会，我带着家属前往参加。我在发言中对于目前的合并在中说：‘我满怀快乐地向往常从另一派立场作为敌人同我們对立的另一派的成员致敬。我們此后不仅和和气气地并肩前进，而且今已为我们所追求的崇高目的共同奋斗。再說，我們不久就要联合为一个单一的团体。虽则我們以往互相斗争得那末激烈，我們此后却将更加强有力、更勇敢无畏地反对共同的敌人。成功是必然到来的。’庆祝会的气氛极为美好，大家在实行和解的情况下，好像是由魔掌中得到了解放。
拉内的同志接着在七月间举行庆祝大会，后来还有荷亨斯坦—艾恩斯塔尔也举行大会。

摩里茨•赫斯于四月间在巴黎亡故，他没有活着见到合并。卡尔•希尔施致悼辞。在同一个月，乔治•海尔维格也在巴登—巴登去世，他自从拉萨尔死后就离开了党。在同一年，《法兰克福报》发起为以前的“囚犯”奥古斯特•罗克尔募捐，他住在维也纳，生活十分困难。

从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到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前夕

合 并 工 作

筹备委员会在1875年五月二十五日起召开合并代表大会。在多年的互相苦斗之后，这些历来互相敌对的兄弟们现在面对面地进行共同的工作。至于人们不马上兄弟般地互相拥抱，而一部分仍是心存猜忌，这又何足怪？还需要大大地互相尊重和互相小心对待，以免在仍然存在的人和事的矛盾上发生冲突。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共同敌人好奇地和紧张地向哥达注视，看合并工作能否成功。这个工作在一些小小的摩擦以后得到意外的成功，有了结果。

出席大会的代表一百二十七人，代表二万五千六百五十九个党员。其中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七十一人，代表会员一万六千五百三十八人；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五十六人，代表党员九千一百二十一人。

大会由W. 鲍克（哥达）以当地委员会的名义揭幕并邀请出席代
表致辞。鲍克是爱森纳赫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办人之一，而今他第二次着手创立新的、更大的政党的工作。

盖布和哈森克莱维尔被选为大会主席。在审查资格时，我主张准许莱比锡诺萨尔派的一个由联合会总部分裂出来的小集团出席。既要合并，就完全合并。奥艾尔反对。我的建议被否决，但准许各派的代表列席讨论。所以我获得一半的胜利。接着是布勒斯劳的代表建议两派应在全体代表大会开始讨论以前，先分别举行各自的代表大会，安排各自的内部事务。奥艾尔表示反对，说这在全体代表大会以后同样可以举行。为这件事，爱森纳赫派需要一天时间，出席代表可以证明，这个计算是对的。代表大会是在两派的代表取得协议后举行的。没有人怀有隐情。在爱森纳赫派方面适用“我们贫穷，但是诚实”这个口号。我们不能把大会拖长，所以反对布勒斯劳人的建议。奥艾尔的这番话显然伤害了对方，于是弗里茨舍在次日发言，就奥艾尔所说的：“我们贫穷，但是诚实”这句予提出申述。这话会使人怀疑全德工人联合会是不诚实的。盖布劝慰弗里茨舍。奥艾尔说：他认为这话在现况情况下是对的。又说拉薩尔派自己发动了这种攻击，却说成“双方”了。

这是在谈判中出现的唯一严重的不和之音。

纲领问题由李卜克内西作报告。纲领中有这句：劳动者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于工人阶级，一切其他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我建议把末句改为：“对于工人阶级，一切其他阶级都是反动性的”。瓦尔特希更进一步，建议删去这一整段。他的建议是十二对一百一十一票，我的是五十八对五十票被否决了。在下次的特别讨论会议上我提议案，要求两性国民都有选举权。哈赛尔曼表示反对，奥艾尔赞成。这提案以五十五对六十二票被否决。事后哈森克兰维尔解释说：许多代表认为国民一词使要求的词意隐晦，因而反对我的建议。李卜克内西表示相似的意见说，他由于
文词的原因（两性）反对我的建议，就事情本身而言，他是同意我的。此后，还有些我们提出的小修改建议被接受了，在最后表决时纲领获得一致通过。其中原则性的条文是：

“1. 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通常只有通过社会才有可能，所以全部劳动果实应归社会所有，也就是应按照平等的权利、按各人合理的需要分配而归社会全体成员所有，并且人人有参加劳动的义务。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所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转变为社会公有财产，并要求在按照公共利益来使用和公平分配劳动所得的情况下集体调节全部劳动。

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对于工人阶级，一切其他阶级只是反对的一帮。

2.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由这些原则出发，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資劳动制度违背其铁的规律和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首先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但也意识到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且决定履行工人运动加在工人身上的义务，以便实现全人类亲如兄弟的关系。

3. 为了开辟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求设立依靠国家帮助并受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的生产合作社。无论在工业中，或是在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以便能从这中间产生出全部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①

下面接着是要求国家民主化和社会的要求。

---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十九第二十八页。——译者
由纲领中可见，合并后党的名称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哈森克萊維尔作了关于所建议的组织的报告，照原案略加修改，一致通过。根据这个建议，党的领导机构是由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成的理事会。为了监督理事会管理业务，任命七人组成为监察委员会。该会地址由大会决定，其人选由该会所在地的党员选举。此外，选举散居德国各地的十八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作为临时裁决机关，决定党的理事会有关事项，遇有特别重要事项，应理事会方面的邀请参与讨论。地方的业务领导由党的理事会委派一个由地方成员提名的代理人担任。人们希望借此可以避免因协会的违法联合而遭到控诉。不久就显出来，希望落空了。

党的理事会的所在地，照我的建议，决定为汉堡。还通过了我建议的理事会五位委员的工资。依此，执行业务的主席每月应得六十塔勒，他的代理人十五塔勒，两位秘书每人五十塔勒，司库三十五塔勒。这些数额是我们事先商量好的。我也以爱森纳赫派名义建议，在新的理事会中选举三个拉萨尔派和两个爱森纳赫派，也通过了。于是哈森克萊維尔当选为第一主席，哈尔特曼（汉堡）为第二主席，奥艾尔和德罗席为秘书，盖布为司库。监察委员会的所在地是莱比锡，由我担任主席。

党的正式机关报是柏林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莱比锡的《人民国家报》。两个报纸都转为党的财产。

五月二十七日夜晚十一时半，会议结束，大会在高呼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万岁和接着高歌马赛曲的歌声中闭幕。

白拉克因健康关系未参与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他对大会的结果表示满意。五月二十七日，他写信给恩格斯说：

“我个人还能有所奉告，因为在作判断之前，必须先明了所决议的东西是什么。如果这些决议不是荒谬的，那么我们也不要制
造荒谬。（暗指李卜克内西写给白拉克的信中的话。）无论如何，李卜克内西、盖布等是有诚意补救所犯的错误的。大会经过表明，草案为了工人所必需而作的让步，远较由于照顾个人而对哈森克莱维尔等人所作的让步为少。到现在为止，就可能断言的而言，我对大会满意，因大会表明了，工人事实上比我所想像的进步得多。”

我到秋季才答复恩格斯三月底的信。我写道：

“莱比锡，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您三月底的来信，我搁起起来没有回信，非常抱歉。但我可以向您说明，在被释后的头三、四个月没有一个钟头的安静时间来复您的信，就在今天仍难挤出所必需的时间。

我完全同意您对于纲领草案的意见，由我给白拉克的信可以证明。我也严厉谴责了李卜克内西的委托求全，既然遭到灾难，就应该尽可避开此难。代表大会决议各项是所能达到的极限了。另一方面却表现了一种可惊的浅见和部分的恩怨，如果不使这个大声喧嚷中上演的合并代表大会给敌人称快，给党大丢其脸，闹到无结果而散，那末就必须像捧小磁人似的对付这些人。虽然如此，我们最后，特别在人选问题上，却还做到使我们能对于结果感到满意。当然还要对浅见和个人利己主义作许多斗争，但我毫不怀疑，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就可以斗争到底而无损于整体，并且在两年内那些现在还有些顽固的分子会充满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

全部是一个教育问题。人们受了八、九年拉萨尔－－施韦泽式的教育，不能马上习惯于另一种方式，在这里重要的是耐心。

如果我们这里能够满足从各方面涌来的要求参加集会和作庆祝会演说的邀请，我所说的教育方法也许可以大大省略。同这些人做些私人往来可以很快地扫除偏见和成见，但是我们能够完成的较之所要求的差得不远了。

272
我特别被我的生意弄得疲惫不堪，因而对于邦议会选举的失败没有比我更高兴了。李卜克内西和莫特勒虽然在此任内任职，情况也并不比我好些；因为他们的工作同流浪的变动生活很不协调，并且我们对于这一点做得已经太多，对它不感到很大的热情了。而且肺部和发音器官也有点意见。

一般说来，我们对于党的活动是很满意的，现在才看到，以往的斗争怎样地分散了力量。现在党的财务情况是以往所没有的，虽然营业萧条，会费却收得很准时和正常。

承您友好地邀我到伦敦去，照上述的情形看来，我自然是难以遵命；我很愿意到古老的英国去一趟，但目前还不能作此想。明年我或许要到莱茵省，也许到荷兰去做生意，那时到您那里的路程就不太远了。

我听说，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但是我或许见不到他了；据李卜克内西说，他想取道巴伐利亚回去。我大约十四天后来到卡尔斯巴德。我想到波希米亚作业务旅行，但届时他大约已不在那里了。马克思如果回去，请代我向他致意。您不打算到德国故乡来看看吗？您住在英国好像镌住了。

友谊的敬礼

您的倍倍尔。”

恩格斯给我的复信表明，他和马克思对于我的信的看法与该信的内容不大相合。恩格斯写道：

“伦敦，一八七五年十月十二日。

亲爱的倍倍尔！

您的来信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这种合并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是太轻率了，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将来分裂的萌芽。如果这种分裂能推到下届帝国国会选举以后，那就很好了……

现在这个形式的纲领包括三个部分：

294

273
1. 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接受这些东西是我们党的一种耻辱。如果两派要想在一个纲领上取得一致的意见，那就应当采纳双方一致同意的东西，而不涉及并非双方一致同意的地方。诚然，拉萨尔的国家利益也曾列入爱森纳赫纲领，但是，在那里它不过是许多过渡措施中的一个，而且就我所听到的一切来看，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要不是合并，它就会在今年的代表大会上根据自拉克的提案删掉了。现在它却被看做医治一切社会病症的不可缺少的和唯一的良药。让‘铁的工资规律’和拉萨尔的其他词句强加在自己的头上，这是我们党在道义上的一次巨大的失败。我们的党改信拉萨尔的信条了。这不是一下子可以否认掉的。纲领的这一部分是奇耻大辱，我们党就带着这样的耻辱匍匐于神圣的拉萨尔的赫赫声名之前；

2. 民主要求，这些要求完全是按照人民党的精神和风格提出的；

3. 向‘今天的国家’提出的要求（而且谁也不知道，其余的要求应当向谁提），这些要求是非常混乱和不合逻辑的；

4. 一般的原理，多半是从《共产党宣言》和国际的章程中抄来的，但是修改得不是把内容全部弄错，就是变成了纯粹的废话，正如马克思在您熟知的那篇文章中所详细指出的那样。

整个纲领都是杂乱无章、毫无联系、不合逻辑和给人出丑的。要是资产阶级新闻界中有一个有批判头脑的人，他就会把这个纲领拿去逐句研究，弄清每句话的真实含义，极其明确地提出荒诞无稽的地方，揭露出矛盾和经济学上的错误（例如，劳动资料今天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似乎地主已经不存在了，不谈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说‘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本身在今天恰恰是过份自由了！），并且把我们的整个党弄得非常可笑。资产阶级新闻界的蠢驴们没有这样做，反而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纲领，加进了其中所
没有的东西，并做了共产主义的解释。工人似乎也是这样做的。
仅仅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否认这个纲领。当
我们和工人把我们的见解撤到这个纲领中去的时候，我们
可以对这个纲领保持沉默。

如果您对选择问题上所达到的果感到满意，那就是说，我们
这方面的要求一定已降得相当低了。两个是我们的，三个是拉
萨尔派！因此，在这里，我们的人也不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同盟者，
而是战败者，并且事先就决定了我们的少数派地位。委员会的活
动，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也不令人快慰的：1. 决议没有把自拉
克和伯·贝克尔的关于拉萨尔主义的两本著作包括在党的文献
目录里；如果能把这个决议撤消，那就既不是委员会的也不是李卜
克内西的过失；2. 禁止瓦尔特希接受宗纳曼向他提出的担任《法兰
克福报》记者的建议。这是宗纳曼亲自告诉正在旅行中的马克思
的。使我感到惊奇的，与其说是委员会的妄自尊大和瓦尔特希不
是正委员会满不在乎而是对它唯命是从，不如说是这项决议的令
人难以置信的愚蠢。委员会倒是应该设法使得像《法兰克福报》那
样的报纸到处都只由我们的人替它服务……

说这整个事件是一次富有教育意义的试验，它即使在这种情
况下也还有希望取得极其有利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您是完全正
确的。这样的合并不只要维持两年，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但是，它
无疑是可以用便宜得多的代价取得的。……

由此可見，要想同伦敦这两位老人取得谅解并不是件容易的
事。在我所认为是聪明的打算，灵活的策略，他们却看做是软弱
和不负责任的让步，可是合并不的事实毕竟还是主要的事情。从逻
辑上来说，这个主要事情在自身里就包含着继续发展，今后和以往
一样，我们的朋友和敌人也都关心这件事。党的理事会在恩格斯
所指责的事情中所犯的局限性和狭狭性也不能改变这一点。这里
必須說明，當時《法蘭克福報》對於我們所代表的方向持有友好的態度，相反地，全德工人聯合會同宗納曼則吵鬧不休。所以不難明了，聯合會方面對他和他的報非常仇視。

余痛

合併過程並不是到处都像我給恩格斯的信中所描述的那样顺利。特別是在有哈賽爾曼和李希特爾（王茲培克）和他們的信徒进行挑撥的汉堡，这些人常常有激烈的互相冲突。奧艾尔作为党的秘书住在汉堡，他认为这些事情是相当可忧的。因此，他在一八七五年九月十五日写信給我說，在党的成员中仍旧很不一致，是否会由于这一切可恶的瑣碎事而再闖出分裂，很大問題。并且在九月二十五日他又給我一封信，重訴他的愁詞。后来在一八七六年的党代表大会上，李希特爾（王茲貝克）因为进行損害党的活動而被开除党籍。

一八七五年春天，在萊比錫当选为国会議員的斯台法尼博士辞去了委任。于是来个补缺选举，我又被提为党的候選人。五月十一日选举时，我得了四千零十八票，較上年普选时多三百六十七票，我的对手民族自由党的候選人較保守党的少得一千多票。我同時也被提名为薩克森的美拉内一荷亨斯坦—艾恩斯塔尔的邦議会议选区的邦議會議員候選人。这里我同样失败了，是以六百九十四票对我的民族自由党对手所得的八百九十九票。我很满意于这次失败，如上面转录的我給恩格斯的信中所說的。党在那时还很少致力于邦議会选举。而且选举法比起今天的现代选举法来，显然是很有利的，它對選民的要求是繳納国家直接税三馬克，薩克森籍和年滿二十五岁。如果要想被选为議員，即所謂被选举权，其要求是：至少納三十馬克的国家直接税，年滿三十岁和获得国籍已滿三年。
虽然如此，我们的选举人还是为数很少，因为那时许多工人并没有缴纳与每年收入六百马克有连带关系的三马克国税。到一八七六年施行了新的所得税法，由于收入估计得较高，选举法才变得对我们有利。从该年起，我们才有成效地参加邦议会的选举。

为了使往日敌对的兄弟们越来越亲切深切地感觉到已实现的统一，我们一致同意，由以前两派最出名的人物到他们以往比较难达到的地区去举行集会。于是李卜克内西和莫特往北方和西方，哈森克莱维尔、德累斯巴赫等到南方和萨克森去。我到阿尔托那汉堡，参加我在那里的举行的集会的异常踊跃，在柏林的佛罗里我所举行的一个盛大集会上也是如此。在汉堡、阿尔托那及其周围各地，由于一八七五年十月一日创刊了《汉堡一阿尔托那人民报》，运动有了新的据点。哈森克莱维尔现在宁肯脱离理事会而加入《汉堡一阿尔托那人民报》的编辑部。

*     *     *

当时的境遇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不惬意的。营业与党之间的利益冲突使我痛苦异常，关于这，白拉克在八月底也写信向我诉苦。做一个营业的奴隶是悲惨的。但是如何摆脱？他意欲把他的印刷出版企业卖给莱比锡印刷合作社，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有所顾虑。出版社和印刷所使他担负极繁重的工作和沉重的债务。我很诧异，他虽有不少烦恼而仍保持着愉快心情。因为我在那时获得了我后来的合伙人（合伙是在今年秋季才实行的，合伙的消息却闪电似地在莱比锡传播开来），敌人就造谣说，我此后将要脱离党的生活了。这个谣言是一个阿尔登堡的同志首先告诉我的，他在八月三十日写信对我说，他在莱比锡的短时间内由各方面听说，我找到一个合作人，将成为一个大企业家，而后就要慢慢退出党。他在什麦尔恩的一个工人宴会上，也告诉了美拉内和郭斯尼兹的同志们，并且同他们说，他们必须克服我所给与他们的这一沉痛打击。但令人感动
的是，这些同志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回答说，他们不相信，他们认为这是不会有的事。同时他也认准了这消息不确。但是他也答应他们，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我，并请我原谅冒昧，他说我可以公开地辟谣，我则认为不值得这样做。

在这时期（一八七五年九月）莫斯特还一直关在普略曾湖的监狱里。我给他一封长的慰问信并探问他的近况如何。我已听说，他的待遇也比从前优厚了一些。他在九月二十七日写信给我，说：“亲爱的倍倍尔！如果我告诉你，我常常数月之久既没有从党方面，也没有从同志那里得到一个字，那你就可想而知你的信多么使我高兴。请勿为我担忧，我固然是够懒的（完全由于我的俭约的生活方式），但还不至于颓丧。从幼年起，尤其是近七年以来，我一直过着下贱的生活，常常能够忍受非常多的东西……你传达给我有关你们党的一切消息又重新证明了，对我们的党的一切希望和现在都是徒然的。如果我出来了，我希望能够感到愉快。至于我要说的东西，那自然还要忍耐一时……我做什么呢？现在我刻苦用功！第一，我为盖布写东西，第二，我努力于法文翻译，第三，勤奋地钻研唯物主义……人们在今天，如果不愿作蠢汉就必须多多阅读……我的时间过得很快。盖布认为，我可以申请暂时释放，但是到现在我已拒绝三次了，因为这种乞怜是既无原则又无好处的。”

国 会 工 作

一八七五年十月底，国会又开会了。在差不多三年半的间断以后，我第一次再参加国会会议。也在这次会期中，党的代表第一次以合众的党代表身份出现于公众之前。我们的党团的行动也立即比以往任何一次会期都更为活跃，更为自觉和更有力量。讨论材料的性质也是有助于热烈辩论的。
向国会提出的有一个关于修改工商业条列第八条的法律草案连同一个关于互助基金的法律草案。我们在讨论法律草案时的各阶段都以全力进行争辨。几乎党团全体成员参加辩论，一部分还反复参加辩论，并且对于各条提出相当多的建议。草案在工人界造成很大的不满并招致一批请愿书，特别是柏林的疾病救济基金委员会的请愿书很仔细地研究了法律草案的各条规定。

议会党团方面决定由我充当总辩论时的发言人。讨论在十一月六日开始，还在当天结束。多数派愿意尽可能少辩论而迅速结束。我对于当前内容的草案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党团和党当时的立场是，疾病救济基金专属于工人，因为只有他们缴了费，所以应该有完全的自己管理权。保证金以及关于意外事故的一切后果的保证金要完全由企业主负担。残疾保险和养老保险由双方出资举办。我说，草案把工人置于官厅和企业家的监护之下。草案否认工人具有其他阶级在管理自己的财产上所具有的权利，这就是自己管理自己财产的无限权利。如果我们在一个公司法或者合作社法中搞个这样的监护章程，国会会说什么呢！人们不从伟大的与帝国相称的观点出发而从渺小的和最渺小的观点出发。尤其是与保证金法第四条有联系的部分，草案是很有问题的，因为草案把救济基金的重担放在工人身上而该项基金是应由企业主的赔偿义务保险来担负的。法律草案如果基本上保持它现在的性质，它在工人界中所引起的将不是满意而是大不满意，也就是与它的目的正相反。这个草案被转交二十一个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在讨论以后，议员米凯尔走过来问我，是否准备任该会委员。我在通讯党内同志以后，声明愿意，但在投票决定时，议员米凯尔又到我跟前说，他十分抱歉地通知我，他的议会党团的大多数不投票选我。他劝我去和中央党协商。这个我拒绝了，为了委员会的一个席位而去请求其他党派，有用我们的尊严。国会常务委员会在当
时已經成立，該會按照各党团人数的多少分配委员会的委员。每个党团至少须有成员十五人，而我們只有成员九人，不能算作一个党团。所以我不能参加委员会。最后我們因为我們的修正建议沒有获胜，于是投票反对該法案；我們的建议全部被否决了。

我們参加討論的第二个議案是刑法修訂案，这个修訂案把刚生效五年的刑法修改或新增不下五十三条。联邦政府要想用十四条新罪行的議案来保证刑法迫害。俾斯麦在任何时候都是个逞强肆暴的人：凡是为到不便或讨厌的时代潮流，他总相信，能够使用国家的暴力把它消灭掉。他对于天主教运动、波兰运动、社会主义运动都是如此。虽然在的晚年这种政策的彻底失败已了如指掌，他是个失败者而不是胜利者的时候，他的这种观念依然未改。迄今用警察和法官没有做到的事，要想全靠刑法附则来促成。所以特别是刑法法典中所谓政治条款，例如：九十五、一百零三、一百十、一百十一、一百十三、一百十四、一百十七、一百二十八、一百三十、一百三十甲、一百三十一等条款都相应地加重了。于是第一百三十条就包含如下的内容：凡是以危害公共治安的方式公开挑拨各阶级民众互相对立者，或者以同样方式用言语或文字攻击婚姻制度、家庭制度、所有制者处以监禁。第一百三十一条也作了类似的补充。提案是用以前臭名远扬的普鲁士的那個关于怀恨和蔑视的条文略加修改来代替这一条。我們采取的策略，首先是观望，让对政府这个草案非常不满的自由主义者向前。这个策略证实是正确的。不仅进步党的海乃尔博士，而且連民族自由党的班伯格和拉斯克尔都阐明关于舆论自由的见解，使我們不必加以补充，他們这个见解却大不同于他們几年后对于第二个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所持的态度。議案的一部分移交委员会，另一部分由大会讨论。第一百三十条则在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七日的議事日程上，在討論这一条时我們才真真正开始参加。普鲁士内务部长欧
伦堡伯爵的发言开始时说道：我的先生们，第一百三十条是针对社会民主党制定的。他发言的其余内容主要是引证《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人民国家报》报上的和一八六三年拉萨尔一篇演说中的大段辞句，他企图因此来证实我们对国家的危害性。最后他请求给联邦政府以必要的权力来对付我们，否则就只好满足于目前不中用的法律条款，“直到用枪射击，用刀砍杀时为止”。这个演说决没有给人什么印象，所以哈赛尔曼在欧伦堡之后发言时，轻而易举地把他驳倒了。政府面对着社会民主党运动而不了解这个运动只是现有经济弊病的自然结果。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要求是我們所建议的医治现有病症的良药。对于控诉我們在民众集会中煽动工人的话，他提出质问说，人们为什么不到这些大会上解斥我们呢？阶级斗争是敌人开始的，巴黎公社就证明了，他们是多么残酷和血腥地进行斗争。他最后声明说，无论以怎样沉重的牺牲为代价，我們也要在合法基础上继续进行斗争。辯論的結局是，在保守党的一个修正案被否决后，竞没有一票赞成政府的建議，因而引起哄堂大笑。

党报对欧伦堡的演说表示感谢，因为它起了有利于党的鼓动作用，党的理事会决定把它广泛传播。第一百三十一条新修订的条文在国会中也没有博得人们的喜爱，同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关于所謂阿尔尼姆条款（三百五十三条）李卜克内西发表了一个简短的、但很有作用的演说，引起国会多数派的激烈反对。

当修改案第三读时，俾斯麦感到需要再把提案的第一百三十条谈一谈。但因这一条已不存在，议员拉本瑙的瑙代克男爵又提起那个議案。于是俾斯麦馬上向我们猛烈开火。他要求，在国会里也应该反对社会主义鼓动。如果一个社会党的议员在议院中讲话，就要照例在听他的话时好像他是来自另一个与国会无关的世界。人們必须极其广泛的宣传反对社会主义者那种空想谬论的理由；現在竟同时在这里国会中公开颂揚巴黎公社的杀人放火犯，而
无人提出反对的意见。这是一种被诱惑者只能在诱惑者的遮眼灯
阴影中才会看到的幻象；如果把它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它的不切实
际和有罪的愚蠢就必定暴露出来了。

俾斯麦这个指责无疑是针对我在一八七一年会议为巴黎公社
辩论的演说，因为自从那次以后，国会再没有关于公社的演说，于
是我要求发言。温德荷斯特和俾斯麦又讲了一次话，然后拉本瑙
的瑙代克男爵声明撤回他的建议，他的理由是，俾斯麦侯爵在第二
读时缺席，现在既已发言，他的建议就已达到目的。当温德荷斯特
坚持继续辩论时，因费尔肯贝克不能出席而暂代议长的辛森反对。
当宗纳曼为了要使我得以发言而又提起拉本瑙的 瑙代克的 建议
时，辛森宣称，议员瓦兰丁已提议结束辩论。因此，瓦兰丁的讨论
终结建议又早就储存在办公室内随时备用。于是断绝了我回答俾
斯麦的攻击的发言的机会。我就企图用个人说明为自己辩护。我
谴责人们不让我在首相对我个人激烈攻击时作答辩。（中间一再有
人叫嚣。）首相的攻击无疑是针对着我个人的，这一点我可以指出
一八七一年我的演说作证。首相诉说他本人时常遭到侮辱，因
而他给议会这个首先应对我和我的党所行的妙计。他控告我为杀
人放火犯辩护，我把这话说对我的侮辱来驳斥。我所以为巴黎
公社的人们作辩护，正是因为在这些人看作杀人放火犯，而
应该看作是遭到非常不公平待遇的人们。瑞士联邦、比利时和英
国三个大名鼎鼎的政府曾认为巴黎公社的逃亡者不是罪犯而拒绝
引渡，由此可见他们并不是杀人放火犯。说到这里，议长打断了我
的话，说我的陈述已不是个人性质了，我这样针锋相对地具体陈
述，超出了个人解释的范围。我只好不再继续讲下去。但是我在莱
比锡的一个集会上报复了，得以畅所欲言。

拘捕议员问题由于进步党的建议又提出讨论，但因这个建议
有片面性，所以我们提出一个更进一步的正确建议作为对策。我
們的建議由我申述理由，沒有通過，但是進步黨的建議也以一百四
十二票對一百二十七票被否決了。拉斯克爾根據他上週會議的態
度，本來必定贊成這個建議，卻棄權，馮·本尼格森缺席，還情有
可原。

另一事件，在下次黨代表大會上還要談及並且受到攻擊，即關
于我們對舒爾采—德里奇及其夥伴有關支付議員日俸的建議的表
決。李卜克內西和我在此建議二讀時棄了權，哈森克萊維爾則
投票贊成，其余同事在表決時都沒有出席，其中莫斯特在監禁中。
在三讀時我以全體名義發言，並聲明我們全體棄權。我們已厭煩
了，經常為聯邦政府委員會的字紙篓工作，國會在每次會期總接受
下越來越多的支付議員日俸的建議，而聯邦政府委員會卻也經常
把這些建議丟進字紙篓里。如果國會有誠意支付議員日俸，就應
該運用它所能運用的手段取得它。國會由是應該首先拒絕支付首
相的薪俸。國會得不到德國一切其他議會都得到的東西，這是有
恥辱。我們不願繼續參加這個遊戲，我們既不能對這建議投反對
票，所以我們棄權。這個短短的發言給我招來了兩次遵守秩序的
叫喚。會議於二月十日結束。

我对巴黎公社的态度

一八七六年三月十日，我在萊比錫同布倫諾·斯巴利希舉行
了一次辯論會。他是萊比錫民族自由党的主要鼓動者，在討論我
對公社的態度的發言中提出了當時人們對公社所作的一切攻擊。
那個集會由兩黨共同召集，每黨都分到一樣多的入場劵，每黨各選
主席一人，當一方發言時，由另一方任主席。我們這方面是尤利烏
斯·莫特勒任主席，對方是波克爾校長。

我為了幫助讀者，把當時在萊比錫的發言節錄下來：
“波克爾校長，現在伯格爾先生發言。（發言人在暴風雨般的掌

283
声中走上讲坛。

倍倍尔：我结合着斯巴利希先生的刚才说的话来谈。（骚动。）
斯巴利希先生声称，他还有那样多的反对公社的事实可供引证，是可以讲上十个晚上。（骚动。）我的先生们，我在一开始就已向斯巴利希先生提議，如果辩论在一个晚上不能完結，应当在次日或者更晚一天继续进行。所以我们可以在明天或下星期一继续辩论，我是随时都准备好了的。（大骚动，嘘嘘声。）但是斯巴利希先生又声明，在一个晚上就足够解决这件事了。（好啊！嘘嘘声。）

我的先生们，首先我对我党同志有个个人声明，他们有一部分人认为我对这次集会凭入場券参加的条件是违背民众集会原则的，所以对我严加谴责。我的先生们，假如我不是确信，不如此则集会决不能召开，我就绝不会同意这个建议。这是使我同意这个建议的唯一的理由，但是我不会再一次同意，因为，虽然在我和我们协商时，斯巴利希先生说，为了免得看来‘不像样’，在进口处不要聚集许多人，借以避免用入場券做买卖，可是斯巴利希先生方面却不守诺言，破坏协议，把入場券卖钱了。（大骚动。高呼：这不是真的！）

倍倍尔：您怎么能叫喊，这不是真的？（好啊！喝采。）

我的先生们！我首先请求我党同志不要用喝彩来打断我的话，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样耗费我的时间太多。我只有一点半钟的时间。（被打断。嘘嘘声。）

主席波克尔校长：我的先生们，我请求您们，要制止一切像‘这不是真的’一类的喊叫。倍倍尔先生是按照协议讲话的。我请求两党让倍倍尔先生安安静静静地讲下去。

倍倍尔：我党同志极其安静静地听完斯巴利希先生的讲话，虽则他们常有表示不悦的理由。（自由派方面不断的骚动。）

我的先生们，我认为，我们今天给自由派证明了，他们认为一个敌人不能在社会民主党集会上发言的说法是不对的；相反地，斯
巴利希先生却能十分安靜地发言，而您們----（大騷動。喚叫：滾出去！自由派方面的喧嚷。）

倍倍尔，我的先生們！我希望，敵党的先生們不要鬧得使會議被警察解散。我差不多得出了上面这样的一个信念。斯巴利希先生說，我們抱怨国会封闭了我們的嘴，他又說，他不怪罪國會議員不願意老是沒完地听社会民主党的謾調。

我們在国会中是同坐在那里的任何别人一样的人民代表，我們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遇到机会就在那里代表我們党的意見。如果我们有一次沒有出席国会的某一个会议，自由派报纸，特别是《萊比錫日报》就郑重其事上報，第二天人們讀到，某次表决时某某社会民主党議員缺席！如果社会民主党議員发言，那就是，他們恬不知耻！甚至在我們被要求起来讲话时，也打断我們的发言，而自由派报纸和斯巴利希先生却称許这种卑鄙的行为……

斯巴利希先生随后詳述德意志国会一八七一年的討論，在这里首先提到五月二十五日討論合并阿尔薩斯和洛林的會議。斯巴利希先生在这里犯了个日期上的錯誤：他把我四月十日的发言放到五月二十五日的发言的后面。在四月十日的发言中，我說明，我对于巴黎公社的行为虽然不是样样都同意，虽然这是由于手段是否適合目的的原故，可是我还为公社辩护，并且认为我更有义务为公社辩护。因为連自由派报纸起先誣蔑公社的某些行动为暴行，过了几天，也不得不承认它的指责不对而把它撤回……

……斯巴利希先生企图把巴黎公社的活動描写成一長串連綿不断的罪恶和暴行。斯巴利希先生援引枪毙克列芒·托馬将軍和勒康特將軍作为主要的丑恶行动，此外，他把枪决人质和下令焚毁财政部归罪于斐烈。其他‘丑恶行动’他就不能尽述了。

但是这些所謂丑恶行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三月十八日，即枪毙克列芒·托馬和勒康特二位將軍的那一天，根据斯巴利希先生
自已的承认，巴黎公社还未成立。那末，它就不可能负这项责任了。

在枪决人质的那天（斯巴利希先生自己说是五月二十四日）公社已经不再正式存在了；公社委员会在五月二十二日举行出席人数非常的少的末次会议，这一点斯巴利希先生也承认。如果真的像斯巴利希先生所断言的费烈和拉乌尔·里果在二四日下令枪决人质（但是这一点并未证实），那末也只是与组成公社委员会的十个委员中的两个人有关系，所以只能由此两个人负责，而不应由公社负责。

（发言人在这里扼要地叙述公社成立、巴黎被围、民众不信任特罗昂、巴黎投降、宣布选举国民议会来批准和约等事的简单经过。）

宣布选举的时候，法国三分之一的领土被德国人占领，大部分土地处于戒严状态，而且因期限短促不能对要选举的人进行了解，最后，波拿巴王朝的那些几十年来从事卑鄙选帝为常的省长和官员大部分还坐在官衙里面。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自由选举。

选举的结果果然如此。多数派虽然不倾向于波拿巴王朝，却是拥护帝制和反对共和的。结果，甘必大退位，梯也尔先生来领导政府。当时国民议会，大家知道，是在波尔多开会，并且本来声明只是为了决定和约条件而选出来，现在竟擅自决定法国的命运，因而严重违背了它的委任状。政府十分可怜，竟承认这种越权行为。在短短时间内容以这样把拉茹勃·法夫尔及其伙伴那样温和的共和主义者完全从政府里排挤出去。

政府趁此波尔多议会抱这种态度的机会采取更进一步反对巴黎的措施。政府要求巴黎国民军撤出武器，而这违背和约条款的。自九月四日革命以来，巴黎被围状态原已解除，现在又恢复了。以反对共和著称的耶稣会首领道略勒·德·巴拉丁将军被任
命为国民军总司令，可恨的波拿巴派维儒将军被任命为巴黎总督。其他一系列的仇视巴黎的措施也接踵而至。更早一些时候，由于巴黎被围，商业和交通衰落，曾声明到期的票据延期支付。政府在这期间已由两位将军迁到了凡尔赛，现在决定，虽则商业和交通仍旧很萧条，所有到期的票据必须立即兑现。此外，还命令到期的租金（这迄今也同样是缓付的）必须立即付讫。同时，每份报纸收印花税二生丁。这一切措施的结果是，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绝大部分巴黎民众、小商人、小贩、手工业者都同革命分子携起手来。他们声明，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接受现今政府所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当政府看到了巴黎的惨状，就企图去施加恐怖，想以暴力侵占巴黎。在三月十七日夜里，勒康特将军奉道累・德・巴拉丁将军的命令带着一支军队向蒙马特尔出动，要想夺取巴黎被围时国民军用自己钱购置而安置在那里的几百门大炮。国民军在前一天得到消息，因而他们警戒起来。军队到达后，发现一切进口都戒备森严。勒康特眼看不可能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不战而把炮夺走，他下令开枪。在这种时候，国民军旁边有许多民众——男人、妇女和小孩，开枪时这些人一定会被波及。于是军队声明：‘我们不射击’。他们不把枪口对准国民军而把枪柄向上，与同人民联欢。将军下了四次开枪的命令，士兵拒绝了四次。

将军现在开始狂怒谩骂。这就激怒了他的士兵，因而被他自己的人所逮捕，并在当天下午被枪毙。并有一个国民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参与其事，而且巴黎公社在几天以后才宣布成立。

现在克列芒・托马将军出头干预这事，他一向以平民身份混在人民队伍中充当间谍，到他话骂士兵时才被发现。斯巴利希先生却说，克列芒・托马曾是个共和主义者。

我的先生们！在法国有一大批人，自称为共和主义者，但归根到底同我们这里的民族自由党人毫无区别。克列芒・托马就是这
种冒牌的共和主义者之一。他原先是个军官，后来辞职，一八四八年初充当《国家》杂志的担任编辑，同时也担任与别家报刊编辑发生争执时的议长的职务。二月政府又把他编入军队并提升为将军，当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时与他以前他都是担任着极共可耻的刽子手角色，并且以他对工人的残暴行为留下了悲惨的纪念。

一八七○年十一月塔米西尔将军因巴黎没有履行选举市政府的诺言而辞去国民军司令之职的时候，特罗普委任克列芒·托马将军为巴黎国民军的司令。这是一个直接的挑衅。克列芒·托马就任司令后，最急迫的事就是在一切行动上对来自工人区的国民军表示明目张胆的仇视。当人们极端憎恨勒康特将军的行为的时候，这个可恶的家伙即出来庇护勒康特。于是他被逮捕，并且同勒康特一样被忿怒的士兵枪毙。

我的先生们！这是一个暴力行为，我绝不嘉许这种行为，但是人们必须设身处地想想，如果这样一想，就一定会原谅这种行为。但是反动派方面所做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更大的残酷行为，而且这种行为不是像巴黎公社所处的那种人心极为激昂慷慨的时候，而是在安静的时候和冷静的心肠中做的。人们只要想一想，对待流放在新喀里多尼亚岛上的巴黎公社人员的骇人听闻的待遇，空前残酷，并且在战后还持续多年。这样的残酷行为激起每个人道主义者的愤怒和谴责。

三月十八日，当在巴黎的政府机关看到了市民和士兵的情绪时，认为最好赶快逃走。国民军中央委员会于是掌握了行政领导权。

斯巴利希先生认为必须谴责凡尔赛政府没有在三月十八日派可靠部队到巴黎去。可是这个政府根本就没有可靠的部队。所有法国境内的军队全都愤恨政府的态度而同情人民。唯一可靠的军队是；拿破仑的卫队、北非步兵团和阿尔及尔军和虔信天主教的布列
塔尼军，他们全都被关在德国的俘虏营里。当梯也尔先生和俾斯麦先生取得协议，俾斯麦对梯也尔表示好意，把上述的军队拨给他八万多人，归他调遣，这些队伍有如野兽一般向巴黎冲去，好像要把他们在德国人那里所遭到的惨败，报复在他们的同胞身上，在他们那可怕的屠杀中有三万多人丧命。这些军队永远负有恶名，后来常常听到战友们说：他们为巴黎人民的効子手效忠，这对于他们是一种奇耻大辱。

由于国民军中央选举委员会的促使，巴黎人民在三月二十五日选举公社。斯巴利希先生却说，选举时有许多人没有参加，好像由此可以推断，凡没有参加选举的都是公社的敌人。

关于巴黎公社的选举我可以找个证人，这人就是社会主义者的凶狠敌人约翰尼斯·谢尔，他现在在《凉亭》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在辱骂公社上实在是无以复加。

现在，谢尔先生在这些文章中报道，三月二十五日四十九万选民中有二十七万七千三百人前往投票投票赞成公社。这等于百分之五十一。我们在莱比锡的国会选举或甚至在市参议员选举中曾有过一次这样踊跃参加选举的吗？在最近一次市参议员选举中参加选举的还不到百分之三十三。如果我们接受斯巴利希先生的逻辑声明说，所有百分之六十七的放弃选政权的人都是社会民主党人，那末他又该怎么说明？那他就应嘲笑我们，并且有充分的理由。但是这却适用于他和他对他公社的判断。

事实上，巴黎的大多数民众表示赞成公社；甚至连谢尔先生也声明，巴黎民众方面以无比的一致和欢畅进行三月二十五日的公社选举，必须把这一天算作巴黎最美好的一天。巴黎人民在这一天表现出它的十分光荣和最美好的一面，这在其他历史事件中差不多是没有的。所以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敌人必须批判公社！

此外，斯巴利希先生还批判公社的‘制造法律’。他说，一个法
令紧跟着另一个，而另一个法令却又把另一个取消或加重。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把像帝制下的巴黎这样一个鼠垢纳污的地方来个大扫除，还能有别的办法吗？（大笑。）这里的的确确有很多要用法令规定的。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事情不能一切都是循规蹈矩的。一八七〇年的战争在德国人方面必定准备得很完善，但是您试问一下参谋总长毛奇，是否万事顺利，他将告诉您说，各处都还有阻碍。如果事情是一个革命运动，如果要创立一个新国家来代替旧国家，而当时还有几十万敌人——德国军队和凡尔赛人用尽一切力量和一切手段从事于消灭新制度，情形就更是如此。

但是，斯巴利希先生所提到的法令，是他自己也不能认为足以损害公社的那种法令。他在谈到公社的法令时举面包工人做例子说，他不相信，社会主义者会安于早晨只有三分钱的陈面包来喝咖啡，这是一个浅薄的笑料，我不去深究它。在这个措施上并不是能否满足资产阶级养成的口腹之欲的问题，而是应否让广大工人阶级永远受到劳累的损害健康的伤工的问题。凡是稍微从事过这类工作的人都知道，面包店伙计由于夜工和一般特别长的工作时间（常达十六小时，甚至十八小时）多数早年丧命。

巴黎公社既然确实注意到这种情况，这就使它获得荣誉。（同意。）

斯巴利希先生继续说，巴黎公社虽然废除了死刑，但又实行枪毙，他在这里所引用的法令，乃是用枪毙的刑法来威吓一切逃避国民军役，也就是逃避保卫本市的法令。

巴黎公社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即任何常备军都是政府手中压迫人民的工具，所以它要求撤消常备军，实行全民武装。根据这个观点，每一个能服军役的人都有保卫本市的义务。

这无损于任何人而对所有的人都公平，关于我们的这种说法有普通兵役义务，却只武装了一部分人民的国防制度，自然不能这样
說。當然也有一部分人不肯擁護公社，是則公社在敵人包圍之中，而且敵人用盡一切能用的手段來消滅它。

公社受到一切方面的攻擊，被迫起而應戰，在這種情況下它必須採取任何應戰的政黨在這種場合可以采取的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它用槍砲來威懾每一个拒絕拿起武器保卫本市的人。

一八七○年我党也有上千的同志不同意政变，但是人們並不問他們願意从軍与否。他們一定要參戰，如果拒絕，就要被交到軍事法庭，毫不容情地被槍斃。

废除平民刑法訴訟的死刑同战时的军事死刑有天渊之別，而斯巴利希先生竟把两者混淆起来。只要战争还存在，維护战时軍紀的死刑就不存在。

斯巴利希先生又提出一項公社法令，根據這法令，公社没收雇主方面放弃的作坊和工厂，把它們交給一向在里面作工的工人們經管。此外，應選舉一個委員會把作坊估价，以便贈償原业主。他很正確地強調說，如果公社有此权力，就要普遍实行这个法令。是的，他推測，我們只要能夠，一切要照此辦理，这也是正确的。我們想消除工人和雇主之間的对立，因为工人利益和雇主利益在今天处在敌对地位。雇主想尽量减低工资而尽量延长工时，工人想尽量提高工资而尽量缩短工时。这种阶级对立将随着每个机器的发明，随着每个新工厂的設立，而更加尖銳。每修好一条路，每架起一根电报線，都使知識传播更广，都使我們获得新的信徒。每一个为集中資本、为消灭小企业家而采取的步骤，都增加分裂而迫使問題得到解决，到那时生产和分配将集体经济，这就是說，一切作坊，一切工厂，一切劳动资料必須掌握在社会的手中，并由它按照一切公民的利Profit和平等权利加以管理。每个人都必须劳动，每个人都有一份收入，当然也担负一份亏損。应当用社会义的，也就是由社会来组织的，即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生产方式来代
替私人工业, 代替野蛮的、无组织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把
今天的危机塞到我们的脖子上。为此，公社已经实行了第一步，这
一步对于有关雇主根本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他们可以得到补偿他们的
作坊和工厂的全部代价。

按照我们的理解，社会有责任这样组织起来，即平均地照顾所
有成员的福利，使它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越来越多地共享文化和文明
在人类生活一切方面的成就。敌人固然宣称拥护进步，但是一旦涉及
整体生活的改善，他们这些锦衣玉食、大权在握的人们就喋
喋说，我们生活在最好的世界，如果要改变它，那就是犯罪。

他们用一切手段保护他们所占有的特权地位，甚至对于一个
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的次要法令，例如救济基金法，也妄自取说
这个法令对雇主不公平，谁拥护它，谁就会遭谴责（因为我们把这
当作谴责）说，你是个社会主义者。这是我们在《日报》上才
看到的。这就极其露骨地表示出：‘我们不願对被压迫者作丝毫的
让步’。

如果不論在小事和大事，在立法和社会生活里到处都表现出
这种阶级对立，那就不言而喻地会发生像巴黎那样的革命。并且
我确信，像我也曾在这里所引用的国会发言中说过的，只要再过几
个十年，巴黎所发生过的一切将要在全欧洲重演。在社会方面是
了解这一点，并尽力走立法的道路来调和现存的阶级对立。

那么公社还做了些什么呢？它实现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古老要
求，这个要求几十年以来一直列在自由党的纲领上，但是自从该党
执政以后就把它丢在垃圾堆里了。公社决议并且实行把教会与学
校和国家分开，并且还决议没收教会财产。

使我惊讶的只是，斯巴利希先生没有提到这一点，没有提出侵
犯所有权的控诉。但人们却拿这一点对公社屡加责难。斯巴利希
先生既然没有提到，由我来提一下，作为补充。（大笑。）
遗憾的只是，公社做的事情是别人早就做过的。如果现在一五一一七年开始的宗教改革中许多公侯站在马丁·路德方面，并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丰富的教会财产可以塞满他们的口袋。（大笑，鼓掌。）

十五年前，北美合众国发生南北战争，最后北部废除了奴隶制度，人们不可能想像有比这更严重的侵犯奴隶主所有权的行为。我们的敌人认为，凡是对他们有利的就是合理的公正的，而对人民有利的就是犯罪和盗窃。

就是控诉巴黎公社侵犯所有权的这个政党，在六十年代初期它对奥地利感情还好的时候，给它提供没收教会财产来弥补巨大债务的建议，并且当意大利按这个方针进行时，它还鼓掌喝彩。现在，宗教团体根据任何一个资产者所依以取得其房屋或土地的法权来取得它们的财产。那末其因何在呢？公社宣布把教会同国家和学校分开以后，它规定实行强迫的义务教育，不仅免去学费，而且也免去教费。穷人和富人应享受相同的教育，国家借此给一切人同样的保证，以免早在幼年的心灵上就种植了贫富之间的嫉妒和仇恨。请您给我指出一个做到哪怕只是稍微与此相似的成绩的自由主义国家吧。（鼓掌。）

斯巴利希先生还恶意地说，巴黎公社声明，它的政策和它的企图都是有科学根据的。公社以此想说，它把现代科学有关国民经济、有关司法和人民福利事业等方面的成就尽可能普遍有益地运用在立法上，并且不局限于固定的理论和定理。因此它确是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这个立场不是由一定的假设和成见出发，而是企图根据试验和经验考究出最好的东西来。

如果说巴黎公社只完成了一些零星工作，这是由于它所处的局势和环境的关系。请您想一想，巴黎公社自始至终没有一刻安静，不断处在战争状态和战争中——如何能不是这样呢？
斯巴利希先生特别谴责公社的是，公社据说希望最充分的出版自由，它却在封闭敌对的报刊时取消了出版自由。这种措施也很容易用公社处于迫不得已的情况来解释。各方面都向它进攻，处在战争和革命之间，它有必要除了不容忍站在城门口的敌人以外，也不容忍本城的敌人。它必须封闭那些天天对它进行猛烈攻击和诬蔑的报刊，这些报刊同站在城门口的敌人有联系，并且致力于颠覆公社。

一八七○年战争爆发时，在德国所有被认为有危险性的省份都宣布戒严。反对派的报纸全被封闭，所有被认为反对战争的人都被监禁起来。那么，我们也可以为巴黎公社要求同样的权利。

斯巴利希先生也认为巴黎公社既反对间谍税，则控诉梯也尔先生方面夺去粮食税款就不合理。公社这个控诉是有道理的。粮食税是属于巴黎市的，公社不能在战斗中实行一种新的税务制度。粮食税遂成为唯一长流不断的税源，如果它要保持防御和行政管理，就必须利用这个税源。

因为梯也尔先生夺去了公社的税款，它就必须依赖法国银行和罗特希尔德的贷款来应付需要，这笔借款没有被驳回而是得到梯也尔先生的同意，被批准了。但是公社的财政管理部门表现出连斯巴利希先生也无法抨击的一种情况。那就是公社的非常节省俭约，即使敌人也对公社这一点推崇备至。

巴黎公社的财政部长茹尔德在凡尔赛的法官面前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说道：‘我离开财政部时比我进去时更穷了!’（听着!）请指给我一个能够说出同样话的君主国家的财政部长!（大笑，赞成。）梯也尔先生在一八三○年以一个穷律师兼作家在路易·菲力浦治下进入内阁，到一八三六年以百万富翁离开内阁。

巴黎公社的第一个措施是取消高薪俸，它的工作人员只能得到比较好的劳动工资。一级公务员的年薪不得超过六千法郎，
即四千八百马克。莱比锡市长每年的收入是一万五千马克。（大笑，听着！）公社的一级将官也只有六千法郎，但是梯也尔先生刚就任总统时，他最迫切的事却是使人给他三百万法郎的文官薪水。（听着！）

巴黎公社树立了节约的典型，可以作为一切政府的榜样。这甚至社会主义者的敌人梯也尔先生也承认。斯巴利希先生自然不提它，所以我来提一提。（大笑。）

现在我来谈谈枪决人质和放火的事。斯巴利希先生在提到放火时说，他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十四天，在巴黎亲眼看见劫后惨状。他竟至告诉我们都，有一所人们要烧掉的私人住宅，并不在防线以内。他自然没有向我们说，这座房子确实是放火烧的。在战斗时他不在场，他怎能断然判断，什么是在防御上必要或是不必要呢？他引用给他的口头保证。在我眼里，这些保证毫无价值。凡尔赛人的迫害和他们野兽般的忿怒非常猖獗，在公社灭亡后，不仅几个星期之后，而是几个月直到几年之后，还在迫害每个对公社说过一句同情话的人。恐怖如此之甚，不仅没有人敢庇护公社，而且有许多人辱骂他们，以免自己受嫌疑。在这里资产阶级的卑鄙性也完全暴露出来。在公社灭亡后的几天内凡尔赛人那里收到的告密信不下三十七万件。当时巴黎资产阶级的行为与一八六六年莱比锡的资产阶级一样卑鄙。一八六六年，莱比锡的资产阶级向普鲁士将军呈递的告密信非常之多，以至使这位将军感到厌烦，说这事他不願再过问了。

斯巴利希先生现在拿来一封据说是由斐烈签名的放火证明书，上面盖着陆军部长的印信，不过梯也尔先生的陆军部长也能够同样地盖上这种印信，所以这证明书在我看来等于废纸，应当撕碎。（发言人把证明书撕碎。好啊。骚动。）我的先生们，许多关于放火、枪决人质、所谓劫夺财产等的文件，在法庭上将证明都是伪
造的。

费烈就是根据这里所提供的文件而被控放火焚烧财政部，他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否认这个文件是真的；他找出某些字迹证明文件是伪造的，但是凡尔赛方面派来的笔迹鉴别人断定是真的，费烈遂被判罪。他也被控枪决人质。他自己说，他没有下令枪毙他们，而是下令释放他们。其他的报道，特别是一个英国医生的，都与此相符，并且同样证明，有些曾被逮捕去作人质的教士后来在法庭上作证人，因而不可能曾被枪毙。六十八人质中固然有一部分被枪毙，不过据说只是在他们离开监狱后拒绝接受人员要他们协助防务的要求的时候发生的。于是他们被枪击了。拉乌尔·里果也被控枪决人质。现在，拉乌尔·里果已死，他战斗得像一个男儿，而且在战斗中死得也像一个男儿；控告他是容易的，他已经死亡，不能答辩了。

逮捕人质有什么目的呢？一八七〇年德国人在法国抓了许多人质，那是因为法国的狙击兵或其他居民在大道小路上杀害德国人，袭击运粮队，破坏铁路、桥梁和公路，袭击和杀害单身的人员，总之，竭力进行破坏。狙击兵所做的就是一八一三年普鲁士民兵对法国人所做的，而且我还可以告诉您们宣读一下当时的民兵条例，其中规定，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加害敌人，消灭敌人。

德国人不愿承认这样进行战争合乎战时公法，于是命令所有军官说，在兵士受到上述方式的伤害的地方，如果找不到凶手，就逮捕人质枪决，决不宽恕。此外，还向村庄居民征收战时税，有从房屋或村庄向军队开枪射击的，这种房屋或村庄无论有罪无罪都要被烧毁。这些命令常常见于实行。成百的人这样丧失了命，许多房屋和整个村镇被烧毁，关于这些，我在自由派的报纸上没有看到谴责而只有赞扬。

公社对凡尔赛人所处的地位，与德国人对法国狙击兵的非正
規律相似，至少在法律上一样。凡尔赛人在对巴黎的几星期战斗中，违反了一切战时公法，任意屠杀落到他們手里的俘虏。公社的杜瓦尔和佛路朗斯将军以及許多其他军官都是这样牺牲的。是啊，凡尔赛人竟敢射击缝带站，并且把俘获的女护士奸污后枪杀。这只有像借助于德国人从俘虏兵中撤换给谢尔先生支配的那种畜生才做不出来。

为了对付这些丑恶行为，公社决定逮捕人质，并且有一个国民军被害，就枪毙三个人质。但是这停留在纸上，当终于有一部分人质被枪决时，如斯巴利希先生自己所承认，公社已经不存在，因而它也不能对此负责了。

現在，凡尔赛人在戦前義大利兵的幫助下侵入巴黎（沒有幫助他們是难以成功的），在巴黎市街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所有落到凡尔赛人手中的，不论是男人、妇女和小孩一律被杀害，把数百个俘虏排列在拉息士神甫墓园里，用霰弹炮扫射，并且在痉挛的尸体上浇灌石灰和煤油，抛入壕沟。

凡尔赛人強狂，从沒有留下一个受伤的人这个事实，可以证明。根据一致的说法，在几天内就有一万五千到二万人丧了命。

在这种情况下，公社除了尽一切可能自卫到底之外，别无他法；人們惯于忌怕失败者完全合理的行为描写成丑恶行为。请您們读一下罗克尔叙述他在瓦尔特亥姆的监视一书，书中也描写了一八四九年德累斯顿的五月起义，您們在那里可以看到，人們跟着反动派方面与五月起义战士的誅蔑，正是今天人們对公社的誅蔑，所不同的只有德累斯顿的五月革命是个资产阶级革命罢了。请您們再读一下一八四八年后维也纳十月初起义的历史，在它失败后罗伯特·布鲁姆被枪决；当时温第式格瑞茨侯爵向世界发表的关于维也纳局势的宣言，同凡尔赛人向世界所报道的关于公社时期的巴黎局势丝毫不差。
我这里有布鲁姆写的一篇文章，文中他用坚决的态度评论温第格瑞的宣言，并且愤怒地喊道：‘如果人们竟敢对晓得事情的我们说这种话，那末世人会对他们所不熟悉的维也纳如何想像！

在这里我却也要提一下布鲁姆当时如何理解革命以及他一次在大学礼堂中演讲时如何声明：‘我们不能半途而废，我们要对我们的敌人一直斗争到底，毫不怜悯。’并且到了今天，自由派还在纪念罗伯特·布鲁姆，而且是合理的。

巴黎的公社对凡尔赛人的情形同当时维也纳市民对反动派的情形完全一样。公社必须斗争到最后一息，并且它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这是它的最凶恶的敌人所不能否认的。就像人们在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年在维也纳、拉斯塔特和曼海姆按照军法枪毙了我们最好的人那样，公社的男儿们也这样被杀害，其中大多数临终时高呼：‘共和国万岁！公社万岁！’

现在我来谈谈放火事件。

凡尔赛人对巴黎进行了好几个星期的战斗，他们并不是用糖豆来射击；自然会留下一片荒凉。在最后八天内，他们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占领了蒙马特尔高地和五十门重炮，他们在燃烧弹以至煤油弹向房屋射击，于是不出所料，引起许多处大火。所以大多数的火灾都是由凡尔赛人造成的，而他们竟拿这事归罪于公社。现在巷战发生了，并且凡尔赛方面野蛮残酷地进行巷战，公社为了防御起见，不得不烧个别房屋，借以暂时阻挠凡尔赛人。难道说这种办法这样不正当和未曾有，竟被认为是杀人放火吗？德国人在包围斯特拉斯堡时只为了要强迫城市投降，毁坏房屋五、六百幢，虽则他们并不是对老百姓作战。当索阿松要塞投降时，形形色色的新闻记者都证实，城里没有一所房屋是完整的，街道全部被毁，几乎所有的屋顶都被打穿，但是要塞的城墙却完好无损。人们炮轰民
房，杀害平民，使他们有必要迫使军官投降。我没有看到自由派的报刊反对这种作战方法。梯也尔对付巴黎就是照德国人对付要塞的办法，而人们却把公社在可能中采取的自卫行动硬算作罪行！当一八四九年在德累斯顿起义时，博伊斯特先生要求应邀来援的普鲁士人放火烧城，若不是司令官瓦尔德锡伯爵声明，他希望不这样办也能消灭叛党，那就会实现了。不过人们当然还不乏其他野蛮行动。例如人们把一批俘虏从易北河大桥上推到水里去，当这些人企图握住栏杆，人们就用军刀砍断他们的手指。凡尔赛成队的匪徒在巴黎进行与此类似的甚至更残酷的暴行达数星期之久。

所以大部分的火灾是凡尔赛人炮轰巴黎时引起的，这有意大利使臣巴特鲁塞利·德拉·加第尼亚亲眼看见过证。他二十年来一向住在巴黎，当时他正在那里，他曾在《意大利报》上作了公开的声明。他写道，人们必须承认，遭到焚毁的房屋十分之九确是凡尔赛人的炮弹所引起的。公社放火是为了防御的目的。放过火的和焚毁了的房屋大约有二百幢，照这算来属于公社的只是比较小的一部分。

我的先辈们，给我讲话的时间已经过了很多，我只有几分钟了，关于我所列举的证件，我将在下一次答辩时或在有继续举行必要的第二次大会上提出。我所说的一切，我都能用敌方的报道来证明是真实的……”

随后我又讲一下据说是费烈所促使的枪决人质，并且接着说：
“公社的办法是按照当时局势不得已的办法，人们即使不同意它的办法，也至少认为这种办法可以理解而加以原谅。

斯巴利希先生以控诉费烈为结束，我现在也要结束了。确实无疑的是，公社没有做任何感到惭愧的事情（并且我希望还有机会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至于它所做的暴行，欧洲各国政府在类似情况下没有不做得更厉害百倍以至千倍的。暴风雨般的，持久不
息的掌声。)

主席莫特勒：我的先生们，我们必须把事情缩短些；方才警察
长先生来通知，他只能让这个会开到十二点钟为止。

接着是斯巴利希的简短而无关重要的答复，然后我又发言：
“我的先生们，斯巴利希先生对于我的发言没有回答，虽然我
们在今天规定的时间内已经不能完事，他也没有声明愿意举行第
二次集会。我现在有必要谈谈一下斯巴利希先生讲话中最后的几
点。斯巴利希先生自夸他敢同我们对阵的勇气。同一个被认为只
是由一小撮空想家组成的党派对阵，是否具有巨大的勇气，姑置
不论。

斯巴利希先生接着表示，希望今天的集会能有助于踊跃参加
选举；这个也是我们希望的。（大笑。）这对我们也没有害处。（同意。）
迄今每次竞选都表现出，我们一次比一次要多得到几百张票，我希望，
今天的集会将促使下次国会议选也正是这种情况。（大笑，好
啊!）

斯巴利希先生认为自己有责任以布鲁姆的继承人名义，抗议
我把布鲁姆与公社联系起来。我不知，斯巴利希先生何以有全
权就一件没有发生的事情提出抗议。（大笑。）我同任何人知道得
一样清楚，罗伯特·布鲁姆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是一个十足的民
主主义者的共和主义者，这就比斯巴利希先生强了。（掌声。
斯巴利希先生鞠躬。哄堂大笑。）我只是说明，公社所处的境遇类
似一八四八年十月间维也纳的境遇。当时罗伯特·布鲁姆在维也
纳，表示了继续进行革命的决心，即使公社方面也不会比他更坚决
了。因为我在不久之前曾提到罗伯特·布鲁姆在那时的一次讲
话，所以我在这里说明一下，这是引自阿图尔·弗赖伊为致敬于布
鲁姆而出版的一本书里，他在书中努力叙述作为一个人、一个作家
和政治家的罗伯特·布鲁姆。讲话中的有关部分说道：

300
‘不要不彻底的革命！向前迈进，不惜流血，在已打开的道路上前进。首先，对于拥护旧制度、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渴想安逸的人决不容情；对于这些人要进行毁灭性的战争。’

即使最坚决的社会主义者能够比罗伯特·布鲁姆在这里对革命的敌人所表示的更为坚决吗？（掌声。）

现在请你们也听一听温第式格瑞茨给维也纳人的宣言中的一段：

‘城市受了恐怖事件的污辱，这种事件使每个爱荣誉的人义愤填膺！……维也纳处在一切邪恶而鲁莽、不惜做一切丑行的党派暴力之下，生命和财产掌握在一小撮暴犯的手里！’

这不是字字同梯也尔先生关于巴黎和公社所发表的宣言都一致吗？（同意。）

斯巴利希先生又说，只要社会民主党拥护国际主义幻想，就不能得到他那个党的重视。我们不要受重视。（大笑。）但是国际思想真是幻想吗？由家而成族，合许多族而成国家和民族，最后由于民族间的亲密联系遂发展为国际。这是一个历史过程。由于社会主义站在博爱和友爱的立场上，由于它为停止民族的战争和挑衅，为使各民族在和平劳动和促进文化中共同前进而奋斗，社会民主党代表着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最高的文化理想。（掌声。）

因为我们党反对狭隘的民族立场，因为它反对种族斗争而拥护各族亲睦的思想，所以人们现在对它进行蔑蔑和迫害，它的遭遇正是先驱战士随时会遭遇到的。我的先生们！比如说，你们今天去到一个十足的天主教国家里，听听他们以何等的无知来批判马丁·路德！世界上一切代表进步的政党都是如此，自由党也不例外。在今天，自由党掌握政权和统治的地方，它就认为它的世界是最好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在今天就会遭到他们自己在将近二十年前从封建党派那里遭到过的待遇。这完全是很自
然的事！

我们不要被这种指责所迷惑，我们知道，我们的时刻就要来到，形势对我们有利，随着阶级对立的加强，随着被投入工资工人行列的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的消灭，社会民主党就日益壮大，直到最后它掌握政权。（热烈的鼓掌。）

斯巴利希先生感到快乐，因为开姆尼茨最近一次邦议会选举没有社会民主党人被选入议会。这种快乐不久就会成为泡影。（大笑。）但是这却给他表明了，他所表示满意的选举法是一个只以其反动的规定阻碍全民选举的选举法。（掌声。）同时，社会民主党人却将仍然进入邦议会，即使这二年不进入，下年一定会进入（好啊，大笑），如果开姆尼茨的市议会像它开列捐税名单那样开列选举名单（这两年，开姆尼茨也尽人皆知是驴唇不对马嘴的），那末社会民主党人就一定列在其中了。（哄堂大笑和鼓掌。）

最后，当斯巴利希先生乞援于在这里出席的保守党报纸代表的时候，他以为现在保守党报纸大概看得清，民族自由党与社会民主党无关。这一点肯定还没有人真正相信，并且那些写过这话的人是最不相信的。（大笑。）

事实上，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之间的争执，只能看做是一对不满意的夫妇之间的争吵。如果有第三者参与其间，他们就成为一致了。（大笑。）……几个星期以前在《莱比锡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号召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敌人说：‘我们要组成一个单一的正直的大党。’ 现在，我们祝您们达到这个目的，您们将有必要这样做。（大笑。）最近我们也已经在开姆尼茨看到这个现象了。起初，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在那里打架，两党都要提出候选人，因为都不想把地盘让给对方，但是当他们听说一个社会主义者要被提出的时候，争吵就停止了，现在是：‘大家都来对付倍倍尔’。（哄堂大笑和鼓掌。）”

302
这个成绩辉煌的集会以我的讲演为结束。

新的迫害

一九七六年一月初，萨克森的本党同志在开姆尼茨举行了一个集会者很踊跃的集会，会上为了可望在一九七七年一月举行的下届国会选举提出候选人。不顾一切迫害，情绪还是非常好的。这一年年初，柏林的同志在《柏林自由报》上创办了一个地方柱，它逐渐获得了朋友和敌人的重视。现在也已经觉察到国家整个政策要转变的初期征兆。四月底，内政部长德弗雷尔被免职，官方开始向保护贸易的方面。普鲁士的贸易部长冯·康普豪森不久之前曾在国会中为企业主反对工激以摆脱危机作辩护，并且因此博得欧仁·李希特尔的颂扬：“谨向竟敢说出这样不得人心的真理的部长致以崇高敬意”，后来他也因此遭到冷落。在这期间，连续不断地对我党同志进行迫害，特别是由于侮辱首相的罪名。俾斯麦采用了一种惯例，他使人把他的刑事起诉书大量复印出来，送给那些指出了侮辱者姓名的检察官来提出诉讼。

他不断提出这种起诉，直到他一九八〇年二月离职时为止。这种案件数以千计，被判罪的人使监狱中的人口大增。这种办法当然不是他宽宏大量的明证，就连崇拜他的人也有许多不赞成的。

此外，台森多尔夫遵照俾斯麦的意旨继续迫害工人组织。他控诉全德工人联合会领导人违反一九七五年二月的普鲁士结社法时，建议对联合会实行镇压，他的理由是：“我们摧毁了社会主义的组织，社会主义的政党就不再存在”，这句话证明他对运动完全不了解，现在他认为需要进一步采取类似的手段。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镇压，由于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哥达的建立而被推倒了。现在转到社会主义工人党受镇压。他也办到了要求柏林市法院参议室作出决议，宣布把党在柏林的党支部以及党本身在普鲁士全境
内暂停封闭。党理事会以一封告党员同志书回答这个决议案，书中
要求党同志不顾这个决议案，为下届国会选举进行鼓动。党应该表
现出绝不让像柏林市法院参议室那样的决议案给吓住。现在各个同
志才真正有必要为党尽他的全部责任。对台森多尔夫这个“消灭
社会民主党”的手段必须用“社会民主党万岁”这个对策作答复。

此后普鲁士各处在党组织被解散的地方都成立起地方组织，这些
组织当然必须隐蔽它与德国其他地区继续存在的中央组织有联系
的任何迹象。台森多尔夫这个行动确实成为一塌空，因为这些地
方组织在发展党员、推销党报和募集资金等方面所作的事至少与
被解散的中央组织一样多。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召开以往那样的党代表大会。但
是我们不欲也不能缺少这种会议，于是由国会党团和党理事会聚
在一起，讨论应该怎么办。我建议，由国会党团召开一个社会主义
者全体代表大会，会期是八月二十到二十三日，地点是哥达，会议
代表由公开的集会选举，这建议大家很快地就同意了。另一方面，
为了使普鲁士的党员同志能以无法辩斥的形式来缴纳党费，决议
每月出版一张大约有手掌大小名为《选举人》的小报，定价二十分
尼，销路极好。

但是台森多尔夫的迫害并不以解散普鲁士的党组织为满足。他随即也处置一些工团的中央联合会，使它们作为“政治组
织”而遭到与党同样的命运。对于其中的四个，他达到了目的。被
解散的中央领导机关现在迁往汉堡，那里的结社法并不禁止政治
性团体的联合。

* * *

六月二十八日，莫斯科在受了二十六个月的监禁以后，由普略
曾湖释放出来了。在同一天，白拉克公开宣布出版莫斯科所著的
一本小册子，名：《普略曾湖的政治犯监狱》，他在书里叙述他的经

304
历，并且描写了他和其他的人如何在官员的背后做了各式各样有利的事情和欺骗这些官员。这本书的出版是不智的。书刚一出版，内务部长就要求那个不知名的普略曾湖监狱长报告所描写的事情。结果是许多官员受处分和革职，并且从现在起执行监狱规定远较以前严格。还有，从现在起（当也不得不迁入普略曾湖时，人们把我作为例外，关于这事，下文再谈），大多数的政治犯被隔离在所谓的蒙面区中。当莫斯特在一八七八年又被判处住六个月普略曾湖监狱的时候，他的轻率举动受到报复。他现在被严格地单独禁闭起来，每当他离开监狱时，必须同狱舍中其他住客一样，带上方黑色面具，免得有人认出他来。

处罚也同时对党越来越凶的迫害相适应。原先判几个星期或仅仅几个月徒刑的，现在判得加重三、四倍。判决十二、十五、十八个月甚至更多，已成通例。个别党报，如《前进步报》和《柏林自由报》，经常有许多编辑在坐牢。例如鲍维格（开姆尼茨）因为犯君罪（人们把这看做亵神罪）被判处二年监禁；由于种种违反出版条例罪，奥格斯堡刑事陪审法庭判处 R. 弗兰茨徒刑三年，E. 罗特曼诺和 E. 科伯尔各二年，这些判决引起全党暴风雨般的怒怨。在其他案件中，托马斯（奥格斯堡）被判处二年，劳夫（开姆尼茨）被判处一年零四个月。次年，瓦尔特希因为种种违反出版条例罪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并且在再下一年，《德累斯顿人民报》编辑格・冯・福尔马尔被判了同样的处分。到后来，这些判决在党内几乎引起不公感的；谁作编辑或鼓动者，谁就必须把坐牢算作他的职位所必不可少的属性。因为福尔马尔是《德累斯顿人民报》的编辑，我和他发生频繁的书信往来，他被种种违反出版条例罪所牵累，于是我完成了一件迫切问题，即在判罪以后他作为德法战争中重伤员所领的年金是否因而取消，他为此征求我的意见。一八七七年六月十七日我对此答复说：
“……关于您的年金的事我还没有能够同夫鲁塔格谈起，我也
难以相信，他能够比我告诉您的更多些。

我查过了国会审议录。法令第三十二条关于军人的年金和生
活费在第二款中规定，经过法律上的司法判决能够导致年金的
丧失，并且还规定，

年金的增加却不能因司法裁定而予以取消。

审议录中并没一个字提到任何情况可以取消年金。在讨论
的时候曾注意到，在帝国刑法法典中，凡是能够取消年金的规定
一律删去了，这对巴伐利亚自然也是有效的。一八四五年普鲁士
的旧军事刑法法典却与此相反，其中包含有这样的规定。但我所
知，这些规定对于巴伐利亚是不适用的，于是问题就在于巴伐利
亚的军事刑法法典究竟包含有哪些有关的规定，这就是现在应该
考虑的，这法典您大概是不难找到的。

我劝您在写作方式上要特别小心，我害怕您们会使您大上共
当。但是因为这种判决万不能招致丧失公权，所以问题在于，这种
褫夺公权是否是取消年金的条件。在什么情况下，您也许能得到
保护。统治势力把它当作一个‘叛徒’而对您特别仇恨这是确实无
疑的……”

使人大为满意的是，这时得知，不伦瑞克大公国的最高法院
因为吕森事件判决埃尔・冯・法尔科施太因将帅赔偿在一八七
〇年秋季所逮捕的同志的损失，计付给白拉克二千一百马克，格拉
菜一百零八马克、彭好尔斯特一百零五马克、独立经营工商业者埃
莱尔斯每天七点五〇马克，工人曲恩每天三马克。

一八七六年的哥达代表大会

我们拟订的哥达代表大会（八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的议事项
程是：“

306
“1. 社会党议员的活动； 2. 德国社会主义组织的行动和地位；
3. 当前的国会选举； 4. 确定社会党候选人； 5. 德国的社会主义组织； 6. 党报。”

半官方的《北德意志总汇报》对这种安排大肆叫嚣并威胁说，人们将设法确定，这次代表大会是否是一个规避法律以免被随后被封閉和解散的行为。但是我们对这个威胁置之不理。我们必须表示，我们不受威吓，并决定利用环境所容许的一切手段来招架对我们的打击。

会议仍由盖布和哈森克萊維尔主持。出席代表九十八人，代表二百九十一个地方的三万八千二百五十四人的委托。李卜克内西和我由于私事在开会的第二天才出席。在奥艾尔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党的领导机关从一八七五年六月八日到一八七六年八月二十日总共收入五万三千九百七十三马克，开支则是五万四千四百三十二马克。所以稍有亏空，这个亏空用《选举人》小报高达四千三百三十一马克的盈余来弥补。党在那时拥有二三十个政治性的机关报和新创刊的消遣性附刊《新世界》。机关报中每星期出版六次者有八种，出版三次者八种，二次者四种，一次者三种。由国外社会主义组织寄来了一系列的祝贺党的勇敢行动的信件，这对一个德意志的党代表大会来说还是第一次。我因业务关系曾到瑞士旅行，凑巧参加了在伯尔尼举行的国际会议，于是我带回了国际会议的祝贺。为了表示兄弟般的国际团结，决议为极端困苦的巴黎公社社员适当地筹措款项。卡尔·希拉施代表巴黎工人出席大会。哈森克萊維尔作关于党团在国会里的活动的报告。我利用这次机会为我使大受攻击的在议员日俸问题上弃权一事作了辩白。莫尔肯布尔反对我们的弃权，发言说，他认为，弃权的办法损害了我们的鼓动工作，这种策略使同志們吃惊。党团对一个议案赞成还是反对，必须总是态度鲜明并连续参加投票。在长期间辩论以后，A. 卡培尔
和德累斯巴赫建议，应声明我们对议员认为问题投票是不切实际的。这个建议遭到否决。相反地，勒文施泰因的一个建议通过了，他建议略去这个问题，因为社会主义议员当然赞成日德，并且在目前情况下弃权，只是证实了一部分自由主义议员所犯的欺骗罪行。

进一步的讨论表现出，在新合并的党里还存在着人事上和事务上的强烈对立，这些对立现在爆发出来。弗罗梅说，许党报并且还有李卜克内西和我从宗嘎曼（法兰克福）那里领取金钱津贴，于是引起了激烈争辩。结果证明被提到的报纸没有一家是从宗嘎曼那里领取津贴的，对李卜克内西也是如此。我告诉大家，在我坐牢期间，宗嘎曼曾再三说，我出狱后如果为了恢复营业需要借款时，他愿意帮助我，已借给我六百塔勒，利息五分，分期归还。这更是无可非议，因为我自从一八六十五年以来就和宗嘎曼有了交情，而且这件事完全是纯粹私人的事情。宗嘎曼自己不好意思，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法兰克福的同志，这件事就被传播出来。辩论的结果是，以全体对七票通过白拉克（他多年来第一次出席代表大会）的建议，谴责了这次存心与我为难的行为。我于是在本年内还清了宗嘎曼的借款。

另外还有一次争论，当时也很激烈，争论的问题是，今后是否需要有两个正式的机关报（柏林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莱比锡的《人民国家报》）。如果只要一个，那么要哪一个。最后，赞成莱比锡的有四十九票，赞成柏林的有三十八票，六个代表弃权。并且还决议，中央机关报从十月一日起改名为《前进报》，每星期出版三次。然后，两位编辑的选举又引起热烈的辩论。哈斯尔曼向来不希望合并，声明决不迁往莱比锡，并放弃编辑的职位。根据盖布的建议，哈森克尔维尔声明与李卜克内西共同担任编辑。此外，大家一致同意，党在普鲁士被解散后，另设立中央委员会代替汉堡的党的理事会，中央委员会由奥尔茨、布拉特、德罗蔡、盖布和哈尔特
曼。經我建議，秘書月薪定為一百五十馬克，司庫一百零五馬克，两位副手每人四十五馬克。

此外，党代表大会对当前的经济问题表示了意见。自从一九七四年起发生了工业危机，并且一年比一年加重，它使得工业界关于保护关税还是自由贸易的问题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并且最后在数十年来一直是自由贸易制度的主要支柱的农业界，也得到了拥护者。首先是钢铁工业家，他们早在前几年就对从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取消钢铁关税的决定非常激愤并与之作斗争。和他们联合的还有其他工业家，特别是棉业工业家。因为现在美国的粮食竞争日益显著，粮食价也不能保持所希望的高价，反而落了价，易北河以东地区的粮食生产者在美国的竞争下，他们国外市场的销路日益呆滞，就是在本国也感觉到这种竞争的影响，于是他们转到保护关税派。广大阶层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看法的这种转变也必然引起党内的注意。所以在本年内奥艾尔·弗里茨和麦克斯·凯塞尔都表示赞成一种或多或少带有保护关税性质的政策。因此，代表大会不得不对这次转变了的潮流表示态度；它的确表示得不充分，而且有些不清楚。由于白拉克、弗利克、弗里茨和格利伦贝格、巴塞尔曼、李卜克内西和摩斯特的建议，大会未经讨论即通过一个决议案，其中说道：“德国社会主义者不过间有产阶级内部所发生的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之间的斗争；采取保护关税与否的问题只是实际的问题，而必须按照个别情况来决定；劳动阶级困苦的根源在于一般的经济情况，但是政府方面所缔结的现行通商条约既不利于德意志工业，就要求改变”要求党报劝告工人，不要为在要求保护关税时求国家帮助的资产阶级火上取栗。并且因为那时还有铁路应归私有还是归国有的问题，而且俾斯麦还力求由帝国垄断铁路，所以决议案对这个问题也表示了态度。大会表示赞成铁路国有，但反对帝国的铁路计划，因为这种计划是为促
进阶级国家和军事国家的利益而制定的，并且这笔收入会用在非生产的项目上，帝国由此获得一种与人民为敌的新力量，并使人民的财产大量落到交易所投机者的手里。

温柔善良的白拉克未能忘怀他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后从它那方面所受的种种屈辱，在八月三十一日写了一封信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谈到代表大会的经过说：“讨论得非常好，弗罗梅—宗纳曼事件，还有关于议员日俸的表决，接着是中央机关报应放在柏林还是放在莱比锡的问题，这是三个主要项目；拉萨尔派认真地相信，运动已为他们的掌握之中，无论如何他们在组织中的胜利是无疑的了。他们有一切根据来这样想。有一次在柏林举行的会议上，拉姆（莱比锡，莱比锡党的印刷所领导人。——奥·倍·）同意迁往柏林，而盖布因恐惧难违，也就不再反对。但是倍倍尔和我，以及奥艾尔声明，迁移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也博得了许多人的赞同，并且重新鼓起了李卜克内西、盖布和其他的人们。于是这一仗打得也很漂亮。我们在宗纳曼事件和与议员日俸有关的事件中得到胜利以后，拉萨尔派（现在柏林企业的经济利益却在为他们帮忙）作孤注一掷。双方都非常激烈，于是打了一个真正的议会战。首先登记发言的有四十二人，在前面的除了倍倍尔外尽是些柏林人。我们以一些适当的建议使这个名单失效，因为出于敌人意料之外，我们方面的人首先上了名单，现在可以大方起来，最后李希特尔（王兹培克）还为我方出了大力。人们特别激动，双方都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但是敌人却激动欲狂，他们发出暴躁的喧嚷，来充分利用那五分钟的发言时间，同时我们却保持安静并且个个都缓缓稳重地发言。其结果您已经知道了。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好极了。

哈森克莱维尔终于被盖布说服到莱比锡去参加中央机关报，这就取得了圆满的胜利，因为不这样，人们就会与弗利克（不来梅）
一同说：新报纸只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位先生的机关报。这样一套，统一就得到了保证……”

哈赛尔曼于一八七六年十月一日辞去《柏林自由报》的职位，回到巴门一爱北斐特，在这里他担任《山地人民之声报》的编集，并创办一个表面上只以传单形式出版的新机关报《红旗》。但是不久就表单出，哈赛尔曼创办这个报集，是追求分裂的目的，这使他对党和对中央选举委员会处于不正常的地位，并在次年的党代表大会上又引起了不愉快的争论。

一八七六年到一八七七年的竞选

中央选举委员会在一八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发出号召，展开竞集。由于该委员会和许多同志的要求，我又写了一本书名为《一八七四到一八七六年德意志国会和邦议会议会的抗议活动》的小册子。这个著作我是以我的名字在柏林印刷合作社出版，也就是在台斯多尔夫注制之下出版的，我不久就由我所遭的损害体会到，他适当地利用了这种情况。

国会的末次会期在十月三十日开始。但会期只能很短，而且因为各法律草案对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利益关系，所以我们在会期讨论，却更多从事于选举鼓动，在那几个星期我由莱比锡到科伦，由科伦到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又从哥尼斯堡到布勒斯劳等地。在哥尼斯堡，我要在座无虚席的集会上演讲两个晚上，因为我的报告所引起的讨论要到第二天夜晚才能结束。在第一次集会上约翰·雅可比也出席了，人民推举他为大会名誉主席。我到这时才认识他。他仅仅是中等身材，整个态度显然是谨慎的，只有为环境所迫才肯明显地干预公众事务，他给我一个非常亲切的印象。我在第一次大会之前到他的寓所去拜访他，他在一个很宽敞的书房里接待我，里面的书架和橱柜直到天花板都装满了书籍。我真
羡慕他这个布置极好的房间，这个房间的舒适安排简直诱人工作。雅可比在次年春季因患结石症施行手术而去世；前一年十月弗兰茨·齐格勒在他之先死去。

回到莱比锡以后，我召开一次民众大会，议程是：“妇女在现今国家里的地位和向社会主义前进。”虽然我们使用的是莱比锡最大的会场，但容纳不了大批潮涌而来的听众，许多人因为没有席位而不得不折回。听众中妇女很多。我分析给她听，她们对于眼前的国会选举也必须加以如何热烈的注意；但因她们暂时还没有选举权，她们的任务就是参加竞选的鼓动，并且催促她们的丈夫和有选举权的男性亲属参加选举，而且要拥护主张她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完全平等权利的社会民主党。集会进行得很如意，这还是第一次要求妇女参加政治性的竞选活动。

我从莱比锡急急忙忙赶到德累斯顿去鼓动，在这里我被提为党的候选人。第十七萨克森选区（格芬一美拉内）也提名我为候选人，该区有组织的同志们都预先声明，如果我在另一个选区当选的话，他们就准备来一个补我的席位的复选，因为他们在一个选区仍会得到胜利，全世界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事实也是如此。

我在德累斯顿的三个候选人中间首先得到了相对的多数票。我和自由派的候选人麦侯夫教授进入复选，并以一万零八百三十七票对九千九百二十票取得胜利。在选举的次日，我接到通知胜利消息的电报时（我曾请求不要在选举的当天夜晚打电话告诉我选举结果），我问我妻，地下室里是否还有一瓶酒，在她答应“有”之后，我说：“好，那末让我们今天中午用它来为我的德累斯顿选民祝福吧。”谈话时我的小女孩在旁边，问道：“爸爸，麦侯夫教授先生今天中午要去喝一瓶酒吧？”我笑着回答她，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教授先生的口味如何。在第十七选区是威廉·白拉克代替我当
选举结果对于我們非常有利。虽然哈森克萊維尔在巴門一爱
北斐特以一万四千二百四十五票对一万四千四百八十五票失败
了，但是邻近的索林根区以一万零六百三十六票对七千四百五
十三票把李廷豪森选进国会, 并且格利伦堡在纽伦堡也几乎当选,
但是以一万二千零八十九票对一万二千六百二十五票为敌人所败。
党参加了二十四次复选。当选为議员的有十二人: 奥艾尔、
布洛斯、白拉克、宮廷建築技正德姆勒（石威林，第十三薩克森选
区——莱比锡區）、弗里茨舍、哈森克萊維尔、A.卡格尔、李卜克
內西、莫特尔、莫特勒、李廷豪森和我。

年老的德姆勒偶尔谈起, 他当过梅克林堡公爵的宫廷建筑师,
建筑了一座华丽的石威林宮, 他有个习惯, 如果要离开石威林时间
較久, 就要到公爵那里去辞行。这次当他要起程到柏林入国会时也
是这样。大公爵趁这机会同他說: “我祝您一路平安, 但是亲爱的德
姆勒（于他笑吟吟地伸出一个指头警告着），您在柏林只不要搞
得太凶了。”这里应该提一下: 德姆勒是沒有通过工头独自和工人
订立合向把石威林宮建筑起来的, 并且对所达到的结果非常满意。

二月二日, 我写信给徳累斯顿我們的党报发行人施吕尔尔同
志, 告诉他, 我已通知选举委员接受徳累斯顿的选举, 并且附带
提及:

“我觉得很愉快, 我这个手艺伙计走到异乡以来整整十九年
了, 当时自然不会预料到在十九年后的同一天里我把我接受薩克
森首府的国会議員委任的声明送给一位选举委员。老拿破侖有一
次曾說过, 每个兵士的背包里都有一支元帅的手杖, 今天可以說, 
每个手艺伙计的背包里都有一张柏林国会議員的全权委任书。一
切在前进。我們的朋友，那些敌人, 都应活下去。”

敌人对选举结果怒形于色, 因为我们所得选票的大大增长远

313
此所获得的几个委任状更使他们震惊。党的票数由一七七四年的三十五万一千六百七十增加到一七七七年一月集結在我们的候選人名下的四十九万三千四百四十七票，计增加十四万一千七百七十七票，即百分之三十六。在萨克森我們得到了相对多数的票，即三十一万八千七百四十票中的十二万四千六百票。

台森多尔夫制度曾逐渐越过普鲁士边界，在大多数中，小邦中成为榜样，这次选举结果证明，这个制度悲惨地崩溃了。即使此后再对社会民主党竞选和社会民主党組織猖狂泄忿，并且对党的代表人物判决得一个比一个更加严酷，也无济于事了。即如俾斯麦遇到幸运，终于得到他长期渴望的严酷的非常法令来对付他所深恶痛绝而又那样害怕的党，也是无济于事的。

一七七七年的国会

在二月二十二日开幕的国会会議中社会問題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社会民主党选票的不断增长特别使中央党恐慌不安，该党現在第一次在加伦伯爵公司名义之下提出一个法律草案，这个草案完全适应自此以后中央党越来越拥护的社会政策上的需要。以往中央党对于社会問題一向持非常保守的态度。这个草案要改善小企业家以及工人的状况。针对着这个草案弗里茨舍和我拟訂了一个对案，要求修改工商业条例中的一、二、七、九和十等項重要規定，使其有利于工人，党团也表示赞成这草案。这个法律草案要求使用监狱中的劳役，监狱劳役应以为国家劳动为限。此外还要求：禁止工厂在星期日工作；如果有的地方办不到，就应当在一星期中给工作人员一天休假；一个标准工作日是九小时；对于女工、十八岁以下的男工和学徒则为八小时；禁止夜工；如果因为企业的性质不可能禁止夜工时，就应实施八小时的輪班制。孕妇和产妇
的休假期应相应延长。每个工作場所应实施一种由劳資双方約定
的工作规则。此外还要求：对矿工也取消工作登记簿；只有在工人要求之下才有颁发证明书；规定双方相同的解约通知期限，禁止实物工分制①，对于女工和学徒应有更严格的保护办法；设置同业公会和劳资仲裁机构；在国家卫生署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实行一种国家劳动检查制度。最后我们要求保障和扩充集会结社权。

中央党和我党同时提议讨论的法律草案，由党团方面的弗里茨开始辩论。辩论渐成为社会党人的辩论，我于是得到机会对所提出的谴责予以最有力的驳斥，并对中央党发言人所代表的所谓基督教世界观给予应得的批判。我的演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莱比锡印刷工人协会特于翻印，并送给我一份装订精美的演说辞。

这些建议的讨论并没有实际的结果。

在四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上，国会宣布，哈森克莱维尔在柏林第六选区得三十票多数的选举应作为无效，因为很奇怪，无意中在把一张选民名单订入选区时弄错了，以致有一批选民未能参加选举。进步党希望重选时能再赢得第六区，它却错了。我们把全部精力投入选举鼓动，于是哈森克莱维尔现在以多一千多票的优势而获得胜利。

在讨论铁的关税问题时白拉克发表了一篇关于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的好处演说，但到了表决时，党团的票分散了，只有少数票赞成保护关税。

要修改会议章程第四十六条的措辞，以便防止继续任意提出终结建议的企图，没有成功。这个建议不再付讨论。相反地，国会却同意了停止对我提出刑事诉讼的建议。台森多尔夫为了我的国会小册子在柏林市法院建议对我提起控诉，因为那小册子大大地得罪了首相和触犯了刑法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这一条是：“凡是

---

① 实物工分制，全部或一部以实物（货物、生活资料等）代替金钱付人工资。
捏造或歪曲事实，明知事实是捏造或歪曲的，而仍公开主张或者传播，因而使国家机构或是上级命令受到蔑视者，处以六百马克以下的罚金或是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按照台森多尔夫建议在一月十二日《柏林自由报》发行所进行搜查，只查到我的作品十二份，加以没收。

一八七七年哥达代表大会

一八七七年同往年一样，国会党团召集全德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于五月二十七日到三十日在哥达开会。议程是：1. 关于国会议员的活动的报告；2. 关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动态和现状的报告；3. 德国的社会主义组织；4. 党报；5. 党的纲领。

从再度由奥艾尔作的报告得知，党在一百七十五个选区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三百九十七名。党报的数目增加为四十一种。此外成立了十四党的印刷所。党的收入是五万四千二百十七马克，支出是五万零二百三十五马克。

因为李卜克内西在家患病未到，关于党团活动的报告由弗里茨舍代作。我因为凭籍身到五月二十八日才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到达哥达。

关于组织问题由特耳克作报告，他以当选的组织委员会的名义建议通过下列决议：

“鉴于普鲁士当局以空前的大胆正式宣布社会主义团体在普鲁士完全非法，代表大会不拟再设立党的组织，以免德国，特别是普鲁士对它使用现行的结社法，代表大会听任各地党员同志们根据地方情形和需要来进行组织。”

这个决议没有讨论就一致通过。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当时差不多全部自由派报纸，进步党的也不例外，无动于衷地看着当局对社会党组织进行骚扰、压迫和强暴，而很少听到一个字的批评。当
局自然把这事只看作是对它的非法暴行的鼓励。

哈赛尔曼的行为又引起了不愉快的争论。哈赛尔曼在一八七七年一月取得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同意由他发行只为支持选举而出版的传单——《红旗》报。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却完全背着中央选举委员会向官厅呈报为正规出版的周刊，他的追随者借此到处排挤《前进报》。毫无疑问，哈赛尔曼是在使党分裂。这一点在辩论中也由大多数发言人表明了。最后我的一个建议只有五票反对被通过了，建议说：“代表大会请求哈赛尔曼同志，一旦《山区人民之声》报（他任该报编辑）能够维持，就把《红旗》报停刊。”但是他早在十月初就不得不声明《红旗》报停刊。该报入不敷出，使他不可能继续办下去。

另一个争论的不愉快程度不亚于对哈赛尔曼的争论，这是莫斯科谈到《前进报》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杜林教授的连载文章所引起的。杜林做到了使柏林运动领导人几乎全体都赞成他的学说。我也认为，由于鼓动的理由，凡是像杜林那样猛烈攻击社会现状并表示拥护共产主义的文章，我们都是加以支持和利用。由这个立场出发，我早在一八七四年就已经由要塞监狱里写了两篇论及杜林的作品的文章，题名为《一个新的共产党人》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有关的书籍是由爱德华・伯恩施坦寄给我的，当时他同恩格斯、弗里茨舍和其他人都是衷心追随杜林的人。不久杜林由于他的学说与政府机关和大学发生冲突，这个冲突导致一八七七年六月柏林大学对他的处分，这就在他的追随者的心目中更加增高他的声望。这一切促使恩克斯在大会上提出一个决议案如下：

“大会声明，有些文章，例如近数月内恩格斯对杜林所发表的批判，使《前进报》绝大多数的读者丝毫不感兴趣或者发生极大的反感，今后不再刊登在中央机关报上。”

诚然，此后不久杜林的威信在他的社会主义追随者的心目中
就遭到彻底的破产。这个人的态度这样专横和狂妄，致使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他。

在这次大会上，福尔马尔（他当时第一次出席党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通过了；

“为了表示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团结，大会决议，派遣代表一人参加今年在根特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代表人选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决定。”

格利险背格支持这个建议，相反地，李卜克内西警告大家防止比利时境内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潮流，它将企图操纵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是否举行，我不记得了，反正我们没有派人去；在这期间，党内部发生了更严重和代价更高的问题。

萨克森邦议会的选举——《未来》月刊

一八七七年九月在邦议会选区之一的莱比锡乡区（第三十六乡选区）中，我们得以使李卜克内西当选为议员。党员同志最初请我为候选人，我谢绝了，因为我不可能期望我的合伙人和职业让我除了接受国会委任之外再接受邦议会委任。选民委员会审查资格时提出，李卜克内西入萨克森籍不到三年，所以不能当选为议员。选举宣布无效。于是选区的我党同志提出莱比锡律师奥托·夫赖塔格同志，他也当选了。——

从九月一日起，瓦尔特在兹维考服刑十八个月，次年福尔马尔继之入狱。十月一日，在柏林出版了一种月刊，名为《未来》，由卡尔·赫希柏格（一个法兰克福银行家的儿子）出资经营。赫希柏格，我可以说明，是出于感情主义的动机而参加运动，爱德华·伯恩施坦辞去柏林银行业职务做他的私人秘书。这个月刊，就其创办人和代表运动一切方向的撰稿人的世界观而言，它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采取了暧昧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引
起伦敦两位老人的猜疑，当事件的进展和党遭到的经济困难大大要求赫希柏格顾受各方面的经济牺牲时，猜疑就更加深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只从远方观察事物，对于人物和情况没有深入了解，认为赫希柏格的这种甘愿牺牲是一种诡计，是一个冷静考虑出来的把党引入歧途而使它背离它的任务的计划。

这是彻头彻尾的误会。赫希柏格从没有企图把他的财产用于我们所疑惧的目的，或者把支持所疑惧的目的作为他的援助条件。他的资助是出于好心好意和对事业的兴趣，并且从来没有过事不同我或其他朋友如盖布、李卜克内西等商议。但是后来我决定在一八八〇年秋末为了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真象，同伯恩施坦作了一次党内著名的“卡诺沙之行”，解除伦敦人对赫希柏格的猜疑的尝试才得实现。这件事见下一册。

我自己为《未来》月刊写了许多文章，其中一篇是关于按比例分配的选举法，这个问题当时在党内还很少讨论。这种选举制度认为是必然要实行的，而且事实上后来也实际应用了，开始时在拥护这种选举制度的主要国家瑞士，遭到我们那儿经验和同志卡尔·比尔克里的一些反对。但是当我在一九〇一年秋季在苏黎世道代尔教授那里吃过午饭向比尔克里告辞时，他说：“倍倍尔，我们不能再见了”（他那时已七十九岁），“但有一件事我想告诉您，您那时在《未来》月刊上所作的实施按比例分配的选举法的建议是正确的。”几个月后比尔克里死去；他准确地预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入狱的时机又成熟了

一八七七年六月十二日，我也终于以一个被告人的身份站在柏林市法院的臭名远扬的第七庭之前。台登多尔夫在我的小册子里发现侮辱俾斯麦的地方不下三个，此外，如上文所述，还找到了一个违背刑法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的地方。俾斯麦是热心于提起公
訴的。不錯，我對首相的態度是有点曲溫和。当我写这本小册子时，想起了一八七六年那在国会中当面侮辱我的发言，而且多数派通过了一个討論結論的建議使我在不能答辩，我还愤愤不平。如果我当时能畅所欲言，就非常可能免于这次侮辱首相的罪名。我的小册子里对俾斯麦的攻击是指的是国会中这件事。此外，当我有一次攻击民族自由主义者时讽刺他們，說他們受首相奴仆般的待遇，而絕沒有想要侮辱俾斯麦。这事发生的时候，正是班伯格議員因为首相对他和他的朋友的待遇而忽然有了可佩服的自知之明，說了一句使人难忘的話：“我們簡直是狗!”

我对軍国主义所作的尖銳批判被认为违犯刑法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可是这批判却完全符合我們所代表的观点。人們控告我，说我捏造或歪曲事实，明知事实是捏造或歪曲了的而仍公开主张或传播，要借此使軍国主义的机关遭到蔑视，我觉得这是对我个人的侮辱，因为我所写的东西是符合我的立场和我的信念的。

台森多尔夫作为公诉人很容易尽他的职务，他对第七庭知道得确很充分。他若无其事地站在法庭前面，一只手插在浅色条子的夏服裤子（现今所流行的制服是后来才兴起来的）袋里，上身穿着一件破旧的黑礼服，好像私人谈话似地作了几还不到五分钟的发言以后就提議，侮辱首相罪应判九个月，违犯刑法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应判五年，一共十四个月监禁，他建议合在一起作一年监禁。

台森多尔夫这种办事的方式使我本已激动的感情更加激动了。我自作辩护。在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中我把起诉各点逐一加以辩驳。如果人們要由我的小册子里搜集侮辱首相的字句，那就必须考虑到我写稿時的情况，就这种情况来说，则所提出的判刑标准太高了。况且违犯第一百三十一条的事根本是有的。我认为，根据这一条来控告我是荒唐的，因为法庭一定深知，我格外以事实与
引自科学和军事权威的文字来说明理由的演说，只是同我党的立场和信念相适应的。

我认为，我这次的讲话很好，但是，即使法官们的注意力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冰雹敲打窗玻璃的风暴所吸引，我的讲话也不能给他们什么印象。法官对窗玻璃何时会被冰雹打破的问题显然比对我的很好的讲话更为重视。台森多尔夫认为不值得答复我，就退出了，在简短会议后宣布，无论如何，我的判决是九个月监禁。

我提出上诉，十月二十八日，案件由高等法院审理。这里由检察官格罗叔夫进行公诉。他在讲话中主张，由于我是再犯不能从轻判刑，他建议维持初级法院的原判。

我仍自作辩护。针对检察官的起诉词我讲了一个钟头。他认为，我似乎因为是再犯就必须从严处罚，这使我特别忿怒。我抗议，人们对一个为了他的信念而奋斗并一再同刑事裁判官打交道的被告人和一个普通犯人——一个屡犯的小偷或骗子——同样看待。普通犯人为了获得个人利益，因而由于利己而犯法，政治“犯”却是为了捍卫或者宣传他的见解而犯法，乃是由于理想主义。对不屈不挠地维护自己观点的人，不应该从严处罚而应该表彰。没有一个政治“犯”会由于捍卫他的信念而与刑法发生抵触时会像普通犯人那样被社会所鄙视的。而且政治犯甚至还会因此在他的同志的心目中赢得威信。

我在继续讲话中，把重点放在违犯刑法法典第一百三十一条的控诉上。我因而取得了法庭的首席法官的许可，宣读我那包含军国主义批判在内的长达七页的文章。结果，我被免去违犯第一百三十一条的罪名，但被处以侮辱俾斯麦，被判监禁六个月。

我要附带说明，几个月以后，十二月间，保守党的社会政治家鲁道夫·梅耶尔也由于侮辱俾斯麦被高等法院判处监禁一年。那个也对我提出公诉的检察官格罗叔夫现在说，他希望，这是最后
一个侮辱俾斯麦的案件。但是，这种案件一直到俾斯麦不再做首相时，就是说过了十三年才不再发生。

考虑到我的家庭和生意，我非常盼望能在莱比锡服刑，但是按照部里颁布的法规，这里只能处理最高不超过五个月的徒刑，于是我向主管机关询问，是否可能准许我在莱比锡监狱服刑五个月。等这里批准以后，我往柏林向第七庭庭长请示，准许我在普罗戈曾湖服刑一个月后把下余五个月改在莱比锡地方法院监禁里服刑。使我吃惊不小的是，他非常有礼貌地接待我，并且表示同意我的建议。

于是我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开始在普罗戈曾湖服刑。入狱的手续很是繁琐讨厌。当我被引到劳役监督官的面前时，他用这句话来迎接我：“现在，倍倍尔先生，普罗戈曾湖政治犯监狱的情形如何，您大概从莫斯特的作品中知道了。”我回答说，我固然看过这部作品，但是当时已过，我请他告诉我有关情形。于是他那显然抑制已久的对莫斯特的愤怒突然发作起来。他说，他懂得，囚犯把官吏看作敌人，并且背着他们尽可能设法图谋占便宜，但是随后公开叫嚷他们怎样欺压官吏，怎样诱使他们让步，这是卑鄙和愚蠢的行为。他接着叙述，莫斯特的作品发表后，在普罗戈曾湖的官吏中发生了什么作用和后果。他结束他的激动的谈话说，“莫斯特只要再落到我们手里，我们要向他报复他那泄露机密的行为。”

不久他就又落在他们手里，并且他们给了他充分的报复。莫斯特到普罗戈曾湖监狱来会我时，曾立即遭到拒绝，这就使他预感到一旦遇到机会什么事情在等待他。

我获得了可以从事写作并且在夜晚灯火可以点到十小时的权利。我的马克思《资本论》和各种其他社会主义著作都被没收了，好像我还有什么会被腐蚀似的。由于劳役监督官绝对地要求我，不但要从事读书，而且也必须拿出点作品来，于是我便写了一本
以《十八世纪的法国》为名的小册子。

膳食不能自理，只有那些因为欺诈而入普略曾湖的交易所投机者才可以自理，政治犯是不准的。但是这种粗劣的伙食即使不使囚犯厌恶，也特别使囚犯苦恼，它的菜单是固定不变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星期之内，早上、中午和晚上所供给的膳食按次序地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循环着。我在普略曾湖将近两个月，体重大减。我不懂，监狱的医生怎么会批准这样的伙食制度。由于我的要求，医生批准我吃所谓病号饭。于是我每星期有三次午饭可以得到一份确实不错的肉汤和一份插在尖木签上的麻雀肉（因为不放心让犯人用刀叉），还有洋芋和蔬菜。麻雀肉这个名目的来源是这样的，这一小块肉在形状和大小上看起来很像一只拔去了毛的麻雀。

我打算在圣诞节前由普略曾湖迁往莱比锡。这样我就可以到家里去欢度佳节了。我的女孩迄今共过了八个圣诞节，其中却有四个我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我希望不要第五次在监狱中过圣诞节。但是事情竟然如此。我向莱比锡监狱管理处请假，我可否在圣诞节后到那里开始服刑，该处回答说，暂时还不可能，因为牢房已经住满了。到一八七八年一月十八日我才迁往莱比锡。

当我在普略曾湖服刑时，监狱牧师曾屡次找我来谈政治事件。我被准许看《福斯报》，这个报照例在每周末，即星期日我才能全部收到。弗斯特那时开始用他的全副热情作退出邦教公会的公开宣传。他所发起的民众大会emand也参加弗斯特的集会，并且这些演说家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吃了亏时，这种激昂情绪高涨起来了。这种鼓动使得国内的信徒大为震怒，监狱牧师也很激动。这甚至使年老的皇帝在一八七八年三月回答邦议会议长祝贺他的寿辰时说："宗教必须为人民保持着。"
内部事件

当我在监狱里有空闲时，党内及党外发生了一系列特别重要的事件。柏林的同志们在十一月间创办了一个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协会，以代替被解散了的组织。基督教保守派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创办一个周刊《国家社会主义者》，撰稿人有沙夫莱教授、冯·舍尔教授、银行家沙姆特尔、Ad.马格纳教授、托特牧师、彼得曼博士（德累斯顿）等人。福音派社会政治家不乐意让天主教的社会政治家独占阵地，而要在社会民主党面前把这些还可能挽救的福音派工人挽救出来。

在重大政策方面似乎也面临改革。帝国的支出不断增加，需要有新的收入。向各邦摊派的弥补帝国亏空的款项日益增加，但因各邦本身在财政方面需款日增，所以各邦就越发觉得困难了。俾斯麦最不喜用间接税来弥补日益增加的开支。他痛恨直接税，并且他自己也在可能范围内设法逃避纳税。早在一八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国会里阐明他的税收思想时就说过：

“我从来就根本赞成尽可能用间接税来筹措一切款项，并把直接税看作一种又苛刻又抽筋的应急办法，类似摊派税款，唯一的例外是我可以称为体面税的税，这是我永远要维持的一种直接税，也就是富人的所得税……大家彻底了解，这指的是确实是富有的人……我几乎迫不及待地想加重烟草税，虽然我很愿意让每个吸烟人都享受这种快乐。与此类似的还有啤酒、烧酒、糖、煤油和一切这类的大量消费品，可以说是广大群众的奢侈品。”

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者也倾向于以同一办法来弥补额外开支。因为当时俾斯麦同一部分保守党人冲突很大，另一方面同中央党仍是敌对的，所以他有心联络那时同亲密盟友形成国会中最大党的民族自由党人来拥护他的政策，因此，他同他们的领袖冯·本尼
格森先生谈他入普鲁士内阁的事。本尼格森愿意如此，但是他认定有必要取得其他领导同志对这一步骤的同意。在拉斯克尔的影响下，大家一致认为，如果除本尼格森之外还有巴伐利亚的斯陶芬堡男爵和冯·博尔肯克先生也可以进入内阁，才可以同意本尼格森参加内阁。本尼格森独自一人对付不了日益增涨的反动的保护关税主义的潮流、俾斯麦对于这个条件，尤其是对拉斯克尔大为震怒，并斥责他说，总有一天再让他尝尝滋味。后来老皇帝听说要邀请本尼格森加入内阁，认为他在一八六六年对汉斯威王室的态度可算是半个叛逆分子，表示坚决反对本尼格森担任普鲁士的阁员，于是全部计划付于流水。俾斯麦不忘记民族自由党人所干的他认为得罪了他，不久就对它们进行报复。

一八七七年年底，奥艾尔由汉堡迁往柏林，与安特等人一同参加《柏林自由报》的编辑工作。奥古斯特·盖特力求使尤利乌斯·蒙特勒接替奥艾尔充任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但是，一八七六年由于私人原因已被解了党籍的拉比·锡印书业合作社领导机关的莫特勒加以拒绝。

此后不久，柏林发生了两件事情，使广大民众紧张起来。一七八八年三月七日，柏林联合印书馆的经理奥古斯特·汉斯去世，定于三月十日安葬。汉斯不是演说家，却是个杰出的组织者，柏林运动的一切关键都汇合在他手里，他不贪图荣誉，没有钱，也没有钱，因而获得了柏林工人最广大的同情。他的葬礼形成了柏林社会民主党空前大示威。警察局长对于运动的理解表现在他禁止游行队伍携带旗帜，即使是隐蔽起来的旗帜。

示威游行进行得又安静又有秩序，使敌人非常佩服，《喧声周
“给社会民主党
他们近来纪律严明，秩序井然，
就他们这次游行而言，我们承认。
如果我们也要这样大的游行，
希望能保持同样的纪律精神！
我们乐意为他们鼓掌喝采，
只有白痴才认为这不公平。
不愿意向敌人学习的，
就有败无胜。”

几星期后，柏林发生了第二次，或许还更为盛大的葬礼。《柏林自由报》的责任编辑保尔·邓特勒也死于肺痨，但是他死时的情况令人气恼，于是党在柏林和全德国掀起了一阵痛惜的风潮。邓特勒和汉士一样，是一个年纪还轻的人，他为我的官司热心地做了不少的琐碎事情。他身材瘦长，面色苍白，皮肤细嫩晶莹，这是叠病患者常有的现象，他的为人非常和蔼可亲。

一月十八日，邓特勒在《柏林自由报》上犯了多次密君罪以及他他罪行，在重病中被拘押审讯，并在二月七日被第七审判决二十一月监禁，他声请上诉。于是邓特勒申请鉴于他身患重病免去他上诉而不变的待审拘押。法院要求监狱医师核定病情。一星期又一星期过去了；列文大夫（这位贵人的称呼）屈尊到囚舍来看一次，问邓特勒觉得怎么样，随后就又无影无踪了。邓特勒终于获得的是他在死前不久从市监狱被送往慈善医院的囚犯科。

邓特勒从这里写信给《柏林自由报》编辑部说：

“我的情况日益恶化，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提请注意（请求暂时），没有效果。第二个星期开始，又结束了，在这个星期的末一天——我申请以后的第十四天——医药顾问乌尔夫来了……乌尔夫先生作了很仔细的检查以后，说我的情况非常严重，就走
了。——自从那次检查以后又度过了整整八天，我仍旧不明白我的命运如何，第七次以后开庭三次，并且我——我今天下午散步时吐了血。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是将在短期内跟着来的更厉害的肺出血的预兆。我这次肺出血会像以往经历过的两次那样幸免于难，我简直认为不可能。”

所预料的大吐血发生了。四月二十四日，邓特勒逝世。四月二十八日，举行送葬，送葬的人非常众多，这是对他所遭受的待遇的一种激烈的抗议。为邓特勒送葬的人那么多，又使资产阶级既惊讶又害怕。《马格德堡报》在描写这种惊骇的情形时这样说道：“看见这次送葬，谁还能说柏林工人穷？这是团、旅、师，甚至还要多，这是整个军团，向确实为他们的事业立了大功的死者致最后的敬意。”

此后，柏林还出现过多次社会民主党人的送葬行列，规模比汉士和邓特勒的还要大，这些是向资产阶级大声吼出的警告。

一八七八年春季的国会

在这期间，国会在一八七八年四月六日开幕。我又因坐牢不能参与。我的请假建议和以往一样仍遭拒绝。

我们的议会党团很勤于提出提案。它建议，修改宪法第三十一条（议员即使在徒刑中也应释放），修改国会选举法，实行封台制，选举规定在星期日，根据每次户口调查规定选区的数目和范围，修改刑法法典有关操纵选举的规定；有关结社和集会权的法律草案，建议修改迁徙自由法（限制驱逐出境），对于委员会设置裁判机构的报告的建议，对于政府所交给的有关修改工商业条例的法律草案的建议。

那时期常发生社会党的辩论，有一次俾斯麦开了个玩笑，他愿意把波兰的一个地区给我当作社会主义实验示范区。我因为被
关在牢狱里面，对于他的这个玩笑不能作适当的答复。

我听说 Archer 想讨论工厂童工问题，在二月十二日写信给他说道：

“昨天格拉特斯台恩博士告诉我，你把他搜集有关儿童死亡率的材料。如果你这样做只是为了用工商业条例附则来限制童工，则以不涉及数字材料为宜，因为就我所知，没有可用的材料。儿童死亡率之大是众所周知的，近年来也是如此，但须注意的是，除工厂劳动以外，恶劣的住所、恶劣的饮食和病中恶劣的护理也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反之，如果你把一岁胎儿大量死亡归之于母亲在工厂中工作，则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棉花恐慌时，母亲们缺乏工作，婴儿能够不离母怀，所以幼儿的死亡率显著减少，这无疑是再好没有的实例了（参看马克思的《资本论》）。

我认为，你最好在这里干脆指出这种劳动本身在肉体上和道德上的害处，并且还指出，母亲在工厂工作不仅破坏家庭生活，并且损伤儿女的感情，如果他们的妻和孩子提出这种要求，他们该说什么。此外，政府为了使雇主能作更多剥削的阴险举动，也应受到相当的指摘。

可是这里有一个新的解决一切的好处意见。如果外国竞争使雇主难以完全禁止童工和基本上限制女工，那就应该采取政府业已在他范围内采用而有成效的方法，结各种有关的国际协定。如此，则政府不使德国的舆论站在它的方面（这在其他问题上几乎是没有的），而且也能博得国外劳动阶级的同情。这种措施的道德压力之大会使每个政府都接受这样的建议。

我相信，我们用这张王牌可以赢得很多胜利。

对于舒尔采—德里奇关于合作社法的建议（第十一期印刷品），你们可以再提几个补充建议，例如实行有限制的赔偿义务，类似以前萨克森的合作社法。舒尔采的建议也有些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我提出我的一份报告备用，在报告里我对题材加了几个注解，可据以发挥。如果有人对这方面有兴趣，可以担任这一章。

我遇便就把报告（第十一号文件）交出去，但请代我保存，将来仍予赐还。”

在莱比锡狱中和此时发生的事

我利用狱中闲暇来写作，其间也为《前进报》写了一篇文章，提倡建立党的总图书馆（档案馆）。数月后发生的事件阻碍了计划继续进行。我后来在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又重新提起这个意图，这时从事《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书店工作的施吕特尔同志答应实现这个意图。党的档案馆随即建立起来。

此外，我完成了《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在次年发行第一版。我也写了一本小册子《国家卫生局及其纲领》，其中讨论社会卫生问题，据我看，国家卫生局必须能解决这些问题，才符合它的名称和地位。

我这次在莱比锡服刑，使我有机会帮助一部分同僚者来稍微改善他们的情况。当时狱中的高级领导是一个老年的典狱官，据说他在他的职位上用下流手段致富，他以获取高额利润的价格把食物和饮料卖给有钱的囚犯。此外，我的看守者（他很高兴同我谈谈）在私人谈话中告诉我，典狱官还用其他方法在囚犯身上作弊。他克扣囚犯的手巾和肥皂，囚犯必须按规定的时间延长一倍。囚犯们用瓷碗盛饭。当然有时会有一个被打破。但是典狱官不予补充，于是必须等待一部分囚犯吃过饭，才能用未洗洗碗的碗把已冷的食物盛给另一部分囚犯。

这个消息激起了我的忿怒。我现在想出一个办法来阻止典狱官的这种行为。法院院长当时兼任监狱的总监，我坐下来写给他一封申诉书，描述全部非法行为，但我以刚离开监狱的囚犯身份
来叙述亲身经历的典狱官的不法行为，这样我就不至于受牵连。这封信自然必须是匿名的。

我妻下夜来探问我时（每次都是当着典狱官的面），我秘密地把一张纸条塞在她的手里，纸条上写的是请她在一个约定的夜晚正
九时半从我的囚舍窗前的街上走过，我将丢给她一封信，再由她用
辨识不出的笔迹抄写一遍，而后送交法院院长。事情就这样办了。当
我妻带着小女孩在街上出现时，我由三楼上丢给她一封相当厚的
信，很响亮地落在寂静的街道碎石路上。我妻急忙拾起信来，同女孩
赶快跑开，她以为听到有人从后面来，怕是来追她的。几天以后，看
守人很激动地冲进我的囚舍，对我讲，院长和典狱官在上午大闹了
一场。老头子——他是这样称呼典狱官的——被院长叫去，并且根
据一个释放了的囚犯所写的一封信，列举了他一切的罪恶，把他大
加申斥。老头子非常生气地来到他们看守人这里，命令立刻革除恶
规。看守人非常得意地叙述这件事，我自然慎防他发觉写信人是谁。

*              *

五月初，中央选举委员会号召召开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时间是
六月十五日到十八日，仍在哥达举行。议程中的第三项，讨论社会
民主党对国营和地方经营的企业态度，登记的报告人是我同李
廷豪森。讨论这一目的起因是俾斯麦的计划，即铁路国有以及
实行烟草专卖的计划，烟草专卖计划当时虽未公开讨论，但已泄露
出来，说烟草专卖在俾斯麦同冯·本尼格森先生的谈判中占有重
要位置。我党的李廷豪森同志公开表示赞成保险事业国有化，但
在党内并未完全取得同意。

*              *

但所筹划的会议没有实现，当时发生的事件使它不能举行。

霍德尔的行刺及其后果

五月十二日，我在囚舍收到一个使我惊讶万分的消息：前一天

330
下午三时，柴比锡的某一名霍德尔的人，据说是个社会民主党人，
行刺老皇帝，但老皇帝没有受伤。我起初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
个名叫霍德尔别名莱曼的人，我是知道的。霍德尔前一年出现在
柴比锡党内。我不认识他本人。因为他没有工作，也许是不愿
工作（他曾学过修匠），就从事于推销我们柴比锡地方机关报《火矩
报》和出售社会主义书籍。但是不久就证明他是个骗子。他侵吞
了收进的钱，这使《火矩报》发行所早在四月五日就已宣布，撤消霍
德尔销售报纸的职务。而且在数日后柴比锡党部作出决定，建
议把霍德尔开除出党，事实上中央选举委员会在五月九日，也就是
在他行刺以前两天，在《前进报》上宣布，霍德尔被开除出党。

霍德尔不可能留在我们这里，于是转到民族自由党鼓动者斯
巴利希和民族自由党的《柴比锡日报》的编辑部，并且为了金钱供
给他们一系列假的夸张的对党的控诉，《柴比锡日报》企图以此对
我们进行敲诈。他在柴比锡完成了反党的使命后，斯巴利希及其
伙伴设法甩掉他，他们给了他往柏林的旅费。到柏林以后，他脚踏
两只船。他加入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协会，同时也参加宫廷教
士斯托克尔的基督教社会党，当时在斯托克尔的周围集结着各阶
层大批的危险人物。还有个裁缝格伦贝克，二年前他在斯图加特
和慕尼黑因为行骗被社会民主党开除出党。格伦贝克后来也离开
了斯托克尔，他透露说，除了霍德尔之外，还有诺比林博士也是基
督教社会党的成员，这个人就是后来第二次行刺皇帝的人。格伦
贝克遵照宫廷教士的吩咐，开列了一份新的党员名单，其中却没有
诺比林的名字。霍德尔在柏林既推销社会民主党的，也推销基督
教社会党的报刊和作品，即《国家社会主义者》和传单《热爱国王与
祖国》。当他被捕时，在他的身边还搜出李卜克内西、莫斯科和我的
像片，他也拿这做生意。关于这个人的道德品质是不问可知的了。

俾斯麦在弗里德里希斯卢合一听到霍德尔行刺的消音，便上
打电报到柏林说：“以非常法令对付社会民主党”，由此可见，他如何迫切期望有个机会尽可能给这个可恨的政党以致命打击。起初公众和出版界对行刺的消息相当冷淡。当个别报纸企图使社会民主党来负行刺的责任时，半官方的《汉堡通讯》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七十八年内对出名的政治人物发生过三十五次暗杀和暗杀企图，而且凶手是属于各种不同的政党的。政治暗杀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孕育下产生的这种控诉，是不能成立的。国会起先对于这件事也还是很冷静，所以五月十四日我们要求暂停对莫斯特进行刑事诉讼的建议未加辩论即予通过。

在第一次审讯时，霍德尔反驳他有意向皇帝射击的说法，宁可说他是意图自杀，作为迫使他出此的我们悲惨情况的标志。作为佐证，他在被捕时他口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并且他所用的手枪是件劣货，这支枪，据造枪工人在检查后确定，在几星以内都不能命中。此外还确定，霍德尔是他的母亲的私生子，他的母亲和一个姓莱曼的结婚，所以他有时也姓莱曼，他受的教育很坏。虽然人们在他的脑子里塞满了教义问答和圣经格言，可是他不能写出一句正确的话。此外还确定，他患有花柳病。他在被带上法庭时，傻笑着进入法庭，在判决后同样笑着离开。他给他的双亲所写的信末尾署名：麦克斯·霍德尔，行刺德意志皇帝陛下的凶手。还确定了，他从小就是个骗子和小偷。这个人的整个品行，据判处他死刑的法院确定，是一个精神和肉体都陷于混乱的人的品行。而由于一个这样人的行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却被钉在十字架上。

霍德尔想请奥托·夫赖塔格律师做辩护人。夫赖塔格也表示愿意担任辩捕，但被他要求把案卷送到他那里，给他八天研究时间并准备辩护。值得注意的是二者都被拒绝了。人们非常急忙从事于对霍德尔的起诉和处决。现在霍德尔得到了一个义务辩护人，这个人不会做别的，只是请法院原谅他抽中了签而必须担任这个谋
反者的辩护人。霍德尔的头在刽子手的斧子下落了地。维尔周教授请求把霍德尔的头给他作解剖研究，也被拒绝了。

死刑的文书须由弗里德里希皇帝签署，因为当时皇帝遭到六月二日诺比林的行刺而受了重伤，由皇帝代理。此后皇帝在他摄政期间，即使是未受厌手，他也没有再签一张死刑判决书。还有其他征象表明，他对整个事件有如何不同的理解。

第一个非常法

俾斯麦所要求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不久就实现了。俾斯麦的非常法的草案早在五月十二日就到了柏林，于五月十四日由他的秘书处制定好并且得到了他的同意。早在十六日，它即由联邦议会批准（萨克森政府对这最为热诚），五月二十日草案连同缘起被送交国会，二十三日即已列入议程。

民族自由党人在全部进程中心情不佳，他们本能地感觉到，俾斯麦在背后还另有反对他们的计划。普鲁士政府也有变动，预料终无好事。代替本尼格森和博尔肯克参加内阁的是两个极端保守主义者，欧伦堡的包图伯爵和司透尔堡的内尔罗德的乌都伯爵，即那个在一九〇九年担任国会议长时去世的人。自由贸易派的自由主义者财政部长冯·康普豪森也只得辞职，由意志薄弱的民族自由党人霍伯瑞希特继任。自由主义的文化部长法尔克，即反对中央党的五月法令和文化斗争期中唯一开明的法令（实行民法登记法）的起草人，也必须让位，这些都意味着对中央党的极大让步。所以民族自由党人一切理由感到怀疑。

根据共有六章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提案，联邦议会有权禁止追求社会民主党的目标的印刷品和协会。一旦国会开会，就必须把禁止事项通知它。如果国会要求取消禁令，则禁令即行失效。警察局可以临时禁止在公路、街道、广场或其他公共场所散发印刷品。
但如果在四个星期以内联邦议会方面没有禁止这项印刷品，则警察禁令即行取消。禁止和解散集会权完全由警察掌握。对于这，是不准上诉的。违反禁令者处以五年以下徒刑。印刷品即使没有法官的命令也可没收。被禁止的协会的主持人，被禁止的集会的召集人与领导人以及供给被禁止的协会或者集会以会场的人，至少应处以不少于三个月的徒刑。这个法令的有效期限是三年。

预料在讨论提案时议会党团将通过它的发言人激烈反对这个法令，我在五月二十日由监狱写信给莫特勒说：

“因为实施非常手段是事实，那末，我们这方面为此发言的人就不应忘记，必须把他的发言散发出去几十万份。也要注意到，如果议案被否决了，国会就要被解散，那末，我们就在竞选的前夕，这个发言将发生它的效用。所以首先要把我们手里有关这个发起人的一切材料，逐项加以研究。

《法兰克福报》的星期日晨刊有一篇很好的社论，请你们注意。法令草案近乎疯狂。”

但是议会党团经过长久讨论后决定，通过李卜克内西发表一篇声明，今后不再参加辩论。

国会的辩论由史伦堡伯爵的简短讲话开始。接着由李卜克内西发言，作了以下的声明：

“在法院审讯还未结束之前，就想利用一个疯人的行为来实行蓄谋已久的反动计划，并把还未证实的对德意志皇帝行刺案的‘道义上的主使’归罪于一个政党，而这个党是批判任何行刺的，并且把经济与政治的发展都理解为完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这种企图本身在每个公平人的眼里都要受到充分的谴责，因此，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选民的代表感到不得不作一声明：

我们认为参加今天提交国会的非常法令的辩论是与我们的尊严不相容的，并且任何挑衅，不管来自何方，都不能动摇我们这个
决议。但是我们的确要参加表决，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尽我们的一份力量来防止一票史无前例地摧毁人民自由的行动，用我们的票决胜负。

不论国会表决的结果如何，惯经斗争和迫害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以正当的不可战胜的事业的意识所赋与的有信心的镇静态度正视未来的斗争和迫害。”

继李卜克内西之后，由本尼格森发言。他的发言我认为是他直到那时最好的一次发言。这个发言表现出，他也能换一个样子，他能用比以往流行在民族自由党及政府人方面的观点更高的观点来判断事物。他在发言中说，政府的见解已明白显示出来，即明知法案会被否决而仍交议。他希望，这种见解要纠正。他指出政府的不安定和动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厉害。内阁危机在普鲁士是永久存在的。如果人们想要独裁强权，首先必须知道，谁来行使强权？像所要求的这个非常法令，他的党不能同意。历史指出，这个法令引导到哪里去，而且毫无好处。他为此作了长篇的历史考据。此外，他在发言中还主张停止文化斗争。他是个厌倦的人，他希望看着斗争的结束。在这斗争中虽然他和友人曾一度为这在俾斯麦领导之下的斗争喝彩欢迎和奋斗到底。这些所谓文化战士却迄今没有获得丝毫好处。最后他自愿明年在普通法典的基础上帮助通过一个议案，使公民自由同公众生活中的合法秩序和牢固权威为一切阶级统一起来。

那末，他现在自顾效力于他和友人二年以前用充分理由所反对的东西。这又是完全民族自由主义的。但是，事与愿违，本尼格森及其友人却被迫来作他们目前所拒绝的事情。

经过两天讨论，法案的第一章以二百四十三票对六十票，六票弃权，而遭否决。中央党全体投票反对这个议案，民族自由党人有贝塞勒、格奈斯特和冯・特拉奇克教授表示赞成。根据这结果，
政府把提案撤回。

非常法令既暂时搁置下来，欧伦堡伯爵就在六月一日给警察
机关一个训令，要它严厉对付党。“应当负责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
的鼓动，并且为这个目的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法律手段，要慎慎遵
守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但在这个范围以内使用到所许可的限度。”

一开始就不需要这样的要求。警察到处表现出他们极热心于
救国活动，检察官和法官也不亚于警察。

诺比林的行刺及其影响

我于五月底被释出狱。六月二日，一个星期日，我同妻子和小
孩去散步，下午七时以后回家。我们才到家，夫饪塔格律师的妹妹
急急忙忙地到我们的寓所来，很激动地问我们是否知道发生了什
么事？我们住在郊外，所以消息传来不快，特别是在星期日。我回
答她说：不知道。夫饪塔格小姐接着问：“您认识一个诺比林博士
吗？他今天下午行刺皇帝，皇帝受了重伤。”我哑口无言，好像触了
电。我回答说，诺比林这个名字我不熟悉，但我认为他决不属于我
党。这位年轻的女士才放心而归。

次日早晨，我急忙赶到《前进报》的编辑部，去听一听那里有什
么消息，以及人们对这事如何看法。公的电报并提不到诺比林属于社会民主党。我松了一口气，走进编辑部说：
“噢，他们不能拿这个人牵连我们了。”李卜克内西、哈森克莱维尔
和其他在场的人都和我的看法一样。没有人认街刺客，就是他
的名字以前也没人听说过。我心情坦然地离开了编辑部，但是
几分钟后我又必须转回去，因为这时又公布了第二个电报，说诺比
林在第一审中供出，他是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有同谋者。我们大家
都哑口无言。

后来证实乌尔夫电讯社的这些报道，也和其他许多当时故意
传播的这类消息一样，乃是大大的谎言和捏造。但是这些却最圆
满地达到了目的。舆论早已为了六月一日得到的消息，说当时德
意志舰队一艘最大的“大选侯号”军舰在大白天和一艘载有乘客约
五百人的船只相撞而沉没在英国海岸附近，而极为愤恨，现在听到
第二个暗杀消息，就沸腾起来。

当俾斯麦得到这消息时，他欣喜若狂地叫道：“现在我抓住了
这些家伙(民族自由党人)，现在我要把他们逼得尖叫起来”，然后他
才问到皇帝对诺比林暗杀重伤后的情况。现在解散国会和因而重
新选举已实实在在，由于他可望得到所需要的多数，这个多数就可
以批准反对我们的非常法令以及由实行保护关税获得的新收入。

诺比林是从菩提树下街他所租房屋的窗子射击皇帝的。射击
以后，他曾企图自杀，连放三枪都没有成功。皇帝被刺后，许多人
闯进诺比林的住所，一个军官用军刀把他的头部砍伤很重。诺比
林一时失去知觉，已完全不能受审讯。可以确定的是，他多年前曾
在莱比锡学习农业，并且在我们最凶狠的敌人比恩卡姆教授的学
院里的辩论会上表现为我们党的激烈对头。他又从莱比锡到德累斯
顿，进入伯麦尔特教授的学院，这人也是社会民主党的激烈对头。
在德累斯顿，诺比林曾多次在集会上发表反对我们党的演说，因
此，我们在那里的同志，如福尔马尔、施吕特尔、巴士基等都认识
他。这些人后来在对诺比林的审讯中作证，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
人，头脑非常混乱。他和党的关系比霍德尔更少。许多人发表意
见，认为，由于新闻界大量报道霍德尔这个人的消息，有一家家庭
问题报刊刊登了他的精美木刻的肖像，这引起诺比林去干这 件 事。
諾比林所描繪的形象完全不切當，他絕不是個有理智的人，他比霍
德爾更为愚蠢。”到了九月十日諾比林死在監獄裡的時候，絲毫沒
有取得證據能證明社會民主黨直接或間接同凶手有聯繫或者對他
這行動有所影響。

對於那些要不惜任何代價利用這兩個暗殺案來成立反對社會
民主党的非法法的煽動者來說，一切這些確證都是不存在的。俾
斯麥濫用他借助收買案造成的對於大部分報紙的強大影響來激起
民眾對社會民主党的狂熱仇恨。凡以社會民主党失敗為有利的
人，特別是一大部分企業家，都附和這些報紙。在敵人的陣營中，
黨被成為暗殺黨，使群众不信上帝、王权、家庭、婚姻和財產的毀滅
一切的党。這些敵人認為最光荣的事是對這個黨作鬥爭，如果可
能，就把它消灭掉。几千又几千被当作社會民主党的工人被拋
棄在街头。各報的廣告欄里刊登着聲明，工人們負有義務，此后既
不隸屬於一個社會民主黨組織，也不保存和閱讀社會民主黨的報
紙，也不為社會民主黨的活動捐錢。企业家的恐怖政策是这样厉
害，我們的報紙要求黨的拥护者，他們可以在任何聲明上簽字，但
是过后他們還是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于这样的恐怖政策不
必守信。恐怖政策和与此相連的抵制政策还有发展：爱国的房东
通知他們的社會民主党的房客搬家，还有多年来喜欢把社會民主
党人当作主顧的酒館老板現在也要求这些人回避他們的酒館。萊
比錫的《前進報》和《新世界》的主编——李卜克內西、哈森克萊維
尔、蓋塞尔习惯于每天下午编辑工作结束后到一个固定的酒館喝
杯“早酒”。老板現在让人告訴他們，不欢迎他們來臨。《柏林自由
報》和其他地方的編輯人也屢次碰到类似的事情。

在石威林，年老的德姆勃的窗子接連兩夜被捣毁，这使七十四
岁的老人异常愤怒，一时离开了石威林，并且拒绝充当国会候選
人。但是，一切這些狂暴行为和政治顛簸还不足以滿足“愛國人
士”的迫害狂。真真假假蒙君罪的告发潮涌而来。经法院证实，许多告发人是因为个人利益受到损害，复仇心切，于是进行告发。但是这并不妨碍宣判最严厉的处罰。大部分的法官被迫害狂所感染，于是，他们就宣判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的有期徒刑，这些是法律所许可的最重刑罰。以往丝毫不能惊破检察官的宁静的言论，现在都被看作重大罪行而受到最严厉的处罰。

七月初，进步党的《福斯报》写道：“在我们报道各地判决（因为蒙君罪）的徒刑的总额高达五、六百以后，我们不愿把悲惨的名单继续发表下去。”但是，法官既已完全忘记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对它们还有什么可说呢？在两个月内统计有五百二十一人被判徒刑共约八百十二年，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警察机关，一如往日，对有这类机会时一样，也似乎丧心病狂，搜查住宅，并根据不可靠的揣测，妄加拘捕。极大多数的被捕者在短时期内又释放了。

早在五月，汉堡市政府就已禁止举行全德职工代表大会，哥达市参议会在六月初也禁止举行德意志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各官署也屡次反对各协会和集会。统治集团屡次使人向我们传话，要如何堵住社会民主党的口和逼它抗議，就可以开枪了。《柏林自由报》因此发布通告说：“谨慎小心，有人要开枪了。”虽然如此，还有一批党报宣布从七月一日起订户增加。《柏林自由报》的订户由新年的1万份增加为一万四千份。但是一八七八年九月底，《柏林自由报》的六位编辑也被关起来，其中有理查·费雪尔，他还是个年青小伙子，因为加入流亡者同盟而被判七个月监禁。

* * *

这种普遍的迫害对于我和我的事业非常不利。我在长期监禁以后有必要作一次业务旅行。这次旅行应当到德国西北部和莱茵河下游一带去，这些地带大部分是我很久还没有去过生意的
地方。这就某种意义来说，也是我的幸运。我在那些地方熟人极少，在旅馆中可以冒用假名，因为我若使用本名，人们决不容我作客的。我天天在餐桌上所耳闻目见的，是客人们如何对党，也特别对我个人表示无比的仇恨。如果我被认出来，就会发生极严重的事件。但我在向商人推销我们的出品时，也遇到这类事情。我首先在萨雷河畔的哈雷访问一个商人。他认为我们的出品合意，并给我一张值得重视的订单。但是我一把我们商号名片递给他，他看到商号的名字，就粗暴地声明：“我不同这家商号作生意，您取消我的订单”。这样的事我常常遇到。有些人不作任何解释，就拒绝订货。我这一趟生意做得非常坏，在六个星期后回到家里时，我因结束了这段经历而欣喜，因为我所售出的货物还不足以补偿我的旅费，虽然我企图把旅费保持在最低限度，并且为了这个目的，在有些地方，不管雨天还是烈日之下，我把自己把九公斤重的样品箱在街上背来背去，来节省运费。

一八七八年的国会选举

回家后，我就投入选举鼓动中。俾斯麦在这里也懂得趁热打铁，并且两次暗杀事件使他摆脱了内部的各种纠纷，遂向联邦议会提出解散国会的建议，联邦会在六月十二日接受了这建议。选举定于一八七八年七月三十日举行。

如果俾斯麦只为搞一个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令，则不解散国会也可以达到目的。在诺比林克刺以后，民族自由党的全部报纸，并且在各种时机还有该党议员们也都保证，他们现在准备批准反对我们的严厉的非常法令。

但是单用这个已不再能事奉俾斯麦。他决心要打倒民族自由党人的势力；他声明说，他们的主张对于任何政府都不是正当的。然而这些要求却向来是如何有节制。他促使公布一个正式的纲领
宣言，他在宣言中完全背弃了盛行的、所谓为自由贸易服务的经济秩序。其中说：法学家、官吏和学者，那些不从事生产的人们迄今所占的优势使议会走到不切实际的方向。政党间的仇恨，各党团的内容，党团领导人的野心使人把时间都浪费在辩论表演上。大多数人没有生产性的职业，他们既不从事手艺，也不从事生意，既不从事工业也不从事农业。经济的利益却由那些依靠薪俸、酬金、议员日俸（这在当时国会还没有。——奥·倍·），新闻事业或有息证券为生的人们来代表。

这个激烈的攻击不仅是极其清楚，而且也粗野透顶。对竞选能发生影响的官员们现在认清了他们应办何事，并且依此办事。

竞选以空前未有的激烈发动起来。俾斯麦的选举口号不妨碍一切资产阶级政党把对我们的斗争看做它们最主要的责任。“社会民主党必须离开国会。再不准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当选”，也成为进步党报纸的口号。虽然人人都看得出俾斯麦的阴谋何在，他不仅要消灭我们，而且也力图削弱自由党，当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同保守党候选人或在生产选区进入复选的时候，进步党领袖欧仁·李希特尔把选举口号打电报告诉他的同党：要同鲁西乌斯（保守党人），不要卡培尔（社会民主党人）。他对我们的仇恨，竟使他不见选举策略上的自然规律，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同自由党人同样是俾斯麦经济政策的敌人，而将来的国家是没有考虑到的。

我又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候选。在德累斯顿和我竞选的是冯·弗里森男爵（一个退职部长）和一个进步党候选人。我在初选时得到九千八百五十五票，冯·弗里森七千二百六十六票，瓦尔特（进步党人）五千四百一十票。我和冯·弗里森进入复选，复选由选举委员会定于八月九日，即冯·弗里森庆祝他的七十寿辰的日子举行。显然人们预料我定会失败。但是我竟以一万一千六百十六票对一万零七百零二票胜利了。在莱比锡，我得了五千八百二
十二票，较上次选举多六百票。除我以外，我党最后当选的还有：白
拉克（格劳乔一美拉内），弗里茨（柏林），哈赛尔曼（巴门一爱北
斐特），凯泽尔（奥德朗－夫赖堡，萨克森），李卜克内西（科布伦茨一
卢森），赖因德斯（布勒斯劳），瓦尔特希（米特维达－里姆巴赫），维
麦尔（安那堡－米萨，萨克森）。这样一来，共有九位议员，其中只
有二人，即白拉克和李卜克内西，是在第一次投票中当选的。

因此，把社会民主党赶出国会的打算落空了。而且票数也比我
们遭到凶恶迫害后所敢希望的更为有利，因为在这块选区中，敌
人的恐怖政策非常厉害，使我们无法进行鼓动。党在第一次投票时
共得四十三万七千一百五十八票，一八七七年一月选举时共得四
十九万三千四百四十七票。这就算损失五万六千二百八十九票和三
个委任。敌人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

选举的全部结果，果然不出所料，是俾斯麦的胜利。民族自由
党由一百三十七个席位降为一百零六个，进步党由三十九个降为
二十六个。保守党的委任则相应地有所增加，中央党也稍有增加。

现在俾斯麦为了推行他的政策有两个可供支配的多数派。一
个同意反对我们的非常法的民族自由党－保守党多数派，还有一个
赞成他那关税政策的保守党和中央党再加上民族自由党右翼的
多数派。剥夺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政治权利和通过关税政策加
重群众负担的新纪元现在就可以开始了。要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作出决定的新国会定于九月九日在柏林召开。

这幕戏可以开始了。这是一出悲剧，注定了社会民主党要为
君主－资本家的利益的牺牲品而遭受致命的打击。但是这次也同
以往经历过的许多次一样，事情发生了变化。这位要用棍子打死
我们的海格立斯①，却在同他仇恨的敌人作了十二年对他很不名誉
的斗争以后却自己倒下来，陈尸在旷野上。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大力士。——译者